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

吴庆洲 主编

《管子》城市思想研究

STUDIES ON THE IDEAS OF CITY IN GUAN ZI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哲理、学说及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 50678070）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

吴庆洲 主编

《管子》城市思想研究

STUDIES ON THE IDEAS OF CITYIN GUANZI

苏畅 著

SU Chang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子》城市思想研究/苏畅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112-12667-5

I. ①管… II. ①苏… III. ①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IV. ①B226. 15②TU98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6952 号

本书将《管子》城市思想分成两大部分进行研究, 即营国思想与营城思想, 并归纳出其因应务实的独特性。放之国家建设中, 营国思想是全面的经营国家的方略, 营城思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转到城市建设上, 营国思想就与营城思想共同构筑起经营城市的城市思想。

本书可供从事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相关人员使用。

责任编辑: 常 燕

《管子》城市思想研究

苏 畅 著

*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霸州市顺浩图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版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frac{1}{2}$ 字数: 459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ISBN 978-7-112-12667-5

(1997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录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瑞珠 阮仪三 邹德慈 夏铸九 傅熹年

主编

吴庆洲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亨 王贵祥 田银生 刘克成 刘临安
陈 薇 赵万民 赵 辰 常 青 程建军
傅朝卿 Paolo Ceccarelli (齐珂理, 意大利)
Peter Bosselmann (鲍斯文, 德国)

执行编辑

苏 畅 冯 江 刘 晖

总序 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

吴庆洲

本文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的总序。笔者希望借此机会,讨论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学科特点、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特色等若干问题,以推动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关于“营建”

“营建”是经营、建造之谓,包含了从筹划、经始到兴造、缮修、管理的完整过程,正是建筑史学中关于城市历史研究的经典范畴,故本书系以“城市营建史”称之。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国家、城市、建筑的构建都常使用营建一词,其所指不仅是建造,也同时有形而上的意涵。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主要学科基础是建筑学、城市规划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以往建筑史学中有“城市建设史”、“城市发展史”、“城市规划史”等称谓,各有关关注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城市营建史是城市史学研究体系的子系统,不能离开城市史学的整体视野。

二、国际城市史研究及中国城市史研究概况

城市史学的形成期十分漫长。在城市史被学科化之前,已经有许多关于城市历史的研究了,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还是社会、政治、文学等其他视角,这些研究往往与城市的集中兴起、快速发展或危机有关。

古希腊的城邦和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城市复兴分别造就了那个时代关于城市的学术讨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学则源自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发展高潮。一般认为,西方的城市史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等地,与城市社会学渊源颇深。^{〔1〕}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地区的社会史、城市史、地方史等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城市史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即成书于1961年。现在,芒福德、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 1923—)、科斯托夫(Spiro Kostof, 1936—1991)等城市史家的著作均已有中文译本。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按每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70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2〕}此外,

〔1〕罗澍伟,《中国城市史研究述要》[J],《城市史研究》,1988,1。

〔2〕近代重庆史课题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内容及线索》,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城市史研究》,第5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海外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3—2008)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罗威廉(William Rowe, 1931—)的汉口城市史研究、申茨(Alfred Schinz, 1919—)的中国古代城镇规划研究、赵冈(1929—)经济制度史视角下的城市发展史研究、夏南悉(Nancy Shatzman-Steinhardt)的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以及朱剑飞、王笛和其他学者关于北京、上海、广州、佛山、成都、扬州等地的城市史研究已经逐渐为国内学界熟悉。仅据史明正著《西文中国城市史论著要目》统计,至2000年11月,以外文撰写的中国城市史有论著200多部(篇)。

中国古代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城市,在很长的时间里,辉煌的中国城市是外国人难以想象也十分向往的“光明之城”。中国古代有诸多关于城市历史的著述,形成了相应的城市理论体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刘敦桢先生的《汉长安城与未央宫》发表于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3期,开国内城市史研究之先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应该说,这与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不无关系。许多著作纷纷问世,至今已有数百种,初步建立了具有自身学术特色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体系。这些研究建立在不同的学术基础上,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水利学和建筑学等一级学科领域内,相当多的学者关注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史论著较为集中地来自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建筑史、考古学、水利史、人类学等学科,代表性的作者如侯仁之(1911—)、史念海(1912—2001)、杨宽(1914—2005)、韩大成(1924—)、隗瀛涛(1930—2007)、皮明庥(1931—)、郭湖生(1931—2008)、马先醒(1936—)、傅崇兰(1940—)等先生。因著作数量较多,恕不一一列举。

由20世纪80年代起,到2010年,研究中国城市史的中外著作,加上各大学城市史博士学位论文,估计总量应达500部以上。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史的热潮正在形成。

近年来城市史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空间的日益重视——无论是形态空间还是社会空间,而空间研究正是城市营建史的传统领域,营建史学者们在空间上的长期探索已经在方法上形成了深厚的积淀。

三、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回顾

城市营建史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不能脱离一般城市史学的基本框架,但更加偏重形式制度、城市规划与设计体系、形态原理与历史变迁、建造过程、工程技术、建设管理等方面。以往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主要由建筑学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来完成,亦有较多来自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史学者、地理学者和艺术史学者等的贡献,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日渐明显。

虽然刘敦桢先生早在1932年发表了《汉长安城与未央宫》,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而言,中国城市营建史的起步较晚。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61年完成初稿,后来补充修改成二稿、三稿,

阮仪三参加了大部分资料收集及插图绘制工作,1982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是系统讨论中国城市营建史的填补空白之作,也是城市规划专业的教科书。我本人教过城市建设史,用的就是董先生主编的书。后来该书又不断修订、增补,内容更加丰富、完善。

郭潮生先生在城市史研究上建树颇丰,在《建筑师》上发表了中华古代都城小史系列论文,1997年结集为《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台北:空间出版社)。曹汛先生评价:

“郭先生从八十年代开始勤于城市史研究,自己最注重地方城市制度、宫城与皇城、古代城市的工程技术等三个方面。发表的重要论文有《子城制度》、《台城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等三篇,都发表在日本的重头书刊上。”^[1]

贺业钜先生于1986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199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是另一本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

吴良镛先生一直关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英文专著《中国古代城市史纲》1985年在联邦德国塞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关注近代南通城市史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对城市史的研究始于龙庆忠(非了)先生,龙先生1983年发表的《古番禺城的发展史》是广州城市历史研究的经典文献。

其实,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关注和研究城市史的人越来越多,以上只是提到几位老一辈的著名学者。至于中青年学者,由于人数较多,难以一一列举。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点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培养城市史和城市防灾研究的博士生,龙先生培养五个博士中,有四位的博士论文为城市史研究: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87),沈亚虹《潮州古城规划设计研究》(1987),郑力鹏《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991),张春阳的《肇庆古城研究》(1992)。龙先生倡导在城市史研究中重视城市防灾(其实质是重视城市营建与自然地理、百姓安危的关系)、重视工程技术和管理工作在城市营建过程中的作用、重视从古代的城市营建中获取能为今日所用的经验与启迪。

龙老开创的重防灾、重技术、重古为今用的特色,为其学生们所继承和发扬。陆元鼎教授、刘管平教授、邓其生教授、肖大威教授、程建军教授和笔者所指导的博士中,不乏研究城市史者,至2010年9月,完成的有关城市营建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已有20多篇。

四、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诚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近年以来,有关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既有基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整理和积累,也从其他学科和海外

[1] 曹汛, 悼郭潮生先生 [J], 建筑师 2008, 6: 104~107.

引入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一些新的技术也被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中。笔者完全同意何一民先生的看法：城市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密切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新学科。^{〔1〕}

笔者认为，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虽然面临着方法的极大丰富，但仍应注意立足于稳固的研究基础。关于方法，笔者有如下的体会：

1. 系统学方法

系统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系统。“系统”一词来自古代希腊语“systema”，是指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现代系统思想作为一种对事物整体及整体中各部分进行全面考察的思想，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1901—1972）提出的。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

钱学森在1990年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理论中，根据组成系统的元素和元素种类的多少以及它们之间关联的复杂程度，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和巨系统两大类。还原论等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处理复杂的系统关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eta-synthesis）才是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2）把科学技术方法和经验知识结合起来；（3）把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4）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2〕}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是细节的堆积。

2. 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中国城市营建史不只是城市规划史、形态史、建筑史，其研究涉及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水利学、地理学、水文学、天文学、宗教学、神话学、军事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灾害学等多种学科，只有多学科交叉，多角度的考察，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果，靠近真实的城市历史。

3. 田野与文献不能偏废，应采用实地调查与查阅历史文献相结合、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印证相结合、广泛的调查考察与深入细致的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4. 比较研究

和许多领域的研究一样，比较研究在城市史中是有效的方法。诸如中西城市、沿海与内地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城市的比较研究，往往能发现问题，显现特色。

5. 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应考虑是否适用中国国情

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可以借鉴西方一些理论和方法，诸如形态学、类型学、人类学、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等。但不宜生搬硬套，应考虑其是否适

〔1〕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M]，14. 成都：巴蜀书社，2007.

〔2〕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 自然杂志，1990，1：3~10.

用于中国国情。任放先生所言极有见地：

任何西方理论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适用度，都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或证伪，都必须置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审视，绝不能假定其代表客观真理，盲目信从，拿来就用，造成所谓以论带史的削足适履式的难堪，无形中使中国历史的实态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我们应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某些概念和分析工具提出修正或予以抛弃，力求创建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理论架构。

在借鉴西方诸社会科学方法时，应该保持警觉，力戒西方中心主义的魅影对研究工作造成干扰。^{〔1〕}

6. 提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依靠多学科交叉、借鉴其他学科，就有可能找到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比如，拙著《中国古城防洪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古代长江流域城市水灾频繁化和严重化”中，研究表明，中国历代人口的变化与长江流域城市水灾的频率的变化有着惊人的相关性，从而得出“古代中国人口的剧增，加重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加重了城市水灾”的结论。^{〔2〕}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人口变化的背景研究城市水灾变化的一种探索，仅仅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是很难解答这一问题的。

五、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要突出中国特色

类似生物有遗传基因那样，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明显的阴性偏向，其本质性特征与一般女性的心理和思维特征相一致；而西方则有明显的阳性偏向，其特征与一般男性的心理和思维特征相一致。

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西方学者多立足空间以视时间；中国学者多立足时间以视空间。所以西方较多地研究了整体的空间特性和空间性的整体，中国则较多地探寻了整体的时间特性和时间性的整体。^{〔3〕}

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有极强的渗透性、继承性、守常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思维方式的考察对于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社会、哲学、宗教、艺术、道德、语言文字等方面，中国与欧洲鲜明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体系，不同的走向，不同的格调。^{〔4〕}

〔1〕任放. 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 [M], 357~358. 367. 商务印书馆, 2010.

〔2〕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M], 187~195.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田盛颐. 中国系统思维再版序. 刘长林著. 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刘长林. 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 [M]: 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由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中国城市的营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城市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理念指导下,根据城市的地理环境选址,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要求营建的,中国的城市体现的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中国城市营建史一定要注意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特色、突出中国特色。

我们运用现代系统论的理论,也要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易经和老子哲学也是用的系统论观点,认为天、地、人三才为一个开放的宇宙大系统,天、地、人、三才合一为古人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这些都投射到了城市营建之中。

赵冈先生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完全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力量,不待工商业之兴起,所以中国城市兴起很早。第二,政治因素远不如工商业之稳定,常常有巨大的波动及变化,所以许多城市的兴衰变化也很大,繁华的大都市转眼化为废墟是屡见不鲜之事。此外,赵冈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城乡并不似欧洲中世纪那样对立,战国以后井田制度解体,城乡人民可以对流,基本上城乡是打成一片的。^{〔1〕}赵冈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现了中国城市的若干特色。

中国城市营建史中有着太多的特色等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去做深入的发掘。即以笔者的研究体会为例:

中国的古城的城市水系,是多功能的统一体,被称为古城的血脉。^{〔2〕}这是一大特色。

作为军事防御用的中国古代城池,同时又能防御洪水侵袭,它是军事防御和防洪工程的统一体,^{〔3〕}为其一大特色。

研究城市形态,可别忘了,我国古人按照周易哲学,有“观象制器”的传统,也有“仿生象物”的营造意匠。^{〔4〕}

只有关注中国特色,才能发现并突出中国特色,才能研究出真正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的成果。

六、研究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城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在古代世界,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设了当时最壮美、繁荣的城市。汉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六朝古都南京城、宋代东京城、南宋临安城、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都是当时最壮丽的都市。明南京城是世界古代最大的设防城市。中国古代城市无论在规模之宏大、功能之完善、生态之良好、景观之秀丽上,都堪称当时世界之最。

〔1〕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M],90~91.新星出版社,2006.

〔2〕吴庆洲.中国古代的城市水系[J].华中建筑,1991,2:55~61.

〔3〕同〔7〕,563~572.

〔4〕吴庆洲著.仿生象物——传统中国营造意匠探微[J].城市与设计学报,2007,9,28:155~203.

吴良镛院士指出：

中国古代城市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城市文化灿烂辉煌，中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特点是：城市分布普遍而广泛，遍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城市体系严密规整，国都、州、府、县治体系严明；大城市繁荣，唐长安、宋开封、南宋临安等地区可能都拥有百万人口；城市规划制度完整，反映了不得逾越的封建等级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世界城市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城市有高水平的建筑文化环境。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独树一帜，‘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有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规划结构、城市设计体系和建筑群布局方式，在世界城市史上也占有独特的位置。^{〔1〕}

中国古人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上有相应的哲理、学说以及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遗产，值得我们去挖掘、总结，并将其有生命活力的部分，应用于今天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之中。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处于较低水平，并且理论尤为滞后。正因为城市规划理论的滞后，我们国家的城市面貌出现城市无特色的“千城一面”的状况。出现这种状况有两种原因：

一是由于我们的规划师、建筑师不了解我国城市的过去，也没有结合国情来运用西方的规划理论，而是盲目效仿。正如刘太格先生所认为的：“欧洲城市建设善于利用山、水和古迹，其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创作都具有本土特色，在长期的城市发展中，设计者们较好地实现了新旧文明的衔接，并进而向全球推广欧洲文化。亚洲城市建设过程中缺少对山水和古迹的保护，设计者中‘现代化’、‘国际化’的追随者较多，设计缺少本土特色。”即亚洲的“建设者自信不足，不了解却迷信西方文化，盲目地崇拜和模仿西洋建筑，而不珍惜亚洲自己的文化。”^{〔2〕}事实上，山、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营建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广州城，便立意于“云山珠水”。只是由于当代人对城市历史的不了解，山水才在城市的蔓延和拔高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以至于成为了被慢慢淡忘的“历史”了。

二是中国古城营建的哲理、学说和历史经验，尚有待总结，才能给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有关决策者、建设者和管理人员参考运用。城市营建的历史本身是一种记忆，也是一门重要而深奥的学问。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不可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之上，但城市营建的现实性决定了它也不能只发生在书斋和象牙塔之内，对于处于巨变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城市营建在观念、理论、技术和管理上的历史经验、智慧和教训完全应该也能够成为当代城市福

〔1〕吴良镛著. 建筑·城市·人居环境 [M], 378—379.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万育玲. 亚洲城乡应与欧洲争艳——刘太格先生谈亚洲的城市建设 [J]. 规划师. 2006, 3: 82—83.

社的一部分。

中国城市营建史之研究，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指导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实践意义。从创造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以及对世界城市规划理论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这两方面，这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重大的。

七、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各个学科研究城市史各有其关注的重点。笔者认为，以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以及历史学为基础学科的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应体现出自身学科的特色，应在城市营建的理论、学说，城市的形态、营建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国城市营建史应关注：

- (1) 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学说；
- (2) 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主要思想体系；
- (3)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学说和实践；
- (4) 城市的营造意匠与城市的形态格局；
- (5) 中国古代城池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和维护；
- (6) 中国古城防洪体系的营造和管理；
- (7) 中国古代城市水系的营建、功用及管理维护；
- (8) 中国古城水陆交通系统的营建与管理；
- (9) 中国古城的商业市街分布与发展演变；
- (10) 中国古代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 (11) 中国古代城市的园林和生态环境；
- (12) 中国古代城市的灾害与城市的盛衰；
- (13) 中国古代的战争与城市的盛衰；
- (14) 城市地理环境的演变与其盛衰的关系；
- (15) 中国古代对城市营建有创建和贡献的历史人物；
- (16) 各地城市的不同特色；
- (17) 城市营建的驱动力；
- (18) 城市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与规律；
- (19) 中外城市营建思想比较研究；
- (20) 中外城市营建史比较研究，等。

八、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

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书系首批出版十本，都是在各位作者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也是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成果。这十本书分别是：

- (1) 苏畅著《〈管子〉城市思想研究》；
- (2) 张蓉著《先秦至五代成都古城形态变迁研究》；
- (3) 万谦著《江陵城池与荆州城市御灾防卫体系研究》；

- (4) 李炎著《南阳古城演变与清“梅花城”研究》;
- (5) 王茂生著《从盛京到沈阳——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
- (6) 刘剡著《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
- (7) 傅娟著《近代岳阳城市转型和空间转型研究(1899—1949)》;
- (8) 贺为才著《徽州村镇水系与营建技艺研究》;
- (9) 刘晖著《珠江三角洲城市边缘传统聚落的城市化》;
- (10) 冯江著《祖先之翼——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

这些著作研究的时间跨度从先秦至当下,以明清以来为主。研究的地域北至沈阳,南至广州,西至成都,东至山东,以长江以南为主。既有关于城市营建思想的理论探讨,也有对城市案例和村镇聚落的研究,以案例的深入分析为主。从研究特点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主题:城市营建理论、社会变迁与城市形态演变、城市化的社会与空间过程、城与乡。

《〈管子〉城市思想研究》是一部关于城市思想的理论著作,讨论的是我国古代的三代城市思想体系之一的管子营城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有六位作者的著作是关于具体城市的案例解析,因为过往的城市营建史研究较多地集中于都城、边城和其他名城,相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在层次、类型、时期和地域上的丰富性而言,营建史研究的多样性尚嫌不足,因此案例研究近年来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得到了鼓励。案例积累的过程是逐渐探索和完善城市营建史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过程,仍然需要继续。

另有三位作者的论文是关于村镇甚至乡土聚落的,可能会有人认为不应属于城市史研究的范畴。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城与乡在人的流动、营建理念和技术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区域史框架之内的聚落史是城市史研究的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这些著作来源于博士学位论文,因此本书系并未有意去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而是期待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能够陆续出版,期待更多的青年学人投身于中国城市营建史的研究之中。

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的到来!

吴庆洲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目录

总序 迎接中国城市营建史研究之春天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思想体系与《管子》及其城市思想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相关界定	3
一、主要研究方法	3
二、几个界定	4
第二章 《管子》城市思想形成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7
第一节 桓管霸业	7
第二节 春秋战国经济大发展	9
第三节 田齐政权的要求	10
第四节 战国的时代风云	10
第五节 士阶层的涌现	12
一、来源于基层	12
二、形成于游离	12
三、发展于集中	13
第六节 稷下学宫	13
一、政治职能	14
二、学术职能	15
三、特点	15
第三章 关于《管子》一书	17
第一节 作者、成书年代及派别	17

第二节 孕育《管子》的地理概况	18
一、齐之疆域	18
二、齐的气候、地理条件及特征	20
第三节 齐的文化区间	23
一、根文化区——海岱之区	24
二、部族文化的分与合	25
三、一个典型现象——齐、鲁文化的比较	26
第四节 《管子》产生的文化渊源	29
一、东夷土著文化	30
二、夷夏互融	32
三、商文化的载体	33
四、周之封齐	35
五、齐文化对于《管子》的意义	36
第四章 《管子》营国（城市管理）思想	37
第一节 《管子》指导思想	37
一、因与应的营国（城）之道	37
二、以发展经济为主旨富其国（城）	39
三、以人为本安民心	40
第二节 《管子》营国思想的内容	41
一、礼法并重的政治管理思想	42
二、农业思想	44
三、经济实施方略——轻重学	51
四、发展工商业	55
五、赋税制度	58
六、军事制度	61
第五章 《管子》营城（城市规划）思想	65
第一节 《管子》营城思想概述	65
第二节 《管子》中的城市地理学思想	67
一、城市的地域选定	67
二、城市的分布	71

三、城市结构与功能	73
四、城市的规模	75
第三节 《管子》中的城市社会学思想	76
第四节 《管子》中的城市生态学思想	81
一、地宜论	81
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87
第五节 《管子》中的城市水文学思想	90
一、水文概念	90
二、城市水利	93
第六章 《管子》营城思想是东周前三千年城市建设经验的 结晶	98
第一节 溯源于考古成就	98
一、关于“城址”	98
二、在考古资料中可探源的方面	100
第二节 聚落时期的建设经验是对《管子》营城思想产生 影响的初级阶段	101
第三节 史前城址	103
第四节 夏商西周时期城址	114
第七章 临淄城——《管子》城市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和 《管子》城市思想的实证	123
第一节 齐都临淄概述	123
第二节 临淄中的营城思想	126
一、择地营城	126
二、水利工程	128
三、城防	130
四、城市规模与分区	132
五、居住区	133
六、商业区	134

第八章	《管子》与《周礼》城市思想之比较	138
第一节	概说	138
第二节	两者的内容比较	140
一、	具体内容的分类比较	140
二、	内容比较之小结	146
第三节	两者的差别	147
第四节	两者的共同点	151
第五节	两者的成因	152
一、	《管子》城市思想的形成	152
二、	《周礼》城市思想的形成	153
第六节	两者对后世都、城建设的影响	154
一、	明南京	156
二、	明清成都	162
三、	比较	165
第九章	《管子》城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70
第一节	综述	170
一、	实用性原则	170
二、	可持续性发展策略	170
第二节	南宋临安	171
第三节	宋元泉州	177
第四节	隋江都与唐扬州	179
第五节	明清赣州	184
第十章	从地方志中看《管子》城市思想	188
第一节	汀州古城	188
一、	建置沿革	188

二、山川形胜	190
三、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190
四、汀州城之经营	191
五、汀州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194
第二节 广州府城及县城	196
一、建置沿革	196
二、府城形胜	196
三、各城之经营	201
四、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205
第三节 潮州府城及县城	215
一、历史沿革与建置	215
二、府城山川形势	216
三、各城之经营	216
四、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227
第四节 归德府城	228
一、建置沿革	228
二、形势	229
三、经营	229
四、解读	231
第十一章 《管子》中的城事防御思想	236
第一节 日常管理与维护	237
一、水利设施的管理与维护	238
二、城墙的维护	243
第二节 军事防御	248
一、守之君、守之将、守之士、守之具	249
二、城之守	252
三、守城实例	257
结语	260
图录	264
表录	270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8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思想体系与《管子》及其城市思想

吴庆洲先生在《华中建筑》1996年第2期的《象天法地意匠与中国古都规划》一文中,提出了影响中国古都规划的三种思想体系:体现礼制的《周礼·考工记》中的思想体系;注重环境求实用的《管子》中的思想体系;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象天法地”哲学思想体系。吴先生认为,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代表哲学层面的象天法地规划思想“既打破了礼制僵硬的王城模式,又补充了只求实用的规划思想在内涵上的平淡无奇”,并指导着代表制度层面的《周礼·考工记》营国思想与代表物质层面的《管子》规划思想。^{〔1〕}在先生的《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一书中对中国古都中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有精辟、独到的论述。而贺业钜先生对《考工记》营国制度已作了深入的研究,可详见其著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毋庸赘述。^{〔2〕}唯独《管子》中的城市思想在此前尚无人进行系统研究。

对《管子》一书的关注,当推《管子学刊》。但其主体仍只是将该书作为一地方文化进行研究,研究的着重点主要集中在《管子》的学术流派与地域文化方面的探讨,集中在对该书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思想上的论述。而在建筑规划方面,被大量提及或引用的则是“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3〕}“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4〕}等有限的几句。

对《管子》进行系统研究的少之又少,而对《管子》城市思想进行全盘通论的在目前学术界更是白纸一张。对于该书,目前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学术流派与地域文化的探讨,而缺少对其中城市地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城市由宗法礼制政治中心向经济文化中心的转化中,以《管子》城市思想为代表的重实用城市思想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其后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等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笔者勇当开拓者,以“《管子》城市思想研究”为题展开系统研究与论证,辩证地提出了“营国思想”与

〔1〕 吴庆洲. 象天法地意匠与中国古都规划. 华中建筑, 1996, 2.

〔2〕 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3〕 管子·乘马.

〔4〕 管子·度地.

“营城思想”两个构成《管子》城市思想主体的概念，并总结出《管子》城市思想重视因应、务实的独特性。可以说本书是首篇研究《管子》城市思想的城市营建史专业著作，因此希望通过本书的撰写，率先成功地在该页的空白上挥洒几道多彩的生花之笔。

《管子》城市思想与其他处于相同时期、同样的大环境下的城市思想相比，之所以有其独特之处，在于《管子》产生于“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稷下学宫；而稷下学宫之所以只出现在齐国，并能够提供足够的学术自由，以招徕各方游士及同时容纳纷纭众说，在于齐地文化本身兼有开放、多元、务实等特点；而齐文化之所以与中原礼制文化固守、单一、重礼的特点不同，是由其所处的滨海地理环境与东夷族的民族特性所决定的；而齐国之所以和与之同时建国、同在山东境内的鲁国，二者之间有着截然相反的特点，在于两国的创国者实行了完全不同的治国方针，即“因其俗、简其礼”〔1〕与“变其俗、革其礼”〔2〕。于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结合思革求变的时代环境就成就了《管子》城市思想的特点，即因与变、重经济发展、以人为本，这几点既是《管子》城市思想的特点也是其主要的内容与构架。对《管子》城市思想进行全面研究，还要研究《管子》一书。产生于齐地的《管子》，其成书主要在战国中期，内容来源则涉及春秋与战国两段历史时期。要了解该书的特点，就必然要对其于斯生根、发芽、结果的土壤——齐文化，进行研究。从齐文化→稷下学宫→《管子》→《管子》城市思想，是本书的一个研究过程。

本书将《管子》城市思想分成两大部分进行研究，即营国思想与营城思想。放之国家建设中，营国思想是全面的经营国家的方略，营城思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转到城市建设上，营国思想就与营城思想共同构筑起经营城市的城市思想。《管子》城市管理思想也即其营国思想，包含了礼法并重的政治管理思想、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农业政策与土地制度）、以轻重之术为主的经济实施方略、大力发展工商业、“相地而衰政”〔3〕的赋税制度以及“作内政而寓军令”〔4〕的军事制度等。对《管子》营城思想也即城市规划思想的研究，则从相应的城市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及水文学等方面着手，并从东周以前聚落遗址及城址的考古资料中，验证了《管子》营城思想来自实践的科学性。在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之后，接下来就进入了向实践靠拢的过程。先是分析、比较《管子》城市思想与其生发地齐都临淄的建设之间的联系，接着比较《管子》城市思想与《周礼》城市思想，都是为了巩固对《管子》城市思想的理论性理解；再将在城市建设实践中采用适用性原则及可持续性发展策略等城市思想的城市归为《管子》类，具体分析南宋临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史记，鲁太公世家。

〔3〕管子，小匡。

〔4〕管子，小匡。

安、宋元泉州、隋江都与唐扬州和明清赣州几个城市实例，来研究《管子》城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状况；并结合汀州古城、广州府城与县城、潮州府城与县城及归德府城地方志资料的列举和分析解读，研究《管子》城市思想在城市经营中的反映与作用；最后从以上的一系列研究中总结《管子》城市思想的城事防御论，即城市经营务实论，形成《管子》城市思想的实践运用体系。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相关界定

一、主要研究方法

(一) 学科综合

尝试跨学科的方法，结合城市学、史学、考古学、社会学进行研究。在古城研究的资料上对考古学成果进行引用；方法上采用社会学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对城市思想研究的内容上涉及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及水文学等，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也有所涉猎。

(二) 比较法

1. 将齐文化与鲁文化进行比较。从源流、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及经济因素等方面对比，分析二者之所以具有不同特点的原因，由此加深对齐文化特质的认识。

2. 将《管子》城市思想与东周以前的史前聚落、史前城址及夏商西周三代城址的营建进行比较。在有限的考古资料中，从选址、总体规划及与水的关系等方面，验证《管子》城市思想的科学性与务实性。

3. 将《管子》城市思想与齐都临淄的营建进行比较。从择地营城、水利工程、城防、城市规模与分区、居住区及商业区等方面，考察二者的关系及验证《管子》城市思想的实践性。

4. 将《管子》城市思想与《周礼》城市思想进行比较。比较二者的内容、差别、共同点、成因及二者对后世都、城建设的影响等方面，以此辅助论述《管子》城市思想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三) 引用法

1. 本书在论述过程中适当引用各家之见，并根据需要将部分原文成段呈现，或采用其观点或作为补充。集各家之所见，这原本就是《管子》城市思想的基本形成方式，在书中运用此法，本身就是对研究对象在方法上的理解与运用。

2. 在书中实例论述部分，引用地方志和古籍文献中的内容。

(四) 图表解读法

书中特别是实例部分通过较多的图量辅助阐释、表达笔者的意图与思想；书中的列表有的作为对文字内容的解读而设，有的则独立设置，或归纳、或分类、或两者皆有，各有不同。

二、几个界定

(一) 营国与营城

1. 国与城

“中国都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过各种名称。称京，称都，称国，称邑，称京师、京辇、京城、京华，又称京阙、京畿、国都等等。”〔1〕“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2〕

“周代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是适应宗法分封的政治要求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这次建城活动，即实行封国的建置城邦国家活动。……建一城，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田地居邑所构成的城邦国家。因建城实即建国，故直称之为‘营国’，而‘城’也就通常叫做‘国’了。从周王到分封的诸侯，都各有城邦国家；卿大夫采邑——‘都’，也是个具体而微的城邦国家。周人奴隶制王国便是通过宗法血缘关系，联合一系列大小城邦国家而组成的。”〔3〕“三级城邑的建设体制，即王城、诸侯城和卿大夫采邑城。王城乃全国政治中心，诸侯城为诸侯封国政治中心，而采邑城便是采地区的政治中心。为了区别三级城邑，凡城邦的中心城，无论是王城或诸侯城，统称之为‘国’，而采地中心城则呼之为‘都’，以示大小尊卑之分。究其实际含义，‘国’、‘都’均是指城邦的政治中心——‘城’而言，只不过大小规模与政治等级有所区别而已。”〔4〕

“春秋时期，国名与都城名往往合一，而多以国名称之。”〔5〕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前国即都，也是指国家。故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营国”的提法对于东周前的城市建设较有概括性与代表性，较能体现当时都城建设的主要特点。而对于本书所研究的城市思想，单单用营国思想是无法涵盖的。原因在于：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引起的，各诸侯国纷纷进行的增筑与新建都、城的“僭越”行为。此时“国”虽然仍被作为城的指称，然而其实质与内涵已发生了转变，包括的不仅有都还有城、特别是城的概念在内。这点在文章中也有更深的论述。因此经综合考虑，本书认为使用“城市思想”符合《管子》一书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著书立说”之本义，故采用“城市思想”的总提法，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分概念——营国思想与营城思想。二者在本书中共同构筑起《管子》城市思想。

2. 其中的“营”

不再只是短时性、阶段性的建造、营建等单纯含义，在本书中注重的是城市兴建、发展过程当中的全时效行为。意即只要城市还存在，那么对其所进行的经营则始终不止。因而在本书中“营”具有营建、建设、防守、

〔1〕叶晓军. 中国都城发展史.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4-5.

〔2〕六韬. 武韬. 文启.

〔3〕贺业钺. 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5.

〔4〕贺业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18.

〔5〕曲英杰. 《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 管子学刊，1996，2：47.

防御、守护、维护等的综合意义。

(二) 有关古史分期

对于中国历史时代的分段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众说纷纭。(1)《中国通史》审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而代之以只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2)曹大为等新编的《中国大通史》“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且“避免笼统使用含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1〕(3)晁福林:夏商两代是氏族封建社会,西周春秋是宗法封建社会,战国以后是地主封建社会。〔2〕(4)田昌五:五帝和夏商周称为族邦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为封建帝制时代。〔3〕(5)苏秉琦:古国,方国,帝国。〔4〕(6)严文明:龙山时代——古国,夏商周——王国,从秦到清——帝国。〔5〕(7)台湾学者许倬云的见解略同,只是提法不一样:复杂社会,初期国家,正式国家,帝国。〔6〕(8)近年新出的几部篇幅较小的通史著作提法各有千秋。樊树志——文明开端,封建时代,中华帝国。李定一——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7〕〔8〕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根据西欧历史提出来的五种社会形态顺序发展的理论(以下简称五形态论)并不是任何地区任何社会必经的普遍规律。有的学者考证了五形态论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源出于苏联理论界〔9〕或斯大林〔10〕;有的学者论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种科学假说,只有单个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而无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规律〔11〕。”〔12〕

本书认为各说都无碍于本书内容的阐述,各有千秋;且也不认同传统的五段论,故而对书中涉及此方面的历史分期避而不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需要扩展,带

〔1〕原注: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3。

〔2〕原注:晁福林,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6,3;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原注: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文史哲》,1995,2。

〔4〕原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8。

〔5〕原注: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1。

〔6〕原注:许倬云,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北方文物》,1998,3。

〔7〕原注: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李定一,《中华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叶文宪,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史学月刊》,2000,2:6-7。

〔9〕原注:朱本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历史研究》,1989,1。

〔10〕原注: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1。

〔11〕原注:朱本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历史研究》,1989,1。

〔12〕叶文宪,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史学月刊》,2000,2:5-6。

来了规划上的迫切性。怎样才能形成具有现代特色而又适应国情的规划思想？这一问题成为建筑规划人员的首要任务。学古知今，只有对中国古代的城市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才有可能掌握中国城市建设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符合新时代节奏的城市思想来。作为建筑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就有必要率先突破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获得不同的思路。希望以此对中国古代规划思想有更深、更广的了解，从而有益于现实中的城市规划工作。本书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展开研究的。

第二章 《管子》城市思想形成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综观《管子》通篇，直接明了，无外乎一个主旨——营国。而且，这个主旨是为战国时期田齐君主内政外交服务的。在这样一本古籍里，不像其他子部典籍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以理论为主，而是包含了经营国家的具体理论与实践，这在先秦诸子的作品中较为少见^{〔1〕}，甚至“它的某些思想要超越自己的时代 250~300 年”^{〔2〕}。

《管子》中除了营国思想之外还有重要的营城思想。营国思想指的是全面的经营国家的方略，包含有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工商、牧民、哲学、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税收、盐铁、礼俗等等。营城思想则指的是营建城市的一系列方法与原则。“中国的古代城市，始终没有摆脱政治的控制，而是一直在政治的轨道上运行，而且越来越明确地作为统治机构的一个部分，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中心。”^{〔3〕}因此既是全面经营国家的方略，对于国家可行，那么对于城市更为有效，自然也就涵盖了全面经营城市的思想，这其中包括营建城市的思想及经营城市的策略。在国家的经营上，营国思想是主要的，居于统治地位，对于营城思想有指导意义。在城市的经营上二者则是居于同等地位，并且互为补充的；将二者结合起来便构成《管子》的城市思想。

非成于一时、一人的《管子》，上承春秋桓管，下系战国风云之势，浸润于太公“因俗简礼”开国方针的强势影响之中，每篇每句均是谏君治国的妙语良言，是不可能单凭偶有所感、光靠闭门造车就能编出来的。以下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历史的纵横向进行探讨，一究《管子》城市思想的独特内涵及深刻意义之由来。

第一节 桓管霸业

齐在春秋桓公小白当政之时进入了全面鼎盛期。齐桓称霸，是齐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到此时，齐终于得以摆脱弱国的地位，政治、军事的强势无形中也将文化中心的地位从鲁国夺了过来，改变了原来鲁强齐弱、齐为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三版），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1-102。此看法在先前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其中有类似的提法及论证，认为《管子》一书的内容复杂而有系统，有别于先秦某子、某子的书。

〔2〕〔苏联〕史太因，《管子》研究导论，周一沙译，管子学刊，1988，1：55。

〔3〕吴春明、林果，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291。

鲁掩的格局。“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1〕。齐终于率先称霸于春秋，成为五霸之首。

齐桓公治下的齐国在春秋时期傲视群雄、称霸三十余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桓公知人善任、从善如流的领导管理才能。桓公在用人上注重大节、不求全责备，且不疑其人、各尽其才，放手让其负责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任意干涉；再者，桓公闻过则改，勇于接受臣属的直谏及批评，居安思危、有远见有抱负，是一位襟怀博大的政治家。他能够不避私怨去接受出身微寒且对他曾有一箭之仇的管仲，拜其为相并尊之为“仲父”，而在其后称霸的晋文公却仍在无谓地坚持“异姓之能，掌其远官”〔2〕。故唯有桓公的雄才伟略，才让他有足够广的胸怀重用管仲这位异姓士人为相，且位在命卿国、高二氏之上，权势仅次于自己。《管子》中有关桓公纳谏的篇章便是对当时史实的记述，同时也为提醒当世君主应善于纳谏起了旁敲侧击的作用。

管仲自小的遭遇及所受的教育，令他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文韬武略，并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他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立有远大志向、具不世之才的管仲，没有更不会全盘照搬周之旧法。从其相齐之始起，便以其开拓创新的胆略实施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治国之策。一方面“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3〕，有选择地继承太公以来的治国方法，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俗之所欲，因而欲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4〕，于是邦安国治。另一方面“参其国而伍其鄙”〔5〕，以周文化作为借鉴改造东夷文化，实行一系列强而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上的改革措施〔6〕。开明的政策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促进了齐与外界的交流，在思想上渐趋多元化，从而带来了文化的开放与兼容。唯其如此，齐才有可能以大国的雄姿屹立于中华之东方。“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7〕！“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8〕这几句正是最佳的写照。孔子赞管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9〕后人总结管仲相齐的方法、实践与理论，便成了构筑《管子》城市思想的主要框架。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国语·晋语四。

〔3〕国语·齐语。

〔4〕史记·管仲列传。

〔5〕国语·齐语。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三版），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4—112。有学者认为此即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变革，由于说法纷纭、兼涉极广，本文暂不进行对当时社会制度的确证工作。

〔7〕史记·齐太公世家。

〔8〕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9〕论语·宪问。

第二节 春秋战国经济大发展

西周时代，天子、诸侯乃至卿大夫等贵族，都拥有自己作坊和工匠，一般平民的生活也多自给自足，因此商业没有太大的进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开放山林川泽的资源，采取抽税办法令工商业者自由经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列国争霸竞雄，战祸连绵，干戈不息，但经济发展并未停滞，反而因各国竞争的需要而有所进步。春秋时，已出现许多独立的手工业者。当时经济发展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铁器的出现和使用。根据考证，铁制的生产工具在春秋初期就已开始使用，但那时的打造技术还不够先进。到了春秋中期，齐国已广泛使用铁器作为劳动工具，晋国则在春秋末期用铁器铸造刑鼎、铁犁，南方的吴、楚、越三国更成为铁器生产的中心。铁制工具不仅有犁、铧、锄、耜、镰、铎，还有斧、刀、锤等。到了战国，分化出众多生产部门。除青铜冶炼、制陶、纺织、造木、玉器等不断进步外，冶铁、造车、造船、制革、煮盐、漆器等都有重大发展。尤其是冶铁，更成为重要生产部门。当时手工业的地域分工格外显著，工艺水平颇高，如吴、越的刀剑，赵的冶铁，齐的桑麻、纺织，楚的皮革，都是闻名的手工业产品。由于冶铁技术不断提高，春秋战国之交还出现了炼钢，并首先被用于铸剑等兵器制造业。吴、越、楚等国都是当时铸造名剑的地方，出现纯钧、湛卢、豪曹、鱼肠、钜阙、干将、莫邪等名剑。

春秋战国时各国之间的商业交换也颇为频繁。据《荀子》记载，当时北方的良马、大狗，南方的羽毛、齿革、丹青，东方的龟贝、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在中原的市场上。商业发展的另一后果，是都市的兴起。当时万家之邑多了起来，各国的都会往往成了商业交换的中心，如东周的洛阳、魏的大梁、韩的阳翟、齐的临淄、赵的邯郸、楚的郢都、燕的蓟、秦的咸阳等等。

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兴修，比较著名的有漳河渠与都江堰。漳河渠修建于魏国，由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县令西门豹所督修。都江堰是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所建，位于四川岷江中游的灌县（今成都附近），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它令岷江水源源不绝地流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上的千百条大小渠道，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都江堰历代维修扩建，不断地发挥着重大效益。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当时人们在工商业上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如何发展工商业及提高经济效益渐渐跻身于统治阶层的日常议题。在某些开明或有发展经济的传统的诸侯国中，如齐国，务实被摆上了治国大计的实施当中。于是务实性不可避免地成为《管子》的特点之一。

第三节 田齐政权的要求

及战国时田氏代齐，欲巩固自己得来不易的统治地位，需要有合理的理论根据和舆论支持，于是就有了黄老学说的诞生。远古传说中黄帝战胜了炎帝，而炎帝为姜氏始祖，田氏于是将黄帝认作远祖加以尊崇。有铭文“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成。其唯因咨，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迹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为证。^{〔1〕}有了历史依据，田氏代姜氏专齐政就顺理成章。“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2〕}，齐国田氏本是由陈国公子敬仲完从陈出奔于齐而迁来的。陈数为楚所灭^{〔3〕}，楚地老子道家学说也数传入陈，因而在齐的陈田氏也受到影响。道家思想被田氏运用到治国上，即顺乎民心。“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4〕}，齐人遂尽归田氏，“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5〕〔6〕}。因此注定了黄老学与田氏政权间互相依存的特殊关系。为田齐服务的黄老之学所继承的道学，也不再注重老子道家的“无为”而治，而是以“道”的哲学思想为主，兼收其他各说的政治思想和道法结合的积极为政之术，具有为政治服务的现实性，同时成为支撑《管子》的“道”与“法”两大主要派别之一。《管子》之成书为田齐的统治提供了经验和良策。

第四节 战国的时代风云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是分封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经济、交通条件下，各诸侯国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而只是用宗法关系维系的一个政治军事同盟，所以一旦王室削弱，诸侯割据争霸的局面也随之出现。诸侯争霸固然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兼并之战使诸侯数目减少，形成了区域性的统一；各国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都进行了改革，促进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争霸斗争促进了各族间的接触和融合，加速了各族文化的交流和互补，春秋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战国时代风云变幻，霸国此起彼伏。各诸侯国跃跃欲试，均望一尝身为霸主的滋味，而且强者存、弱者亡的残酷现实也令他们不得不奋起搏击。于是如何强国成了首要任务。从当时的历史可知，启用人才、全面改革是最为

〔1〕 青铜器铭文。陈侯国青敦。

〔2〕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 史记。陈杞世家。

〔4〕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5〕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6〕 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132。齐君主的称谓：“从姜太公封齐至齐桓公，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都称君，齐威王始称王，齐湣王一度称帝。”

直接有效的方法。齐国田氏统治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时机，复兴齐国、再现姜齐桓公时的辉煌，固然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远大目标，而站稳脚跟、发展经济，更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历来治国，用人政策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荣辱。齐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方面。齐国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统治者长期执行了正确的用人政策。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从姜太公治始，就秉着“举贤而上功”〔1〕的方针，明确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其因俗简礼的治国思想。“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2〕。在委任各级官员时，太公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没有因循守旧沿袭周礼，在周初世卿世禄制主导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准则，而是尊贤与用能并重，任人以贤。太公在用人问题上所制定的这种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不重名分，以功为尚的方针，开始冲破了世卿世禄制的藩篱，把入仕的门户向血缘贵族以外的广大人民开启，这在周初，是很了不起的创举。如此便团结、利用了齐地原居民及异姓贵族中的贤能之士，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同时也极大地缓和了姜氏政权与齐地其他势力之间的矛盾，使齐在建国之初危险的局势中迅速稳定下来。在这种豁达开明的治理下，齐国奠定了政治开放、经济发达的基础。

到了桓管之时，先是有了桓公的尊贤用能，听取鲍叔牙的建议启用管仲这位治世良才，才会有接下去所创的旷世奇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相齐，不仅沿袭了姜太公的做法，并且全面实施广纳人才的方案，使之制度化。其一，确立全面有效地挑选官吏的“三选”制，这种选举制度包括各乡长每年定期向上推举基层人才、各级行政长官考评后以书面上报、桓公亲自面试策问等三个主要环节，故称为“三选”。地方官吏如果压制、埋没人才，便会被治以“蔽贤”、“蔽才”之罪。〔3〕这样就开辟了各层人士参与国事、政事的渠道。其二，广招天下人才之制，以“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4〕。其三，实行“啧室之议”的制度以纳谏进贤，“有非上之过”者，“谓之正士”。〔5〕

及田氏当政之际，必须巩固得之不易的政权，并在日趋频繁、不断升级的兼并战争中谋求富国强兵。鉴于这种内欲稳、外求强的情势，以承继桓公霸业为标榜的田齐君王吸取了姜氏政权的宝贵经验，因而具有与外国不同的战略眼光，不仅将其贤士良将视为至宝，最具实际意义的做法便是创立了稷

〔1〕 汉书·地理志下。

〔2〕 汉书·地理志下。

〔3〕 管子·小匡。

〔4〕 管子·小匡。

〔5〕 管子·桓公问。

下学宫以招揽天下能人志士。兼并战争实际上是实力的竞争，而一个国家实力是否雄厚，关键在于该国的治理如何。国家治理的第一步就是选择适合本国实情、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有识之士在学宫里可以自由地发挥自身所长——参政、议政、总结前人、审时度势、著书立说等等，提供适宜的治国方案，一切都是为了适应田齐政权意欲图霸的需要。《管子》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之一，其营国思想从营城、建明堂、封禅、巡狩等国之大典，到爵禄、祭祀、婚丧等制度，甚至君王的衣食住行的小细节，都做出了翔实的规定，在理论上和舆论上积极配合，为齐国的再度复兴发挥了理论和实践作用。

第五节 士阶层的涌现

士阶层是先秦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它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以后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面貌。《管子》正是由该阶层的人员集体编撰出来的成果。作为《管子》的作者群，他们特有的精神追求及创作取向必然决定着该书的特色。因此研究一下士阶层的来源、形成与发展状况将有助于对《管子》一书在具体内容上的理解。^{〔1〕}

一、来源于基层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士，事也。”段玉裁疏此字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说文解字》训士字后又引孔子语：“推十合一曰士。”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考证士即为“士伍”之士。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牘中载有武士又名“什伍”。从上面诸家的考证可以得知，士阶层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因为有勇力和武艺，所以被特别选拔出来。刚开始时还是平时从事耕耘，有战事的时候则组成军队作战，后来慢慢地不再耕田，专门作为武士。他们的地位仍然较为低下，但已是属于宗法关系中的一部分了，是一个特殊的中介性的社会阶层。

二、形成于游离

春秋时期，士阶层开始出现分化与蜕变。作为上层社会与平民社会上下流动的过渡、汇合之处，其成员不断地处于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春秋时期，列国争霸，各社会阶层的关系重新调整，统治阶层垄断知识的局面被打破，一部分士人接受知识并专门从文，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士产生了。

各诸侯国为了巩固及增强自身的实力，大量需要有特殊才能的士。士与各级统治者的原有关系改变了，出现了如《日知录·周末风俗》所述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面。士阶层周游列国，游说、游学，各施其能、各取所需。体现这一人际关系变化的社会现象之一，便是春秋中期开始流行的养士之风。养士之风为士阶层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空间，使得士人们

〔1〕以下有关“士阶层的涌现”的观点参考自《侠的文化存在》(www.wenyl.com)系列文章。

打破了地域、身份的界限而自由地流动和聚集，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三、发展于集中

战国时代，社会对士的需求量大增，各国君主都争先恐后地“礼士”、“养士”，千方百计地收罗人才，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强。

士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士阶层以其自身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辅佐君王强国称霸，并通过群体力量，汇集、创作综合性的治国安邦的谏言良策。齐国在用人方面，就不仅向国内各阶层人士开放，还特别重视招揽别国的人才。比如齐桓公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引进人才，“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1〕。再如战国时期更在临淄稷门之下设立稷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著书立说。于是，成就了《管子》一书。

第六节 稷下学宫

稷下学的特色反映了《管子》的特色，同时也是其营国思想的特色。

齐稷下学宫的创立年代众说不一，有三国徐干《中论·亡国》曰：“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此处齐桓公指的是战国时田齐桓公午。稷下学宫是由桓公午始创，此说现多被接受，本文亦从此说。学宫之名是因其位于齐国都城临淄城西门“稷门”〔2〕〔3〕外而得名。〔4〕稷下之学的诞生，一言以概之，乃顺应了齐国统治者改革创新、图霸称王的政治需要。

齐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从姜太公治国时“尊贤上功”的传统始。姜齐桓公执政时求贤若渴，设庭燎之礼、“啧室之议”广纳人才。稷下学宫的内在形式已初见端倪。可见从建国起，齐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人才对于实现霸业的重要性，这对于稷下学宫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和参考性。之后的田齐君主认识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长期性，加上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因此着眼于培养人才的长期效益而创立了稷下学宫，使齐国在人才资源上较之其他各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可以说，稷下学宫是变私家养士为国家养士，是田氏家族的私家养士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扩大。”〔5〕

〔1〕管子·小匡。

〔2〕李新泰，齐文化大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01-502。历代学者对稷下学宫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的几种说法。

〔3〕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3。稷门的具体位置也有在古临淄城的小城西门、小城南门或大城西门等说法。

〔4〕胡家骥，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6。

〔5〕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3。

如果说桓公小白的举措还仅仅是单纯的政治行为,那么桓公午设立的稷下学宫应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职能了。议政咨询、著书立说和授业讲学等都是学宫具有的功能。稷下是齐在战国大环境里重才的实际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前面已讨论过),并作为肥沃的土壤生长出了《管子》这样一棵大树,开花结果得到《管子》城市思想这个丰硕的果实。

一、政治职能

正如《管子·形势》所云:“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稷下学宫之所以历六代齐主^{〔1〕}、一百五十余年之久,各国各派学者能够长期聚集于此,是有其独特原因的。可分为内外双重原因。内因是谋求富国强兵的田齐统治者迫切招徕“不治而议论”^{〔2〕}的天下文人,对学宫采取优惠政策。在政治上给予很高的地位,“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3〕};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4〕};言论和行动上给予自由,“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5〕}。外因是正值战国各诸侯国纷争兼并之际,魏文侯任用魏成子和李悝开变法改革之先路,接着公仲连在赵、吴起之楚、商鞅入秦、申不害于韩,掀起一派变法改革的潮流。各方学士顺应潮流,带着各自的营国方案积极奔走参与,在哪里受重用就投靠在哪里。不甘示弱的齐威王在“诸侯并伐,国人不治”^{〔6〕}的情况下振作起来,任邹忌为相、田忌为将,锐意变革,大力扶植稷下学宫为其所用。有了这些保障和动因,诸子百家纷纷汇集于稷下。一时之间如众鸟投林,学者荟萃,“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7〕},鼎盛时达到“稷下先生千有余人”^{〔8〕}。

稷下学士们对齐国政事起着议政、咨询的作用。他们积极通过演讲、辩论及著书立说等各种方式议论时政,及时地纠正齐君的失误和偏差,就齐君的询问出谋划策、直陈利弊,协助国君对重大国事做出适当的判断和决策。另外稷下先生在齐国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学识渊博、口才出色且见多识广,故而能圆满地完成出使任务,不辱君命。在战国兴王称帝的高潮中,稷下学士们还根据形势需要,为田齐君王制造了大量政治舆论,为他们一统天下论证了合法性,并且拟定了一整套相应的礼仪制度。

〔1〕胡家骢,《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为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六世。

〔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6〕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8〕盐铁论,论儒。

二、学术职能

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主要发生在稷下，这里是“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在活跃自由的学术气氛中，稷下学士们纷纷著书立说，百花齐放，“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1〕！同时他们还收徒讲学宣传己说。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些门人弟子只能局限于听一家之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先生及内容去听讲。《管子·弟子职》篇中，就记录着来稷下求学的学士们在品德、纪律、起居、仪表等各方面都必须遵守的准则。既保证学宫教授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也反映出稷下学宫作为学术中心的正规性。

学宫定期的学术活动为学士们提供了学术争鸣的场所和机会，原先封闭的各派思想在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学士的见解在接受各方评判、建议和启发后，客观地认识到自身的狭隘性而进行更新。于是均以本学派的理论思想为本位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如儒法互补、道法相参、儒家的文治教化深入人心、道家的哲理成为共识等等。“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2〕，反映了诸子百家既互相争鸣创新又彼此融合互补的特点。《管子》中法、道、儒家思想的彼此渗透，即是最佳的例证。各派经过发展重塑各树新旗，同家同派内也发生分化，以致很难确切地界定他们的派别归属。稷下成了各种新学术派别的发源地，除上面提到的黄老之学源自稷下，还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秦法家的齐法家，与阴阳学说结合的五行相生相胜说，及从名家分化出来受墨辩影响初涉逻辑学的名辩派、将形名理论与变法实践结合的名法派等。这些思想无一例外地反映到《管子》一书中。

三、特点

稷下诸子百家，由于阶级、阶层、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体系，各有自己的理论重心，各有自己的学术动机和目的。然而无论稷下诸子持有何种学说，是否适合统治阶级的现实政治需要，都能在稷下存在、发展；当权者非但不加干预，还积极创造条件，优惠学者，鼓励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上说下教。各种理论学说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共存并立，竞相争高，各以其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方式、途径而存在、发展着，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稷下学宫的两大职能中，是以政治职能为主、学术职能为辅的；其中学术职能是手段，为政治职能的发挥提供可能性，政治职能则是目标，为学术职能的进行指引方向。“适应政治上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大趋势的要求，学术思想就出现了融合统一的趋势。”〔3〕因此作为主体的齐文化以其开放

〔1〕史记·孟荀列传。

〔2〕汉书·艺文志。

〔3〕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4。

性容纳、影响着多元的诸子百家，打破了旧式的门派之别及过时的门户之见。来自各个文化圈的学术思想都汇集在这个大熔炉里进行了大交流，不同类型的思想不断发生着碰撞，回旋激荡之余实现了学术上有史以来的大融合，不再互为排斥，相互间的界限也不再分明。在学术上分属各派的稷下学士们，自由辩论，不拘囿于一家之言，同属一个学派的也各自拥有不同的主张和倾向。显而易见，分化与融合在这里成为同义词，代表着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趋势。可以说，务实性、适应性、开放性、综合性是稷下学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特点。

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为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管子》一书就是在这片土壤上开出的一朵奇葩，首当其冲成为以齐文化为基础的稷下学的代表作。当其时，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因为有了稷下百家丰富多彩的政治思想的争鸣，才产生了兼容并蓄的《管子》及其具有齐国特色和政治价值的城市思想；稷下之学务实性、适应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也就同时成为《管子》内涵的特点。

《管子》既对管仲的营国思想一脉相承，又博采众家之长。其城市思想的内在综合性与齐文化的特色相契合，外在适应性又与时代背景丝丝相扣，是齐文化的深层体现和高度浓缩。

第三章 关于《管子》一书

第一节 作者、成书年代及派别

《管子》一书，经多方学者考证，可以初步认定，是由不同作者于不同时期依托管子之名写成的。^{〔1〕}因而书中各篇的观点与思想有些许差异，甚至出现重复或截然不同的主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工作造成混淆。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时代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的提高，各期作者思想、观点的一个既继承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角度上看却又是有益于对特定时期与环境的事物进行研究的。本书综合各种意见及各方因素，认为该书主体应是完成于东周时期，特别在战国中期，而主笔的则应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诸学者们。西汉时流传的《管子》有564篇，经刘向整理删存，编为86篇，后佚失10篇，存76篇即为今本《管子》。该书包容兼收，各家各派的思想均有所体现。虽然许多学者将其派别定为法家，但鉴于书中又有较浓的道家意味及其他如儒家、阴阳家、名家、轻重家、兵家、农家等的思想，本书认为很难作确切的定位。由于该书主体成于田齐稷下学风盛行之时^{〔2〕}，姑且将其派别归属为稷下管子学派^{〔3〕}。

管子（公元前？—645年）^{〔4〕}，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他是姬姓后裔，管严之子。原是贵族出身，因家道中落降为平民，做过许多低下的职业，屡屡不得意。姜齐桓公立后，经好友鲍叔牙极力举荐，兼桓公不计几为他所伤之前嫌，管仲得以为齐上卿，并被尊为仲父。其任齐相四十年，大力辅佐齐桓公，全面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一系列改革，从而使齐威大振，“九合诸侯，一

〔1〕主要分歧在于：有的学者认为成书于春秋至汉，参见吴文涛、张善良编，《管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1；有的则认为是由战国推崇管子的稷下先生们编撰而成，参见胡家骥，《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之观点。至于有关的争论如《管子》作者、断代及思想体系和学派归属等，可详见王德敏、刘斌等，《管子十日谈》，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3-7。

〔2〕胡家骥，《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7。本文从其说。

〔3〕张岱年，《齐学的历史价值》，《文史知识》，1989，3。所谓“管子学派”的提法乃多家之言。其中有张岱年先生的解释：“《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的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该说堪称代表。

〔4〕也有公元前725—645年之说。

匡天下”〔1〕，于春秋各诸侯中率先称霸，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为此备受后人所推崇，故而孔子赞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2〕！《管子》书中，以记录管子的言行、总结继承管子的营国思想为源起和主脉，汇集了春秋以来的各种思潮。而有关营国的思想又是稷下学者切合战国时期田齐变法的需要，作为理论基础而提出来的。战国初期取代姜齐政权的田齐统治者以承继齐桓霸业为己任，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管子》之成书为田齐的统治提供了经验和良策。

第二节 孕育《管子》的地理概况

齐地以姜姓封国。有一说，指“齐”乃取《尚书》中“天齐于民”之意，这是治国方面的涵义。〔3〕再一说，“齐”者，“脐”〔4〕也，地之中心；又“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5〕。这是从地理方面来说，即言其地之重要。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各要素，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齐独特的地理环境是齐文化产生的基本因素和支撑点，作为齐文化的载体，主导着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齐之疆域

齐地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雄跨于山东半岛的齐国的主要疆域。在齐国立国至灭亡八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换及军事形势的动荡，齐国疆域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因而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去考察一二。〔6〕

在西周早期齐地古国除伯陵氏被蒲姑氏取代、蒲姑氏为周所灭外，齐地中东部诸国仍大致保持着商代原有的态势，所以当齐国始封姜太公初于营丘就国时，便同莱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被迫三迁其都。齐国疆域在立国之初甚狭，“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或封百里或五十里”〔8〕，“太公之封于齐，为方百里”〔9〕。其范围约南起临淄，北到博兴，南北长、东西窄的一段狭长地带。（图3-1）在太公之世齐国范围即已有所扩展，既有经济作用，如“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又有政治影响，如“及周成王少时，

〔1〕史记·管晏列传。

〔2〕论语·宪问。

〔3〕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33-135。

〔4〕黄松编，齐鲁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35。

〔5〕史记·封禅书。

〔6〕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8。有详细的论述。

〔7〕史记·齐太公世家。

〔8〕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9〕孟子·告子。

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1〕}，虽然这只是齐受权征伐的范围，但也可说是其拓展疆域的起始及手段。总体说来，西周之世齐国的疆域仍在临淄周围，没有多大的扩展，方圆不过百有余。



图 3-1 西周时期齐国位置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17-18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节选增绘)

春秋早期齐国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活动，今寿光、益都一带的纪国首先被纳入齐国的版图。在西部地区，于周初形成的谭、成、遂等国也相继被灭。姜齐桓公时期的对外政策并不以兼并为目的，而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存亡续绝、九合诸侯。因而，其征伐所达的范围也不能算是其真正的疆界。《国语·齐语》载：“（齐）地南至于陶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鄆。”《管子·小匡》亦有类似的记载：“（齐）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二者指的都是桓公发展初期的疆界。到了兴盛期及发展后期，至少达“方五百里”^{〔2〕}的范围。春秋中晚期，齐国经过长期的力量积蓄终于展开了对其宿敌莱夷的兼并战争，并于齐灵公时期灭亡莱国，此时齐国东部疆界已越过胶莱平原，抵达大沽河流域^{〔3〕}。位于今黄县及其周边地域的东莱古国、安丘境内的杞国，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或稍晚的时候被并入齐国的版图，黄县归城古城废弃于春秋战国之交可为其证。“春秋末期，齐国的疆界北至渤海，南到泰沂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管子·轻重丁。

〔3〕《左传·昭公二十年》：“聊、摄以东，姑、尤以西。”杜注：“聊、摄齐西界也，姑、尤齐东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阳郡东南入海。”此二水即今大沽河、小沽河。

山脉以南之地，西至今聊城县境，东已到今胶莱河以东的黄县、招远一带”〔1〕。〔图3-2〕至此，前引周成王所允齐太公“实得征之”的齐国疆域才得以实现。周代齐地域内的周人文化是由西向东逐步延伸的，地处半岛东部的莱阳前河、诸城斗鸡台、栖霞大北庄和黄县归城都发现了西周墓，可视为齐国与莱夷互通渔盐之利等经济交往过程的遗留。乳山南斜山的周代墓葬则完全保留着夷人的文化风格。其他周人势力达到的地区，包括临淄齐故都附近的物质文化，大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定的夷人素面鬲文化遗存。

战国初期，齐国的疆域没有大的变化，此后齐国不时地发动扩张战争，掠地颇多，如鲁国的多处边邑、卫之贯丘、燕之桑丘、魏之观地都曾沦为齐国的属邑，燕国和宋国（包括楚国的淮北）也曾整个地被齐国所兼并。《战国策·齐策一》云：“（齐）东有菑川、东莱、瑯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信阳；西有济南、平原。”又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语：“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在诸侯争霸中，齐之疆域显然更为扩大。到战国后期，其北至渤海湾一带，东已囊括山东半岛，西达黄河故道今鄄城和河南濮阳一带，南甚至深入鲁南大部地区。〔图3-3〕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齐国的这种占领是相当短暂的，时隔不久六国合纵伐齐，燕将乐毅攻破齐都临淄，占领七十余城，秦、楚、魏、赵等国也相机掠地夺城，齐国几乎被灭亡，故这些地方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齐地。〔2〕

二、齐的气候、地理条件及特征

齐国故地气候属暖温带季风类型，年平均气温11~14℃，年平均降雨量在550~950mm之间，由东南向北递减，降雨集中于夏季。〔3〕

齐地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山东〔4〕一带，古属《尚书·禹贡》所载的九州中青州、兖州及豫州的一部分。“从科学地理学看，古齐国位于今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地区，在东经115°50′~122°40′，北纬35°45′~38°30′。”〔5〕

据《尚书·禹贡》所定九州土壤优劣来看，齐地土质应属中等。虽仅属中等，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与那些土地贫瘠之国比较，可算是不错的了。有这样的基础因此才可能经过日后的发展，从管仲口中“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海庄、龙夏，其于齐国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埽齐地者五分之一”的“非谷之所生”之地，〔6〕形成太史公所见的“自泰山属

〔1〕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7。

〔2〕王承典。先秦齐地历史沿革述略。管子学刊，1996，4：23-24。

〔3〕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7。

〔4〕黄松编。齐鲁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2。早在战国秦据关中时期，称崂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之后，在不同时期所指的地域不同，总趋势是范围逐步缩小东移；而用山东专指齐鲁则是由汉代始。

〔5〕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6。

〔6〕管子。轻重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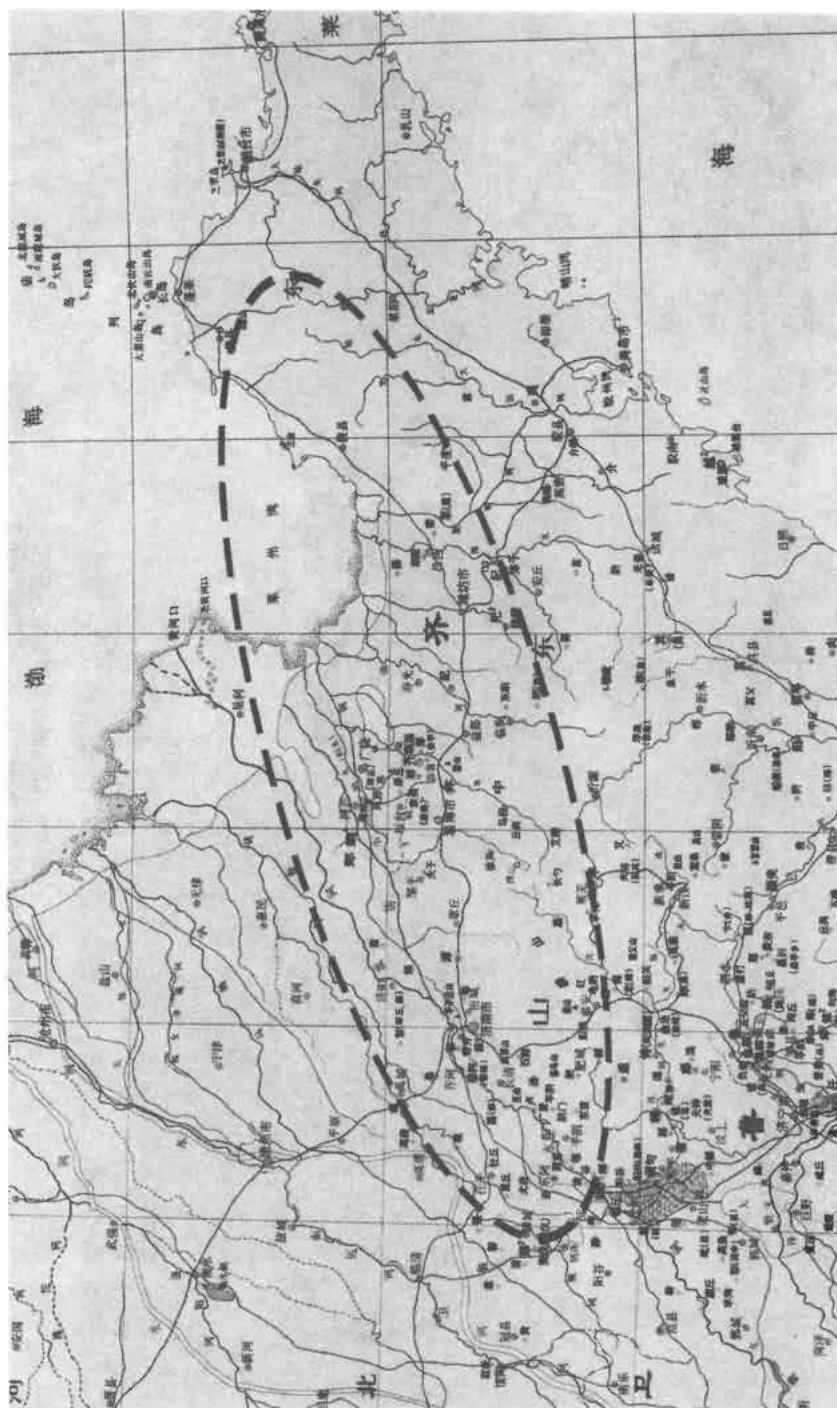


图 3-2 春秋时期齐国位置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26-27 “春秋时期齐鲁” 图节选增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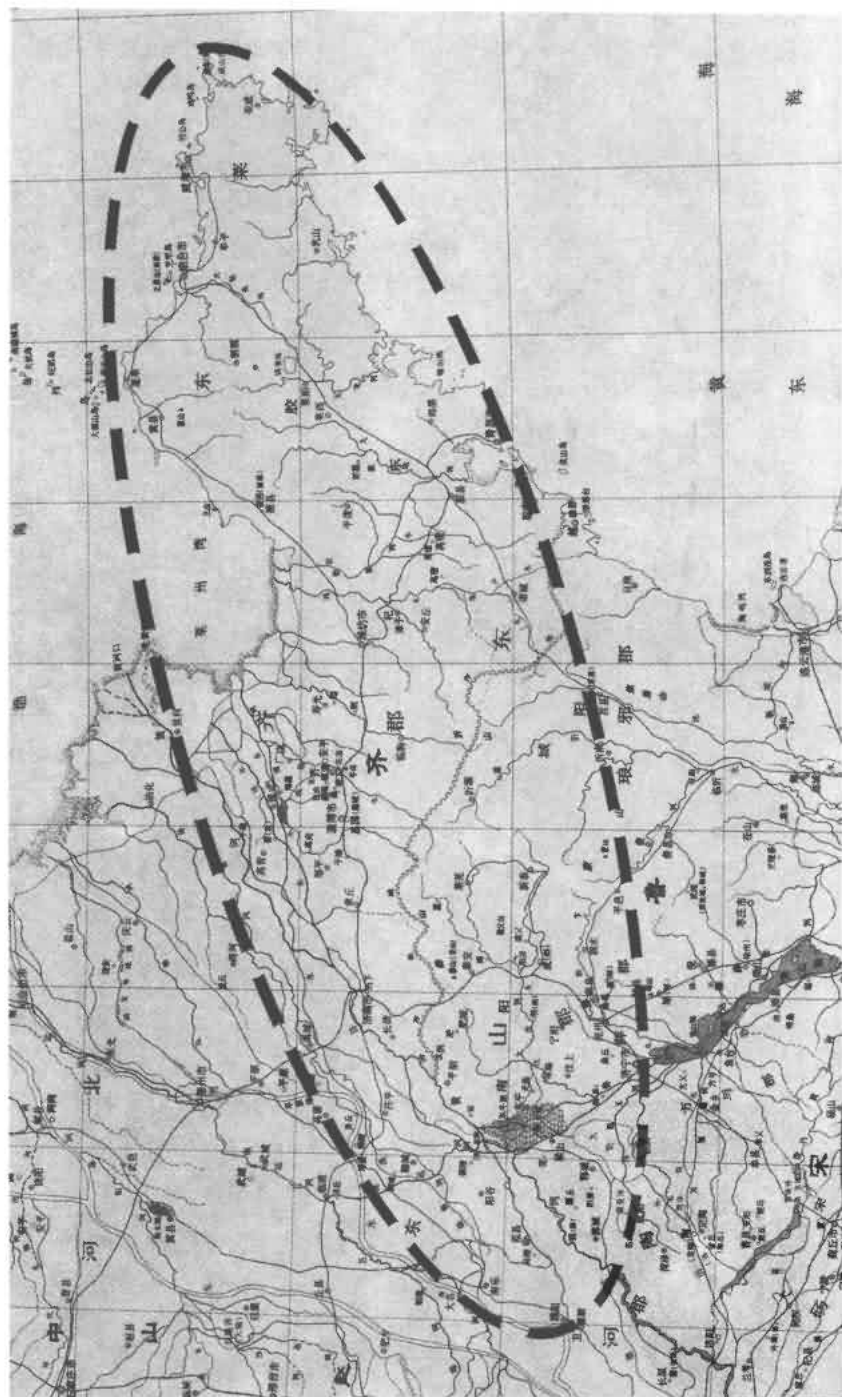


图 3-3 战国时期齐国位置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9-40“战国时期齐鲁宋”图节选增绘)

之琅邪，并被于海，膏壤二千里”〔1〕之景。

齐故地水系较为发达，河流分属于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小清河流域，湖泊主要有东平湖等。其地貌多样，有中山、低山、丘陵、台地、盆地、山前平原、黄河冲积扇、黄泛平原及黄河三角洲等类型。周边东临黄海，西北有黄河、济水和渤海，南部为泰沂山脉，自西向东横亘泰山、鲁山和沂山，呈南高北低的地形。在山海之间则是堆积平原，地势和缓，分布有网状的河流。〔2〕（图 3-4）这种相对独立、在军事上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孕育出古老的、自成风格的滨海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且“夫齐衡处之本，通达所出也”〔3〕，由于沿水、沿海的便利，使得齐地处交通要冲、四通八达，对外发达的水线，沟通了齐国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面对海洋形成的宽广胸怀及与外界频繁往来开拓了齐人的思想，以致“民阔达”、“俗宽缓”〔4〕，令他们摒弃保守而重实效、尚开放。齐文化的这种特点自然也成为《管子》最基本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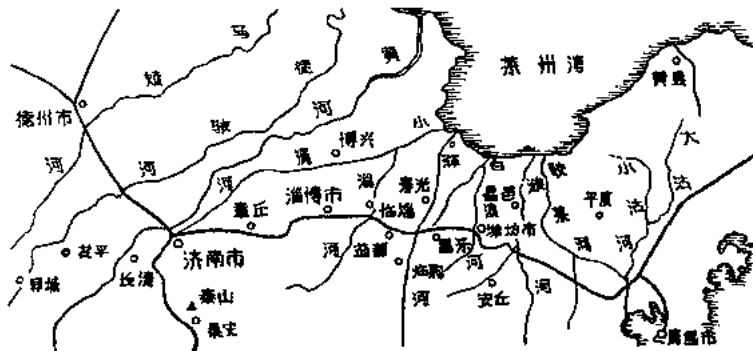


图 3-4 齐地水系示意图

（引自叶骥军. 中国都城历史图录. 第一集: 132）

第三节 齐的文化区间

社会文化是在地理环境条件的孕育下，经过人类生产及劳动实践提炼出来的产物，其地域特征是在自然地理及社会人文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下不断发展形成的。因而说各个地域文化的特征反映了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同时也渗透、反映到文化与物质层面上，未为不可。研究地域文化必须明晰构成它的各种部族文化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才可能揭示出其本质特性，而不

〔1〕史记. 齐太公世家.

〔2〕王闾森、唐致卿主编. 齐国史.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7.

〔3〕管子. 地数.

〔4〕史记. 齐太公世家.

致流于表面形式、产生片面性。

“所谓齐文化，是指先秦古齐国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其先驱是东夷海岱文化，中经周初吕尚建国及春秋战国时期，而形成和确立的文化系列”〔1〕。产生于齐地的《管子》，必然映射出齐文化的特质。齐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也必然影响着《管子》一书风格与特点。

一、根文化区——海岱之区

海岱之区包括今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全省、河北东南部、豫东、皖北和苏北的区域，因处于山海之间而得名。海岱文化即是代表海岱之区空间方位的文化，衔接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等体系。海岱文化区的自然地貌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即低山丘陵和冲积平原。前者主要有鲁中丘陵和胶东丘陵，后者主要为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也有一些小范围的山前近海平原，如胶东半岛沿海地区。泰沂山以北地区，主要为后来齐国及其控制的小国分布区。泰沂山以南地区，则以鲁、宋、莒等为主。在大水系划分上则属于黄河和淮河流域。相对独立的地理地貌环境，对海岱文化区的产生与形成，并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时期保持着相对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是目前我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研究得最为清楚的两个地区，也是保存传说时期古代文献最丰富的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两个地区之间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往来和交流，其中既有单纯的文化传播和影响，也有人员的往来和人口的迁徙。对于两地区之间文化往来和影响的趋向，可主要归纳为：从早在裴李岗时代两者开始有联系起，先是以中原地区对东方海岱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为主，接着至仰韶时代晚期东方文化渐渐占主导地位，并进而发展到向西迁移人口，此后到二里冈下层商文化初期，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影响的辐射面甚至达到更远的区域。〔2〕

“说中国是大陆型文明，是一种主体内向型的农业文明，是大体正确的。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用这种理论去概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区域文化，就未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齐国文化，就是一种别具风格的文化系统”〔3〕。用海岱文化来概括齐文化，同样不精确。在海岱文化的前提下，代表齐国及其部分邻境地区的齐文化就退而成为亚地域文化。但是齐文化在受到齐地环境熏陶的同时，却是离不开其上一级文化——海岱文化的影响的。“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4〕东夷

〔1〕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6。

〔2〕梁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118-130。

〔3〕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5-6。

〔4〕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海岱先民是大陆民族中的海洋民族，因而身为其中濒海部分的齐国是农业型国家中的海洋国。同时其文化也深受影响，使得齐文化成为内向、封闭型文化中的外向、辐射型文化，是静态文化中的动态文化。〔1〕

二、部族文化的分与合

“所谓文化模式，通常是指一民族的各部分文化内容之间彼此交错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的文化结构。……文化模式反映着一种文化特质丛（内容）相互结合的特殊形式，这种特殊的形式反过来也反映着各种文化的结构性特征，使之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文化区别开来。”〔2〕欲研究地域文化却忽视各种部族文化在该地的分布情况及各种部族文化所处的地位，那么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就无从深入，只能停留于表面现象，或者悬浮于抽象的观念。

传说的五帝时代〔3〕各部族文化间的多元流动与交汇，是伴随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而实现的，华夏民族的融合与凝聚即滥觞于此。真正作为华夏文化代称的“中原文化”也是到这里才开始具有名副其实的意义。中国早期文明的各种因素都不是同时、同地、同步发生的。上古各区域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优势互补本来就是华夏文化或曰中原文化赖以整合形成的内在机制。各大集团角逐的结果是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发展及其向中原王朝的逐步过渡和蜕变，而早期华夏族的孕育因此就是以东部族群与西北族群的斗争融合为轴心实现的。这实质上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导致这一时代晚期的社会组织由原始的散漫走向文明整合的一个必然过程，而研究各地域文化的关系都须以此为起点。〔4〕

五帝时代的社会变动，表现在社会组织方面，乃是一个由氏族组织、部落或部落联盟，经过长时期的动荡、分化和改组，逐步演变为王朝一方国体系的过程。中原地区原始氏族制的部落文化到五帝时代前夕已充分成熟，这种成熟一方面导致了它自身在当时生产力基础上贫富分化加剧产生的没落，另一方面也加速了部落战争时代的到来。这时庞大的部落群形成原始古国，原始古国复聚为更加庞大的古国集合体，于是各大集团力图通过战争与结盟，实施地域性的重组和统一——这便是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基本图景。古国的分化与独立也就是原始氏族部落的解体，古国的重组与联结则造成不同层级部落联盟的变质，并使最高层级的部落大联盟逐步蜕变为具有公认权威性的多民族、广地域的国家雏形——王朝。王朝本身起于朝覲和贡纳，它实行“与国制”，作为核心把众多古国演变而来的方国，以“中邦锡

〔1〕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8。

〔2〕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51-152。

〔3〕韩建业、杨新政。《五帝时代》。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1-2。严格意义上的五帝并不存在，在此基础上的五帝时代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

〔4〕张富祥。《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史学月刊》，2000，2：124-132；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土、姓”及“奢慎财赋”的形式组织为松散联邦式的统一国家。由于各部族先民的迁徙流动，多部族成员杂居共处，在同一地域内很难有单一部族居住的现象，由此造成了同一地域中多部族文化并存的局面，各地域文化包含多部族的文化因子，而仅在部族文化的成分及多样性的程度上存在差异。东夷族中先后出现过太昊（皞）氏、少昊（皞）氏及有虞氏等具有重要影响的部落，正是他们及其他具有不同来源的中小部落——这些东夷文化所在的东部族群所进行的重组和统一，形成了东夷部族文化共同体——齐文化的源头。其互融互补的过程对日后齐地文化的重组和统一潜藏着内在的影响力，其内涵也因此得以延续并发挥特有的效应。

部族之间的迁徙及斗争使得无论是华夏文化或是东夷文化，都只能是在互相影响与融合之下才逐渐形成的。因此齐文化在其渊源上就已不是单一的部族文化，而是多部族文化的综合体，呈现出多部族的特征。

三、一个典型现象——齐、鲁文化的比较

历史上的齐国和鲁国在地域上都属于山东一带，反过来说山东主要是由齐国和鲁国组成，仅仅西南部分有面积不大的一点属于宋国。齐国的首都在淄博，鲁国的都城在曲阜。齐国是指山东中部到沿海的一片地域，包括济南以东到胶东半岛的地区。鲁国则偏居鲁西鲁南。

自然环境的些许差异，也会形成地域文化特征的不同，为划分不同文化亚区提供依据。两周时期的海岱文化，已明显地区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两支文化本有着极其相近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然而在历史渊源、发展道路和总体风格上却又有着极大的差别。

（一）源流

“齐鲁文化源流之不同，从根本上说，应为炎黄两帝系统之不同。黄帝一系，即后来夏周系统，乃鲁国文化之来源，周公孔子发扬光大之，而齐国文化则部分来自炎帝系统，道家老子所出，而道家与法家有密切关系，故在《史记》中，老子与韩非同传。同时《吕刑》之严刑，亦当与后来之法家相关，故东方法家首先出自齐——管子。战国时代的稷下老师荀子，实为继承齐鲁两系文化之大师，因他曾游学于齐，又曾仕于楚，齐楚都与炎帝有关，他是儒家而有法家气息者。”〔1〕

建国之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鲁优于齐。政治上，鲁为周公封地，而周公是武王之弟，时辅佐年幼的成王，摄行政事，是周的实际统治者。为褒扬周公之德，“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2〕鲁君享有天子礼仪，并保存有周的礼器法物和文化典籍，使其成为周在东方的代表；平王迁都洛邑之后，鲁国更是保有周文物制度最为完备的地方。所以

〔1〕 杨向奎，齐国史，序，王闿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2〕 史记，鲁周公世家。

直到春秋晚期，晋国执政韩宣子聘于鲁，看到鲁国的文物典籍，感慨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由此可见，鲁国在相当一个时期，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是周典章文物荟萃之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早期儒学、墨学，培育了孔子、墨子、孟子等一代文化伟人，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鲁国在当时政治上处于优越地位，使其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因循和保守的倾向，这在孔、墨、孟诸家思想中也有所表现。

而齐国自姜太公以来，实行了与鲁国完全不同的文化政策。春秋战国之际，齐国的稷下学宫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学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文化中心从鲁国转移到齐国。后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既继承孔子也注意吸取诸家思想，特别是齐文化中的法制思想，集先秦儒家思想之大成，并成为李斯、韩非法家思想的前驱。他的思想形成进程也反映了齐学多元融合的特质。

（二）地理因素

以今天的地理形势而论，齐文化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东部，南枕泰山，东北、正东和东南三面临海。这种依山滨海的地理环境，与鲁文化根植的内陆河原地带不同。从而滨海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也与大陆文化的封闭性有很大的不同。以文化类型言之，大致为齐文化属滨海平原与山地丘陵的结合型，鲁文化则属典型的中原平原型，二者的地理分界大致在泰沂山系。对比两者可以加深对我们所要研究的齐文化的认识。

（三）政治因素

从西周封建之初，到春秋前期，齐、鲁两国由于统治者各自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略，对原东夷文化的改造程度不同，使两地文化风貌差异较大。姜太公初封齐，政治形势剑拔弩张，为缓和矛盾采取“因其俗，简其礼”〔2〕的政策，对土著文化即东夷文化有较多保留，形成有别于周文化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即齐文化。自此之后，因任夷俗成为齐的长期国策，这是形成齐、鲁两条不同文化路线的直接政治因素。同是东夷封地的鲁则与齐形成鲜明对照。周公受封于鲁，其子伯禽治鲁，沿袭周之传统，重礼义、王道，以礼为治国之纲，完整保留宗法制度，“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3〕，将周文化移植过来，全面彻底地行周礼，大力改造当地文化，使鲁终为周所同化，使之成为宗周在东方的一个缩影。在周失去共主地位后，成为周文化的唯一延续者。由此，齐与鲁之建国方式及政治模式其泾渭分明昭然可见。

（四）经济因素

“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

〔1〕左传。昭公二年。

〔2〕史记。齐太公世家。

〔3〕史记。鲁太公世家。

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1〕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古及今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齐地近海多山，有丰富的鱼、盐、林木和矿藏资源，加之水陆交通便利，所以工商业特别发达。太公立国伊始，便把优先发展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并且在推行的过程中大见成效，使齐国世受其益。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盐铁论·轻重》亦载：“（太公）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蓄货殖，世为强国。”桓管执政期间，不仅继承了太公的优良传统，而且给这一政策注入了更大的活力。积极地利用本国有利条件发展对外贸易，“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2〕。《国语·齐语》曰：“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可见这时齐国的外贸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自此以降，直至战国、秦汉，齐地的鱼盐业、冶铸业、纺织业、制陶业、商贸业都远远地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列。此外，齐地还有发达的畜牧业和家庭副业。总之，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齐国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工、商、贸一体化的复合式经济结构。

与齐国相比，鲁国位于泰山之阳地处丘陵地带，其地域上的封闭性，使其经济及思想意识形态都带有封闭的特点。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皞皞。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鲁国经济长期都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当地不仅不发达且受到鄙视，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及文化的交流。

综上所述，齐、鲁两地，在先秦时代分属两个诸侯国，地域也因国而名，虽然其文化源头相同，但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与本国所实行的政策不同，遂在流变过程中产生某些歧异。

鲁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浓厚的重农传统、严密的宗法组织体系和发达的礼乐文明。反映到学术文化上比较注重对古文化的传承，从而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守成的儒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表现出因循保守的倾向。孔子、孟子是其代表。将鲁文化的特点归纳出来如下：内容上的单一性，即仅以儒家思想为宗；发展上的一贯性，即始终以儒家传统思想贯穿前后；学术上的自我性，即缺少与其他学派的交流、融合。

齐文化的经济基础则以农、牧、渔、盐并举，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淡薄，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比较注重变通，表现出开放变革的倾向。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之学。管子、晏子是其代表。总结齐文化的特点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2。

〔2〕史记，齐太公世家。

为：变革性、开放性、务实性、多元性等等。

第四节 《管子》产生的文化渊源

稷下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杂学旁收的《管子》在以管子思想为主调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吸收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较为全面地映射出了当时齐国的文化特质。要深入探究《管子》学说的内涵及意义，势必要追源溯本了解其文化渊源，也就是齐文化的渊源。

关于齐文化渊源，《齐文化通论》一书在论述时提出了“东部文化圈”与“西部文化圈”两个历史概念。所谓东部文化圈包括东部地区史前考古文化、东夷文化、裂变的殷商文化。所谓西部文化圈即处于黄河中游的姜炎文化系统和姬黄文化系统。东部文化圈主要是东夷文化圈，西部文化圈主要是华夏文化圈。

在以上提出两个文化圈概念的前提下，齐文化的来源拓而广之，必然要从相对为外部的西部文化圈与其所处的东夷文化圈中寻找。而西部文化圈的代表——华夏文化圈就是由夏、商、周的文化共同组成的。“夏、商、周既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三个朝代，同时又是平行发展的三种部族文化，三者构成了从传说时代到文明之初中国古代部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后来出现的秦晋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是在三大部族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次生态文化。”^{〔1〕}以东夷土著文化为基础，融合夏、商、周三大主流部族文化的齐文化，包含了内陆与海洋、农业与工商业、君主与民本、礼与法、义与利等诸多要素，属于独特的复合型文化模式。该复合性在非单一的多层面文化共同影响作用下形成。这就既能揭示出齐文化的本质和特色，又突出齐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其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2〕}这里所指的东方便是东夷海岱之区。东夷人与夏、商的关系，古代典籍中有不少记载。夏商时期，齐、鲁即今山东一带均为其势力范围。夏的封国遍及今山东境内，夏文化在齐、鲁两地的影响，已由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商的发源地就在东方，即鲁西南与豫东一带，这点已为学者普遍认同，商文化的影响，除史籍记载外，也有地下文物可证。因此，东夷文化融合

〔1〕李炳海. 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20.

〔2〕干春松、孟彦弘编.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 殷周制度论.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128.

夏、商文化，为齐鲁文化的共同渊源。下文就此进行讨论。

一、东夷土著文化

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从胶东半岛至鲁西平原，大量史前文化遗存证明，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一样，发展和形成了自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商周之前，今山东及其周围地区，聚居着东夷族人。据目前考古资料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以前，东夷族始终是这一带的土著居民。东夷族所创造的文化，即东夷族文化，与其他地区所产生的文化不同，是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从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资料来看，至少在这个时期东夷族人的文化不是自西向东发展，倒是自东向西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就是后来乃至商周时期，东夷人及其文化确有逐渐东移的趋势，也并不存在‘被赶’的问题，那只是由于山东西部的东夷人在发达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合到中原华夏族中去的结果，是中原文化逐渐吸收和同化东方夷人文化的问题。东夷人的原始社会文化，并不比同时期的中原居民落后，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1〕

《说文》曰：“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说文通训定声》曰：“从大从弓，会意，弓所持也。”

《说文》又曰：“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后汉书·东夷列传》曰：“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东夷”作为单一民族的专名与“北狄”、“西戎”、“南蛮”等特定的民族学共同体相提并论，应首见于《礼记》，在此之前均属泛名，如代表四方少数民族的“四夷”等概念。〔2〕本文研究的“东夷”应为专名，即在中国东部沿海居住的人〔3〕。东夷族，是我国东方最古老的民族，是史前就已生活在山东及周边地区的土著，与中原华夏民族、南方苗蛮民族鼎足而立。史载东夷人身材高大，民风醇厚，喜骑射，善征战。东夷文化经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东岳石文化等阶段，即约为神话传说中的太昊（皞）氏、少昊（皞）氏到夏商时期。传说时代的东夷部族主要为太昊氏、少昊氏和有虞氏等，他们的文化在东夷文化中影响最大。〔4〕在漫长的年代里东夷族逐渐演化为许多原始部落，统称“九夷”。据《竹书纪年》及《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九夷”包括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和阳夷等九姓部落。

从现存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看来，东夷有着与中华其他地域不同的、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东夷人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最古老、最辉煌的文化

〔1〕逢振鐸编，东夷古国史论，成都：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2。

〔2〕逢振鐸编，东夷古国史论，成都：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3-7。

〔3〕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18。

〔4〕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24-30。从其说。

之一，又因地理位置而被称“海岱文化”。相对于组成华夏文化的其他谱系来说，是处于高度领先地位的。

山东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目前至少可以追溯到 40 万年以前。1981～1982 年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东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化石，1966 年发现于新泰市乌珠台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女性智人牙齿化石，以及近年发现的众多的以粗大石器或细石器为特征的人类活动地点，都属于齐地已知最早原始居民的。

新石器时代齐地居民及其历史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近年在鲁北地区发现的后李文化即是一支已定居下来的、文化发展程度很高的民族。他们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 8500～7500 年左右，以农业活动为主，兼营采集、渔猎和畜牧业，制陶、制骨和磨制石器具有相当的水平。聚落面积已达数万或十余万平方米，已知分布范围位于鲁北平原西起黄河沿岸，东至潍、淄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在距今约 7500～6000 年的海岱文化区的形成期，齐地的原始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在齐地中部地带后李文化的已知分布区内，后李文化逐步发展为北辛文化的鲁北类型；在半岛地区，则出现了类似于北辛文化的白石村一期文化，或可称之为北辛文化胶东类型，与后李文化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应为后李文化居民的后裔。

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六七千年），原始耕锄已经成为东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形式，此时的生产和生产工具均已专门化、定型化。东夷人已会种植多种农作物、饲养多种家畜，还会酿酒，能制作精美的石、骨、牙器具及烧制陶器，并独立自发地发明了纺织技术、象形文字和历法（山头纪历）、八卦占卜术等。到距今三四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在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方面又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已能够生产黄铜器皿和铁器。特别是他们创造的一种薄胎蛋壳陶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还饰有精细的花纹图案，这就是著名的“龙山黑陶”。文明程度的提高还具体表现为人口密度增加，大型聚落增多，出现了原始的图画文字等等，并先后形成了尚鸟的风姓太昊（皞）氏和嬴姓以鸟命官的少昊（皞）氏等大型部落族团。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的属于龙山文化的黄铜钻形器、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刻字陶片和众多的龙山文化城址，都代表了当时的文明水平。

在此期间新的文化成分开始注入齐地，东部半岛地区出现的众多贝丘遗址表明，由白石村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大汶口文化丘家庄类型、北庄类型进而演变成的龙山文化胶东类型，其文化面貌与辽东半岛的原始文化有着关联。在胶莱平原和鲁北平原东部也出现了文化上的交叉现象。一方面大汶口文化的鲁北类型，即五村类型作为北辛文化鲁北类型的后裔在这一带继续发展着，另一方面鲁中南地区典型大汶口文化的势力业已达到这一地区，最终形成了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鲁北平原西部，由于河南、河北等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龙山文化鲁西类型，即造律台类型。鲁北平原中部受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了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大汶口文化西进至河南伊洛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和河南龙山文化的某

些因素如陶鬲等深入山东腹地，就是这种交流的反映。至此历史上强大的东夷族团已完全形成，并因此而拉开了夷夏交争、融合的序幕。^{〔1〕}

稳定的经济生活和细致的社会分工加速了文化思想的发展，学术界公认，龙山文化是东夷海岱文化的鼎盛时期，它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地域文化。^{〔2〕}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区，是以泰、沂山地为中心，西界到聊城、菏泽、商丘和周口东部，南达淮河流域，东至黄海，向北至少在鲁、冀交界一带。龙山早期，海岱地区普遍进入文明社会，时值夏代之前的方国时期；龙山晚期，某些势力强大的方国，已经具备了问鼎中原的实力。^{〔3〕}

再者，东夷海岱文化的先进性还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同一地域文化包含来自多个部族的文化因子，同时也扩散到许多区域，而不仅仅局限在它的发祥地。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属于大陆型文明，所以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相对独立和封闭状态；而东夷海岱文化却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东南沿海一带是东夷族的摇篮，东夷族文化最初从那里产生、发展起来，东夷人以开阔的视野和灵活的思维方式有效地利用发达的海上交通及内陆河网向外开发、传播自己的文化，使东夷族文化同时往深层及纵横向拓展，与其他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三个发祥地^{〔4〕}之一，东夷不仅流淌着独特的文化涓流，并且汲取周边地区的文化细流，汇成激流击荡着整个中华文化。

二、夷夏互融

有夏一代，夷夏几乎总是以战争的形式表现着二者之间的矛盾。据《竹书纪年》记载，自后相以降，夷人势力始终是夏王朝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征战攻伐、遣使亲和不绝于书。“见于文献的夏王国对外关系史，几乎全是夷夏关系史，由此足见夷族的分量。”^{〔5〕}基本以黄河中游和黄、淮河下游作为划分的东夷文化圈和西华夏文化圈，也就因此不断实现着融合与渗透。

夏商时期齐地居民的文化属性先后表现为岳石文化及东夷地方的商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之间的交融，部族成分则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复杂的情

〔1〕王承典. 先秦齐地历史沿革述略. 管子学刊, 1996, 4: 21-22.

〔2〕栾丰实.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213. “龙山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龙山文化，是指空间上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地区、时值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或铜石并用时代、以灰黑陶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其文化内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故又有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现又称为海岱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或称后冈二期文化，现又将其和后几种类型合称为中原龙山文化）、……以及各种龙山文化的区域性变体等不同类型文化之分。对此，学术界现在多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大的时期来对待，称为龙山时代。狭义的龙山文化，则是指最初发现这一文化的那种类型，即分布于黄淮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亦即现在所谓的海岱龙山文化。”

〔3〕栾丰实.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220、227.

〔4〕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0. 另两个是华夏及蛮族.

〔5〕黄松编. 齐鲁文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8.

势。岳石文化时期，夷夏交争已呈白热化状态，鲁西的岳石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中原同期文化因素，齐地东夷部落族群虽然仍保持着龙山文化时期的基本态势，但中原地区的夏人势力已深入东夷腹地。古史传说中的夏启与伯益争国^{〔1〕}，太康失邦，后羿、寒浞代夏，少康复国^{〔2〕}等历史事件也多与齐地有关。伯益、后羿均为夏代东夷族团的首领，其活动地望约在今山东潍坊、淄博地区，后羿所立诸国也多在泰沂山系之北，约当今掖县、潍坊和德州等地，夏人的同姓宗亲斟寻、斟灌大致也在鲁北平原东部^{〔3〕}，取爽鸠氏而代之的季荝据说也是夏王朝的诸侯国。^{〔4〕〔5〕}

夏文化对东夷故地的渗入，是从鲧所处的尧舜时代开始的。在“五帝”时代夏文化中心是沿黄河流域自西向东迁移的。一直到夏朝灭亡，夏文化中心实际偏于东方。夏族子孙和东夷族成员频繁交往，在黄淮地区实现了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双向互渗。夏族是沿着两条路线由西向东进入东夷文化区。一是南线，沿着今陇海铁路的走向推进到海边，其中商丘是重要的中间站。一是北线，由山西越过太行山到达今河北保定一带。夏族对东夷文化区的土著时而依赖，时而征伐，在亲近和碰撞的交替中相互融合。再者，夏族虽然其本源在于西北，但却兴盛于东方。传说为夏后氏铸鼎的蜚廉氏是东夷伯益部的一支，铸鼎之地昆吾则本为祝融部后裔昆吾氏的居地（在今濮阳西南）。夏朝的历正羲和、车正奚仲，都是东夷后裔。夏后氏尚黑的传统，更应是袭承“黑陶文化”而来的。至于“夏道尚忠”，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夷俗仁”的观念互相包含。^{〔6〕}

“综观早期华夏文化的融汇史程，东夷文化的主流地位还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上古主要围绕和延展黄河轴心的东部地区文化，乃是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这种主流或基础的地位当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中原文化本身的形成、延续和发展便会使地区文化间的差异日渐缩小。”^{〔7〕}

三、商文化的载体

殷商出自东夷，代表的是东夷文化。

从文献记载方面看，商人先祖发祥地在东方，即鲁豫皖交界地区的说法

〔1〕《史记·夏本纪》曰：“帝禹……以天下受益，……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古本《竹书纪年》曰：“益干启位，启杀之。”

〔2〕《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来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浞（杀羿）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3〕《竹书纪年》云：“浇伐斟寻，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

〔4〕《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5〕王承典：先秦齐地历史沿革述略，管子学刊，1996，4：22-23。

〔6〕张富祥：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史学月刊，2000，2：124-132。

〔7〕张富祥：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史学月刊，2000，2：128。

较之其他诸说更为可信。

由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商人“不常厥邑”,经常迁徙。^{〔1〕}自契受封于商至成汤建立商政权,八次迁都之后始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2〕},又经盘庚五迁,才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往殷。对于这八次迁徙的具体地望,近代学者王国维曾做过详尽的考证:契由亳迁于番,一迁;由番迁于砥石,二迁;昭明由砥石迁商,三迁;相土东徙泰山下,四迁;相土复归于商丘,五迁;帝芬迁于殷,六迁;孔甲复归商丘,七迁;汤居亳,八迁。^{〔3〕}商,即濮阳或睢阳的商丘。砥石,今河北隆平、宁晋县间。泰山下为相土之东都,商丘为其西都。亳,今河南商丘南。除砥石外,余者均在今之豫东、鲁西和豫北这一范围之内,尤其是集中于豫东和鲁西南一带。因此,上述范围最有可能是商族早期的活动区域。^{〔4〕}商朝建立后,王都亦多次迁徙:仲丁迁囂,或作囂,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河亶甲移相,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祖乙迁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南,后又徙邢,在今河北邢台市;盘庚先都于奄,在今山东曲阜县,继而迁殷,在今河南安阳市西。^{〔5〕}由此可见,殷商出自东夷,发祥于华夏东部,在商的历史中,东夷始终是作为商的本根在起作用的。据《史记·殷本纪》载,殷商始祖契乃是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孕所生,由此也证明了商族与崇拜鸟图腾的东夷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为商文化的重要源头,商代的东夷与商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后汉书·东夷传》用“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来形容这种特殊的关系。卜辞记载商人征伐东夷的词条也很多,帝乙帝辛时的一次征伐活动历时二百六十多天,有七八十条卜辞记载了这一事件。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说,典型的商人文化在早期阶段仅抵达泰山一带,如济南大辛庄的泗水尹家城三期文化中的鬲和大口尊等即属于商文化的遗物,济南以东地区则存在着一种以卷沿粗筒高档案面鬲为特征的夷人物质文化。商代晚期商人的势力逐步到达半岛东部地区,益都(即青州)苏埠屯及其以东地区都发现有晚商的遗存。具体到古代部族,活动在中部地区的古族除有逢伯陵氏、蒲姑氏外,还有己氏、并氏和其氏,多为商人在东方的重要盟国。^{〔6〕}

从某个程度上说,殷商文化正是以东夷文化为代表的^{〔7〕},“没有任何理由排除二者政治文化的相通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殷商的政治文化

〔1〕《尚书·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2〕《尚书·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3〕于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144-145.

〔4〕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372.

〔5〕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27.

〔6〕王承典,先秦齐地历史沿革述略,管子学刊,1996,4:23.

〔7〕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24.

来透视当时齐地政治文化景观,以补文献不足之弊”〔1〕。从政治、宗教和道德观念、社会面貌、丧葬习俗、妇女地位、巫史制度到城市布局,商文化对东夷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四、周之封齐

我们知道,齐文化的源头在于东夷本土。相对独立并不等于封闭,部族间的迁徙、交往打破了孤立的文化系统。这样形成的动态系统才是有生命力的。初具雏形的齐文化在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前提下,吸收外来的文化养分,为将来多方位的发展提供盎然生机。

齐文化的形成,以姜太公封齐为标志,前一阶段表现为东、西部两大文化圈局部融合的渐进过程,后一阶段表现为东、西部两大文化圈整合成型的质变过程。这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分析,又是多元的、立体的视角,既把齐文化形成放进全国性大文化的演变背景下进行分析,又视齐文化为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姜太公封齐后,在“因其俗,简其礼”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创造性地把西方新兴的姬周政治集团的各种制度及风尚,与东夷人的礼俗、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奠定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基础。在姜太公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几乎包含了齐文化的全部基因”〔2〕。

周武王伐纣灭商王天下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3〕。吕尚姜姓,其始祖相传为神农氏炎帝。姜炎族因姜太公之分封来到齐地。源自西北的游牧族——姜炎族,与以农耕为主的姬周族不同,带着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融入当地的渔猎文化。齐“民阔达多匿知”〔4〕,除东夷人天性如此,与作为领主的姜氏的潜移默化也不无关系。商周之际,周吸收商的政治经验和文献典籍,经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形成完整的“周礼”。而姜“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5〕,并不完全推行周礼,根据当地习俗灵活变通,对东夷土著居民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各种礼仪制度等等或因袭、或简化;并且根据当地“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6〕。

之所以采用“因”与“简”的开明政策,除太公自身的因素外,还与当时当地严峻的政治形势与低下的经济基础有关。周初,胶东半岛上已形成大大小小许多方国,其中有东夷各部族所建之国,东夷各方国占据了胶东半岛绝大多数的土地和几乎全部海岸线,亦有殷商时的一些旧封国。齐国建国伊始,便处在上述方国的包围之中,而且齐国国内同样是由东夷人和殷商遗

〔1〕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123。

〔2〕宣兆琦、李金海主编,《齐文化通论(上)》。第二章,第四节。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3〕史记,《周本纪》。

〔4〕史记,《齐太公世家》。

〔5〕史记,《齐太公世家》。

〔6〕史记,《齐太公世家》。

民、周民（只有很少数）三种人组成。殷商遗民仇视周朝姬姜新政权自不待言，而东夷各国也十分仇视周朝。太公甫抵封地，“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于是这种争抢之战不止一次地发生。面对如此挑衅，太公顺应时势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的开国方针，以调节同商代旧方国之间的关系，调节当地落后的生产力与当时相比较为先进的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创造性地把西方新兴的姬周政治集团的各种制度及风尚，与东夷人的礼俗、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唯其如此，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才能彼此迅速接受。实践证明这一独特的方式在当时的齐国是行之有效的，缓和了与夷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创造了有利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社会很快得到稳定，统治秩序很快地得以建立，同时也为齐国后世统治者们的治国指引了明确而妥善的方向。独特的开国方针奠定独特的文化基础，造就独特的文化性格，终齐之世，“因”成为齐文化的主导因素。

然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2〕，齐作为周的封地，不仅受到周族生产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还必须服从并执行周的社会典章制度。况且，姜姓与周世代通婚，既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耕人与游牧人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3〕，那么他们相互融合的文化模式也不能不影响到齐地的文化。

五、齐文化对于《管子》的意义

齐国的地理概况、所处的文化区间及文化渊源，深刻影响着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了齐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即便是有着相近文化背景的鲁文化）的特质——那就是多元、开放与务实。这些特质以其无形中的引导作用影响着该区域内的文化产物，于是产生了颇具同样特点的《管子》一书。对于该书的形成过程来说，多元是手段，开放是观念，务实是本质；其具有延展性的大跨度的成书时间，决定其处于齐文化长期浸淫下的切实性；而其著书者的群体性，使其大量接纳外来文化，并与本土文化充分结合，筑就了多元的特色。对于该书本身而言，其内容是多元的，思想是开放的，出发点则是为了务实。齐文化的特质影响了《管子》的特点，二者是相通的。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诗经·小雅·北风。

〔3〕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5。

第四章 《管子》营国(城市管理)思想^{〔1〕}

“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2〕}

营城思想与营国思想是《管子》城市思想中的主要内容。营城思想体现的是具体的规划城市的方法，即城市规划思想。而营国思想则全方位地阐述城市从建立到发展所需的各种制度和策略，亦即城市管理思想，是营城思想的辅助和补充。本章就先从营国思想开始研究，为下一章营城思想的研究做铺垫，有益于对作为研究重点的营城思想更深层次的理解。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地域载体和最为直观的空间景观表现。由于受政治社会体制及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地域与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演化的，因此古代的城市最能反映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历程和典型的文化内涵。”^{〔3〕}城市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及最基本的地理条件。而中国古代的城市尤其离不开政治因素的作用、影响与制约，特别是早期的城市，政治与军事因素更是其产生的主因。

第一节 《管子》指导思想

“圣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4〕}

《管子》是齐学的代表。其重经济、重人本是适应环境、顺应时势的体现。而适应环境和顺应时势就可归结为因、应二字。这几方面可说是《管子》在经营国家和城市上的主要特色。

一、因与应的营国(城)之道

所谓“因”就是因势利导之意，“应”即因时、地、人、事制宜，“各处其宜”^{〔5〕}。因与应在这里成为同义词。而因、应的目的是为了用，因、应以务实，这是《管子》有别于先秦子书的重要特点，也就是务实精神。纵观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其整个社会都是处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该系统随着时势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地调整着自身的结构，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新精神。

〔1〕本书所引用《管子》原文主要取自：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长沙：岳麓书社，1993；颜昌尧，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1996。

〔2〕管子，制分。

〔3〕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58。

〔4〕管子，宙合。

〔5〕管子，心术上。

正如《轻重甲》所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行事合宜而乘势则有利，这其中就富含了应的动因在内。“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1〕，各乡、各城都有不同的风俗、礼节，相应地实行不同的制度，国民就不需要太多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故《九守》曰：“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统治者遵循了“因”的原则，因势利导，才能长久治理国家。《心术上》曰：“执其名，务其所以成，此应之道也。”在“因”的基础上，根据事物的内在规律进行应变，就是“应”的原则。“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2〕为了贯彻因与应的原则，就要求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通过追索事物的来源和研讨事物的实质来探索事物生成的根据。可见，《管子》强调的因、应之道，反映了《管子》认识论中的务实倾向。如果说“因”的原则是《管子》认识论的求实态度，那么“变”的原则标明着其认识论的务实宗旨，即强调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整治万物，以所明之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此因天下以制天下”〔3〕。“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4〕，失天下。在世界本原与认识方法的问题上，《管子》并不仅仅是为了构筑思辨的体系，而是更侧重于为统治者的治国安邦之策提供一个哲学的基础，从而使哲学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务实的色彩。

务实性是齐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在齐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中，从初期的姜太公，到中期的桓管，直到后期的威宣稷下学宫，务实精神一以贯之，充分反映齐文化精髓的《管子》自然也不例外。所谓务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而应。比如：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框定齐国不是向农业型经济，而是向工商型经济发展的方向。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5〕在普遍以农为重而歧视工商业的时代，能够不分高低将三者并举，即是姜太公的特色。因此，姜太公能从特定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制定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从而为后来齐成为东方大商业国奠定了基础。此乃因应之策一。春秋时期，齐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齐国的疆域扩大了，土壤也得到了改良，发展农业的条件基本成熟了。桓管君臣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从实际出发，在继续推行太公政策的同时，又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了诸如“井田畴均”、“相地衰征”、“勿夺农时”等一系列改革，把农业与工商业同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此乃因应之策二。在赋税征收上，管仲一方面反对轻赋税、

〔1〕管子·侈靡。

〔2〕管子·白心。

〔3〕管子·轻重丁。

〔4〕管子·轻重甲。

〔5〕六韬·文韬之六守。

薄征收,认为“轻赋税则仓禀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禀虚则俸贱无禄”,以致“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俸贱”;另一方面又能时时体察民情、抚恤民心,如对于粮食的征收则根据土地情况、收成多少来进行,而不是一味地、不顾实情地加重农民的负担以求增加国家的收入,甚至有时会启用轻重之术转移收税的来源以缓和民怨。此乃因应之策三。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畸形发展趋向,手工业重刻镂文采,商业也出现了宿商大贾,破坏了齐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秩序,这时齐国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重农抑末”的主张。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合乎实际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此乃因应之策四。再如:历经商周鼎革,到春秋战国时期,民众所起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民本思想已然成为强大的潮流。在这样的形势下,齐国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提出了政顺民心的主张。此乃又一因应之策。凡此无不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精神,而这些务实精神也不可避免地为《管子》所全盘吸纳,成为了《管子》城市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特点。

二、以发展经济为主旨富其国(城)

《管子》首篇开宗明义:“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此话大意是,凡是拥有国土治理人民的君主,必须重视四时农事,保证粮食储备。国家财力富足,就能吸引远方人迁来,土地开发利用得好,就能使国民安心居住。首先阐明了“知礼节”及“知荣辱”等道德观念的形成是以“仓廩实”、“衣食足”的物质满足为前提的。“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经济是政治、伦理的基础,治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生产发展了,国家富足了,远方的人民就会前来归附;土地开垦了,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只有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人民才能讲求礼节荣辱,国家秩序才能得到巩固和维持。说明人们经济生活的实缺决定着政令的贯彻、社会的安定。“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愿,则能用之耳。”〔2〕民是生产资料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夫才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3〕《管子》所关注的民众还更着重于其在物质上的力量,认为民心向背取决于其物质利益是否满足,这点是有别于其他思想家最突出最富有个性之处。《治国》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所以爱民必须富民,民实则城治,城治则国富。从总体上看,《管子》的富国富民思想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对富国与富民之间统一而又矛盾的关系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将富国富民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当时,富民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农业,并举以

〔1〕史记·货殖列传。

〔2〕管子·侈靡。

〔3〕管子·八观。

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因而《管子》总是从经济生产入手来探讨营城安邦之策，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

三、以人为本安民心

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民众的威力充分展现出来。当时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民众的社会作用。如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孟子的“民为贵”、墨子的“兼爱”、杨朱的“轻物重生”及荀子的“节用裕民”等等。《管子》也不例外。《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股以人为本思潮的共同点是：希望改善和提高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表现出对人的爱护与关心；强调民为治国之本；探索有关人生的哲学命题。“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1〕欲重用其民，必先爱民，这就是《管子》的予取之道。《五辅》有六兴：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穷。当其时，行此德政改善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条件，这对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令他们心存感激之余，何愁民心不归？

“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假也。”〔2〕首先，《管子》把民本作为政治、经济的基础。《牧民》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这里其实就是把民的价值放到了突出的地位，民的需要、民的好恶成为重要的价值判断的依据。从当政的角度来看，要能巩固政权，就必须首先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以及经济利益。接着《牧民》又曰：“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里的“四欲”指的是上面所说的“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四恶”指的是“忧劳”、“贫贱”、“危坠”、“灭绝”。并且对“四欲”与“四恶”的取舍问题已经明确地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予其前者而舍其后者。其次，从辩护的角度来看，论证了“民本”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侈靡》曰：“足其所欲，赡其所欲，则能用之耳。”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充分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才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它还从道德的角度阐释其利民的合理性，认为从政者只有满足民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听从安排，这种从政方式才是正当的、善的。《五辅》曰：“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然后政可善也。”即使是取利于民也应取之有度，不能无限制地搜刮民财，否则，国家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3〕。此外，它还认为统治者除以利利民外，还应以德

〔1〕管子·权修。

〔2〕管子·轻重甲。

〔3〕管子·权修。

利民,“行九惠之教”〔1〕;“德利百姓,威震四海”;“无德而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2〕。总之,《管子》从利益与道德两方面阐释其民本思想的内容及合理性与正当性。

第二节 《管子》营国思想的内容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3〕

“古代政治家的信条是‘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建城就是保民。为了保城,又必须在城的周围开拓土地,建立以城市为中心而带有若干农村的城邦。《管子》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为了守地,必须守城。守住城才能保住国土,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要害。为了守城,要有强大的军队,有雄厚的国民基础,有足供兵民生活的粮食。可见,城是国家的代表,是国家政权的物质核心设施,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城市的兴建,都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特别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这就决定了城市的性质与作用,首先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统治者。”〔4〕

《管子》城市思想包含治理国家和经营城邑等思想在内,具体而微,上至国家大策,下至国民生活,都囊括在内。治国在于对国家的统筹管理。《管子》的治国思想全面而系统,在治理国家、巩固国防、加强军备及发展经济诸方面都能够行使强有力的管理职能〔5〕,其大致包括:“因其俗,简其礼”的治齐原则;“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措施;“尊贤智,赏有功”的用人方针;尚礼义、重法制的政治传统;“均田分力”、“相地衰征”的农业制度;“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工商政策;“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人”的开放措施。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治城也不外乎为了安民、富城和强兵。“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用,故能为天下。”〔6〕本章先从大处着手,研究对营城具有指导性的方针策略,并尝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的疏理分析。

〔1〕管子·入国。

〔2〕管子·霸形。

〔3〕管子·五辅。

〔4〕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312。

〔5〕吴碧英,《管子》的管理思想与欧洲古典管理学派理论,管子学刊,1990,3:62-66。有学者认为《管子》的管理思想与欧洲古典管理学派的理论有十分相似之处,以此显示我国管理思想的源远流长及不凡成就。

〔6〕管子·禁藏。

一、礼法并重的政治管理思想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1〕

《版法解》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管子》一直以来为许多学者定性为法家著作，虽属片面，亦可见其中法学思想的突出，而且在以法治国方面自成系统。然而“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2〕，《管子》中最主要也最有特色的政治思想还是在于礼法并重。其对“礼”有完备的论述。如“礼有八经，……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3〕。且不以现代的眼光去评价其是否完全符合现代标准，不论其正确与否，毕竟它为当时的社会制定了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某种秩序。就是在以法治国的同时，也要讲求礼。即行的是德法。“……礼的实质是通过制订一系列地位、身份不同、在社会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们各应遵守的不同行为规范，来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齐国的等级制度”〔4〕。德法成为齐统治者治国时的政治行为准则。开篇《牧民》提出的国之“四维”中，礼即列在首位。从姜太公立国治齐“因其俗，简其礼”〔5〕始，就已为后代齐君的行德政奠定了基础。至齐桓公当政，在管仲的辅佐下，“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6〕，寓法于德，使德法互渗。“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法者，将立朝廷者也”〔7〕；“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8〕。也就是说必须依法治国，但并不能单靠严刑峻法，同时又要重视德行教化，国家朝廷的政务才能正常行使，更为有效地维护君权。而这种以法为保障的“礼”，也与儒家所提倡的以德为政的“礼”在实施上有根本性的不同。这是在对内统治方面实施的措施。而在对外时，也同样运用“礼”。“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9〕在内政外交上，礼成为民治邦交的基本原则。

《枢言》曰：“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

〔1〕管子·牧民。

〔2〕管子·任法。

〔3〕管子·五辅。

〔4〕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181。

〔5〕史记·齐太公世家。

〔6〕管子·小匡。

〔7〕管子·权修。

〔8〕管子·形势。

〔9〕管子·枢言。

定。”《任法》又有曰：“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二说看似各执一词，实际上并不矛盾，其指出了礼与法互生并存的关系，说明“礼”与“法”的缺一不可。一方面，礼教道德区分、规范各种等级差别，重在对人心的感化，使人们自觉遵守相应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制刑赏重在对外在行为的约束，弥补了人们自觉性的不足，抑恶扬善，二者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着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对治下国民要求他们注重“礼”：“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1〕教导他们由小做起，从小礼而到大礼，循序渐进，不愁礼之不行。“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2〕在法的约束、制约作用下，人们轻易不敢作奸犯科、做违法的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以礼引领道德风尚。以“礼”为根本、尊卑等级为前提，形成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规范，从而为齐国百姓创造了一个宽松有节的政治和生活环境，无形中也提高了国中居民的人口素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管子》在倡导法治和德教并举的时候，不是立足于空洞的说教，而是主张同人们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始终把人民的经济生活是否有保证，作为推行法治和德教的先决条件。

在当时社会的几大派法家中，齐法家以其独特性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产生于代表当时齐国最高水平的稷下的《管子》，其法家思想便代表着齐法家的主流思想。因此研究齐法家的思想与内涵有助于加深了解《管子》中的法家思想。

对比晋秦法治思想，齐国法治思想有其独具的优点和特色。概括地说，一般认为齐法家先驱管仲的法治思想“均衡平和”，而秦晋法家则显得“偏面、激烈”。晋秦法家的阴术，显然不如齐法家的阳术结信、明义。差异在于：（1）对待君权态度不一。齐法家与晋法家都主张尊君，但对待君和法关系的态度却有很大差别。齐法家强调“令重则君尊”，“令尊于君”，把君权限制在法律之下或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要求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3〕至于实际上能否真正做到另当别论，关键在于其所遵循的原则，这也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晋法家则主张，“君尊则令行”，要君主独揽大权而不一定受法律的约束。这就使法律在君权以下，执行起来对君对民就更加难以做到平等对待。（2）对于道德教化认识不一。齐法家认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又是可以通过教化改变的，故他们主张“教训成俗而刑罚省”，“以力使”难服人心，“以德使”则“民归之如流水”。晋秦法家则主张，治理国家，“任其力不任其德”，“不务德而务法”，暴力就可使民惟君命是从。（3）齐“富民而治”的优越性是晋秦法家“愚民可治”所不及的。“仓廩实

〔1〕管子·权修。

〔2〕管子·七法。

〔3〕管子·任法。

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民的粮食充足、衣食无忧之后才可能顾得上重视礼、仪、法度，否则难免为求温饱铤而走险。在晋法家的眼里民被看成是如牛马一样任由驱使的，只让他们无知地照君主的意志去行动即可，至于他们的温饱则不是重要的。不难设想，在一个民不聊生，人民最起码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对人民讲礼、义、廉、耻又有什么意义？老百姓首先关心的是生存条件。（4）对施行刑罚认识有差异。齐国法家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杀戮重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1〕。晋法家则不然，他们认为重刑可以预防犯罪，即所谓“以刑去刑”。（5）对农、工、商认识有差别。齐国重农又不弃商工，以“务本饰末”为指导思想，使农工商协调发展。而晋法家却认为：“事商事，为技艺，皆以避农战也。”强农而抑工商，迫使工商户弃工商而从事农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还有的学者，把齐国法治思想概括了十大特点：（1）重法治而轻弃礼仪。（2）君主主义而不强调君主专制。（3）治民牧民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4）重刑罚而不是重刑主义。（5）重刑法的同时，也注重行政法、经济法、民法。（6）法、术、势三结合，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的综合治理而不是法律独尊。（7）强调法治为耕战服务而不抑制工商之业。（8）广开言路，听民议政、议法。（9）较早的提出了“法治”为结束割据一统天下服务的思想：“聚国而为天下”。（10）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法哲学。还有的学者提出，齐国开放度很大的经济与坚定的法治思想相结合，“狱市并容”，才使得齐国、齐地经济千年不衰。〔2〕

二、农业思想

中国自古以农耕为本。农业是人们生活的依托，农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国家的盛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的贫富与安危。可见农业是国之保障，耕地是国之根本。因而农业曾被当作本业、主业，其他非农业被看成是末业、次业。而农业中又以发展粮食生产为其主要任务。由于齐国历来为“衡处之国，馈食之都”〔3〕，主要靠输入粮食为主，因而《管子》在治国大策上就十分重视对农业统筹安排，同时发展农、工、商各业，使得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粮食自给。农业发展了，国家粮食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城市才会繁荣安定。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意识可知，百姓衣食无忧后才有可能尊礼重教，全民素质才能提高，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这样整个国家才能强大起来。而《管子》中的农业思想大致包含了农业政策及土地制度两方面。

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的思想是建立于一系列客观条件之下的：第一，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土地是人们从事生产的根本前提，土地又是有限的，应当

〔1〕管子·牧民。

〔2〕徐树梓、徐祥民，发源新流 知古鉴今——齐国法治思想学术讨论会综述，1998：90-91。

〔3〕管子·轻重甲。

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齐国是面海背陆地形、土壤性质复杂的国家,合理耕种土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农作物具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这就应当根据土壤不同性质以及地势高低、土地距水源远近等差异,分别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以使其更好地生长,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第三,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丰富多彩的,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是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客观需要。因此,《管子》提出了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举。

种田需要懂得农业技术,以及利用农业科学技术搞好田间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丰收,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和获取更多收益。《管子》中包含丰富的农业科技和田间管理思想等“农技观”,对种田很讲求精耕细作。“及寒击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1〕,在天气尚冷时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乃耕,等到耕种时,深耕土地,均匀播种,快速盖土,就为农作物生长打下良好基础。反之,地耕得不深,草锄得不勤,该种的土地没有种,待种的土地杂草丛生、凌乱不堪等,即使没有水旱灾害,这这也是一个国贫民饥的田野。“当夏三月……利以疾耰杀草藂”〔2〕,要求人们夏季抓紧时间,赶紧整理田苗,除草灭虫,加强田间管理。《管子》还很关心农业技术,积极主张人们制造和使用各种铁制农具,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地员》篇中还要求人们掌握地势高下、土质肥瘠、水泉深浅等与各种作物生长的关系。

(一) 农业政策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

《管子》中的农本思想构成其农业理论的主要内容。《八观》有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即,若不重农事,则缺粮少食;若是国贫民饥,则百姓四处离散;若没有足够的人力固守城防,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危亡。“故地不辟则城不固”〔4〕。

“五谷,民之司命也。”〔5〕《管子》从战略高度评价了发展农业和重视粮食生产与储备的意义,在许多篇章中从多侧面阐发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多

〔1〕管子·小匡。

〔2〕管子·度地。

〔3〕管子·牧民。

〔4〕管子·权修。

〔5〕管子·换度。

蓄粮食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富国安邦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一树一获者，谷也”〔1〕，粮食属于“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的东西，谷物种一次只能收获一次，而一年四季人们都不停止消费它，因而粮食的生产和储备都同等重要，故“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2〕。

《管子》重商而不轻农，通过分析和论证农业与国运、民生、用兵和礼仪道德等各方面的关系，说明搞好农事既是保证人民丰衣足食、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又是统治者富国强兵、称霸诸侯以及统治百姓、安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资本。第一，农业与国运的关系。“粟者，王之本也，人主之大务”〔3〕，粮食是国君治国安民的大事，不能小视它。“困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4〕如果缺乏食粮，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因而农业生产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治乱。第二，农业与民生的密切关系。“五谷粟米，民之司命。”〔5〕“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6〕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从事其他各项事业，所以，富国必先富民，民富国治，“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7〕。第三，农业与用兵的关系。“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8〕，“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9〕。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供给，是实现富国强兵、扩展疆域和称霸诸侯的需要。第四，农业与礼仪道德的关系。《牧民》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粮食富足百姓就知道遵守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廉耻。否则，“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10〕。不重视农业生产，人民就会因吃不饱饭而失去对国家和国家的情感，从而造成人们的礼仪道德与法度等观念淡薄。这里揭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和前提，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关系。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不务天时，则财不生，则仓廩不盈”。〔11〕在农业生产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便是“勿夺农时”。农业是典型的受自然规律制约和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故在发展农业生产时特别要注意各个季节的特点，因时而变，搞好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才能取得较好的收成。

〔1〕管子·权修。

〔2〕管子·大匡。

〔3〕管子·治国。

〔4〕管子·八观。

〔5〕管子·国蓄。

〔6〕管子·五辅。

〔7〕管子·治国。

〔8〕管子·权修。

〔9〕管子·治国。

〔10〕管子·治国。

〔11〕管子·牧民。

《管子》认识到农时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至关重要,并通过对四时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生长规律的科学考察,以及对前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较系统的农时观。《管子》依据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进行了哲学概括,认为“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1〕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和时日长短都是阴阳交互作用的结果,四季变换又会影响万物的生长收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四时更替的自然规律。“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2〕这些就是依照农时进行耕作的具体措施。准确把握农时从事农业生产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安排农事必须根据阴阳之气的消长,遵循四时变化和万物生长的规律,不能盲目行事。“地之生财有时”〔3〕,农事活动必须按照农时进行才能有所收获。“不务四时则财不生”〔4〕,“不失其时然后富”〔5〕。如果不遵守四时变化的规律性,就搞不好农业生产,只有不错过农时而合理安排耕种收藏,才能获得农业丰收和走上富裕之路。可见农时对农业生产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重农时是搞好农业的重要前提。《管子》还认识到,农时又是很短暂的,必须珍惜和抓住农时,及时进行农业生产和收获。“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6〕。一个农民耕种百亩土地,而春种又必须在二十五日内完成,农时紧迫,机不可失。《山国轨》中说的:“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是告诫人们在春、夏、秋、冬各季最要紧的十来天不误农时,及时完成春种、夏芸、秋收之事,而在冬季最要紧的二十来天不误整治土地,为下年耕种打好基础 and 做好准备。此外,《治国》还提出:“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说明当时在耕作制度上已经实行改革,在嵩山、黄河与汝水之间推行套种和复种,一年中有“四种而五获”。这种耕作制度对现代农业也有很大影响。

正因为农时短暂和宝贵,所以,《管子》还认为统治者应不夺农时,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兴丰。”〔7〕“无夺农时,则百姓富。”〔8〕只有不侵占延误农民的农时,才能保证搞好农业生产和取得农业丰收,从而百姓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安定。那么怎样做才会不夺农时呢?《禁藏》、《山国轨》等诸篇中列举了一些具体办法,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先,君主和官府不要在农忙季节让农民服徭役,相反为了赶农

〔1〕管子·乘马。

〔2〕管子·山国轨。

〔3〕管子·权修。

〔4〕管子·牧民。

〔5〕管子·禁藏。

〔6〕管子·巨乘马。

〔7〕管子·巨乘马。

〔8〕管子·小匡。

时,还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充足的人、财、物力服务于农业。其次,在春耕夏忙之季,赦免罪轻的犯人,放出被拘押的人,化解百姓间的矛盾纠纷,奖赏各种有功德的人,以便增加农业劳动力及时完成农事。再次,在农时到来之前,国家要充分地为农民准备好各种农具、粮种,并且还要免除困难者的赋税,借贷给无粮者钱款、种子,租赁给穷困户农具器物,使他们及时致力于农业生产。另外,在农忙季节,通过发布严厉的法律、政令,禁止农民从事其他非农业经营活动,其目的仍然是保证劳动力的投入和争取农时。

(二) 土地制度

“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1〕

土地是农业之母。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劳动对象就是土地,要想增强农业生产的自觉性,就必须了解熟知土地的类型、性能和适宜种植何种农作物。《管子》虽然重视粮食生产,但并不反对用多种经营方式来发展农业经济,提出了根据不同土壤、水源、地势和地理位置等,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思想。

《乘马》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土地之开垦是统治的根本。《禁藏》曰:“夫民之所主,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土地之开垦也是人民生存的关键。《权修》曰:“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土地之开垦又是国家富裕的源泉。《轻重甲》曰:“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土地之开垦又是精神文明赖以存在的条件。《权修》曰:“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土地之开垦还是外御敌寇内固统治的基础。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2〕。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对土地的合理分配可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发展。土地分配分为几个方面:正地、均田、调配及更制等。《乘马》曰:“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封”是井与井间的界,“界”是十井与十井间的界。《周礼·考工记》载:“匠人为沟洫,……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浚。”畎、遂、沟、洫、浚都指的是井田间大小不同的疆界,其修建的形式为水利灌溉提供了便利,同时保证了田间交通。正地就是将所有的井田重新分界、修筑沟洫,《管子》认为应每三年修整一次封沟,每五年修整一次界洫,且在土地的使用过程中随着土壤条件及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更制,即每隔十年据此将田地重新分配、充分利用,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正地

〔1〕管子·问。

〔2〕管子·乘马。

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1〕,以此确定严密的井田系统,使之制度化。《小匡》曰:“陵陆、丘阜、田畴均,则民不惑。”《乘马》又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即将分好界的各种田地均等分配予民,再根据实际的土质肥瘠等情况进行调剂。

春秋初期,金属器尤其是铁器的铸造及广泛应用,也促进了自此以后的土地开垦,不论是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出土的铁削,还是《叔夷钟》铭文,〔2〕都表明春秋时期齐国已能大规模铸造铁制工具。那些用于开垦土地的铁制农具给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3〕由此,齐国“实广墟,垦田畴”的土地开垦运动取得了较大成就。历史进入战国,各国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纷纷展开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的变法运动。魏文侯任李悝为相,“作尽地力之教”〔4〕;楚悼王任吴起为相,“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5〕;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大良造,“急耕战”。均以对土地的开垦与利用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田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尤其重视土地的开垦与利用,甚至将土地是否垦辟作为评判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威王九年,威王召即墨大夫,因“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而“封之万家”,又召阿大夫,因“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而烹阿大夫,此举使齐国朝野震惊,“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之莫敢至兵于齐20余年”。至于宣王时,齐地仍“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兵山”〔6〕,并维持威王时的规模与程度至于战国末。尽管土地得以大量开垦、土地资源得以全面开发,然而从春秋桓管时期到战国时期,土地制度却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土地所有权均属国有。而有所不同的如公田的消失、井田的复杂化和授田对象的增加等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变更。

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因而土地的产量就有差别。“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7〕上、中、下等的土地收成不一,则向其征收也就应有不同的标准。“郡县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8〕按土地好差确定征购的数量,百姓就能安定而“乐上”。“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陵陆、丘阜、田畴均,则民不惑。”〔9〕在土地的肥瘠和种类

〔1〕管子·乘马。

〔2〕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159。

〔4〕汉书·食货志上。

〔5〕吕氏春秋·贵卒。

〔6〕战国策·齐策一。

〔7〕管子·山权数。

〔8〕管子·乘马数。

〔9〕管子·小匡。

上,《管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折算,使得平地、山地及高原上的种植都各得其宜。《山国轨》曰:“相壤宜。……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通过调查统计各种土壤的情况,在安排农业生产上注意因地制宜,以优化管理和控制适宜的生产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取得较好的收成,取得较好的比较效益。而对于土地较差的地区,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法。如“有山处之国,有汜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洿之国,有漏壤之国”等不利的地形,“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洿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1〕《乘马》曰:“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洒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藪,镰纒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以可耕面积的实数对土地进行折算:对于不长粮食的土地和没有树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可耕地;干涸的沼泽、不生草木的土地和无法进入的荆棘丛生之地,也是百而当一;另山、林、泽等地,凡是可以对其进行改造的,折率会高许多,又可以利用其中原材料的,折率更是相应增高。《管子》还对地面下有水的土地的地租单独进行了折算:“一切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一切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2〕地下水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土地的使用,地下七八尺(约一仞)深处有水的地不易发生水涝,地下五尺深见水的地则不易发生干旱。因而地下五尺到七八尺深有地下水的土地是最好的,而五尺以上、七八尺以下有水的土地则递差并递减租税。

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集约化经营的方法,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对此《管子》主张深耕细作,提高土地生产力。《八观》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慎,地宜不任,……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根据一国的耕种状况可以估量出这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如果这个国家的土地耕得不深,杂草锄得不勤,再加上没有做到尽地之宜,那么即便不发生水旱灾害,也一定是一个饥饿贫困的国家,所以应该改善耕作状况。《小匡》认为要“审其四时”,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变化,“权节其用,备其械器,比耒耜枷芟”,按照农事的顺序准备好农具。“及寒击藁除田,以待时乃耕”,在天气尚冷时便除草治田迎接来年的播种,要“深耕、均种、疾耰”,并且在雨季来临之前除草松

〔1〕管子·山至数。

〔2〕管子·乘马。

土。雨季一到,就要使农家脱下常服、手持各种农具,“别苗莠,列疏遨”,“旦暮从事于田壅”。这样,在一定量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就能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管子》要求君主把注重地宜看作是“六务”〔1〕之一,并要求委派专职人员“司田”进行具体负责,“相高下,视肥硇,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保证五谷桑麻的种植能因地制宜。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2〕,即便是拥有了土地,而未开辟,都不能算作是自己的土地。除了使用现成的土地,还必须开发荒地,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对此《管子》提出相应的广土政策:“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3〕在号召人民开垦荒地事农致富之余,以强国实力在诸侯间争霸的战争中制胜,从而兼并别国土地充实己需,这也不失为一种扩充土地的方法。

三、经济实施方略——轻重学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4〕

熟知经济规律,善于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灵活调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发展国家经济的主要方法和手段。《管子》中的经济思想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书中所载管仲从宏观上进行调控的经济思想及行为更是其中的代表,可称之为轻重学和轻重术。《史记》中多处提及管子与轻重。《齐太公世家》云:“(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管晏列传》云:“管仲既任政齐相,……贵轻重,慎权衡。”《货殖列传》云:“(管子)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从提及的政绩上看,对于轻重学的运用管子可说是个中翘楚,同时既说明其对于发展经济有全面的筹划,又体现了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重视。

轻重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特有的一个经济学概念,主要是关于如何宏观治国及运用物资流通规律的理论。《管子》认为自古以来就有应用轻重之术治国的传统:“自理国虐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5〕接着自伏羲氏起,列举了神农氏、燧人氏、黄帝、虞舜及夏商周各个时期不同的轻重术。并且在应该如何具体运用的问题上,提出了“并用而勿俱尽也”的辩证认识,即对以往的帝王之道可以参考,但却不可全盘照搬,需要按当前的实际情况行其所宜。〔6〕该思想极大限度地发挥了其因变的能量。

〔1〕管子·七臣七主。

〔2〕管子·权修。

〔3〕管子·治国。

〔4〕管子·国蓄。

〔5〕管子·轻重戊。

〔6〕另见管子·接度、管子·国准。

至于轻重作为治国之术用于经济方面,就好比奇正的思想^{〔1〕}用于军事方面一样重要,包括平衡供求、调节物价、运用权术、控制物资流通及利用各种条件等。轻重之学对内指的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及其他商品的供需、贵贱、互相之间的轻重关系,采取措施提压物价以安定国民生活及使国家富裕;对外则是“以轻重御天下之道”^{〔2〕},权衡轻重,通过对外贸易和谋划、引导商战来战胜他国。因而轻重术可以概括为站在国家高度上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行为。

治国应通轻重,凡是治理国家,不精通轻重之学,就难以编织经济管理之“笼”控制国民;不能调剂国民的物质利益,也谈不上通过经济管治而实现国家大治。例如从“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的现象,就应该知道“国多失利”,即由于富商大贾吸取了社会上的财利,导致国家流失了大量的财与利。^{〔3〕}因此统治者必须研究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并人为地影响和操纵这种变化,运用国家号令从宏观上调节和控制住全国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较为合适的。《山至数》强调:“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把治国和国家的经济活动比作一匹野马,轻重之学就是驾驭这匹马所用的嚼子和缰绳。驾驭好了,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民无不累于上”,^{〔4〕}“开阖皆在上”^{〔5〕},一切都掌握在国家君主手中。驾驭不好,让诸侯或富商大贾钳制了经济大权,就会严重威胁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6〕},“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天子失其权”,^{〔7〕}国将不国也。

《管子》轻重理论总结了流通方面的一些规则和规律。《山至数》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国轨》进一步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轻重理论随着金属货币的使用而逐渐出现。由于金属货币的轻重直接反映其价值的大小,分量重的价值高,分量轻的价值低,所以“轻重”一词开始主要用于说明货币的价值高低。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属货币流通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货币的轻重不仅能改变货币本身价值的大小,还会从另一个方面引起商品价格的涨落。同样一

〔1〕〔春秋〕孙武、周亨祥译注。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7。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中极重要的一组对立统一的概念,是古代兵法的常用术语,广泛应用于谋略、战法等各个领域。

〔2〕管子。山至数。

〔3〕管子。国蓄。

〔4〕管子。国蓄。

〔5〕管子。乘马数。

〔6〕管子。国蓄。

〔7〕管子。山至数。

块金属货币,在市场的条件下,可以购买更多或更少的商品。如果货币价值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商品同货币的比价提高,商品的价格就上升,这叫做“币轻物重”。反之,货币价值高,购买力上升,商品同货币的比价降低,商品的价格就下落,这叫做“币重物轻”。另外还提及“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1〕,“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2〕等类似的规律。说明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间,彼此都是贵贱相反,互为轻重的。粮价高则其他物资必贱,粮价低则其他物资必贵。二者互为对立,涨落有异。掌握好这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稳定国家的经济秩序,就是平准之法,此乃轻重理论的本质。

因此,《管子》提出了“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3〕的主张。具体轻重之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4〕。即在民间物资有余时能以低价买进,不足时可以高价售出。根据这样的价格规律,在民间物资不足时,就可以把库存的东西高价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低价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那么既能够通过这样的调节让商品的价格趋于稳定,又能让国家得到多倍的盈利。以粮食为例,当民间粮食有余价格较低时,把市场的粮食收购起来;当民间粮食不足价格较高时,把库存的粮食销售出去。由于市场粮食有余,老百姓肯以低价出售,“故人君敛之以轻”;由于市场粮食不足,老百姓肯以高价买进,“故人君散之以重”。这样做,“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橛可得而平也”,不但国家获利,市场的粮食价格也因而稳定了。〔5〕二是“以重射轻,以贱泄平”〔6〕。此为统治者的调节措施。即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售出。因为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有所不同,如果注意用此措施来进行调节则可以维持物资供需的平衡,否则便会使价格居高不下,不利国民的消费。仍以粮食为例,当市场上的粮食因过剩而价格下跌时,国家为了防止投机商人进一步压价,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使粮价回升;当市场上的粮食因短缺而价格上涨时,奸商往往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国家就把过去收购的库存粮食以较市价低廉的价格出售,迫使商人把囤积拒售的粮食卖出,让粮价回落。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高价购进,低价售出,但由于市价是波动的,高价购进时的市价要比低价售出时的市价低得多,所以国家不会吃亏。更重要的是“守之以准平”〔7〕,保证了市场粮食和粮价的平衡。三是“春赋”、“夏贷”。即国家在不同时期向农民发放一定的贷款。“春赋以敛缙帛”,春季向农民放贷以收集丝绸。“夏

〔1〕管子·轻重甲。

〔2〕管子·乘马。

〔3〕管子·国蓄。

〔4〕管子·国蓄。

〔5〕管子·国蓄。

〔6〕管子·国蓄。

〔7〕管子·国蓄。

贷以收秋实”，夏季向农民放贷以收购秋粮。在敦促、鼓励百姓专注于本业的同时，保留住了国家的财利。“谷贱则以币予食”〔1〕，粮价低了以钱买粮。“布帛贱则以币予衣”〔2〕，布价低了以钱换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以重射轻”，即先在货币“重”时以高利贷的形式放下去，再到物“轻”时把丝绸、粮食收上来，国家两次增值，当然是“国无失利”，“君得其利”。四是“藉于号令”〔3〕。物价的变化是受到国家法令颁废的影响的。君主通过向民间征货币税，如果限于十天内交齐，则商品价格会下降十分之一；八天内则下降十分之二；五天内则下降一半；若是早上下令限在晚上交齐，那么商品价格将下降十分之九。因此统治者无需向百姓直接征收钱币，只要利用政府力量、采取超经济手段、运用法令，即可介入市场活动、操纵物价以获取厚利。

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包括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难能可贵的是，《管子》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内贸与外贸、经济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调控的范围扩大到了国外。《管子》十分重视贸易活动，最早提出要农工商协调发展，认为商业可以促进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4〕，推动生产发展，满足人民需要，否则，“无市则民乏”〔5〕。对齐国来说，地处交通要冲，“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外人来到齐国，“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驎黄金然后出”〔6〕。在具体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时，《管子》特别强调要采取“斗国相泄”〔7〕的轻重策略，即运用价格政策，千方百计争夺重要物资尤其是粮食，促使别国的物资外流，增加本国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一方面，对本国所拥有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尽力“守”之，使“天下不吾泄”〔8〕，不通过贸易流散出去。另一方面，对别国所拥有的粮食或其他重要物资，设法汇聚而来，“归我若流水”。具体办法就是“谨守重流”〔9〕，即严格执行高价流通政策，保持本国的粮食和重要物资的高价位。“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10〕，“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这样运作的结果是，“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11〕，天下的粮食和重要物资皆备于我，“国常有十年之策”〔12〕，国家

〔1〕管子·国蓄。

〔2〕管子·国蓄。

〔3〕管子·国蓄、管子·轻重乙。

〔4〕管子·小匡。

〔5〕管子·乘马。

〔6〕管子·地数。

〔7〕管子·乘马数。

〔8〕管子·山至数。

〔9〕管子·山至数。

〔10〕管子·山至数。

〔11〕管子·轻重乙。

〔12〕管子·山至数。

有十年的战略储备,不但可以调控本国的经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或左右了各诸侯国的经济,故“诸侯服而无正,臣从而以忠”〔1〕。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驭天下的办法。

轻重之术繁不胜数且变化多端,但最后的结果很简单,“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2〕。这是轻重之学的精髓,也是《管子》加强宏观调控的主要方法和根本目的。

四、发展工商业

发展工商业→人民富裕→社会安定→远者来归→军备充实→国家强大→称霸于群雄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3〕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4〕。齐国东部与北部濒临大海,有丰富的鱼盐资源,加上当地适宜种植桑麻等,姜太公于建国之初便明确了发展工商业的作用和地位,即所谓“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5〕、“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6〕。其中手工业包括渔业、盐业、冶炼业、纺织业和制陶业等多项,商业流通领域则涵盖国内外。这个有创意的方针具有务实、灵活和开放的特色,很快就令齐国经济水平大幅上升。经过长期发展的《管子》工商富国思想,相比之下趋于理论化、系统化和政策化,其所起的效用就更为有力,令齐成为富国强国就是直接的佐证。

《管子》中有一条极富自身特色的富国之道,即山海之利,主要指开发矿山、煮海制盐等。在《管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官山海”、“官国轨”、“官天财”、“官赋轨符”等名词,其主旨在于官营、国家垄断,强调国家除掌握和控制粮食、货币外,还必须依靠行政手段掌握和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矿山、森林、海洋等重要自然资源。“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7〕。一再呼吁对山海资源要“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因为这是“天财地利之所在”,必须让“天下之宝壹为我用”。〔8〕《管子》特别强调的要属“官山海”,即实行盐铁专营。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战国时代,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盐和铁,农民无法独立、批量生产,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获得。因此,“官山海”的主要

〔1〕管子·山至数。

〔2〕管子·国蓄。

〔3〕管子·治国。

〔4〕史记·货殖列传。

〔5〕史记·齐太公世家。

〔6〕盐铁论·轻重。

〔7〕管子·轻重乙。

〔8〕管子·地数。

对象就是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掌握了这两项，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经济方面的其他调控也就游刃有余了。

《地数》指出，天下有许许多多的铜矿、铁矿等矿产资源，以及陆地、江、海、河、湖资源，这些都是种植五谷、制作兵器、铸造钱币的源泉；并详细记述了如何发现各种矿藏的办法，并定下律例，一旦发现矿产资源必须由国家封禁保护、开发利用。《地数》云：“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当时人们将山上显露铜、铁、银、铅、金、磁石等矿苗叫做“山之见荣者”。例如，根据山上出现赭色的铁高价氧化物，当时齐国的科技人员就明确其下层必有铁矿；根据矿山上层铅的出现，就可以推测下层可能有银矿；根据丹砂和磁石的裸露，也能判断铜铁硫化物蕴藏底下。这些古代齐人积累的采矿技术知识十分宝贵，而且符合现代关于矿床结构和矿物分布的理论。在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都城临淄等地已有冶铁工场。齐国人程郑等人是有名的靠冶铁致富的工商业者。

官海即官营盐。食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1〕，“恶食无盐则肿”〔2〕。《管子》载，管仲在答桓公为征税的“何以为国”之问时，回以“唯官山海为可耳”，并进而解释道“海王之国，谨正盐策”。〔3〕对于盐业民办官营，允许民间生产，但必须由国家统购统销，通过提升盐价获取倍于税收的利益。因而“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4〕。同样的政策运用到铁业上，即增加各类铁器的价格而不去征收人口税，也能获得同样的效益。国家垄断了盐的生产和销售，不但可以满足人民的日常必需，让“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5〕，而且可“以四什之贾，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伐蕘薪煮海水以籍于天下”〔6〕，以四十倍的价格出口并控制梁赵宋卫等无海无盐国家，还可以用征税的办法轻而易举地为国家增加可观的财政收入。《海王》篇算了一笔账：一个月，一个成年男子吃盐五升半（升是古量具，1升约205毫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儿童近二升半。盐一百升为一釜，十釜为一钟。一个万乘大国，人口总数约千万，如果每升盐的价格增加二钱，合计约每日增收二百万钱，每月六千万钱。同样是万乘大国，征人口税可征者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税三十钱，总数不过三千万钱。因此仅仅通过微涨盐价，并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可以得到相当于两个大国的人口税钱。反过来若是君主向全国发令要对大人

〔1〕管子·海王。

〔2〕管子·地数。

〔3〕管子·海王。

〔4〕管子·海王。

〔5〕管子·国蓄。

〔6〕管子·地数。

小孩直接征税,那么一定会引起民怨,民“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并且因为“人无以避此者”,故也无人反对。运用官盐还可从别国获取经济效益:“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毋得治室宫,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沛水以籍天下,然则天下不吾减矣。”〔1〕

官山即官营铁。因为铁要通过开采矿山、冶炼矿石才能制得,所以官山实际是官营铁的开采、冶炼和农器具的制作及销售。铁器是农民生产、妇女纺织和交通运输不可缺少的工具,如“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行服连辎輶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2〕铁器还是制造兵器的主要原料。控制住铁,不但可以像官营盐那样用寓税于价的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还可以防止地方诸侯制造兵器聚众谋反。当时的齐国允许私人开采矿山和进行冶炼,但对铁器的买卖和流通,则实行严格的控制和垄断政策。统治者十分清楚开矿和炼铁的艰苦性,“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故善者不如与民”,矿山归国家所有,开采和冶炼可以私人进行,但必须按产量计算利润,与国家分成,“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在此基础上,加以轻重之术,用价格政策灵活掌握,“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3〕

国民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士兵的武器,均由手工业者制造提供,因而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战国时代由于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各种专业也在发展。《管子》中提及的专业分工更趋于多样化。因为“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4〕。在类似社会调查提纲的《问》篇中专门列出几项,即“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等等,对国内工匠的人数、技术水平及分类进行详细的调查。农工商三业之内,又出现了更加专业化的多样分工,如以上提到的《轻重乙》篇主张用私人经营和实行官府征税的办法、允许私人开矿制铁,就说明工矿业的出现。在重视手工业生产的同时,制定规章制度以保证产品质量。如“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5〕等,就是对武器制造的要求。

春秋时代齐之临淄是我国最早的丝织中心。齐国生产的高档精细丝织

〔1〕管子·地数。

〔2〕管子·海王。

〔3〕管子·轻重乙。

〔4〕管子·宙合。

〔5〕管子·七法。

品,不仅充足供给国内所需,还大量输出,畅销各地,达到《史记》、《汉书》所称道的“冠带衣履天下”。姜太公初治时已“劝其女工”〔1〕,开始重视纺织业,并收到良好的效果。之后的历代齐主都很重视桑蚕之业,给予该业一定的优惠政策。如《管子·国蓄》的“春赋以敛缁帛”,就是在春天贷款给资金不足的桑农,桑农到时可以其丝织成品作为抵偿。这种方式对桑农来说,既可以保证他们生产前的资金预备,又可以保证生产后产品的销路,避免积压。而对于国家也能保证蚕茧与丝织品的基本来源,以及丝织业市场的稳定。《问》把“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列为社会调查的项目。《山国轨》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核算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也是将了解国内纺织业的状况列为实行统计理财的规划方法之一。《山权数》曰:“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对于掌握植桑育蚕技术及蚕病防治的专门人才,政府不仅采纳、记录他们的意见,给予物质奖励,还可以免除服兵役。

齐国素有重商政策,其商业一向较为发达,再加上有合适的商业政策,使得其在商业发展上胜于别国。这一点在《管子》中即有所体现。首先对各种物资都要规定价格,“布织财物,皆立其赏”〔2〕,同时应做到“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3〕,经划定的物价必须与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横可得而平也”〔4〕。该政策的提出基于有效地把握了市场机制,了解商品的供求与物价涨落的关系,可以为国家获取丰厚的利益。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5〕。士、农、工、商这四大职业集团对国家来说缺一不可,都是国家的柱石。为此,《管子》强调每一种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仅认为农业重要,而且承认手工业、商业这些“末作”对国家而言也同样重要,是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要富裕,这些职业都不可缺少。与商鞅、韩非相比,《管子》并不把“重本”与“抑末”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职业有轻重、主次之别而已。在肯定农业本业地位的同时并不否认工商业的重要性,为其进步性。

五、赋税制度

“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6〕

〔1〕史记·货殖列传。

〔2〕管子·乘马数。

〔3〕管子·乘马数。

〔4〕管子·国蓄。

〔5〕管子·小匡。

〔6〕管子·小匡。

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产品的主要分配和再分配形式表现为交纳赋税，这是学者们论述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古代，“租”和“税”是同义的，同指田租。在西周时，土地为各层贵族所占有，对农民实行授田，保留大片土地役使农民无偿耕种，名曰“公田”。“公田”收获全归土地所有者，这就是劳役地租，地租与赋税合为一体。后来“公田”制消亡，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所以古代思想家论述租赋制度时，常与“公田”制的存废相联系。《国语·周语上》有“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记载。“籍”是用民力以耕“公田”之意。宣王不籍千亩，说明当时“公田”、劳役地租制已开始消亡。到春秋时期，管仲辅齐桓公已实行“案田而税”〔1〕的实物地租制。鲁国相继出现了三次租赋改革，一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二是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的“作丘甲”，三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的“用田赋”，这三次改革都在于废除“公田”制，前者是改按所有田亩征收实物地租，后二者是改按田亩征收军赋。

管仲相齐桓公改革内政，提出“相地而衰征（政）”〔2〕的租赋征收制度。这个制度是按土地肥瘠分等征税。当时齐国已经实行“赋禄以粟，案田而税”〔3〕的实物租税制度。管仲提出这一改革的重要意义是：（1）废除不分耕地好坏按亩数征税的最不合理的规定，而代之以分等征税的合理规定。这是关于征税的公平原则。（2）既然是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就必然是实行实物地租制，寓税于价格之中，而不是实行劳役地租制，因为劳役地租制没有分别土地好坏征税的必要。“相地而衰征”是“案田而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二者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所以“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4〕，意即实行这种制度，农民将乐于耕种而不思迁移。《禹贡》的“任土作贡”（按土地肥瘠，定贡赋差等）和《周礼·大司徒》的“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的思想，与管仲这种租赋思想是有共同之处的。除了按土地肥瘠征税，也根据收成的多少而相应改变征收的税率。“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5〕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收成之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成十分之一，碰上荒年则不收，等饥荒状况缓解后再收。

在管仲以后，继鲁国“初税亩”等租税改革，政治家子产还在郑国“作丘赋”实行军赋改革。最近出土文物发现，军事家孙武对于亩制和税制与晋国六卿存亡的关系问题，曾提出卓越的论述。认为晋国范氏、中行氏、智氏由于亩制较小农民税负较重都将先后灭亡；韩氏、魏氏则由于亩制较大，农民税负较轻而将存在较久。赵氏亩制最大，农民税负最轻，所以“晋国归焉”。〔6〕这说明春秋中后期思想家非常重视税制改革。到了战国时期，田制

〔1〕管子·大匡。

〔2〕国语·齐语、管子·小匡。

〔3〕管子·大匡。

〔4〕国语·齐语。

〔5〕管子·大匡。

〔6〕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

和税制的改革成为商鞅变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记》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1〕，是说商鞅在废除世卿世禄的变法中，在田制上废除原来田地步百为亩的经界，按孙武所述赵国最大亩制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规定，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所说“赋税平”，意思是亩制改大了，农民赋税负担减轻了。这一改革，对于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自然起很大作用。另外，荀况虽然倡导儒家“薄税敛”，“以政裕民”的主张，但是他从来不提“籍田以力”和“助法”，而认为“等赋”（制定租赋的差等），“相地而衰政（征）”是“王者之法”〔2〕，因而在租赋问题上，荀况是《管子》学派的支持者。

“相地而衰其政”〔3〕这种根据土质优劣及产量高低不同等级征税的制度，大多学者认为是管仲所提出的改革思想，但也有学者提出它是周初就已有的赋役制度〔4〕〔5〕。本文姑且不论哪一种说法正确与否，重点关注于该田赋制度是《管子》最强调的赋役制度上。“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6〕，粮食的收成按数量分为几等，收成越少收税相应减少，遇上饥荒则免税。再者以田地的肥瘠定税率，具体方法如“一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7〕；“上夷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8〕等等。“案田而税”及“相壤定籍”，简言之就是“相地而衰征”。拥有劣质田地的农民〔9〕，不会因为必须缴纳与好地同样的赋税而失去劳动兴趣，进而为逃脱重税而背井离乡。除了上缴赋税外，优劣地之间剩余的粮食不会相差太多，因此农业劳动者不论土地好坏都安于田间生产，努力耕作以提高产量，增加了与土地的结合度。而政府能够按时按量收到粮食，国家的储备自然丰实。

“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10〕，这是为了鼓励商业贸易而采取免除关卡和市场捐税的政策，便利了对外贸易及国内商品的流通，加强了本国经济。“民予则喜，夺则怒，……故见予之

〔1〕 商君列传。

〔2〕 荀子·王制。

〔3〕 管子·小匡。

〔4〕 李衡梅，“相地而衰征”考辨，管子学刊，1989，2：27。

〔5〕 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20。

〔6〕 管子·大匡。

〔7〕 管子·乘马。

〔8〕 管子·乘马数。

〔9〕 王秀珠、李英森，齐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论《管子》的“四民分业”，管子学刊，1988，1：16。管仲所提到的“农”，主要指农奴和自耕农。

〔10〕 管子·霸形。

形，不见夺之理。……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1〕。以对盐铁包括粮食等产品专买专卖的收益代替征税，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置税于物价中，可以说是无征税之名而有征税之实，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尽管《管子》的弹性税制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满足齐君的利益，然而实际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及促进了物质生产，齐国老百姓既满心拥护也从中获益匪浅。百姓生活平稳无忧，国家自然得以大治。齐国在春秋一跃成为首霸，与此不无相关。

为了鼓励发展与别国之间的贸易，《管子》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是“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2〕，为从诸侯各国来的客商专门建立了招待客栈，规定凡驾一车四马者免费吃饭，有三辆车十二匹马的，加供喂马草料，有五辆车二十匹马的，再配备五名服务员。二是税收照顾。“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3〕，放宽关税和市场税的征收，税率只有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而且，“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4〕，关税和市场流动税，只收一次，不重复征收，对空车来的、身背货物徒步而来的均不征税。更有甚者，有时干脆“使关市几而不征，墟而不税”〔5〕，只稽查不收税，还免费提供存放货物的场地或仓库。这样做的结果，“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6〕，“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7〕，齐国更加繁荣发达了。

六、军事制度

“作内政而寓军令焉。”〔8〕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仍，齐人多有总结作战思想的著作，如《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管子》虽然不是一本专门的兵书，但其中的军事、兵法思想足可与以上兵学名著相媲美，并且符合齐国国情。

军队是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管子》充分肯定了军队在安邦治国中的作用：“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9〕与《孙子兵法》中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0〕如出一辙。“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11〕，因而《管子》

〔1〕管子·国蓄。

〔2〕管子·轻重乙。

〔3〕管子·大匡。

〔4〕管子·问。

〔5〕管子·小匡。

〔6〕管子·小匡。

〔7〕管子·轻重乙。

〔8〕管子·小匡。

〔9〕管子·参患。

〔10〕孙子兵法·计。

〔11〕管子·霸言。

认为英明的君主不会沉迷于奢华的享乐，相反都重视政权与军队的建设。而且，军队有对内对外两种职能，即“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1〕。可见，军队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手段，具有强大的军队，国家对外有威慑力量，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有保障，则战可胜、守可固。“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2〕。所以，要想立足乃至称霸于乱世，必须依靠军队的有效辅助才行。

《参患》曰：“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

《管子》认为在用兵上，必须综合考评武器、士兵、将领及君主几项软硬件的水平，从而不断获得质的提高。因为“一器盛，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盛，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盛，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3〕。

“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夹铍之衣、钩弦之造、戈戟之繁，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帅车辐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4〕。从以上这一段官方调查问卷可以看出，《管子》具备一整套武器管理的制度，制定了从制造、统计、发放、回收、收藏、检查到修理的一系列管理程序，监督进行各程序的场所的兴建，甚至连制造的时期也予以规定，即在冬天进行。而且制造的兵器要保证质量，不合格的话等同没有。正如“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八，与无镞者同实”〔5〕，这样如何在战场上与敌相搏，不仅无法胜敌，还将损兵失将。

有了精良的武器，就要配合以训练有素的士兵。首先《管子》以兵农结合、军政一体的思想实施军队编制。“叁其国而伍其鄙，……叁国故为三军”〔6〕。在国中置三军：“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7〕“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8〕，如此则可

〔1〕 管子·参患。

〔2〕 管子·兵法。

〔3〕 管子·参患。

〔4〕 管子·问。

〔5〕 管子·参患。

〔6〕 管子·小匡。

〔7〕 管子·小匡。

〔8〕 管子·小匡。

以“作内政而寓军令焉”〔1〕。接着“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猕，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2〕。在日常生活及农事中就能够落实军令、增强配合、形成默契，“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想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3〕。再者，“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4〕。基于此，《管子》有所谓“三官”、“五教”、“九章”的军事纪律训练大纲，而且鼓励“教无常”，在临阵时才可“行无常”，令敌军对我军“不可量”、“不可数”，从而出师皆能“动静有功”。〔5〕

在组织军备征收兵员与武器时有其一定的制度：“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绘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布之地六步一斛，命之曰中岁。”〔6〕另外在兵器缺乏的时候，可以让犯罪的人按罪的轻重缴纳不等兵器以赎罪，“制重罪八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八兰、盾、鞬革、二戟，小罪八以金鈞分，宥薄罪八以半鈞，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八一束矢以罚之”〔7〕。

“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故一斯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8〕。战争一旦发动，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耗，因而充分的战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了战前才仓促准备，势必捉襟见肘，应起战来也就处于弱势。有道是：“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9〕明确指出了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在平时抓紧生产储存粮草、发展经济制造武器等，“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10〕，以厚实的物力和财力作为军队的基础。

战争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如何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战争中把握时机、运用谋略就有了很大的必要性，“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11〕。把握时机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12〕。《管子》很重

〔1〕管子·小匡。

〔2〕管子·小匡。

〔3〕管子·小匡。

〔4〕管子·七法。

〔5〕管子·兵法。

〔6〕管子·乘马。

〔7〕管子·小匡。

〔8〕管子·参患。

〔9〕管子·七法。

〔10〕管子·治国。

〔11〕管子·七法。

〔12〕管子·参患。

视战略战术——“计”的作用，讲求谋略就必须事先筹划以知己知彼。“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1〕。战前谋划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详察地形、掌握天候、熟知军需、调动士气、了解天下事及洞晓战机等，“故兵也者，审地于地图，谋于日官，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2〕。还有就是要避实就虚，“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3〕，“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4〕。

战争有其作用，但穷兵黩武却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5〕。《管子》虽然重视战争，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却是用之而不被所用、不战而胜者至善也。“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6〕。因而对战争必须运用得当，在看待战争的问题上《管子》也有其辩证的态度，即“兵当废而不废，则惑也；不当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7〕。

总的来说，就是“早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8〕，万事俱备，在对敌中何愁不胜。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9〕

对务实的大力提倡，对经济的大力发展，及对国民的大力维护，构筑成《管子》营城思想的基石。以上提及的经济、农业、国民、军队等几方面，息息相关、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作为营国思想在对“城”的规划、建设和防护中缺一不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10〕简短一语，便可精确概括其意：“富民”既道出发展经济之重要性，又点明以民为本意，同时以“富民”作为“治国之道”，这本身就是务实的手段。

〔1〕管子·七法。

〔2〕管子·七法。

〔3〕管子·兵法。

〔4〕管子·制分。

〔5〕管子·法法。

〔6〕管子·兵法。

〔7〕管子·法法。

〔8〕管子·兵法。

〔9〕管子·权修。

〔10〕管子·治国。

第五章 《管子》营城(城市规划)思想

第一节 《管子》营城思想概述

“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荒，隳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1〕我国的城，即国，脱胎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聚落，约形成于夏王朝。《吴越春秋》曰：“姁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亦有“昔者夏姁作三仞之城”之说。〔2〕夏、商时期的城市已不像原始聚落那样仅按氏族血缘关系进行聚居，开始掺入了一些新的因素。〔3〕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礼制思想的全面贯彻。当时的建国营城主要就是基于政治统治的目的，因而从统治者的需求出发恪守礼制规范而不超越，体现了尊卑有序的权威性。此时城市是作为“卫君”的政治、军事统治堡垒在起作用的，政治职能成为了主导职能。〔4〕直至东周以前，仍是“视城若宗法分封政体的政治城堡或统治据点”〔5〕。

有周之世，出现过两次城邑建设高潮〔6〕。一次就在周分封初期，各封地的诸侯到达封地的首要大事便是营国建都，既为防守，又为礼制。另一次正值春秋“礼崩乐坏”之际，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变带来政局的动荡，使得各国的经济、文化相应变化，军事上的攻伐也更为激烈，于是出现了诸侯有违礼制的“僭越”（对周王朝而言）现象，在都城上即表现为营建新城和扩建旧城等。

随着周王朝的统治日趋衰落，进入了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变革年代。土地私有的普及，工商食官制度的解体，农业生产有了质的飞跃，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封闭型经济基础。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始展现其社会经济效应，新的开放式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商品产量随之激增，商品交换活动日益频繁，交换领域不断扩大。在这样的形势与需求下，各诸侯国纷纷违制改造旧城、营建新城。城市革新活动的成果，在旧城改造方面以齐临淄、晋

〔1〕管子·轻重戊。

〔2〕因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无法相互印证，城市起源的确切时间目前尚未有定论。有始于先夏说、夏说及商说等等，本书从夏说。

〔3〕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75。

〔4〕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7、19。

〔5〕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7。

〔6〕贺业钺，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从其说。

侯马及郑韩新郑等为代表,新营建的则有燕下都、秦咸阳等城市。“春秋中期至战国时,城市数量大量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如春秋时齐国即有城120座。一大批的城市经济繁荣,人口倍增,城市中的道路及上、下水道建设趋于系统化。”〔1〕城市规模扩大、手工作坊及市场增多、城市格局有所创新等都成为各个城市发展的共同点。“〔此时的城市〕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性质自有别于……据政治需求而建置之‘城’。因此城的基本概念发生了变化。强调‘城以盛民’,而非‘卫君’。……强调‘民’,正是藉以显示经济因素对城市的影响,突出城市的经济作用。从此‘城’不再只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城堡,而是兼具政治经济双重职能的‘城市’,成为政治职能的‘城’,与经济职能的‘市’相结合的统一体。”〔2〕城市性质有了转化,同时兼有了政治、经济双重职能,以致在城市规划概念上也随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赋予了经济、实用的色彩。“由新概念演绎而来的新规划理论”〔3〕,相应地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如《管子》、《周礼》、《墨子》、《孟子》等,其中以《管子》的最为系统与全面,而同时期的《周礼》中的城市思想虽然重在描述礼制规划,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新的观点。《管子》所阐述的城市思想,明确转向重视经济与国民,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心的主要是城市作为经济活动场所的层面。其中的“不必中规矩”和“不必中准绳”,正是这种新概念的体现。

在社会潮流的驱使下,民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了:城市的职能从重卫君到君与民并重。从而,城市的功用从重礼制转而为重实用,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是大环境下的产物。《管子》集众人、耗长时以融汇之,并承前启后〔4〕——总结三代时期城市建设、博采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发展的成果与经验。后代此类的城市的营建由此可归之于《管子》的营城类别。

“城市是一个生态、气象、环境、水文、经济和社会等分系统耦合而成的大系统,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因素都对城市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5〕

《管子》中最突出的营城思想是关于城市选址、地形、规模、分区、人口、生态及水利等的。以下从城市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及水文学等方面进行归类并详加论述。〔6〕

〔1〕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28-229.

〔2〕贺业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19-20.

〔3〕贺业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245.

〔4〕此处所谓“启后”,并不是指开创之意,而是《管子》营城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营城类别的开始.

〔5〕朱元胜、金光炎.城市水文学.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1991:11.

〔6〕以下有关《管子》城市地理思想、生态思想及水文思想的资料与观点综合参考自《管子学刊》各期相关文章,其中主要有:陈隆文.《管子》地学思想初探.管子学刊,1996,3期:8-14;戴吾三.略论《管子》对山林资源的认识和保护.管子学刊,2001,1:35-38;曹俊杰.《管子》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管子学刊,2002,4:5-13;等等.

第二节 《管子》中的城市地理学思想

城市地理学研究城市地域状态及分布规律,并分析城市内部形态和功能,不仅研究单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还研究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体系,以确定城市的地域结构。中国古代的各种城市思想多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管子》也不例外,其中有较为详尽与独到的阐述。

一、城市的地域选定

“城址是指城的具体位置和活动的空间。在建城之前,人们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然后划定区域,规划设计,修筑城墙。被城垣所圈定的范围就是城址。城址与城,往往是同义语。”“大多数史前城址都位于大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地理条件比较优越;……都有统一的规划设计等。”〔1〕

“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2〕

“城市是一个地域社会,它在一定的地域里形成。人们将某个城市在某地域的形成发展,叫做城市的地域选定,将形成城市的条件因素叫做地域选定因素。”〔3〕地域选定因素包含有城市的自然环境、地形上的位置及与水系的关系等等。在城市的选址上,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影响、决定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管子》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4〕几句论述,将这几个因素都囊括在内了。参见表 5-1。城市对水用的需求包括饮用水、灌溉水及漕运水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水,使用上要求取用、排放方便,因而城市最好靠近河流。但近水又必须把握一定的尺度,因为要预防汛期洪水的袭击。这说明最好的基址为“大山之下、广川之上”,

《管子》中的城市地域选定因素

表 5-1

地域选定因素	《管子》中“因天材,就地利”的相关论述
环境	《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度地》:乡山,左右经水若泽
地形	《度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 《八观》: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
水系	《乘马》: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度地》: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

〔1〕 马世之. 中国史前城址特征浅析. 中州学科, 2002, 5: 98.

〔2〕 管子. 度地.

〔3〕 [日] 山鹿诚次. 城市地理学. 朱德译.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 18.

〔4〕 管子. 乘马.

即处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上,一般高出河面10~20米、距河岸20米。〔1〕

从已发现的中国史前古城来看,多在山麓河滨选址。如河南巩县西北的稍柴村遗址,该遗址据推测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可能是太康所建”。虽然其具体年代无法确定,然大致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商文化,这是可以确认的。“遗址背靠高山面临两河,处于伊河与坞罗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较高而平坦,有山有水,适于发展生产。”〔2〕靠高山而临河,对应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既处于三角洲地带,地势又较高,则代表着“高毋近旱”与“下毋近水”。说明从城市形成之日起,其对于地形的选择已有了实际的经验。再如“老虎山城址位于蚩汗山南麓向阳避风坡地上;西白玉建城于水泉河西侧;阿善城址北依大青山,南望黄河;寨子塔位于黄河西岸悬崖上;马路塔与后城嘴两座城址建于黄河东岸的高台地上;西山古城北依邙山余脉——西山,南濒枯河;王城岗位于嵩山南麓的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古城寨位于潞、洧二水交汇处;后岗与平粮台分别坐落在洹水、新蔡河之滨的台地上;陶寺遗址处于汾河与塔儿山之间等。”〔3〕这些城址多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中国早期城址多为政治或军事中心,其“城址选择,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4〕。傍山可形成险要地形,近水则为了用水方便。《管子》的这种思想不能不说是受到这些实际经验的影响,并且经历过重视礼制的阶段之后,在求改思变的大环境下重拾起来以顺应注意实用的社会潮流。

而在秦汉以后的城市建设中,也不乏此类重实用的例子。作为都城的如南京之城势,《丹阳记》有载:“石头城,吴时悉为土坞,晋义熙初始加砖累壁,因山为城,因江为池,地形险固,尤为奇势。”诸葛亮评价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5〕。加上南面的天堑长江,使得南京有着优良的自然山川形势。周围地区的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有名的谷仓,成为东南重镇,故在唐朝时即被称为“六朝故都”。再如杭州,位于浙江西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南端及钱塘江口北岸,所处的杭嘉湖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水网密布,故而物产丰饶。“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6〕“山水文化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渊源之一。”〔7〕杭州城的环境主要

〔1〕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6-27、302。“河流的二级阶地”说。

〔2〕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7-28.

〔3〕马世之.中国史前城址特征浅析.中州学刊,2002,5:98-99.

〔4〕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5.

〔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

〔6〕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01-202.原文引自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

〔7〕汪德华.试论水文化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城市规划汇刊,2000,3:29-78.

就是由三个因素互相组合而成的：西湖与西湖诸山，钱塘江，及运河和城内诸河。其余如各郡县城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建设，由于本身有山有水的地理形势及不刻意追求礼制规范，更可归入《管子》的营城范畴。

之所以精心选择地形，乃是出于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来考虑的，城市的发展必将带动周围地区的繁荣，反之也会给周围区域带来恶性循环。城市地形不外乎平地、山地、水边等三种。从其所处位置上看还可具体分为三角洲、扇形地、台地、河口、沙嘴、海峡等。其中的平地即所谓“不倾之地”，对于城市的基址是优选之地。然而在实际情况下，是不可能理想的，营城范围内或周围总是会有山或水，而且山体对形成城市的小气候影响颇大，水对于城市的存在更是有着攸关的意义。因此无法笼统地说只要是平地就好，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所谓在两种地形的接触点就可发展城市，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说法。”〔1〕“事实上，曾经有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遗址，往往处在平原、盆地和山体的交界处，尤其是低山、丘陵伸入平原、盆地的前端。”〔2〕如山地与平地所生产的物品不同，其交界处作为相互交换产品之处就有利于发展城市。这只是有利因素的其中一点。（参见表5-2）又如大山之下高低地形的结合处，为地下水的溢出带，因而水源丰富；大川之上的二级阶地既高又离江河较近，因此不易遭受洪水的袭击又方便引水。〔3〕《管子》中的营城思想即已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大山”与“广川”之间是适合城市发展的地形。

我国城市所在的不同地形类型〔4〕

表 5-2

城市所在地形类型	特征	分布或举例	%〔5〕	总结
滨海	背靠低山丘陵，处于较为狭窄的滨海平原上，多依托港湾或海运条件而发展	—	7.3	我国平原地区的城市多于低山丘陵地区的，中山、高山地区的城市数量极少；除了大平原中腹和三角洲平原外，普遍于两种地形过渡或交接的部位形成城市；平原城市濒临江河湖海，丘陵、山地的城市也多趋于河谷，临水为其普遍特点
三角洲平原	周围平原广阔，水网稠密，土肥人众，农产资源丰富，距海远近与三角洲大小有关，但一般较近	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为典型	5.9	
平原中腹	位于广阔平原面上，不临海、不背山、面坡小、地势低平甚至低洼。在古代为较差的营城地形	—	10.0	

〔1〕〔日〕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21。

〔2〕萧红丽，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南京：东南大学，2003：25。

〔3〕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6-27。

〔4〕许学强编著，城市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7-28。本表格根据其文字资料及表格整理。

〔5〕此列数据（该类城市数量/全国城市总数）引自书中表格，说明1983年我国城市在各类地形中的分布情况，今沿用之。盖古之城与今之城虽在数量上有分别，然分布上则相仿，乃取其大概之意，以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

续表

城市所在地形类型	特征	分布或举例	%	总结
山前洪积、冲积扇平原	地形平坦,土壤肥沃而有坡度,水源丰富且排灌条件良好	广泛分布在北方,尤以沿着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淮阳丘陵北麓、鲁中南丘陵山地外缘等华北平原外侧分布的城市为多	21.8	
平原与低山丘陵邻接地带	处在狭窄的平原和低山丘陵交接带,间有小丘起伏或周围一侧地形破碎	以长江中下游平原边缘、镇江以上的城市为典型	6.9	
低山丘陵区的河谷	多位于河谷,临河。当河谷平原较宽阔时,城市地形平坦;当河谷平原较窄小时,城市具有山城特点;当河谷平原成盆地状时,则城市均挨着盆地边缘	在江南丘陵区为多	26.3	
高平原	数量少,分布在开阔、平坦、海拔约 1000 米左右的蒙古高原面上	—	2.1	
高原山间盆地或谷地	绝大多数集中在二级阶梯高原上相对低平的山间盆地或谷地中,并濒临河流	如位于云贵高原坝子和谷地中的城市	12.2	
中山谷地	位于海拔 500~3000 米中山上的狭窄河谷平原,相对高差较大	如南平、十堰和攀枝花等	5.2	
高山谷地	数量极少,在 3000 米以上的高山地区,必处于河谷中	如拉萨等	0.3	

《管子》中有所谓“国势”，即地域形势。其中提及的是五种不利的地势：“有山处之国，有汜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洿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1〕解决方法为：“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洿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2〕还有“相壤宜”。“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3〕，此处论述的虽只是指不同的土地适宜生产的物品不同，然而同时也隐含了不同的土质具有不同的地基承载力之意。另扩展出去的有“地数”，即利用地理条件创出经济效益。“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

〔1〕管子·山至数。

〔2〕管子·山至数。

〔3〕管子·山国轨。

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1〕山脉、河流与矿山都是粮食、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

城市的发展与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江河流域、湖、海等之利营建的城市比比皆是。“水乡城镇的道路系统与河道系统形成一个互相密切配合的系统，以苏州最为典型。”〔2〕城市用水与营运都依靠各水系，甚至原先水源不足或水系不通畅的某些重要城市，如都城，还会人工开挖运河以供使用。而且在运河流经之地的城市往往也因运河之利而繁荣兴盛起来，如作为一个从筑城之始即与运河息息相关的城市，扬州即是典型的例子。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扬州，十年（公元690年）筑州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挖“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3〕的江南运河。唐时发挥了一些漕运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商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该段运河的水源问题没有解决好，经济作用不大，所以扬州城的经济也就发展有限。宋元两代经营运河有所成就，城内的茅山河、盐桥河、菜市河等河流均直接或间接与大运河相通，保证了城内外的物资交流，渐渐突出了该运河的经济作用。到了明清时期，南北大运河畅通有效，其经济功能空前增加，极大地促进了扬州城的经济繁荣。扬州城因此发展了起来。而后来至清朝中后期，运河渐渐荒废淤塞，扬州城也就渐渐不复有往日风采了。

另外，气候对城市的影响也很大。气候条件的优劣与人类生存的舒适度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且更加影响着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集中在温带，相反，在极其寒冷地带、雨水稀少的沙漠地带、热带地区，则城市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城市的发展。这是由于温带地区适宜于人类的活动，有利于城市的产业、交通、文化等的发展。热带地区的城市，避开了平地的酷暑而在高地上建设城市，也充分说明城市与气候有很深的关系。”〔4〕《治国》曰：“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已注意到从嵩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的地区气候适合粮食的生长，说明当时对气候的要求主要在于种植方面。虽然说营城择址时受地域所限无法选择适宜的大气候，但是也可通过选择适当的山、水区域环境以达到调节小气候的目的。

二、城市的分布

“城市是不能孤立地建立和发展的，环绕城市的广大的腹地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考虑城市的位置时，必须在注意这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地形、气候等条件的同时，还要注意与其他城市、村落处

〔1〕管子·地数。

〔2〕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69。

〔3〕〔清·乾隆〕杭州府志。卷二。

〔4〕〔日〕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译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23。

于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1〕

每个城市作为卫君、盛民的空间时，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处于绝对位置；当视野提升到整个区域时，则单个的城市不再只是体，而成为一个点了。对于个体来说，研究的是其内部的分布情况，即城市结构与功能等，这将在下一小节进行研究。对于区域中的点来说，则是从总体上描述城市在区域中的相对位置及在外部空间中与其他分区的分布状况，即城市与周围一切物质的空间关系，这些决定了城市个性及发展前途。当然所说的点具有重要意义，既是中心点，又是统领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点。而区域指的既是全国性的也包括地方性的，城市与周围地区间进行着互取所需及互相提供所需的双向联系。因此，城市是整个区域的中心和焦点，而整个区域的特殊状态，又决定了城市的特点。

“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2〕在变革的时代具有变革精神的《管子》，仍以桓管的“率天下定周室”〔3〕为模，故遵循分封制下的多核心同心圆模式。并据此提出了“壤列”的地域分级管理制度：“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侏诸侯度百里，负海子男者度七十里。”〔4〕这是统国定地的方法。“若此则如胸之使臂，臂之所指也”〔5〕，由此可以使天子居之城与其封下各城有如身体的胸臂一样互相灵活为用。《事语》中有相似的论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国语·楚语》也有更为详细的提法：“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重视人的价值”，“人是与宇宙万物同构的小宇宙，城市、建筑、园林规划设计中都有法人的例子”。〔6〕城市体系如人体的头颈、手臂、腿脚等一般组合，形成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其意相同。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社会经济活动的速度、水平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水平和结构。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心，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焦点和缩影。”〔7〕因此，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而应从区域出发。具体分析城市的分布，就必须具体分析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力。与不同的城市相邻，产生的影响就不同。《管子》有军事方面的论述。《国蓄》曰：“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衡国。以乘衡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衡处，壤削太半。万乘衡处，壤削少半。何谓

〔1〕〔日〕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译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8。

〔2〕管子·度地。

〔3〕管子·小匡。

〔4〕管子·轻重乙。

〔5〕管子·轻重乙。

〔6〕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413。

〔7〕许学强编著，城市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3。

百乘衡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衡处，危偪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大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扞格蔽围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俘，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赋殫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处在多国的包围之中、四面受敌之国就算是大国，也受到极大的危胁；如果是小国，那么便只是徒有虚名之国，实无一尺土地可用，其国君则为寄食之君。至于经济上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管子》中多有论及，此可以从其轻重论中知其端倪（详见第四章）。

城市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兴筑黄河堤防以疏导江水，却未顾及他国利益，“以邻国为壑”〔1〕，以致引起堤坝溃决、河水泛滥。有贾让《治河三策》〔2〕为证：“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北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雍防百川，各以自利。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3〕

三、城市结构与功能

（一）城市的形态

《乘马》曰：“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作为城市形态的要素，是以房屋和街道为主的，还有水道、交通网、地块划分的比例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自然环境与民族性与历史发展的差异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景观。”〔4〕在以城墙围护城市的时代，城墙展示了城市的平面轮廓。一方面保护着城市的发展，一方面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而不那么中规中矩的城墙相对于方正的城墙，在同等条件下则更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无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中，还是在内部的局部扩展上，都体现了优越性。城市路网也有规则型的、不规则型的和混合型的三种。端正的规则型路网虽然在视觉上较统一，但同时也带来了呆板的城市地块划分与拖沓的交通环境，特别是当无视了实际地形与需要显得不合时宜时，仅仅追求道路平直的人为因素产生了副作用。因而顺应地势的不规则型路网在使用上更为适宜。

（二）城市的分化

早期城市的城墙圈围着所有相关的人和建筑，甚至大片农田都包含在内，这从考古资料上可了解到。当城市发展后，有了性质上的转变，渐渐地就发生了分化，有了城与郭之分，或国与鄙与野之分，即现在所说的城市内

〔1〕孟子。

〔2〕前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3〕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90。

〔4〕〔日〕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73。

部、郊区、外缘等。“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1〕鄙与野等的周边与外缘地区成为了主要的农业用地。

春秋战国前“‘城’的性质就是‘君’……的统治城堡。由于它是按城邦国野体制建置的，因此‘城’（国）实质上是控制‘野’的统治据点。‘国’与‘野’的关系，是‘野’供养‘国’，‘国’统治‘野’。换句话说，也就是政治上‘国’控制‘野’，经济上‘野’供奉‘国’。‘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手工业只不过是聊供自给的家庭副业而已。……‘城’中虽有独立的官府手工业，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都有限，且均为……贵族所垄断。……严格地说，这种‘城’实系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春秋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得井田制及工商食官制日益解体，农业与工商业呈现出新形势。“这种经济因素及其政治影响所构成的新动向，在当时城市建设方面都曾有过强烈的反映。到了战国时期，经济对城市建设的影响更加显著。过去作为宫廷附属设施的‘市’，亦从政治活动中心——‘宫’分离出来，成为城市的经济中心——集中商业区，……形成‘城’与‘市’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城市’的形成，更增加了旧‘城’所难以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和扩散力。因而，城市的经济活动远远超越以往旧城国野体制的那种自然经济圈，走向广阔的交换经济领域。”〔2〕“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3〕鄙之民受到了重视，不再只是“编外人员”，与国之民一起编入行政组织，各有所管，使得国鄙成为互动的“城乡共同体”。“(五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如保而听，毋有淫佚者。”〔4〕城经分化之后，虽然其城墙不移，然而无形中其范围得到了扩大，并且分区也能够做到详细而明确了，构成了围绕城市的大城市域。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到中期，城外不单只是农田之地，城内的市已应需而扩展到城郊甚至更远。如宋代时草市大量涌现，“它们或称为市（村市、山市、野市、亥市、子市、早市等），或称为墟（草墟、村墟、墟市），或称步（山步、水步、水步亦称为埠，故埠亦为草市），或称店（道店、庄店、草店、野店），或称为集，或称为场。名称虽异，性质大抵一致。它们大多分布在县城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上，农家定期前往赶集，……此类草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而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5〕。

（三）城市的功能分区

〔1〕管子·度地。

〔2〕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243-244。

〔3〕管子·小匡。

〔4〕管子·小匡。

〔5〕樊树志，市镇与乡村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1。

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职能,其内部必然化分有多方面的功能来增加吸引力,以适应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畴,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

“凡仕者近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2〕

参见表 5-3。

《管子》中的城市功能分区

表 5-3

城市功能分区	官府区	商业区	住宅与文教区
《管子》中的城市分区 论述 《大匡》:仕者近宫	《小匡》:处工必就 官府 《大匡》:工贾近市	《小匡》:处商必就市井 《大匡》:不任与耕者 近门	《小匡》:处士必于 闲燕

各分区经设立之后,实施配套的管理。“筑障塞匿,一道路,圻出入。审闾閤,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3〕以里为单位,修筑围墙,设唯一门户,留唯一道路,专人看管里门以按时开闭等等。正所谓“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閤不可以毋闾,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4〕。

四、城市的规模

西周时期城市的规模大小与等级高低成正比。但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等级制度退居次要地位,城市规模开始与行政地位挂钩,并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构成渐趋复杂化,人口流动较为自由且频繁,因而城市人口的多寡也成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5〕城市规模宏大固然有大国气派,但若是不顾实情,一味求大,则无必要。不仅浪费人力、物力,甚至可能使城市的发展趋向恶性循环,导致衰亡。同理,在城市构成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也需要全面均衡。

因此,《八观》指出:“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囤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半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遗菑矣。”这段话中共提出了几种比例关系。一是城乡比例。城市人口的衣食要由农村提供,

〔1〕管子·小匡。

〔2〕管子·小匡。

〔3〕管子·立政。

〔4〕管子·八观。

〔5〕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32。

因此城市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其发展规模要以农村能养活的城市居民数量为限度。如果城市的规模过大,就超过了农村所能负担的程度,就会产生供不应求的问题。一是城区大小与居民多寡的关系。一是宫室大小与其中房屋多少的关系。一是房屋多少与居民多寡的关系。再就是仓储储备实缺与土木建设疏频间的关系。城市的规模决定于土地的多寡、居民的数量及物资的丰俭等等,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偏求势必带来反效果。因此,不仅城市内部的比例要协调,城乡的比例也要控制。农村的农业生产为城市居民提供衣食,因而城市的发展规模就必需以农村的承受力作为限度,不能任意扩大。先秦时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决定了国力与人口、国土与耕地间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国土太小而耕地又少的话,就算土地全都开垦也可能使国民无甚蓄积。农田离城越远,城内的存粮就越少,弊端就越大。《乘马》曰:“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较少量的优质土地能抵得上量多而质差的土地。因此从土地上看,土质、数量及远近都影响着城市的规模。

“别制断之,不满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1〕}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城市规模,从小到大分别为里、术、州、都及霸国等。从礼制上分,则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同的规模。

《揆度》进行测度:“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城市的大小由耕地、户数人口、纳税人口、兵车及战马的数量进行衡量。城虽大,其国事谋划也必更费时费力。

第三节 《管子》中的城市社会学思想

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既要中央集权,对全国实行分层级的统治,又要赋予地方行政组织以一定的权力,更好地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权修》曰:“朝不合众,乡分治也。”主张进行不聚众议事,把权力分到乡,实行

〔1〕管子·度地。

以乡为单位的行政管理。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1〕《管子》中关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组织：首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从基层到君主的层层相因的控制全国的行政网络，其中每一级都是互相联系的纽带，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其次，以所管行政事务职能的差异和所从事专业的不同作为机构、官职设立的依据，从而打破了自西周以来实行的按宗法血缘进行社会编制的模式。《管子》的《大匡》、《小匡》等篇中系统地记载了行政组织制度。行政机构分为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管子》系统地阐述了行政机构设置的思想。中央行政部门的组织系统是：君——相——五官。地方行政区域及政权机构，一是以居民组织为依据，一是以地域为依据。家庭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单位。〔2〕在组织上，以家庭户数为基础逐级递升建立行政机构，各级都设有长，管理所辖范围内的行政事宜。参见表 5-4。

《管子》中的行政组织

表 5-4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都制 (城市)	轨 (五家)	里 (十轨)	连 (四里)	乡 (十连)	—	—
鄙制 (乡村)	轨 (五家)	邑 (六轨)	卒 (十邑)	乡 (十卒)	属 (三乡)	—
官制 (行政)	暴 (六里)	部 (五暴)	聚 (五部)	乡 (五聚)	方 (四乡)	—
邑制 (地方)	伍 (五家)	连 (十家)	暴 (五连)	长 (五暴)	乡 (五长)	都 (四乡)
事制 (生产)	离 (四聚)	制 (五离)	田 (五制)	夫 (二田)	家 (三夫)	—

《小匡》曰：“制国以为二十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叁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

《小匡》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如保而听，毋有淫佚者。”

《立政》曰：“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

《乘马》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

〔1〕管子·小匡。

〔2〕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220-221。

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发展规律。《管子》首先肯定了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进一步阐明争取人民的重要性。人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这是《管子》人口思想的基本点，其积极主张增加人口，而增加人口的直接目的，就是使国富兵强，称霸诸侯。

为了使齐国的人口不断增加，《管子》提出男女及时婚配和扶助孤独、奖励生育的政策。在婚配方面：（1）“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1〕（2）劝诫已婚的男女搞好夫妇生活，和睦相亲，“皆勉为善”〔2〕。“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春谷”〔3〕，以示惩罚。在奖励生育方面：（1）对生育多子女的免征赋役。“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4〕（2）对无父母的孤儿，找人抚养。“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膾胜而哀怜之。”〔5〕（3）对无后代的罪犯，释放之后立继承人，以增殖人口，这就是所谓的“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6〕。

《管子》除了鼓励人口的自身生殖外，还实行零零碎碎迁入、杜绝迁出的人口政策。鼓励迁入：（1）“召远在修近”〔7〕。“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8〕（2）给外来人口以好处。“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9〕办法有，“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窳。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澹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

〔1〕管子·入国。

〔2〕管子·小匡。

〔3〕管子·小匡。

〔4〕管子·入国。

〔5〕管子·入国。

〔6〕管子·小匡。

〔7〕管子·版法。

〔8〕管子·牧民。

〔9〕管子·形势解。

流水。”〔1〕(3)给诸侯各国做些好事。“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幾而不征，墟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2〕。(4)采取荒芜别国农业的办法，吸引邻国人民到齐国来。从而曾使“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野、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3〕。杜绝人口外流方面：(1)通过分析人口外流的原因：“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4〕可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5〕，这是防止人口外流的根本办法。(2)建立严密的组织。“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6〕(3)规定根本上人民流转迁移的办法。如，“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流散，则人不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殊，所以留民俗也”〔7〕。又，“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孤独，恤长者；……四政曰：捕奸遁，得盗贼者有赏；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8〕(4)遇到灾荒之年，扩大贫民的就业机会。“若岁凶旱水溢，民失本事，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佣。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9〕

《管子》还注意使各类人口保持适当的比例。如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上，有“野与市争民”〔10〕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以农业为本，安排好城市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关系。《管子》也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增加人口，同时也注意到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认为人口的增长要与土地、经济相适应。“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11〕“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之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12〕。

《管子》在主张增加人口数量的同时，也注意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一

〔1〕管子。轻重甲。

〔2〕管子。小匡。

〔3〕管子。轻重戊。

〔4〕管子。治国。

〔5〕管子。治国。

〔6〕管子。禁藏。

〔7〕管子。修靡。

〔8〕管子。四时。

〔9〕管子。乘马数。

〔10〕管子。权修。

〔11〕管子。霸言。

〔12〕管子。八观。

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也，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1〕

在户口管理和人口调查统计工作上，《管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重视的，而且在管理方法和统计项目上较严密、细致和系统。实行“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2〕的报告制度，以加强户口的管理。同时，还进行经常检查户口的制度。

“人口的职业构成与人口的自然、地域等构成一样，是分析人口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对人口进行职业划分，是对人口的职业构成，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考察的必要前提。”〔3〕“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万事具备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畴，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4〕《管子》在人口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我国人口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分民思想，按职业划分人口，即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使他们各有所处，各尽其责，各安其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民之生也，辟则惠，闭则颡。上为一，下为二。”〔5〕又规定各种职业的人民，要在一定的地点聚居，以安其业。《管子》的这一分民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四民分业定居”的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叁其国伍其鄙”〔6〕制度。国指城郊以内，鄙指城郊以外。“叁其国”，即将国都地区分成二十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士乡由国君帅五乡，国氏帅五乡，高氏帅五乡。“伍其鄙”，即将城郊以外的农村地区分成五个行政区域，由五大夫各治一行政区域。具体划分方法是：三十家为邑，邑设有司；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管理。实行自下而上层层管理，“各保治尔所，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加强了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管理。以法治军，“作内政而寄军令”〔7〕。管仲在改革内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行了军制的改革，寓兵于民，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结合起来。具体办法是：将十五个士乡，五家为轨，每家出一军士，每五军士为一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为一里，共有五十军士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四里为一连，共有二百军士，为一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为一乡，共有二千军士，称为旅，由乡良人统率；五乡共一万军士，为一军。这

〔1〕管子·权修。

〔2〕管子·立政。

〔3〕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6。

〔4〕管子·小匡。

〔5〕管子·乘马。

〔6〕管子·小匡。

〔7〕管子·小匡。

样十五个士乡共组成三军,由国君、国氏、高氏各统率一军。由于农、工、商专事生产、贸易,不服兵役,所以不进行军事编制。管仲的军制改革,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因为士兵朝夕相处,“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故,战则同强”〔1〕。所以管仲对齐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2〕为富国强兵,桓公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管子》中的城市生态学思想

城市生态学是研究城市人类活动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城市生态学将城市视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人工生态系统,在理论上着重研究其发生和发展的动因,组合和分布的规律,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调节和控制的机理;在应用上旨在运用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系统关系,增加城市活力。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城市生态学可分为城市自然生态学、城市经济生态学和城市社会生态学三个分支。城市自然生态学着重研究城市密集的人类活动对所在地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包括城市植被、动物、微生物及城市气候、水文、土壤、景观等)以及城市生物和地理环境对城市居民的作用。本节所要研究的主要就是城市自然生态学。城市经济生态学的研究重点是城市代谢过程和物流能流的转化、利用效率等。此分支反映在《管子》的城市思想中即表现为指导政府行为的轻重论。城市社会生态学着重研究城市人工环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效用及人在建设城市、改造自然过程中所遇到的城市问题,如人口、交通问题等。其内容大致与本文所阐述的城市社会学的相仿。〔3〕

城市中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综合体,水分、阳光、地形、土壤等自然要素,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其中生物的发育和生长。

《管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丰富的城市生态学著作之一,它对植物与生态因子的关系和植物群落特征的描述,同近代植物生态学发展初期的水平相比也毫无逊色。生态因子是指对某一具体植物种有作用的环境因子。除了论述土壤因子、气候因子等对植物的生态作用,得出了“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的结论,还从多方面制定对城市生态的保护政策,使得对自然生态资源的利用既有效又有持续性。

一、地宜论

“官天财”,“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4〕欲管理好自然资

〔1〕国语。齐语。

〔2〕国语。齐语。

〔3〕沈清基编著。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46。有关城市生态学的定义及内容等。

〔4〕管子。山国轨。

源，除春天是国民种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秋、冬都要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1〕

《管子》中有所谓“尽地利”的提法，就是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促进城市发展之意。对于如何尽地利《管子》主要提出了两条：一是合理使用土地；二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管子》说：“天不一时，地不利。”何谓“地不利”？《宙合》解释道：“山陵岑岩，渊泉閼流，泉逾瀼而不尽，薄承瀼而不满，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就是说，各种不同的土地，由于地理位置，土质肥力高低情况的不同，适合种植的作物是不同的，土地的收益也随之不同。因此，《管子》提出要“度地之宜”〔2〕，“相高下，视肥磽，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钩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3〕。应该根据每一块土地的地理条件，肥瘠情况，考虑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只要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就能发展，国家就能富足。反之，不合理使用土地，就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就会饥饿贫困。

土壤是植物生活的基质，它提供植物生活所必需的矿质元素和水分。土壤中的各种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影响着土壤的性质，从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分布。土壤固相颗粒是组成土壤的物质基础，大小不等的矿物质固体颗粒，称为土壤的机械成分。机械成分的组合，称为土壤质地。土壤结构是指固相颗粒的排列方式、孔隙度、团聚体的大小、多少及其稳定度。土壤的质地和结构对土壤的水分、养分、温度、通气、微生物活动等物理、化学、生物性质都有很大影响，因而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分布。《地员》对于土壤质地和结构的调查与分类，以及在调查分类的基础上提出的种类土壤适宜种植的植物种类，对今天也仍不失其科学意义和借鉴作用。

科学的土壤分类固然是近代的事，但《管子》中已知道划分土类，并着重指明各种土壤上生长着哪些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是其一大特点。可以说，当时就有把天然草木作为土壤肥力和农作物栽培的指示植物的含义了。在现代，指示植物在鉴别土壤上仍有积极的作用，常常有某些植物只生长在特定的土壤中，根据这些指示植物，人们可以大体上了解土壤种类。《地员》篇总结了古代人民在认识植物和土壤关系方面的知识，说明了不同土壤中适宜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并概括成为理论，指明草与土壤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又是有一定规律的。关于植物和土壤的关系，我国古代有一种土宜说。这种学说认为，一定种类的土壤上生长着一定的植物种类，这就是宜种。如果把不同土壤与植物的关系调换一下，就发现植物生长不好，这就是土宜。土宜说在古代记载不少，《地员》中也有叙述，它首先

〔1〕管子·山国轨。

〔2〕管子·五辅。

〔3〕管子·立政。

叙述了大平原上五种土壤的宜生谷物和草木，然后叙述山地的高下等次，宜生草木。

《地员》进而详细、具体地讨论了如何度地之宜的问题。首先，根据地质高下和地下水位深浅把土地分为洧田（平原）、丘陵和山地三大类，列述了各种土地和不同土壤适宜于生长的不同谷物和草木。其中对洧田论述得特别详细。把洧田分为息徒、赤垆、黄唐、斥埴、黑埴五种土壤，并且具体记述了每一种土壤适宜生长的农作物和草木。离地下水较远的息徒土，五种谷物生长皆宜，蜃、苳、杜、松四种树及楚棘草宜于生长；离地下水次远的赤垆土，也适宜种植五谷，宜于生长赤棠树、白茅和蓍草；离地下水又次远的黄唐土则只宜种黍和黏高粱；离地下水较近的斥埴土，宜种大豆与麦；离地下水最近的黑埴土，则宜种稻、麦。至于山地，则可分为五种；丘陵地则分为十八种，宜于生长的各种草木，都各不相同。其次，《地员》对九州的土壤作了详细的分类，然后列述了不同土壤所生长的谷物、草木、果品以至鱼产和畜产，并对各种土壤的生产能力作了比较。把九州之土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类，每类又分为六种，即上土分粟土、沃土、位土、隐土、壤土、浮土，中土分悉土、纡土、埴土、剽土、沙土、塉土，下土分犹土、壮土、殖土、𦵏土、𦵏土、桀土，共十八种土壤。每种土壤又有五种品色，所以总共有九十种不同品色的土壤。每种土壤生长二种谷物品种，所以可以生长的谷物品种共有三十六种。还对十八种土壤的生产力作了比较，认为在十八种土壤中，以上土中的粟土、沃土、位土三种土壤生长谷物和果木最好，生产力也最高。而上土中的其他三种土壤即隐土、壤土、浮土与上述三种相比生产能力就要低得多，生产所获要少二成。中土中的六种土壤比隐土、壤土、浮土的生产能力还要低，生产所获比粟土、沃土、位土要少三至四成。下土各种土壤的生产能力则最为低下，与粟土、沃土、位土相比，生产所获要少五至七成。对九十种土壤分别所宜种的三十六种作物都做了叙述。

《管子》中还有不少篇文论及度地之宜。如《国准》指出：“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驂牢，以为民饶。彼菹莱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赢。”要开拓利途，对光秃的童山、干涸的河泽也要利用，可开采铜矿铸造货币；有水草的地方，可以圈养牲畜，从而使百姓富足；至于杂草丛生、不适宜五谷生长的地方，却是饲养麋鹿牛马的好牧场，可以用畜牧业来弥补五谷种植的不足。这样就能变原本无用的荒地為有用，发展生产，使百姓不至于贫乏。

植被是指在一定的地区内，覆盖地面的植物及其群落的泛称。每一个地带或每一个地区，都有一定的植被类型。植被的地带分布，具有按高度交替变化的垂直地带性规律。这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垂直变化，导致了植被垂直分布上的变化，因而在不同的山系上，各自形成了不同特点的植被垂直带谱。植物群落泛指在一定的生境中，由植物种间，以及植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

所联系着的植物组合。植物群落的基本特征是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的可见标志，是群落中各种植物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配置状况。《地员》对一小地区植物分布状况的观察，不仅反映了植物由于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植物空间配置状况，而且还反映了植物在时间上的配置状况，反映了植物由水生植物向陆生植物演替系列的部分阶段，即浮叶根生植物阶段——叶；直立水生植物阶段——蒲、苇等；水生草本植物阶段——薜、菡、茅，说明了植物群落不是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地员》篇在对土壤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对植物垂直分布的观察，得出了“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的重要结论。并且，还根据不同地下水位与水性、不同改善的土壤所宜生长不同植物的观察事实，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思想。不同地形上的植物种类：“其山之浅，有茼与介。……其山之竅，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芩。”意思是说，山中有浅水之处，有茼与介等水生植物；山阜之地有榆属树木；在山下有悬钩子属植物；在山边上生长着葫芦科的贝母。这是山地上的不同小地形上的植物分布情况。再者，十二种植物在一个小地形上的生长序列，固然与水分条件有关，但同时也与地形有关，是水滨小地形上植物分布的典型实例。

另有一段叙述的是山地的五种地形上生长的不同植物，体现了山地植物垂直分布的序列。齐国地处于暖温带，东部三面环海，内地河网比较发达，地貌类型多样，有利于多种树木的生长繁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先民对各种树木的认识逐步增加，植树经验不断积累，认识到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对林木生长发育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初步的林木生态观念。《地员》篇通过考察一个山地的情况，依高度不同把山地分为悬泉、复吕、泉英和山之侧几部分，各部分因高度不同所引起的气候垂直变化也不一样，因而分布的植物种类也不同。“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橘，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命曰复吕，其草鱼肠与菰，其木乃柳，凿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藟、白昌，其木乃杨，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侧，其草兢与薔，其木乃格，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蓂与蓼，其木乃区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在悬泉生长着禾本科与莎草科的草本及落叶松林。在复吕生长着紫莞属的草和有气味的草，还有柳属的丛生灌木。在泉英上生长着伞形科植物、水菖蒲和山杨木。山之侧上草本生长有菊科的豨薟草、麦门冬或天门冬一类的药材，木本则有槭类树木。另一处较高的山之侧上生长着旋花属的蓼草和菱蒿，树木有刺榆。这五个不同高度的山地小地形，由于地势不同，气温不一样，土层亦存在着差别，因而分布着不同的植被类型。这些情况与今华北地区山地植被的分布情况基本相符。

《地员》列举了一个小地区内的十二种依地势高低而分布不同的植物——叶、攀、莞、蒲、苇、薔、蓼、莽、萧、薜、菡、茅，指出了植物与土

壤地势高低的密切关系,得出了“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的结论。还根据小地区地势高低、水分分布的不同,指出了各种植物在群落中各自占据一定的空间,形成了一定的群落层次,“莞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藎,藎下于葵,葵下于莽”等。在水生环境中,生态要求不同的植物在不同深度的水层中占据着各自的位置,“叶下于蓼,蓼下于莞”,反映了植物生长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

水为生命有机体所必需。植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土壤水分的多少都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土壤水分过少,植物会受到干旱的威胁,同时,由于好气性细菌的氧化作用强烈,使土壤有机质含量贫瘠,造成植物缺氧;土壤水分过多,常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只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土壤,才是适于植物生长的优良土壤。《管子》在认识水跟植物的关系方面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不仅区分了旱生和水生植物,而且知道在不同的水分环境里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地员》篇对土壤水分的保持、透水性能有着深入的分析,深有见地地指出“五粟之土,干而不烙,湛而不泽”,“淖而不肭,刚而不般,不泞车轮,不污手足”,故被列为“群土之长”。而下土的持水性能差,则十分贫瘠。《地员》还论述了土壤的水泉深浅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地下水位适宜,土壤质地良好,宜于土壤中空气流通,适于种植五谷;而地下水位过浅,土质较差,土壤中无足够的氧气供应,就只能种植适应力强或耐湿的植物。上一段提到的《地员》中典型的植物与水分环境关系的例子,即把十二种植物以其所处位置的相对高下顺序排列,就较确切地表现了陆地上的水生植物、湿生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的不同生长环境。不仅研究单一植物个体与环境的关系,而且开始从一个小地段上综合研究各种植物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它们的自然次序,探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规律。

土壤的化学性质及生物性质对于植物的营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壤的有机质是生物残体的腐烂分解物质和新的合成物质,是植物营养的重要来源。位土中的落即可为土壤增加有机质,使“群木安逐”、“群药安聚”〔1〕。土壤的矿质元素有的是植物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但也有的元素过多透入对植物正常的生长发育是有害的,“甚咸以若”的桀土即是含盐分过高的土壤,从而抑制了植物的生长,所以“其物为下”。土壤中居住着很多土壤生物,有的土壤生物(如蚯蚓)对土壤的混合、通气的改良起很大作用,因而“虫易全处”的沃土不仅适于各种植物的生长,而且生长得“群木数大,条直以长”,“其麻大者,如箭如苇”,“其细者,如藎如蒸”〔2〕。虽然土壤生物中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土壤动物,但在古代当时,有如此认识,也是难能可贵的。《管子》中也简略地叙述了动物与环境间的关系。“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3〕说明了飞鸟有赖于林谷的问题。

〔1〕管子·地员。

〔2〕管子·地员。

〔3〕管子·宙合。

《管子》还认为：虫豸穴处的土壤，由于生物数量较多而富含有机质，所以相对肥沃。

植物与阳光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众多的绿色植物，阳光是它们进行光合作用时必需的能源。太阳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能源，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生态因子之一，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光照情况在各地都有差异，因此植物的分布也有差异。《管子》注意到阳坡与阴坡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是不同的，指明了阴阳坡所宜的植物不同，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不同还跟土壤有关。《地员》根据阳光强弱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指出：“五位之土，……其山之杲，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芩，及彼白昌，山藜苇芒。……五沃之土，……若在隄、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其阴则生之楂藜，其阳安树之五麻”。这充分反映了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坡向，由于光照条件不同所宜生植物种类的差异性，并认识到了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生长的植物对该地光照产生的适应特性，形成了以光照为主导因子的生态类型——阳性植物“五麻”和阴性植物“楂藜”。

《地员》篇中对城市生态学的论述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中对生态因子植物群落、植被的论述与现代植物生态学的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我国古代植物学提供了新的内容，也为后来城市生态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管子》除了十分强调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生产以外，还主张开发和利用水利、森林等自然资源。

《管子》考察了水利资源同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认为粮食生产离不开水利资源和土地资源，水是万物的本源，各种动植物的生长都离不开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1〕。因而注重水利资源的利用。它提出了“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2〕的原则。这里的“往”是因地之势，疏引水道，便利灌溉；“扼”是扼制水流，不使泛滥，并变水患为水利。也就是说，对水资源要兴其利，防其害。在《管子》看来，兴利防害的具体方法就是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沟渰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沟渰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决水潦，通沟渰，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获，司空之事也。”〔3〕“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4〕。只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疏通水道，筑坝防涝，并修建好灌溉系统，农业生产就一定能够旱涝保收，国家也就会富足。

《管子》还非常重视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

〔1〕管子·水地。

〔2〕管子·度地。

〔3〕管子·立政。

〔4〕管子·五辅。

菑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菑泽、草莱者，新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1〕“宫室器械，非山无所仰。”〔2〕“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3〕森林是木材的生产地，而木材是建筑房屋、制造器具的材料，还可用作燃料，用途很广泛。并且，林业也是“大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也应该促进其发展。

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地理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要缓慢得多。但这种变化有时也会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变得十分明显。例如人们对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的严重流失。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淤高了河床，下游于是往往决口改道，从而导致地貌的变化。当时农耕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垦荒事业的兴起。土地占有状况的不合理，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到处开垦。《九章算术·方田》中，有关于测定不规则农田，如所谓圭田、邪田、箕田、圆田、宛田、弧田、环田等面积的算题，反映了当时垦田的破碎无序。不断扩大的滥垦，造成了生态平衡的失调。森林、草原及其他植被的破坏，使得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以木材作为燃料，制作棺槨，以及大量砍伐林木营造富丽宏大的建筑，也是使森林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黄河原来并不以“黄”相称，到西汉初年才有了“黄河”的名称，“这应该和当时森林遭受破坏和大量开垦土地有关。”泾河清浊的变化就可以作为说明。〔4〕

《管子》不仅主张大力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且还极力主张保护自然资源，反对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无度，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5〕。森林资源虽然丰富，木材的取用也十分方便，但也要合理利用，不能浪费，房屋的兴建要有一定的限度；江河湖泊广大，渔产资源丰富，但渔网网眼的大小必须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制，不能太小，要保护渔产资源。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地利不可竭”〔6〕。《管子》指出，对自然资源若不注意保护，而滥加开发、无度利用，必将带来严重的恶果：“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飘屋折树，暴火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震，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豕多臙蟊，山多虫蚊；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乱

〔1〕管子·轻重甲。

〔2〕管子·山国轨。

〔3〕管子·八观。

〔4〕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1。

〔5〕管子·八观。

〔6〕管子·乘马。

纪，逆气下生。”〔1〕生态平衡破坏带来的水灾、风灾、雨灾、火灾、虫灾等必然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国贫民贫，甚至给人带来灭顶之灾。

森林能为人们提供生产用材和生活用材，还有防风固沙、调节温度和稳定雨量等一系列作用。因此，《管子》特别注意保护山林资源，认为遵从林木的季节演替规律是保护山林资源的主要措施。

怎样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不致盲目开发呢？《管子》谈到过两点：第一，规定封禁和开放山泽的时间。“明主有六务四禁。……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裸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2〕“藪泽以时禁发之。”〔3〕春夏秋冬都要作出相应的规定，保护万物的生长，以便将来赢得更大的收益。第二，注意森林防火。干旱季节，山林很易遭遇火灾，不防止隐患，无救急措施，必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4〕。把森林防火看成是君主的“五务”之一，足见其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若生产开发超出了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就会造成对自然界的破坏。如过度的采伐、烧荒、渔猎等等，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生态环境破坏，导致局部地区生物资源的严重缺乏。《国准》曰：“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藪，焚沛泽，不益民之利。”又曰：“烧山林，破增藪，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客观地分析了自然环境受破坏的原因，是统治者缺乏保护与合理利用资源的认识造成的。“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5〕充分表达了对山林等资源的重视。为了有效地保护山林资源，齐国特别制定了防火法令——“火宪”。“修火宪，敬山泽林藪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6〕当时的“火宪”和保护自然资源的事是由“虞师”掌管的。

对山林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管子》大生态观中一个重要的子部分。大生态观包括对天时、地利、人和的认识，对阴阳（自然规律）的认识。山林资源的破坏影响人民生活，国家尚可设法补救。而大生态的破坏，则灾害肆虐，农业无收，政局不稳，以至国家颠覆。《管子》对天时、地利极为重视，尤其是对天时的有效把握，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1）在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时要注意“天时”，“天不时”，如不遵循四

〔1〕管子·七臣七主。

〔2〕管子·七臣七主。

〔3〕管子·幼官。

〔4〕管子·立政。

〔5〕管子·轻重甲。

〔6〕管子·立政。

时变化的规律性,生产就事倍功半。“不务四时则财不生。”〔1〕“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2〕。“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3〕“时”虽然不是生产的要素,但“动于时”却是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2)山林资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再生、更新。一个森林群落,只要不是过度地采伐,就能承受一定量的择伐而很快恢复。为合理保护、利用山林资源,《管子》强调按时禁发:“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4〕“山林梁泽,以时禁发。”〔5〕对山林按时封禁和开放,正是合理利用资源的体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6〕,“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7〕。从季节上说,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8〕故《禁藏》指出:“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在春季林木发芽生长的季节,要严禁采伐林木。对适宜制作大型器物的树木,甚至秋天也不能随意砍伐,如“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9〕,三时即指春、夏和秋季。并列了不禁的危害:“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10〕由此所见,春夏秋冬,依序联系,各有其政。一政可视为一部分,四政则合为整体。一政不禁会影响其他部分,四政不禁则是毁灭性的。“修火宪,敬山泽林藪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11〕

除有效保护山林,《管子》对植树造林也颇为重视,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12〕。并对包括植树在内的种植能手给予较高的物质奖励,“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13〕,这对发展齐国的林业显然有积极的作用。

总之,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就已洞悉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

〔1〕管子·牧民。

〔2〕管子·禁藏。

〔3〕管子·小问。

〔4〕管子·八观。

〔5〕管子·戒。

〔6〕管子·牧民。

〔7〕管子·禁藏。

〔8〕管子·形势解。

〔9〕管子·问。

〔10〕管子·七臣七主。

〔11〕管子·立政。

〔12〕管子·权修。

〔13〕管子·山权数。

必将带来严重后果。《管子》把土地看作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要素，提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扩大土地要素的投入，以此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措施是得力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水利、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管子》并不一味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它还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所有这些，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借鉴作用。

第五节 《管子》中的城市水文学思想

“城市地区的水文特性取决于下列情况。

1. 城市地区的水量循环中包含的水量，有相当部分来自相邻流域，或者来自地下含水层，或者是不经河流的排滞。因此，不仅是城市排水区参与了水文循环，而且其他地区的水也参与了这种循环。

2. 流域下垫面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修建排水和下水道系统等，创造了一个新的径流形成条件，从而使天然径流流速增大。

3. 由于城市地貌的改变和空气的污染，造成降雨和蒸发情势的变化。

4. 由于不透水面积的比例较大，又大量开采地下水，影响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转化。

5. 非净化和部分净化的污水集中排入天然水体。

6. 形成了新的人工地貌，改变了自然水体。

以上所有这些变化都取决于城市化面积、人口、工业发展水平、用水量和供水系统等条件。”〔1〕

“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2〕

一、水文概念

《管子》对“水”的认识和论述主要集中在水的意义和作用。水在自然界的循环和水量动态平衡、水色、水味、水的物理性质和深浅变化、河流分布与分类、水性与治水以及治世“其枢在水”论等六大方面，广涉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水地》篇从水性、水色、水质、味道、流动性、水平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水的性质与功用。

适时适当的降雨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如果雨水成灾，则会毁坏农田，一旦洪水泛滥就更是酿成严重水患，全面破坏人们的生活。

（一）水性

“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3〕《管子》认为管仲能够掌握水的规律并善加利用，其实是借此说明只要熟悉了水的本性，

〔1〕 朱元钰、金光炎，城市水文学，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1991：70-72。

〔2〕 管子·水地。

〔3〕 管子·水地。

就不难循势利导避免水害的发生。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地》篇指出，本原必须具备超越万物的性质，是衡量万物的准则，具有中立性，是万物共同的基质。“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正是在这些认识基础上以水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随非得失之质也。”而水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准、诸生之淡、随非得失之质，则是因为水具有五种超越性的品质——仁、精、正、义、卑。《水地》认为从包括无机物、动植物、人类以及神怪在内的天地万物的产生与成长，到人们的道德品质、风俗习惯，都要由水来决定。这种观点无疑带有强烈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水是颠扑不破的，万物皆得水以生。水存在于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在内的一切天地万物之中，并且是它们得以生长繁茂的基础。不仅动植物如此，人类亦然。人的生理器官及思维能力都是依赖水而产生的。因为水具有种种生的功能，所以被称为“水神”。人无血气则无生、地无水则亦无成，水就像人的筋脉贯通于整个身体一样，贯通于整个大地。以水为地的最主要的部分，所以言水即先于言地，水与地无殊也。不同的水质可以决定人们具有不同的道德品质和风俗习惯。水还具有许多特性可为人效法。

另一方面，《水地》篇秉承当时齐国注重具体事物、强调生命价值的齐文化精神，倾向于借本原论肯定天地万物、生命的价值。因而强调水本原内在于天地万物中发挥作用，强调水本原作为天地万物基质的一面，并且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基本上是用水的自然形态说明水是天地万物的基质。“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水内在于天地万物发挥作用，体现为万物的生机（幾）、本性（常）：“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万物莫不尽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在以水本原论述天地万物的多样性时，《水地》以水的自然形态论述水内在于天地万物，“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是用自然形态的水的凝聚、停蓄说明玉之九德、人之九窍五虑的形成。“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人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篇末说明水性与民性的关联时，则以各国水流方式、水质、水味、水重等自然形态水的种种特征，说明各国百姓的不同品质。此外，在以水本原解释物质的差别及不同的生命运化方式时，《水地》篇又以自然形态的水与其他原始物质及规律相结合加以说明。如“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结合精气论述人体生命的形成和本质；“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一方面肯定水是最基本的原始物质，另一方面在解释占卜的先验性及龙的神化时，则又把水本原与

其他原始物质如火、五色等结合起来。《水地》篇以自然形态的水作为万物的本质(基质),以肯定天地万物价值,则又使水本原具有两重性:一是作为准则的水强调了水的超越性品质;一是作为基质的水,采取了水的自然形态,并且以自然形态的水作为万物的基质。在此基础上《度地》篇又根据水的特点,总结出作为自然形态的水之性及违反水性所带来的恶果。“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鬲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掬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故五害之属,伤杀之类,祸福同矣。知备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管子》在论述水的德行和滋生万物的功能时,强调以人的生活作为准则,把人和社置于与自然对应的关系中进行论述,由此体现出完整的世界形态,有着以政治观点来解释自然的思想倾向。水性之任意,加上水决定人的思维能力,故而形成因地制宜的城市观。水的流动性,揭示了事物的千变万化及不定性,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准则。

(二) 水类

《管子》书中记载有较多的水文概念。如《度地》篇记述的对河流的分类,是在水文地理学上提出的河流分类概念。

《度地》把天下水分分为六种:(1)经水,“水之出于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这种水,大小难以控制,山洪暴发就会形成水灾,危及人畜安全,淹没农田,为害很大,是治理的重点。(2)枝水,由其他河流江流入大河或大海,“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这类河流危害最大,如果上游大面积降雨,河水就会暴涨,渲泻不及就要出现满槽外溢而决口,如江、淮、河、汉等,往往溢水成灾,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支流很多,河水含泥沙特多,易淤易决。这是当时齐国治河的重点,从《管子》修堤筑坝的治河情况看,是指治理黄河而言。这类汇集河是治水中重点的重点。(3)牛轭湖,是平原曲流发展的产物,“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掬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这种积水现象,就是现代地质学所说的“牛轭湖”。其形成充分反映了平原地形起伏与河流流向,侧向侵蚀河岸和淤积成湖的过程,也反映了《管子》对地质科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为我国地质地貌和牛轭湖形成的理论先驱者。(4)谷水,从山间沟谷中,时有时无地流出来的水,“山之间,有一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这种水,流量小,且较稳定,无水患之忧。(5)川水,从地下发源流入大河或大海,“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如齐国境内的小清河,发源于济南的趵突泉,东流入海,这种水流量不大,且极稳定,无水患之忧。(6)渊水,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

“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这种渊水更无水患之忧。这六种水流都可以因势利导，“因其利而往之，因而扼之”。

(三) 水质

“齐之水道躁而复，……楚之水淖弱面清，……越之水浊重而泊，……秦之水汙罽而稽，淤滞而杂，……晋之水枯旱而运，崐滞而杂，……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宋之水轻劲而清。”从对各国水质的评价中，可看出北方河水多泥沙，含多种化学元素，以至易淤、易浑、易浊、易滞。南方河水则较清纯。在《地员》篇中，还对地下水的埋深与水质的关系作了描述。

二、城市水利

城市水系有以下功用：供水、交通运输、军事防御、排水排洪、调蓄洪水、防火、躲避风浪、水上娱乐、水产养殖、溉田灌圃、造园绿化及改善城市环境等。总体来说就是为了稳定城址、促进工商业发展和提供较高质量的生活居住环境。城市水系的形态按其形成来分，有纯人工开凿的及天然河道与人工河渠结合而成的两种；按水体的组成形态，则分为河渠为主型、湖泊为主型及河湖结合型三种。中国历代古都古城都重视水系的管理疏浚，专门制定法规以防对水体的污染和侵占。^{〔1〕}

长期的治水实践、思维与概括，使古人对水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观察更为细致，察觉到流水江河、静水湖泊、自然降水、地面积存水、地下水等运动的不同态势；察觉到水与地势、天候的关系和联系；察觉到了水质的简单结构，从而分为清水流、带沙流与泥浆流等；从而产生了主动调整人与水的关系，调整人与生物的关系，调整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设想、方案、措施、实践的原则。在这些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春秋战国时均创造了大型水利工程，兴利与除害的水利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古代大规模采用引水灌溉技术始于春秋末期，如楚国的芍陂，吴国的邗沟，战国时期魏国的引黄河水，西门豹引漳水，秦李冰主导的都江堰等等。“人们不仅知道修筑沟渠和堤防都必须依据地势，而且懂得采取一再改变水流方向的方法，可以增加水速，把静水输送到远地；水流方向改变，增加水速，水的冲击力量加强，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作深渊^{〔2〕}。这时运用沟渠来调节水利的方法已相当进步，人们不但注意水的流通、水的蓄藏，还注意及时地调节水量。”^{〔3〕}齐国的水利工程更是有着较高的水平，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可贵的理论。《管子》中的《度地》篇以其对水利工程的组织、准备、分工和实施等全面的考察、细致的观测、科学的分类、

〔1〕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82-400。

〔2〕原注：考工记：“凡行奠水，磨折以参伍。”郑注引郑司农云：“‘奠’读为‘停’，谓行停水沟，形当如磨，直行三，折以五，以引水者疾焉。”考工记：“欲为渊，则句于矩。”郑注：“大曲则流转，流转则其下成渊。”

〔3〕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3。

精确的表述, 及对水害防治与水利建设的有机结合, 就是很好的证明。“夫水之性, 以高走下则疾, 至于鬻石; 而下向高, 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 领瓴之, 尺有十分之三, 里满四十九者, 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 以势行之。水之性, 行至曲必留退, 满则后推前, 地下则平行, 地高即控, 杜曲则持毁。”〔1〕对水既可顺其流势进行引导, 也可以对其拦截控制, 使之流往高处。如果把上游的水位提高, 用瓦器以十分之三的倾斜度引下来, 就可让水流急行四十九里, 而迂回流到更高、更远之处。还有就是在低洼不毛之地取土筑坝修水库, 作为泄洪分流的后备, 调节河水盈亏, 汛期可以分洪蓄水, 旱时可以引水用之, 既利用了荒地洼地, 又有农田水利之便。这段话反映了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 阐述了水利灌溉方面修筑堤坝、蓄水以抬高水位、引水入渠的技术要领。按其中的“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等数据, 可计算出水位的高程差即坡降为 0.9074% , 约等于千分之一, 在实用性上符合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2〕(图 5-1) 都江堰、郑国渠、引漳溉邺等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得以成功建成, 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子》水利思想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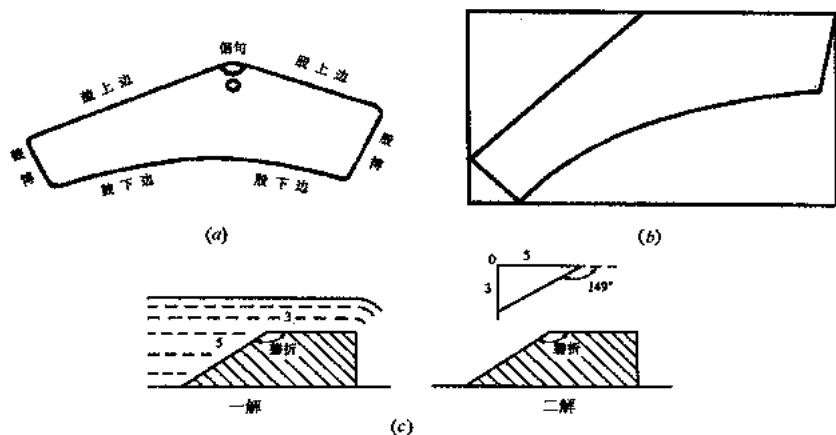


图 5-1 有关壅折

(引自戴晋三, 考工记图说: 144、145、149)

(a) 壅部位名称示意图; (b) 壅制模式示意图; (c) “壅折以叁伍”式的折线型剖面堰

水之性, 以高就下。《度地》认为, 引水灌田要顺应水往低处流的特性, 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要引水灌溉高处的农田, 就需要在上游修建堰坝等扼水构筑物, 为引水创造先决条件。还必须选择渠道的合理坡降。坡降大了, 水流过快, 会冲毁渠道, 甚至剥蚀石头。缓了, 水流过慢, 又会造成渠道淤积。当渠道通过难以避免的道路、小河或沟谷时, 还需要修建多种形式

〔1〕管子·度地。

〔2〕于嘉芳, “壅折以叁伍”新解——兼论齐国农田灌溉和水利工程, 管子学刊, 2000, 2: 86.

的辅助体,如倒虹管、跌水等。这样,水就可以“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1〕,沿着渠道顺着地形向远处的农田流去。《度地》还对渠道水流中的水跃和环流两种破坏性的水力现象,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述,初步认识到水跃现象是由于渠道纵横断面上的局部突然升降造成的。并指出,水跃能够破坏工程,甚至导致“水妄行”事故的发生。对水性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依从水性来治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有水则筑堤,无水的地方修水库,并且在大水库周围筑堤,小水库周围筑防,尽可能做到防蓄并举、防患于未然。

修河治水,时间安排先后有序。《度地》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利以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土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杀草薺,使令不欲扰,命曰不长。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农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湊泊。利以疾作,收敛毋留。……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暴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郾,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廩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毕矣,举有功,赏贤,罚有罪,迁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十分之七,土刚不立。”《管子》针对齐国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认为一年之中适宜组织农田水利建设、动工治水防洪的黄金季节应是夏历春季。秋后农闲时先进行人口土地普查,征集人力,掌握人力资源;冬季准备和整修器材;开春动工。此时动工理由有四:一、立春后寒气渐消,天气渐暖,万物复苏,大地解冻,便于起土修堤筑坝。二、“春三月”当是雨水之后、春分之前的一段孟春时节,“天地乾燥,水纠列”,这时土料含水量比较适宜,容易夯实,工程质量有保证,便于施工;又由于此时“山川涸落”,处于枯水时期,可以把河床滩地上的土取来筑堤,既起疏浚河床的作用,又可以节约堤外的土源,以备夏秋防汛抢险时有足够的土料。三、“春三月”,“故事已,新事未起”,正是春闲之际,是“春十日不害农事”的农闲季节,且昼长夜短,气候适中,利用这个大好季节兴修水利、构筑堤防,便于调集劳力、集中力量兴土动工。四、此时白日渐长,夜间渐短,从农事来说,这期间能充分利用工时,而其他季节则“不利作土功之事”。这些都是其他季节所无法具备的有利条件。

“水”、“旱”、“风雾雹霜”、“厉”及“虫”,“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2〕防治水害,首先要有组织领导,要有人专管,否则,

〔1〕管子·度地。

〔2〕管子·度地。

治水就是一句空话。在治水防洪方面,《度地》从设水官、定职能、征水兵、水工,到确定堤坝形式、走向,到规定筑堤建坝的方式和最佳动工时间,到常年的防护措施,连保管、修理治水工具等,都作了详细周全的筹划。“除五害,以水为始。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以。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1〕先设水官。水官是有条件的,既要了解水性,熟悉治水业务,又要有“习水”的专长。凡需治理的地方,都加以修治,不留隐患。一旦经主管官吏批准动工,就拨给士卒、徒隶和足够的经费,以保证治水任务的完成。水利工程施工民工要从老百姓中抽调,秋季末期就要按人数、土地多少组织施工队伍。不要平均摊派,要分别男女大小,依劳力状况分工。丧失劳动能力的可免其劳动。有病不能干活的可算病假。不能出全工的,可出半工。被征派治河的,可代替服兵役,并造册上报官府。

《度地》还对治水组织和劳动来源进行细致周密的论述。其办法是在头一年的秋后农闲时,实行人口普查,核实人口和土地面积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人数。把全部人口分为四类:一类为老弱、妇女、儿童,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免役;一类为久病未愈的,免役;一类为只能从事部分劳动的,按半劳力处理,从事治河的服务工作;一类为精壮劳力,编入治河队伍,到时候按籍而征,上河治水。这样,通过调查,掌握人口层次情况和劳力资源,再确定各地治河民工(“甲士”)数量,上报“都水官”,再由都水官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下去检查,挨户核实,并与服役者父母协定服务日期和时间,对隐瞒不报或报告不实的,要严加处理。这样就保证治水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度地》有一套管理治水工具的措施:“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甬、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两犂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锢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阅具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次更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工具数量要合理搭配,以利组织劳力,提高工效。冬天就要备好筐、锹、板、夯、土车、防雨棚车和食具等用具。同时要留有储备,以便替换被损坏的工具。工具都要经过水官和地方官吏共同检查,防止虚报或滥竽充数。除备好施工工具外,还需备好柴草和埽料,以作夏秋防汛之用。为了严格督促,还要一套奖惩制度。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力量,齐心合力投入到治水中去,并做到有备无患。治水器材包括两种:一种是治水工具,一种是烧柴。查看治水器具和准备情况是在冬季进行。重点是土筐(笼)、锹(甬)、夹板(板)、木夯(筑)等器物。这些治水工具是按居民组织摊派的。按齐国行政区划“十家

〔1〕管子·度地。

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为长焉”〔1〕的规定，此处应是指每十家准备六套。古时四种工具为一套。总计当为24件。土车一个，防雨用具两个，甚至连锅碗瓢勺等炊事用具都具备。为了防止损坏、丢失，以备补充之用，个人自备工具后，由乡里集中保存，每人两套。采集柴薪是由州大夫率领并负责督导服役水工轮班统一砍伐。砍伐来的柴薪都积存于河岸水边处，以备来春治水烧用。砍伐的时令多在冬季山林开禁之时，有计划、有组织，不致毁坏森林，并由州长、里有司等人全面负责组织领导。

《度地》还实施常年防洪之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效。此谓备之常时，祸从何来？所以然者，浊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谓也。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为败。”

以实用为总导框架，以“因天材，就地利”、定民说、地宜论及水本原论等思想为脉络，加上全面、独到的与城市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及水文学等相关的内容，即是《管子》的营城思想（即城市规划思想）的大致面貌。

〔1〕管子·立政。

第六章 《管子》营城思想是东周前三千年城市建设经验的结晶

第一节 溯源于考古成就

以因地制宜为主旨、代表着实用的《管子》营城思想，来源于对实际经验的总结。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产生之前，人们就已在群居生活中，即始于聚落形态的初期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诸如选择居址等的经验。《管子》营城思想重实用的特点是否决定其来自于生活与生产实践，这就需要研究其产生之前的实践活动的真相；而要从那些久远的时代摘取所需的可证材料，就只有到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去寻找。本章将主要运用前人学者的已有成果进行分析，通过详细列表、分析总结其中规律，从中发现《管子》营城思想的蛛丝马迹，验证其源自实践、取自经验的实用性及实践性。接下来首先阐明本章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一、关于“城址”

《管子》源于管子，成书于战国，历春秋战国之世，因此将本章研究的时期锁定于东周以前，并按时段先后将研究的对象框定为史前聚落遗址、史前城址及夏商西周时期城址三部分。本章所讨论的城址，其所属年代在东周以前，就并非仅仅特指可被称为“城市”的城的遗址，而是包括了史前那些部落或部落联盟曾经居住过的不同内涵的古城的遗址，如既有修筑了城墙或壕沟等防卫设施的，也有无防卫设施的，等等。下面节选许宏先生所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集各家之言论述古城概念的部分段落，以资参考：

“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适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遗址和墓地的中心遗址和墓地。时间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即距今五千年前至四、五千年间。”〔1〕

“城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约当铜石并用偏早阶段的仰韶文化后期，社会的分化导致高于其他聚落的中心聚落的出现；到了铜石并用偏晚阶段的龙山时代，则已出现了若干城址，这些城址大部分就是在中心聚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些可能是都城。”〔2〕

〔1〕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8。

〔2〕 原文参考自：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

“二里头文化时期都城形成，……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作为有防御设施的军事城堡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若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城就显得很不相称’。”〔1〕

“龙山时代的城墙建筑昭示着动用巨大劳动力的防御性公共工事需要的产生，……城市这一新的居住形态的出现则应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早期即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时期，……‘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2〕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城垣）；同样，也并非所有的拥有防御设施的聚落（城）都是城市。……在这里，‘城’与‘城市’是应当作严格区别的。”“鉴此，考古发现的城址，就含有城市遗址和非城市遗址（如军事城堡、设防村落等）两种。而城市遗址，也分为拥有防御设施者（城）和无防御设施者两种。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中国早期城市的特质在于其都具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邑’的内在属性。早期的城垣尚不具有多少权力（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大多是出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它的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因此之故，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但即便在这两个时代也还都见有未筑城垣的城市遗址。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可知防御设施的有无，与聚落的性质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3〕

另有其他学者的一些阐述：

“城址是指城的具体位置和活动的基本空间”〔4〕。

“城有两种，一是城堡，一是城市。后者是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城圈。……但是城堡本身并不便是城市。……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城市不一定非有城墙不可”〔5〕。

“以厚硕的城垣或兼有护城壕（河）为设防工程的城址，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全新的聚落形态”〔6〕。

“学术界在论及城市的起源时，一般都认为原始社会的大型聚落遗址就是城市之源头。据考古发现，我国史前时期的古城遗迹从北（内蒙古）到南（湖南），由东（余杭）至西（成都）几乎到处都有……。依其史前古城遗

〔1〕 邹衡. 中国文明的诞生. 文物, 1987, 12.

〔2〕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 二集.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6.

〔3〕 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8-9.

〔4〕 马世之. 中国史前城址特征浅析. 中州学刊, 2002, 5: 98.

〔5〕 夏鼐. 谈谈探讨夏文化的问题. 河南文博通讯, 1979, 1.

〔6〕 任式楠. 中国史前城址考察. 考古, 1998, 1: 12.

迹的分布地点而言,基本上是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地区为主,夏商周时期的古城在我国更如星罗棋布,其分布范围已远远超过史前时期古城遗迹的分布范围。”〔1〕

“总的来看,史前城址发展到龙山时代,在筑城技术、平面形状与结构类型以及内涵特征等方面,是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重要开端,无疑为商周以来城邑或城市走向成熟发展阶段奠定了前提条件和基础,在聚落与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划时代意义。”〔2〕

前人之述备矣。总括来说,东周以前的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从中心聚落到史前城〔3〕到三代早期城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出现了所谓的史前城,之所以如此称谓,在于当时这批城承担了从原始聚落向城市过渡的重任,表现在考古中即有城市遗址与非城市遗址的不同。说明此阶段中通过区域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强大、社会条件与技术条件的具备,其中心城作为城市所应有的内涵得以渐渐确定。因而城址的提法,是有史前城址与城市遗址的双重含义在内的。

二、在考古资料中可探源的方面

鉴于各聚落与城址环境、其原有地理状况的固有性及研究考古发掘材料的有限性,可资《管子》营城思想从中寻源来考察分析的几方面如下:

(一) 选址

《管子》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4〕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5〕

《管子》曰:“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苻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6〕

“中国早期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对能否防御尤为重视。……城市的城址选择,还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微地形往往是城市选址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把城址选择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之中,使城市处于有利地位,即即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能高低错落,同时引水也很方便。”〔7〕

〔1〕杨华,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城遗迹考古研究(上)——兼说与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古城遗迹比较,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1,35-36.

〔2〕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296.

〔3〕钱耀鹏,试论城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文物世界,1998,1:77-78.“城”的提法.

〔4〕管子·度地.

〔5〕管子·乘马.

〔6〕管子·八观.

〔7〕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5.

（二）总体规划

《管子》曰：“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

《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阨：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2〕

（三）与水的关系

《管子》曰：“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3〕

《管子》曰：“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4〕

《管子》曰：“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矣，至于鬲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高其上，领辄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迁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掩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5〕

“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不仅城市如此，就是原始社会的居民点也要靠近水源”〔6〕。

以下的具体分析主要根据这三点所包含的内容来进行。

第二节 聚落时期的建设经验是对《管子》营城思想产生影响的初级阶段

“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分布在河流湖泊附近阶地平原上的文化遗址有所增加”〔7〕。穴居时期原始人所居临水洞穴距离水面的高度，经学者研究得出以40米为宜。既消除洪水的威胁，又利于上下出入。〔8〕

“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除平原开阔、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外，主要是为了就近取水方便。河流的二级阶地一般高出河面10~20米，既不易受到洪水的冲击，又能就近取水，自然最为方便。就是凿井技术发明以后，原始社会的许多遗址还是分布在河流的沿岸，证明依靠河流供水仍然是重要的供水形式。”〔9〕从选择临水而居，到学习如何与

〔1〕管子·乘马。

〔2〕管子·度地。

〔3〕管子·度地。

〔4〕管子·乘马。

〔5〕管子·度地。

〔6〕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302。

〔7〕钱耀鹏，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中原文物，2003，5：11。

〔8〕萧红颖，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南京：东南大学，2003：26。原文参考自陈伟，穴居文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0。

〔9〕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302。

水共存，在聚落选址中开始显示重视水源等建设经验的积累，水源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出来。《管子·度地》就以“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这样的叙述呈现城与水间一种较好的关系，并突出水系的地位。《管子·乘马》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临水营城之道，也是据此而提出。

“地理位置与地形影响聚落形态的情况到处可见。一般来讲，河旁或道路旁边的村镇常常呈长条形，山坡上的村落常常按等高线排成若干弧形，平原地带则容易形成圆形、方形或者二者的变化形式。”〔1〕

聚落遗址列表〔2〕

表 6-1

遗址	年代或考古文化类型	规模	平面形状	内 容
澧县八十垱	约公元前 6000 年	约 3 万平方米	不规则方形	有环壕，内侧堆筑土围；北面利用古河道作为护围
宝鸡北首岭	约公元前 5000 年	约 6 万平方米	长椭圆形	未发现围壕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	兴隆洼文化	—	不规则圆形	有壕沟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北城子	仰韶文化	—	—	西侧临河，北、东、南环绕壕沟
内蒙古朴西县白音长汗(图 6-1)		—	不规则椭圆形	—
内蒙古凉城县王墓山坡下		—	—	壕沟略呈弧形
陕西西安半坡(图 6-2)		约 5 万平方米	不规则椭圆形	居住区外的环壕
陕西临潼姜寨(图 6-3)	仰韶文化	—	不规则椭圆形	中央居住区外有围壕，西侧临河，北、东、南环绕围壕
河南濮阳西水坡		—	—	有环壕

由表 6-1 可见，在聚落时期，先民虽然只是处于营建聚居场所的初级阶段，也已初步地考虑到对周围环境的利用及所受到的影响，并且限于当时物质水平与技术手段较低的状况而选择去适应环境。可以说，此时期的建设活动成为因地制宜、对水源的利用等建设方法最早期的实践来源，从而也是《管子》营城思想的最早来源。

〔1〕 萧红艳.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南京: 东南大学, 2003: 33. 原文参考自钱耀鹏. 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 文物, 1997, 8.

〔2〕 萧红艳.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南京: 东南大学, 2003: 27-32. 根据其文字内容及表五编制本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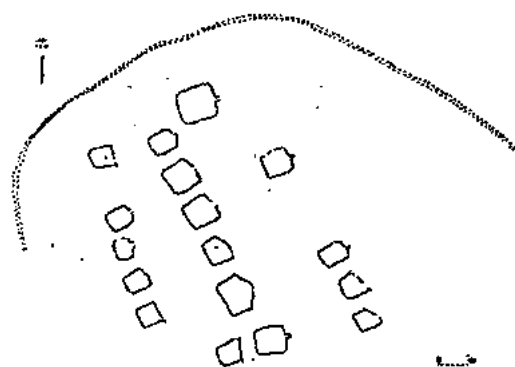


图 6-1 内蒙古白音长汗（南区）环境聚落示意图

（引自萧红颀，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30）

第三节 史前城址

“我国史前城址的出现，是聚落形态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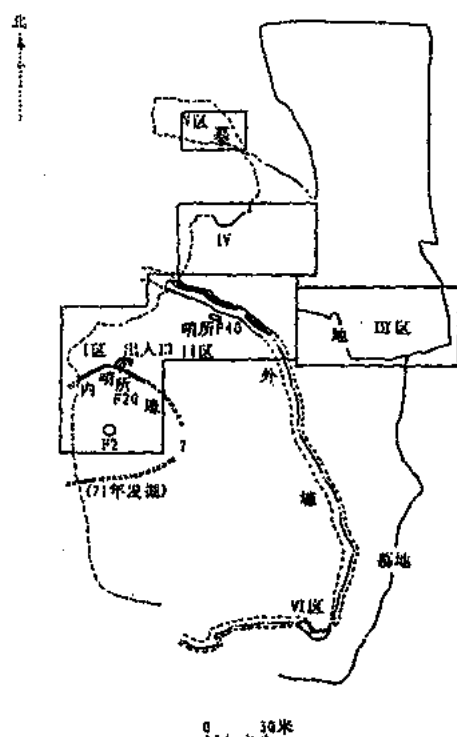


图 6-2 西安半坡聚落（前期）环境结构复原示意图

（引自萧红颀，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30）

发现这类城址,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三千年的一段时期,分属于8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区可划为四大区域,即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总数约50座左右。另外还有与此相关的长江下游太湖地区。”〔1〕

大约公元前3000~2000年的时期内史前城址大量出现,考古上的发现给予我们对当时城址情况的最大认识。在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区域的范围内,将所知的城址依照本文所要研究的各项内容进行列举,从中既能知道各个城址的特点,又可以总结出相关的共性。从而了解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先民们,在营造他们“城”的居址时,就已积累了更多有关选址、适应地形的经验,比聚落时期更具复杂性与进步性。具体的列举参见表6-2。

史前城址列表〔2〕

表 6-2

城址	文化 (类型)	所在地	规模 (米 ²)	平面 形状	所处 地形	城垣筑造	备注
西山	仰韶 (大河村)	河南 郑州北郊	3.1万	类八角形, 近圆形	邙岭余脉 上,枯河北 岸的二级台 地边缘	城墙为方 块版筑法, 外侧环绕有 取土沟	(图 6-4)
王城岗	中原龙山 (王湾)	河南 登封县告 成镇西	1万	西城近 方形	五渡河 西岸的岗 地上	两城并 列,共用 一墙	东西并列 两座小城(图 6-5)
郝家台	中原龙山 (王湾)	河南 鄆城县东 石槽赵村 东北	3.2万	长方形	台地上	城外有壕	(图 6-6)
平粮台	中原龙山 (王油坊)	河南 淮阳县城 东南	5万	方形	新蔡河 西岸的台 地上	城墙采用 小版筑堆 筑法夯成	南门中间路 土下铺设陶排 水管道(图 6-7)
孟庄	中原龙山 (后冈)	河南 辉县市孟 庄镇东侧	16万	方形	坡地上	城墙堆 筑而成,外 有环壕	—
后冈	中原龙山 (后冈)	河南 安阳市	—	—	西北涑 水南岸的 高岗上	残余一段 长70余米、 宽2~4米 的夯土围墙	—
边线王	山东龙山 (姚官庄)	山东 寿光县孙 家集镇边 线王村北	大城5.7 万;小城 1万	圆角方形	淄河两条 古河道间的 台地上	—	小城位于 大城中部略 偏东南处
城子崖	山东龙山 (城子崖)	山东 章丘市龙 山镇东	20万	长方形	武原河 畔的台 地上	北垣随地 势弯曲而外 凸,沿断崖 而筑,外壁 呈陡壁,内 壁呈缓坡, 墙外为河流 或沼泽;大 部分城墙挖 有基槽	(图 6-8)

〔1〕任武楠. 中国史前城址考察. 考古, 1998, 1: 1.

〔2〕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13-3, 1138-139. 根据其文字资料及附表1编制本表.

第六章 《管子》营城思想是东周前三千年城市建设经验的结晶

续表

城址	文化 (类型)	所在地	规模 (米 ²)	平面 形状	所处 地形	城垣筑造	备注
丁公	山东龙山 (城子崖)	山东 邹平县苑 城乡丁公村 东侧	11 万	圆角长 方形	高埠上	有壕,城 内发现有 与外城垣 且本城垣 、城壕	—
田旺	山东龙山 (城子崖)	山东 淄博市临 淄区田旺村 东北	18 万或 15 万	圆角竖 长方形	乌 河 东岸	—	—
景阳岗	山东龙山 (城子崖)	山东 阳谷县东 南张秋镇景 阳岗村周围	38 万	呈东北一 西南向的 圆角长方 形	—	城垣南、 西、北三 面有城垣 、中部有 缺口,可能 为门址	城 内 中 部 有 大 小 两 座 夯 土 台 基,利用原 自然沙丘加 工而成(图 6-9)
薛城	山东龙山 (尹家城)	山东 滕州市官 桥镇九楼村 东南	2.5 万或 1 万	近方形	古 薛 河 西岸	未 发 现 有 明 显 的 城 垣	在 周 代 薛 国 故 城 的 范 围 内,似 属 夯 土 台 址
丹土	山东龙山 (西城)	山东 五莲县东 南部丹土村 周围	25 万	早期为不 规则圆形, 中期为不 规则刀把 形	—	—	中 期 城 址 有 蓄 水 池 、排 水 池 和 出 水 口 等 设 施,已 开 始 考 虑 地 势、洪 水 和 防 御 之 间 的 关 系 (图 6-10)
老虎山	老虎山	内蒙 古 察 哈 尔 盟 的 东 南 部 山 南 麓 阳 城 地 带,面向海 及其周围 的开阔地	3 万	上窄下宽 的不规则 三角形	依 山 而筑,上 下高差逾 百米	城 垣 为 黄 土 垒 成 、外 侧 由 石 块 砌 筑	为 全 城 制 高 点 的 山 顶 平 台 上 筑 有 小 城 、全 城 依 山 势 修 成 八 层 阶 地 (图 6-11)
西白玉	老虎山	内蒙 凉 城	为老虎山 城的 1/2 左右	地貌、城 垣形状及 建筑方式 略同于老 虎山城	—	—	—
板城	老虎山	内蒙 凉 城	更小	略呈梯形	—	石砌	—
园子沟	老虎山	内蒙 凉 城	较大	—	三面为 山脊包围 、一面临 水,地势 险要	未 筑 城 垣	沿 山 坡 分 成 多 层
大庙坡	老虎山	内蒙 凉 城	—	—	平 缓 坡 地上	石砌	城 中 部 发 现 一 道 顺 山 势 修 筑 的 城 垣
威俊	老虎山	内蒙 包头以东 的大青山 南麓台地上	0.8 万/ 处	不规则	台地上	—	由 东 西 三 处 石 城 组 成(图 6-12)
阿善	老虎山	内蒙 南临黄河 与河套平原	5 万	不规则	—	有 的 地 段 多 重 石 墙 并 行	由 东 西 两 处 石 城 组 成
西园	老虎山	内蒙 包头	—	不规则 长方形	台 地 边缘	石砌	—

续表

城址	文化 (类型)	所在地		规模 (米 ²)	平面 形状	所处 地形	城垣筑造	备注
莎木佳	老虎山	内蒙	包头	—	—	台地上	石砌	有东西两座石城
黑麻板	老虎山	内蒙	包头	2万	—	—	石砌	由东西两个台地组成
寨子塔	老虎山	内蒙	准噶尔和清水河之间南下的黄河两岸的高台地上	—	—	东、西、南三面为峭壁和陡坡	石砌城墙依地形起伏修筑;地势平缓的北侧筑有两道平行的石墙,建于人工堆筑的土壕上,外侧为深沟	—
寨子上	老虎山	内蒙	准噶尔	—	—	地形、地貌与寨子塔城相似	石砌,有壕	—
马路塔	老虎山	内蒙	清水河	4万	—	西临黄河断崖,呈东高西低的缓坡状	石砌	—
石家河	屈家岭-石家河	湖北	天门市石家河镇北	120万	近长方形	东、西二河间	城墙堆筑而成,外有环壕;环壕外侧还有人工堆筑的数道土台	(图 6-13)
马家垸	屈家岭-石家河	湖北	荆门市五里镇显灵村	20万	梯形	较平坦的岗地上;城内高于城外,东北部为宽平的岗地	城墙堆筑而成,内坡平缓,外坡陡直;城外东、北、南三面有壕与西面的古河道相通,形成环壕	城门四,另二门似为水门(图 6-14)
阴湘城	屈家岭-石家河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阳城村	—	圆角长方形	台地上;城内东部地势较高	城墙堆筑而成,东、南、西面外有环壕	城北为湖水所侵蚀,状况未明(图 6-15)
走马岭	屈家岭-石家河	湖北	石首市焦山河乡走马岭村	7.8万	不规则椭圆形	高地上;城内东北部地势较高	城墙堆筑而成,有环壕	西城墙之南门似为水门(图 6-16)
城头山	大溪-屈家岭	湖南	沅陵县西北车溪乡境内	7.6万	近圆形的八角形	沅水支流澧水河旁的高地上;城内略高于城外,西南部地势最高	城墙在早期的壕沟上堆筑而成,外有环壕,大部分为人工挖成,少数地段利用自然河道	北、东、南各一门,西无门,贯穿北门的是一条沟通城内外的水路(图 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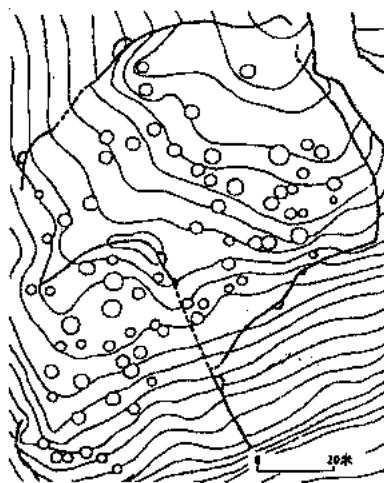


图 6-4 赤峰西山根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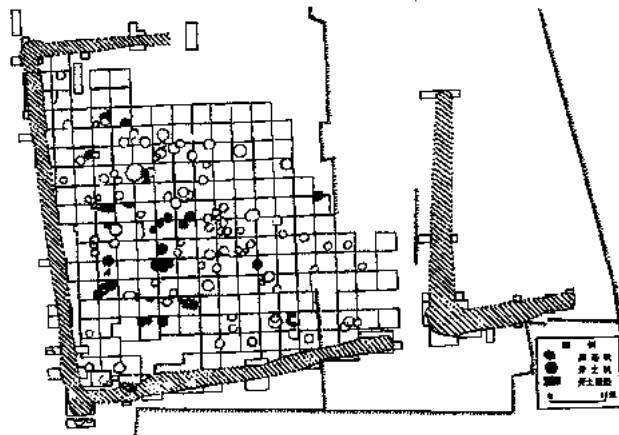


图 6-5 登封王城岗遗址第二期遗迹分布图

(引自钱耀鹏. 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中原文物, 2001, 1: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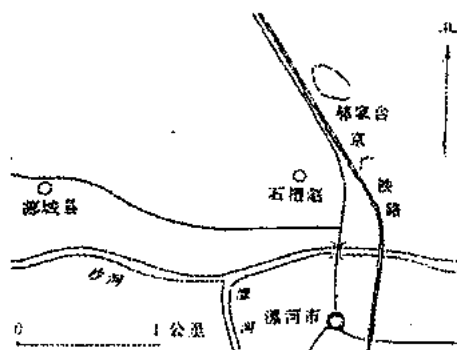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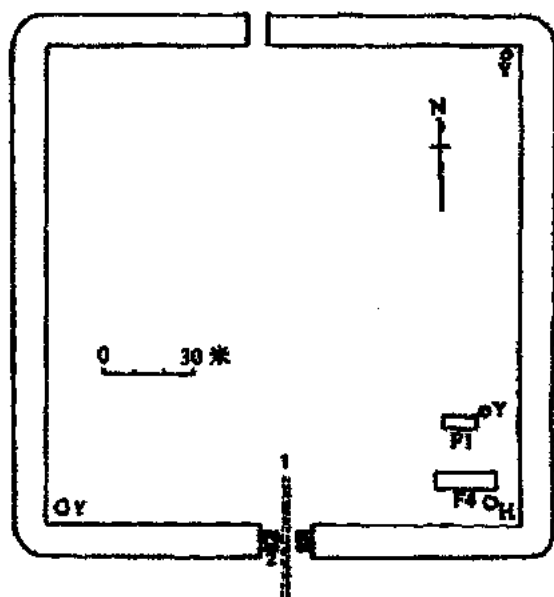


图 6-6 河南郾城郝家台遗址位置图

(引自萧红,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1)



1. 地下排水管道 2. 门卫房 Y. 窑 H. 灰坑

图 6-7 淮阳平粮台城址平面图

(引自钱耀鹏, 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中原文物, 2001, 1: 36)

1. 地下排水管道 2. 门卫房 Y. 窑 H. 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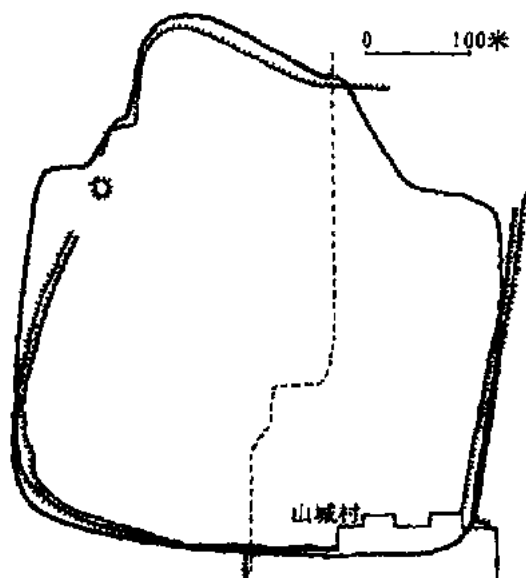


图 6-8 章丘城子崖城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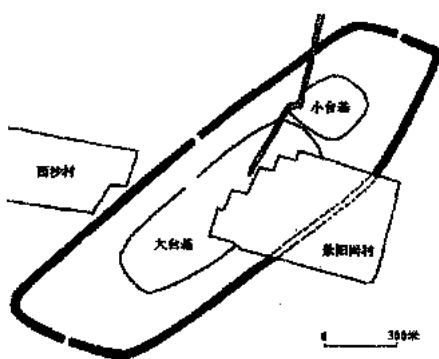


图 6-9 阳谷景阳岗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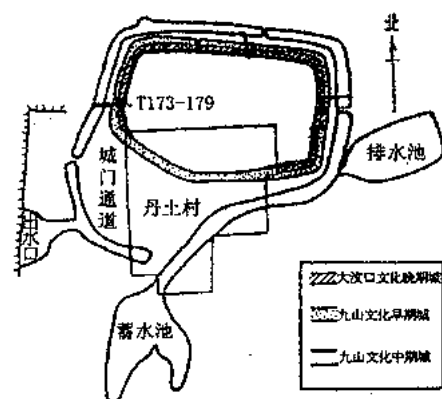


图 6-10 五莲丹土城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萧红,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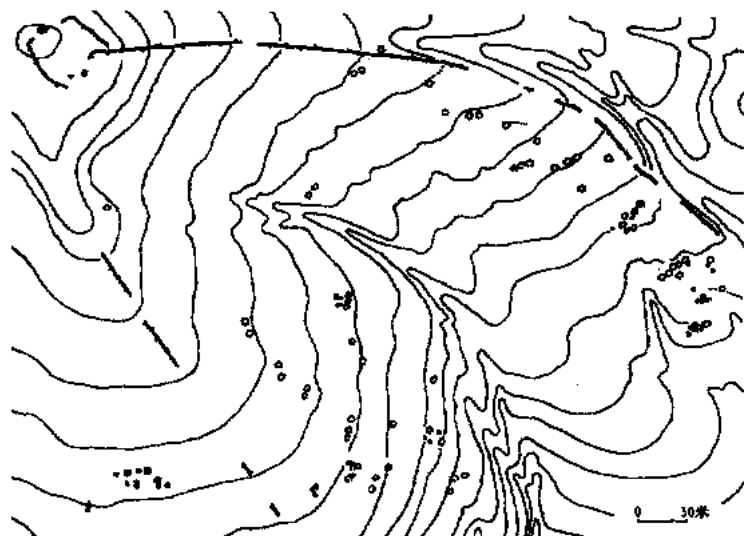


图 6-11 凉城老虎山城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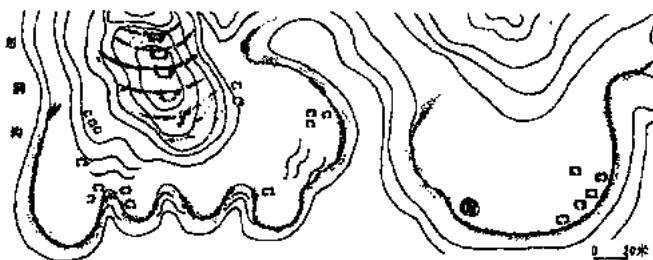


图 6-12 包头威俊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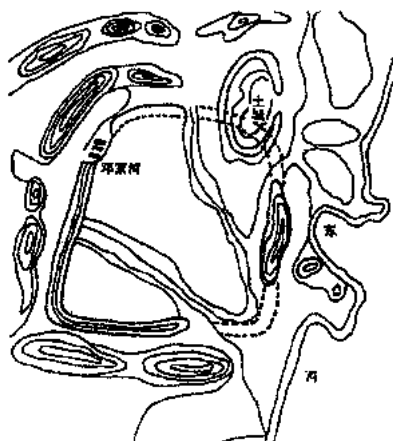


图 6-13 天门石家河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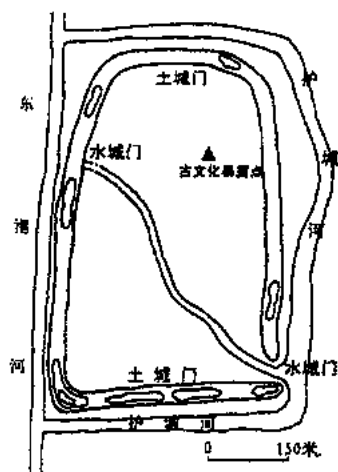


图 6-14 荆门马家垸城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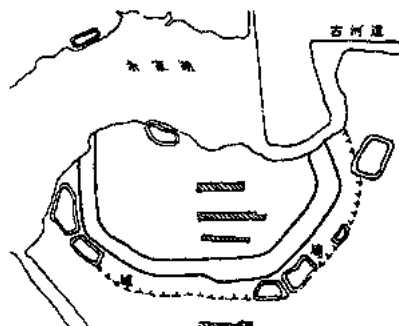


图 6-15 荆州阴湘城城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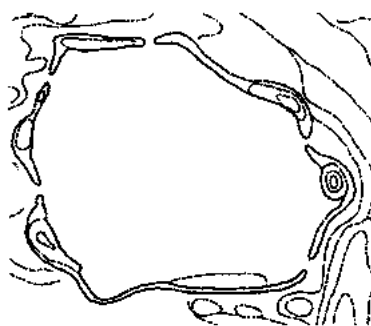


图 6-16 石首走马岭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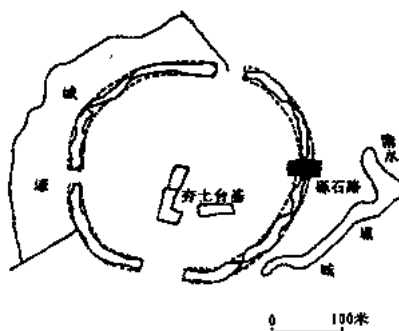


图 6-17 沔县城头山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6)



图 6-18 新津宝墩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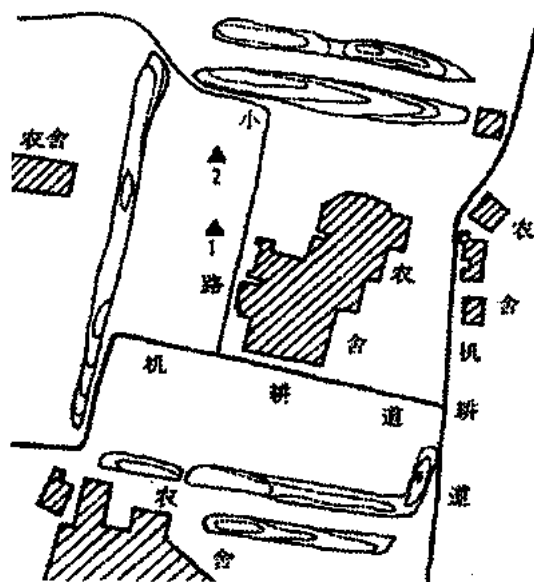


图 6-19 都江堰芒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萧红颢,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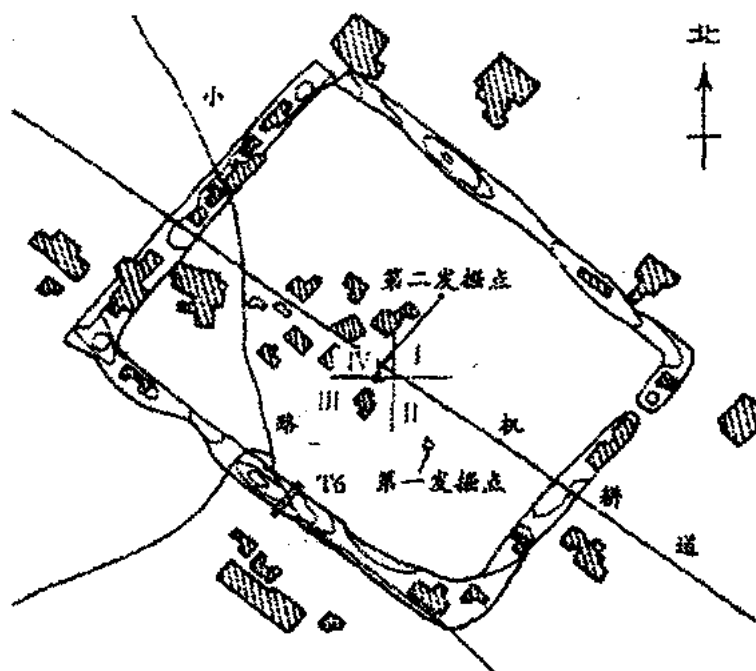


图 6-20 郫县古城遗址平面图
(引自萧红颢,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7)

由以上表格内众多城址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在选址上 5000~6000 年前的人们就是本着因地制宜的思想进行的。依照地势定城址、筑城墙、进而内部分区。其中因地制宜选定城址的有以下几种情况:山地上的不规则平面,如内蒙古中南部的城址;平原上自然形成有利砌筑的方形或长方形平面,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址;近河的台地或岗地上,如长江中游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址;于水边形成平行于水流方向的平面形状,如长江流域的城址;朝向的选择上以东南—西北向为多的,如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城址;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多为背山面水型的,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址;等等。因地制宜筑城墙的情况有:依地形高低错落而曲折或顺山势修筑,如黄河中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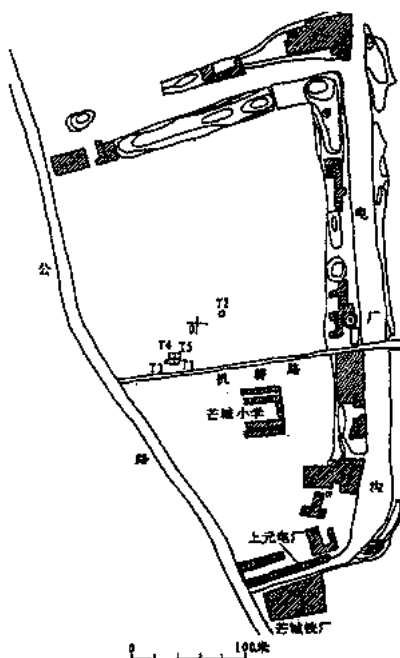


图 6-21 崇州双河遗址平面图
(引自萧红颜,《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77)

地区的城址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城址;台地上或岗地上则筑于边缘,如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城址;地形险要处省略,无险处则加筑双重城墙或重点进行设防,如内蒙古中南部的石城;临水处则以水流、河道做为屏障代替城墙,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址;等等。因地制宜在内部进行分区的,如在城内地势较高处常设置有类似后世宗庙的场所,而在较低处才分布有居住点、墓地或作坊等。得益于这么多的实践积累,重实用的《管子》提倡建城要“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势在必行的了。

北方的城址多处于近河高地上,而南方的则由于所处环境地表水、地下水及降水均较丰富,而普遍于城外挖筑有壕沟,或是完全人工开凿,或是利用周边自然河道,形成以壕为主、墙壕共卫的防御系统。建造于河流两岸的城址,往往受到所处台地范围的大小、形状及河流的流向的制约和影响,一般选择与河流的流向相适应。有的城址往往在考古挖掘中被发现其某一面或几面已为河水或湖水所侵蚀、毁坏,由此也可了解当时那一面或几面就是临水而置的,并且在被弃用之后的年代中为泛滥、上涨或迁移的水流所毁。这当是特意所为,说明当时的先民是注重与水为邻的,而非偶然出现的情况。所以《管子·乘马》总结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对于城防建设,《管子》也提到根据地形“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如在黄河上游内蒙古高原地区的城址,多位于高岗上,其营建既受制于自然地形,同时也充分利用所在地势,突出地表现其以防御为主的特点。如平面

形状极不规整,与山势或岗地的形状相契合;如在地形险要处则省略城墙,只在需要之处才筑有石砌城墙等防御设施,必要时建筑双重甚至多重的石墙来增强防御能力;等等。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地势较为平坦,可以形成较为方整的平面。而在我国最大水系——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城址,其城墙外大部分有较宽的壕沟,并利用周围的河流、湖泊等,与之相连形成环绕的护城河。这点仅在其中下游地区较为突出及普遍,而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则基本无壕沟,与水域的联系也稍弱,当是降水量与水系均较少的缘故。〔1〕

第四节 夏商西周时期城址

“三代王朝实际上就是城邦联盟,天子与诸侯霸主都属城邦范畴。”〔2〕该时期的城址主要包括三代王朝的都城址、三代王畿之内及其周边的方国城址和王朝周边的邦国城址。三代的都城如各商城、丰镐及洛邑等,已在内涵与规模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扩展;王畿之内的城址在各方面与同期王朝的文化有着一致性,并且因其所处的边缘地理位置,又在军事防御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周边邦国的城址则受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等条件的影响,拥有各自的地方特色且表现出不平衡性。详见表 6-3。

夏商西周时期城址列表〔3〕

表 6-3

城址	文化类型	所在地	规模 (米 ²)	平面 形状	所处地形	城垣筑造	备注
二里头	二里头	河南省偃师市西部	400 万	—	洛水南岸	—	(图 6-22)
偃师商城	二里头-二里冈	河南省偃师市城区西南侧	200 万	长方形	东北临河,东南有湖	内城城墙两侧筑有护坡,北垣、东垣有多处直角转折;外城东南南部依地势内收,东北西三面城墙外侧有护城壕	东北城角为斜角,与北城墙外自然河流的走向及位置等有关(图 6-23)
郑州商城	二里冈	河南省郑州市区及郊外	300 万	长方形	—	城墙分段以版筑法夯筑而成,两侧有夯土结构的护城壕;西、南面一段外城墙与北、东面低洼沼泽地构成城外又一道防御体系	完整的供水系统包括蓄水池、地下石板筑水管道和汲水井(图 6-24)

〔1〕 钱耀鹏. 史前城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 江汉考古, 2001, 1: 41-47.

〔2〕 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7. 原文参考自: 日知主编. 古代城邦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83.

〔3〕 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53-78、142-145. 根据文字资料及附表 2 编制本表.

续表

城址	文化类型	所在地	规模 (米 ²)	平面 形状	所处地形	城垣筑造	备注
小双桥	二里冈上层晚段	河南省郑州市商城西北	144万	—	索须河畔	—	—
殷墟	殷墟	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	3000万	—	洹河两岸	可能设有城壕等设施	中心区为宫殿宗庙区,于洹河南岸地势较高处,洹河绕经其北东两面,于南面有壕沟相接(图 6-25)
周原	西周	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中心地区)	1500万	—	北依岐山,南临渭河	—	排水管道用陶质水管套接而成或用卵石砌成(图 6-26)
丰镐	西周	陕西省西安市西南	1000余万	—	沣河两岸;丰京城址在沣河以西,镐京城址在沣河以东	—	排水设施由陶质水管铺设(图 6-27)
洛邑	西周	河南省洛阳市	600万	—	瀍、涧二水之间至瀍水两岸一带	—	(图 6-28)
府城村	二里冈上层	河南省焦作市区西南	8万	方形	地处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山前平原上	城墙夯筑而成;南垣东端略微内折形成一个缺角;北垣外有河流通过,当为护城河	(图 6-29)
垣曲古城	二里冈	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南关	13.3万	不规则方形	坐落于中条山脉之中的小盆地内,黄河北岸的阶地上;地理位置险要;西面与丘陵相连	西垣门道以南及南垣西段(已知)均有平行的双道夹墙;西垣外有护城壕;南垣中部依地形向内微折曲;东南部城墙受河水冲刷无存	防御坚固,军事色彩浓厚(图 6-30)
东下冯	二里冈下层	山西省夏县县城东北	25万	长方形或方形	坐落于中条山北部运城盆地内的育龙河两岸台地上	城墙内外均有夯筑护坡;外侧绕以护城壕;与城墙底部的夯土斜坡基本相连	(图 6-31)
盘龙城	二里冈上层-殷墟	湖北省黄陂县滢口乡境内	7万	不规则方形	处长江支流府河北岸的高地上	城外有护城壕	四面城垣各有一缺口,应为城门(图 6-32)

续表

城址	文化类型	所在地	规模 (米 ²)	平面 形状	所处地形	城垣筑造	备注
琉璃河	西周 (燕都)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部	500 万	长方形或方形	遗址处于太行山东麓属的西山前平地上,城址高于周围台地	夯土城墙分段版筑而成;墙体内外侧有直坡,外护城壕底部;南部城垣可能为大石河所冲毁	(图 6-33)
李家崖	石楼-绥德类型	陕西省清涧县高杰乡境内	6.7 万	不规则的长方形	地处黄河西岸无定河下游的台地上;地势险要;南水,东三面筑有城墙,南北以峭壁为天然屏障	城墙均为土石结构,断面呈梯形,有的地段有土石结构的护城坡;城内通往城外的唯一出口在东门	军事防御色彩浓厚,为一般性的设防聚落(图 6-34)
三星堆	三星堆 (蜀都)	四川省广汉境内	1200 万	南宽北窄的不规则形	位于鸭子河南岸两侧的台地上	城垣外侧均有壕沟;北面以无城墙,应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城墙内外侧均有护坡,顶部有土坯垒砌的梁埂	为大型遗址群,其东部遗址密集分布区有城垣遗址(图 6-35)
石城址群	夏家店下层	内蒙古东部,辽西	成组分布;每组中有 1~2 座较大城址	多不规整	坐落在河流两岸的山岗上	许多城墙外侧有突出石砌的半圆形构筑物,间距不一,多在城墙转弯处	险要地段不设防,以深沟峭壁为天然屏障;大型建筑地址位于城中心地势较高、开阔平缓处

“夏商以来历代都城大多营建于近河高地,即是此前先民传统经验的发展与延续。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位于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北方嵩山,附近丘陵起伏,河流纵横,地势宽润平坦,土质肥沃。郑州商城选择在河南大平原西部,北临黄河,西接豫西山,东南两面为开阔的豫东大平原。安阳殷墟位于遗址中心部位的洹河南岸小屯村和花园庄一带地势较高而近水源。西周初年营建的丰、镐,位于关中平原中部,附近有渭、泾、丰、汇等河流贯其间。洛阳东周城,居伊洛两水合流的盆地,四周地形险要,西通关中,东连华北平原,居天下之要冲。”^{〔1〕}这是从大环境来概括的。而在小环境中,随着国家的产生、文明的发达,此时期的城址比起史前城址,不仅一脉相承,还在内涵上更深一层、技术上更进一步。表现为:选址上利用自然山川更为彻底,或以高、险的河岸为防,或直接以河流为屏障或挖有护城河;内部分区规划上城中大型建筑遗址明显处于重要有利的位置,突显其作为早期城市核心内涵的地位;城墙往往顺应地形在局部作出折拐,结构上趋于成熟,有城壕的城址其城墙与护城河的防御性结合更加紧密;城外出现了无城墙、松散的郭,结构布局上初具内城外郭的形态,郭区含居民区、手工业作

〔1〕 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南京: 东南大学, 2003: 143.

坊和墓地等^{〔1〕}。这就是《管子·度地》中“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闾”城郭之分的来源，同时《管子·小匡》还“叁其国而伍其鄙”地具体划分城郭居民，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



图 6-22 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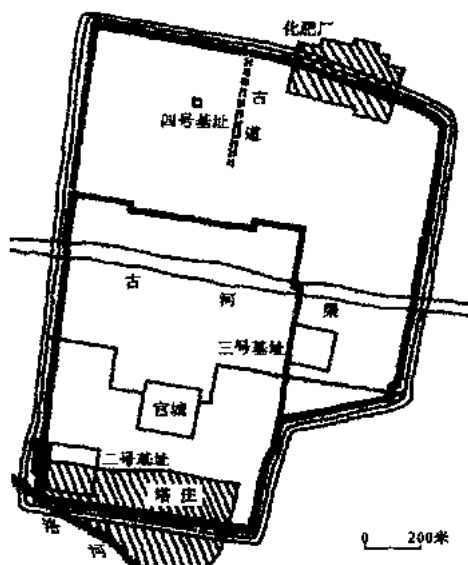


图 6-23 偃师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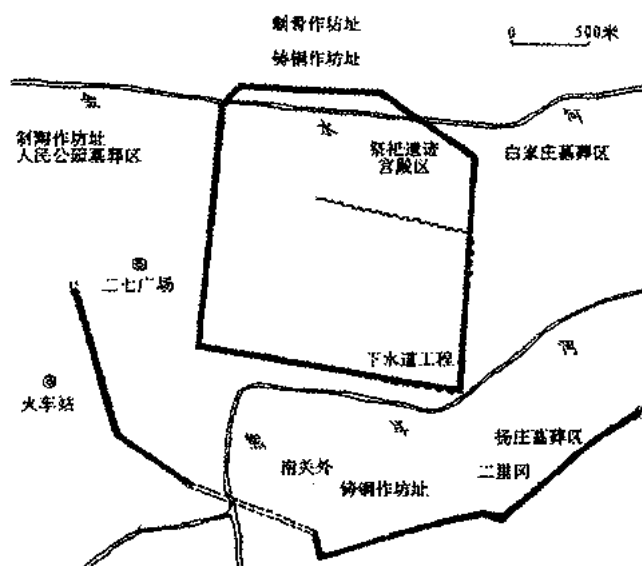


图 6-24 郑州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6)

〔1〕 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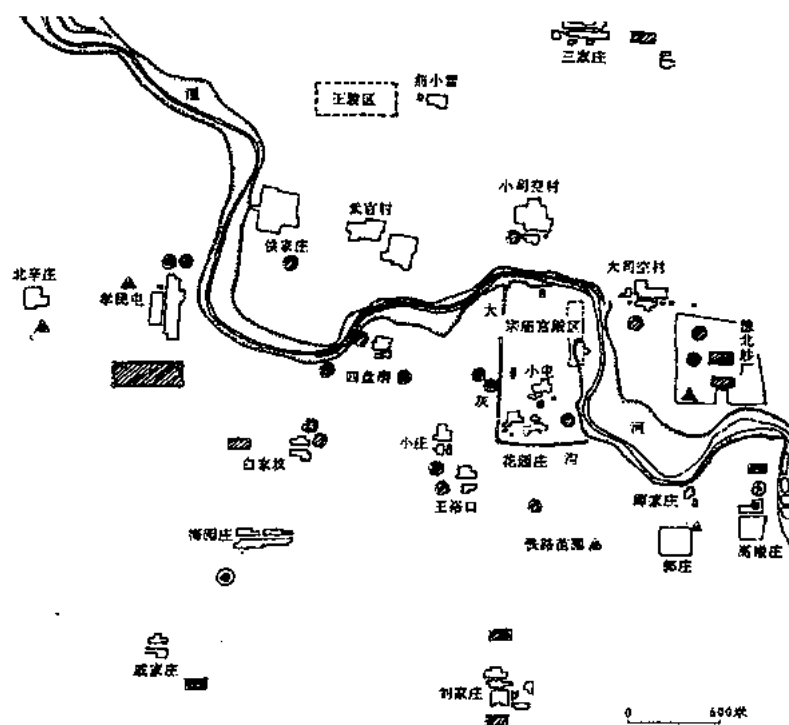


图 6-25 安阳殷墟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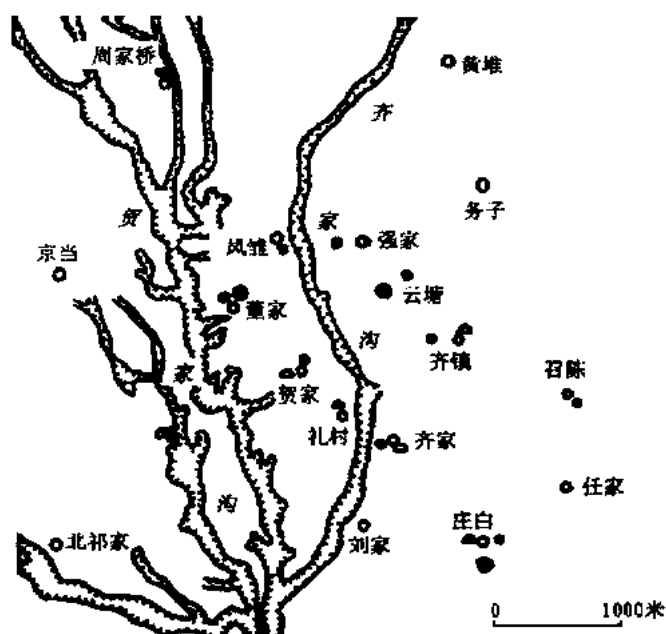


图 6-26 周原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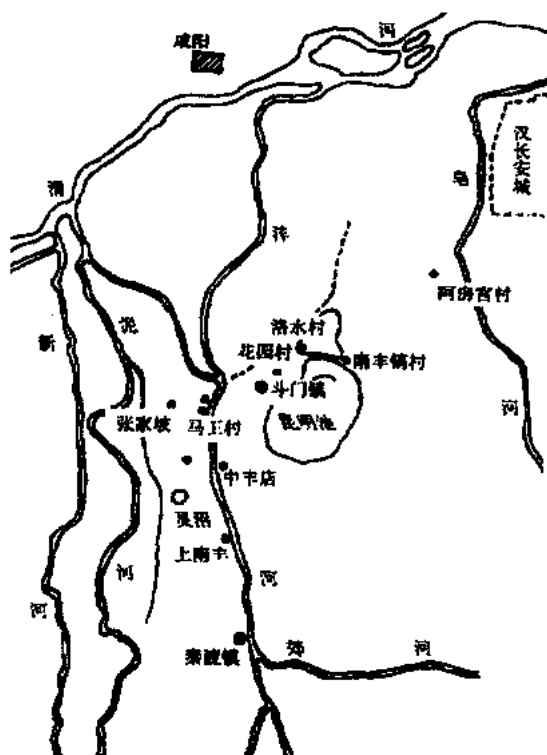


图 6-27 丰镐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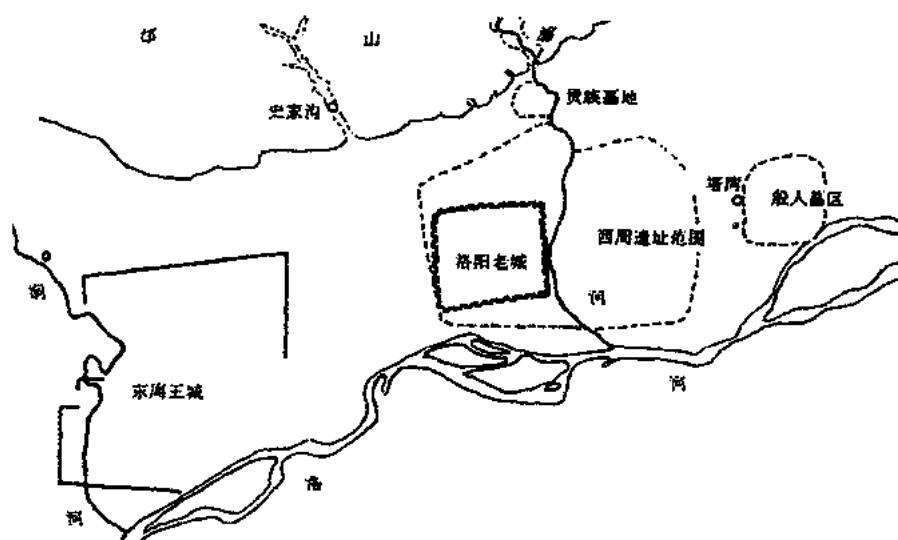


图 6-28 洛邑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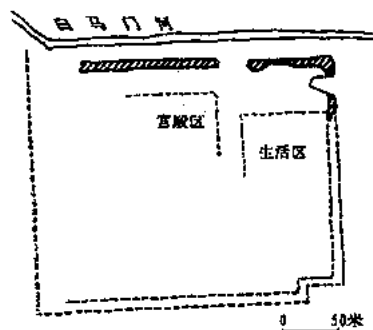


图 6-29 焦作府城城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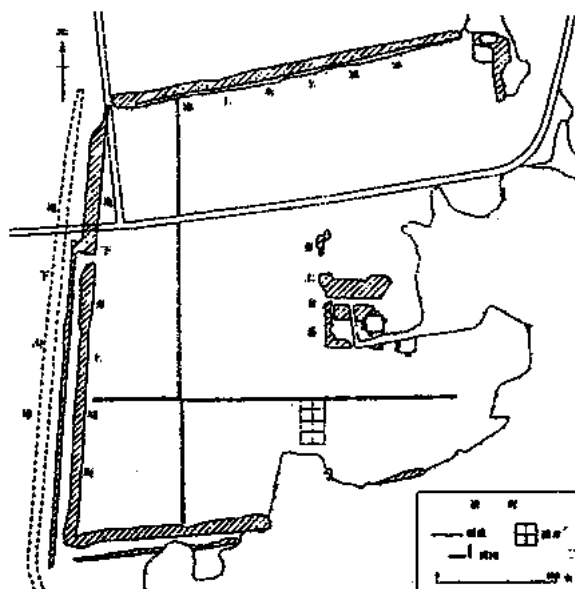


图 6-30 山西垣曲商城城址平面图
(引自萧红,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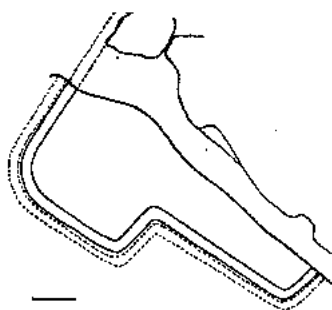


图 6-31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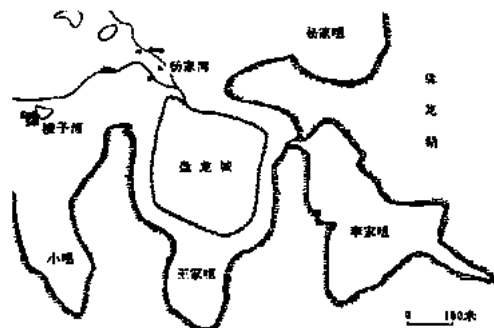


图 6-32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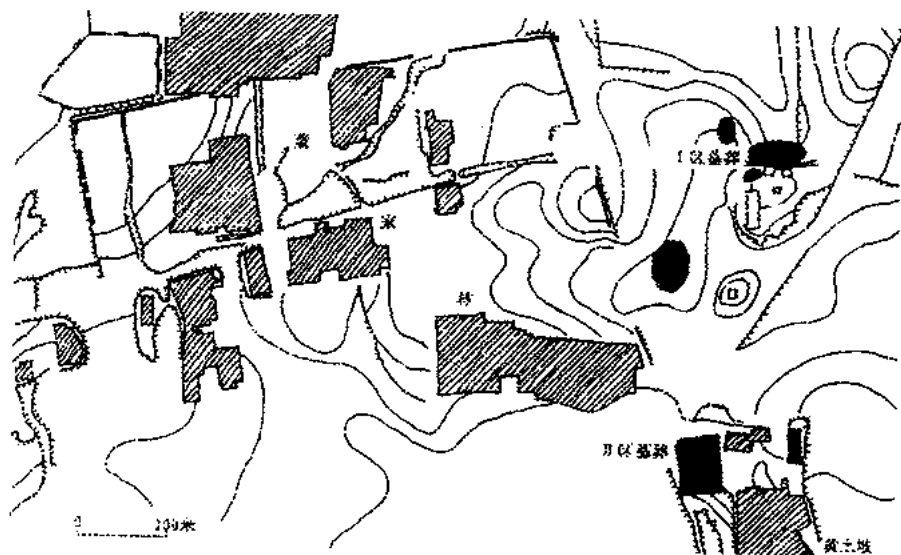


图 6-33 房山琉璃河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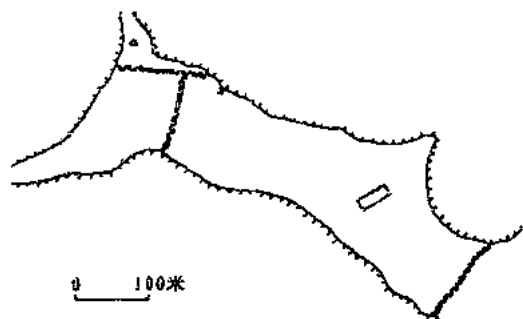


图 6-34 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74)

先民在选择聚落址与城址上所遵循的总原则：满足对水源的需求，尽量顺着水流沿水布置。《管子》基于此首先在对水性有足够的了解之后，提出了治水、用水的各项具体措施以及制定相应的制度进行管理，体现了对实际需求的认识与重视。

先民营建聚落与城或城市的原则：根据各自所处的环境因地制宜地进行。在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才有可能进行营城活动的前提下，《管子》充分考虑到如何省时、省力的重要性，主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先进思想，并将之贯彻全书始终。

从史前聚落开始对以上原则的轻尝浅试，到史前城址的广泛运用，再到夏商西周三代城址的更深一层，这个过程是与人类从事社会活动的规律相吻合的，并伴随着东周以前城市初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用白描的手法、不争的事实描述着其在营城中的先验性。可见，《管子》营城思想不是空泛的纯

第七章 临淄城——《管子》城市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和《管子》城市思想的实证

第一节 齐都临淄概述

如前所提到，有周之世有过两次城邑建设的高潮。作为周朝诸侯国都之一的齐临淄，细究其历史可看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两次大规模的建设。

姜太公适齐，“营丘，地瀋卤，人民寡”〔1〕，只能“辟草莱而居”〔2〕。太公采取了农渔工商各业并举的政策，鼓励齐人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全面发展齐国经济。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还时有当地莱夷人与之争国。太公纵使“因其俗，简其礼”，未按周朝礼制营建营丘，但面对夷人来犯的危机，也必定要“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3〕，为营丘设军事之防。只有紧张的形势得到缓解，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将注意力倾于经济建设，才会有“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4〕的齐国出现。

姜太公重经济功利的治国方式延续下来影响着后世齐君。齐渐富强，春秋时为五霸之首，战国时成为七雄之一。从草莱之居到大都市，田齐桓公称霸是一个转折点。所谓“兴霸称王，以近制远，必先立城廓设守备”〔5〕，无论是军事防御还是富民强国，都需要大力建设、发展都城临淄。自齐创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6〕的功业，拥有令各诸侯国宾服的地位，临淄一跃成为政治经济中心。齐相管仲对此可谓功不可没。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施改革措施进行营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重农、工、商各业，促进了经济发展，使齐国力大增，威震于诸侯。与此同时使临淄城工商发达、人口增加，在规模上有所扩张，为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之为齐，始于西周初建武王大事分封之时。〔7〕周王朝通过宗法关系分封同姓、异姓贵族及功臣为诸侯，控制和安抚被征服地区。“武王已平商

〔1〕史记·货殖列传。

〔2〕盐铁论·轻重篇。

〔3〕古今注。

〔4〕史记·货殖列传。

〔5〕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6〕管子·小匡。

〔7〕李新泰，齐文化大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6。有学者则认为齐之为齐早在夏代中叶即始。



图 7-1 淄济运河

(摘自王育民,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上, 248)

而王天下”〔1〕, “于是封功臣谋士, 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 曰齐”〔2〕。营丘一带后来即发展营建成齐都临淄〔3〕。

春秋时期, 齐国开凿了连接济水、时水和淄水的淄济运河〔4〕。(图 7-1)《史记·河渠书》曰: “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运河的开凿使得临淄与中原地区有了便捷的交通, 齐国所产的盐铁、陶器之类的笨重物品也有了有效的运输手段, 这样, 临淄很快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都市的繁荣。随着齐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齐桓公兼并了众多的

东方小国, 公元前 567 年又灭了山东半岛的大国莱, 国土大大扩展, 经过一系列的征伐之后, 成为“五霸”之首。随之临淄在各国间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临淄不仅成为齐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齐国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带, 也成为诸侯各国朝会的中心, 这时临淄城的建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齐国的临淄最繁荣的时代还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 鸿沟的开凿, 沟通了河、淮之间的济、汝、颍、涡、睢、泗等河流, 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交通网, 再加上原有的薄水、刊沟等运河, 河、济、淮、江“四渎”均有水运可以通达, 山东出产的鱼盐、漆丝与南北方的物产得以广泛的流通。随着交通的发展, 交通线上出了一批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这时的临淄更加繁荣, 位于济、菏二水交汇处的陶被称为天下之中, 而齐都临淄则是东方第一都会。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交通条件, 《盐铁论·禁耕》曰: “燕之涿、蓟, 赵之邯郸, 魏之温、轵, 韩之荥阳, 齐之临淄, 楚之宛丘, 郑之阳翟, 三川之二周, 富冠海内, 皆为天下名都, 非有助之耕其野, 而田其地者也, 居五诸侯之衢, 跨街冲之路也。”也从交通地理位置方面阐明了临淄

〔1〕史记, 齐太公世家。

〔2〕史记, 周本纪。

〔3〕认为营丘一带即后来的临淄城的观点参考自: 曲英杰, 先秦都城复原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227-229; 王志民主编, 齐文化概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4; 黄松编, 齐鲁文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135。齐胡公在位时不堪夷族侵扰迁都于薄姑, 自献公迁回营丘, 始名临淄, 详见《史记, 齐太公世家》。

〔4〕王育民,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248。

繁荣的原因。〔1〕

临淄故城，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地处鲁中山区北麓，距渤海仅百余里，南有牛山、稷山，东、北两面是辽阔的原野，西依系水，东临淄水，“临淄”因而得名。临淄不仅近山傍水，还位于山东半岛通往中原的东西大道上，水陆交通都很发达，是齐地的枢纽，作为齐国都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据《临淄县志》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临淄故城当始筑于公元前859年齐献公复都营丘时，春秋、战国、西汉时对城墙又多次修补加固，直至末代，其城垣基本保存完好。宋文学家李格非曾目睹故城现状，吟有“击鼓吹竿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的诗句。由此得知，在宋代故城城墙尚存，城内建筑则已圯废。

《管子》中的城市管理思想大多来自于对春秋桓管时期管仲治国方略的总结，因而临淄曾在管子的治理下以及运用相延下来的管理模式，使得临淄城的城市管理思想与《管子》所描述的城市管理思想大致是相同的。基于这种状况，本章的论述即主要集中在营城思想方面。

齐国作为《管子》一书的发源地，其都城临淄的规划和建设是否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管子》的规划思想？或者说，《管子》中的营城思想是否受到齐都临淄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启示？《管子》一书出于稷下〔2〕，正如稷下学宫之出现，是为田齐统治者巩固政权、变法革新以图强称王而服务的。有了这个基准点，稷下管子学派的学者们就以受田氏政权尊崇的管子为依托，记录管子的营国言论并总结，汇集成《管子》文集，作为呈给齐君的营国理论基础和依据。而管仲的营国思想除了自身所形成的，或许也包含了对以往临淄建设的总结和沿袭。本书通过现有的考古成就及典籍记载，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形，分析齐国的社会状况，对临淄城〔3〕进行研究，考察《管子》的营城思想与齐都临淄的建设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从而印证《管子》营城思想的实践性。

第二节 临淄中的营城思想

对临淄故城的考古工作开展于20世纪下半叶，60年代进行了一次普探工作，70年代进行了局部发掘。本章采用的考古资料即取自这些考古工作的成果。〔4〕

〔1〕王卫东，临淄盛衰原因试探，管子学刊，1999，1。

〔2〕该观点现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本书从此说。

〔3〕本章所提的临淄、临淄城、临淄故城均指先秦齐国临淄故城。

〔4〕本章有关临淄故城的考古资料参考自：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5：45-54；临淄文物志编辑组编，临淄文物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37-44；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淄文史资料，第八辑：250-255；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30-233；黄松编，齐鲁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34-138。

一、择地营城

国必有都城，《度地》有云：“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这里的“之”指的就是国都。而城址的选择，关乎城市的长远发展。方整的城市平面规划只有在平坦的平原上才有可能实施。“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1〕。临淄城地势就高低相差较大，大体上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图 7-2），“南墙接近海拔 50m 的等高线，北墙已在海拔 40m 以下”〔2〕。面对如此的地理环境，在进行规划时就唯有尽可能因地制宜。这点在《管子》中表述得非常明晰，如《度地》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又《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参照临淄所在地区，其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其土地“质地良好，自古就有‘膏腴之地’的美称”，是足资营城的肥饶之地。〔3〕临淄城处于“淄河冲积扇的前缘部分”，东、西面分别为淄水和系水〔4〕，由于“河床的左右摆动在这一带并不显著”，因而“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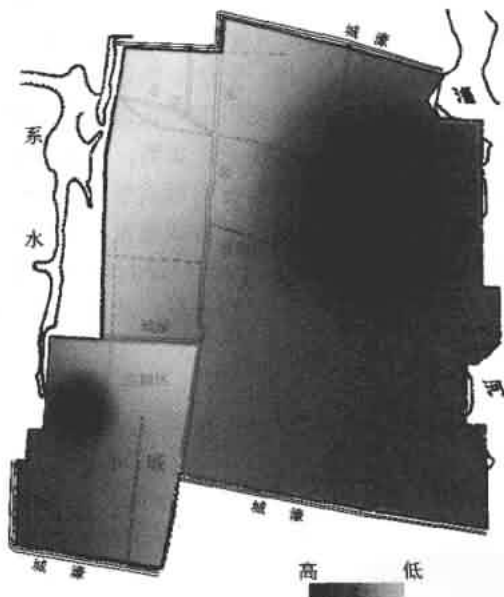


图 7-2 齐故都地势示意图（自绘）

〔1〕 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8.

〔2〕 吴庆洲. 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55.

〔3〕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临淄区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3.

〔4〕 关于二水资料可参看: 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临淄巡古》编辑组. 临淄巡古.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143-149、151-154;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临淄区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68.

址一般不易受到洪水之灾”。〔1〕二水灌溉、滋养了临淄城，在保证全城用水及可以就近取水的同时，还作为东、西城墙的天然城壕，起防卫作用。吴庆洲先生将我国古城选址的规律性及科学思想归结为九点：（1）地理位置适中；（2）立足于农业发达之地；（3）地势利于军事防御；（4）置于水陆交通便利之地；（5）充足的水源，良好的水质；（6）居高临下避免洪水灾害；（7）土质坚实，宜于建设；（8）较好的气候条件；（9）借鉴前人的经验。〔2〕以此作为对照，《管子》所述的选址原则及临淄城的选址是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

《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增多，在功能上需要扩增城内各分区，临淄城原有用地就不敷使用。于是经历代齐君的扩建兴修，临淄城形成现今考古所见的规模。分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总面积达 15.5 平方公里。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东北部嵌在大城的西南隅，两城在地理位置上互相衔接、在功能上相辅相成。考古及建筑界据考古发现基本认定大城始建年代早于小城，且大城建于西周时期，小城建于战国时期〔3〕。临淄故城内外经考古发掘有上千座古墓，其中在春秋时期的大型古墓分布于城内东部，而战国时期的大型古墓则在南部城外。〔4〕该现象也从侧面显示了大城使用空间的拓展，城市中心从开始仅在城内偏北处而扩到了南部，当确实不敷使用时，便有了小城的产生。

“（春秋）时期临淄城的形制是外有郭而内有宫，外郭城四面各设三门。”〔5〕“在今大傅家庙村南一带，即为檀台之所在。……此檀台正当在内宫，应该就是《晏子春秋》记载的齐景公所筑路寝之台〔6〕。由此可进一步推知，此一带当即为春秋时期以前齐都宫城之所在，恰位于外郭城之中心地带。”〔7〕大城南北长近 4.5 公里，东西宽 3.5 公里余，其中有贵族、平民等墓群，兼有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这里属贵族、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外郭；小城南北长 2 公里多，东西宽近 1.5 公里，在其北部偏西处有一夯土高台“桓公台”及许多夯土基址，都是宫殿建筑遗址，所以小城应是国君居住的内城。综合城内各遗址的考古资料，可大致显示出如《大匡》所说的

〔1〕吴庆洲. 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55.

〔2〕吴庆洲. 中国古城选址的实践和科学思想. 新建筑，1987，3：66-69.

〔3〕大城早于小城而建的观点，参见：临淄文物志编辑组编. 临淄文物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38；张光明. 文物考古与齐文化研究.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21；曲英杰. 先秦都城复原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33-237. 独贺业矩先生持异见，认为小城早于大城而建，参见贺业矩. 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89.

〔4〕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临淄文史资料. 第八辑：254-255.

〔5〕曲英杰. 《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 管子学刊，1996，2：48.

〔6〕原注：《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公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

〔7〕曲英杰. 《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 管子学刊，1996，2：49.

“凡仕者近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分区方式。（图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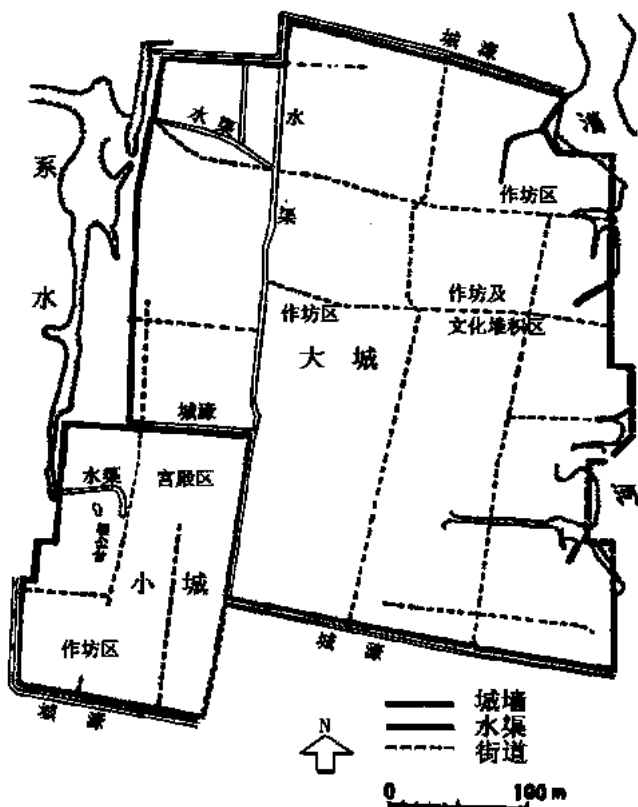


图 7-3 齐故都临淄城遗址
(改绘自群力. 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 图 1)

二、水利工程

临淄城东、西两面临水，预防水患和兴修水利工程是齐人进行农业生产和安居乐业的保障。《管子》很重视水，用《水地》整整一章的篇幅论水，对“水”的各种性能作了详尽的了解。如何理水、消除水害是齐的一件大事。《度地》篇中即载有桓公为此专门向管仲进行咨询，而管子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的治国案例。

从考古挖掘看，临淄大小城不临河的城墙外都挖有很宽且深的护城壕沟，与淄、系二水东西贯通，形成封闭的水系和防御线。城东面地势高起，不易受夏季淄水泛滥之苦；而相对较平坦的西面地势低洼，“水用足”与“沟防省”难两全，只得人工开挖水渠排水防涝。于是在西部开挖一条长达 2800 多米的南北干渠。其南端始于小城东北角与小城东、北护城河连通，然后顺势由南向北流，通过北城墙下的水道口与城外的城壕沟通，并于近北部分出一条支渠向西通过西城墙水道口与系水相连，作为暴雨季节泄洪之需。小城有一条明渠也利用地势，起自“桓公台”宫殿建筑区的东南向，流

经其东、北两面，通过西城墙水道口流入系水。并有排水管道或暗沟与建筑区相通，以解决给水、泄洪及排污等问题。另在小城宫殿遗址区发现有斜坡式散水及地下管道，地下管道又与城内水渠相通。^{〔1〕}（图 7-4）从而城外自然水系、城壕与城内水渠互为连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又系水河床与沟渠等高，旱季还可通过水道引水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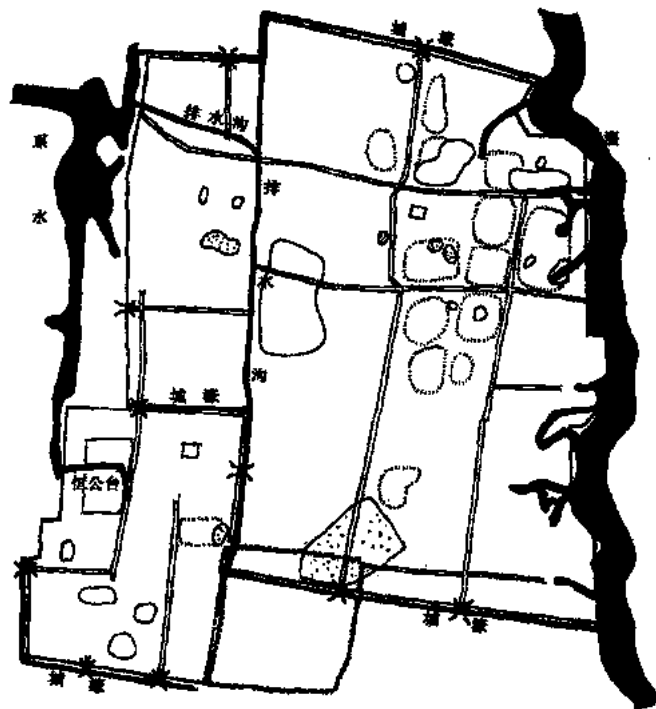


图 7-4 齐故都水系图（自绘）

临淄完善的给排水系统，有领导、组织化、制度化，是历代从识水性到理水等治水经验的有效体现。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开发生产，既有水源的灌溉，又不受水害，便可供养国人、繁育六畜，城内居民的生活首先就减除了一种祸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有晏子赞语：“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贤相也。夫以贤相佐明君，而东门防全也。古者不为，殆有为也。蚤岁淄水至，入广门，即下六尺耳；乡者防下六尺，则无齐矣。”说的是大城东城墙外防淄水的堤坝，是一例有效治水的明证。^{〔2〕}“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郭外为之土閤：地高则沟之，下

〔1〕 张龙海、朱玉德执笔。临淄齐国故城的排水系统。考古，1988，9：784-787。有关临淄故城部分排水系统的资料。

〔2〕 尚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45。

则堤之。命之曰金城。”《度地》是言也。

城市水系除了可以作为生活、生产及水利之用，还被利用为取得经济效益手段。首先“决瓊洛之水通之抗庄之间”。疏通洼地的积水，使之流进两条平行大街的中间地区。“则屠酤之汁肥流水，则蠹母巨雄，弱燕小鸟皆归之，宜昏饮，此水上之乐也。”有此乐，商人们连买卖未完都提早结束，争着“投蠹母巨雄。挟弹怀丸游水上，弹弱燕小鸟，被于暮”。故而商贾“贱卖而贵买。四郊之民卖贵而买贱”，达到了由于“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而使得桓公想要“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的目的。^{〔1〕}这是将治水、治理城市环境与实施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三、城防

城市作为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军事中心，修筑城墙成为其主要的军事防御措施。从春秋到清朝，各朝都城都有城郭之制（秦始皇时的咸阳除外）。城市是城中居民安居乐业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寄托，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庇护场所，城墙、宫墙、院墙，无处不见的“墙”圈起了一个个大小不同但性质相同的空间，它们的存在都是出于共同的目的——给予人们安全感，并有助于统治者唯我独尊地有效控制、管辖他的子民。“这种体现官僚政治、隐私和防御的城墙系统，从大宇宙到小天地在不断地重复使用：国家有墙；每个城市有墙，而且有各处的护城神和护城河（城壕）；城内每一个依据一般是由院墙内的几幢建筑物组成的，以便在习俗上家庭成员增加时使用，……‘墙’这个词实际上和‘城市’是同义语。”

“如此层层包围的结果，使中国社会的每个部分都将保持自身的本质，因而形成各处与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2〕}

巩固城池既是对人君的保障，也关系着人民的利益。“临淄故城的城墙是十分高大坚固的，……大城东面的城墙依河岸地势，曲折凹凸，在河水冲刷造成的天然峭壁上再加筑城墙，居高临下，对军事防御十分有利。”^{〔3〕}经考古挖掘出来的墙基尽管厚薄不均，但最宽的达67米，最窄的也有17米。大城北墙东段第一期的城墙保留残高3米，从考古发现上看其夯筑情况清楚，夯层为3~5厘米，夯迹直径为3厘米，夯层坚硬，可见用土分层夯筑而成的城墙均非常厚实，足以担当卫城的重任。然其中小城城墙周长7275米，大城城墙周长14158米，总长长达21433米，对于如此漫长的城墙，是需要妥善经营才可发挥其作用的。《度地》为此记载相关的保护临淄城墙的措施，“树以荆棘，上相稽无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子孙，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不仅责成城中的守备军负责此项工作，而且“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

〔1〕管子·轻重丁。

〔2〕〔美〕帕瑞克·纽金斯，世界建筑艺术史（第二版），顾孟潮、张百平译，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71-73。

〔3〕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56。

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备之伍”〔1〕，说的是为官者有义务和职责去建设经营好都城。城墙在防卫的同时还起着防洪堤的作用，成为专门的堤坝之外的第二道防洪线〔2〕；而城墙下的排水道口，只能排水无法通人，集排水和防御功能于一身〔3〕。这说明治水与防卫在城市建设中可以是一体的，若举一反三，是可以将许多相关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的。

“临淄城墙有明显的后期增筑和修补现象。在增筑或修补时，为了便于衔接，先将早期城墙的立面或平面铲平，然后再填土夯筑。同一夯层往往不是一次夯筑成，而是分成几次填土夯筑。另外，有些夯层，在夯筑时还采取了特别的措施：（1）在夯层中铺设未经任何加工的圆‘枕木’，棍长3米左右，径12~17厘米。枕木多横向排列铺设，近城外皮而又不伸出城墙，棍距宽窄不齐，一般在1.2~1.3米，个别地方，还在横向枕木下毗置竖向枕木；（2）除在夯层中放置枕木外，在枕木上下铺设有数道绳索，然后用小木桩将上下两股绳索绞紧，小木桩的长度大体与夯层厚度相当；（3）在夯层中铺设纵横交错的方格绳网，方格边长0.8米，两绳交接处，往往有小木桩加固。采取上述各种措施，主要是为了加固城墙，使之不易坍塌。”〔4〕

“……城门在普探中曾发现了十一座。其中小城城门五座，东、西、北门各一座，南门两座。大城城门六座，东、西门各一座，南、北门各两座，东门的位置偏北，自此门至城的东南角，直线距离尚有3000米，中间至少还应有一座城门。四面的城门，不仅数量不等，位置也远非对称，门道的宽度很不一致，一般宽度在10右，其中小城的东门、北门形制较特殊，后者门道两侧的城墙不成直线，西侧的城墙靠北，成曲尺形，东侧的城墙靠南，小城东门和北门的门道则比较长，其外口两侧的城墙向前凸出，与城门相对的城壕也相应地有个拐弯。此两门都通向大城，联系到与大城衔接的小城相接的部分，加强了防范，反映了小城作为宫城所具有的保卫国君的堡垒性质。”〔5〕

又由于淄水及系水属天然河道且城中地势高低起伏，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6〕。临淄的城垣和道路，特别是城垣顺应地势而呈不规整状，随河岸、地形蜿蜒多变。城墙拐角达24处之多，其中以大城东城墙和小城西城墙最为曲折。“将城墙建在河流西岸，但不是南北尽量取直，而是根据淄河河床的弯曲向着相反的方向凹凸，即在河床向西摆动的部位（冲刷岸），城墙则紧逼河岸建造，造成陡峭的峭壁，

〔1〕管子·问。

〔2〕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56。

〔3〕张龙海、朱玉德执笔。临淄齐国故城的排水系统。考古，1988，9：784-787。

〔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十二章 城市建设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709。

〔5〕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十二章 城市建设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709。

〔6〕管子·乘马。

高可数米、使敌人难于攀登；河床向东摆动的部位，情形恰好相反，城墙则向内（向西）凹入，离开河滩地一段距离再修筑城墙，使敌人在超过河漫滩时目标明显，这样既便于从城墙上瞭望敌人的活动，也便于伺机杀伤敌人，使敌人无法接近城下。”〔1〕该段话详尽地说明了大城东城墙的实际状况，还形象列举城墙在水平方向上凹凸的情形及防卫功能。结合前面提到的该城墙还随地势高低而在垂直方向上起伏，不仅与地势地形密切结合，还充分让地势地形为我所用，展示了当时因地制宜的创造性，也是对“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的最好诠释。

大小城平面均呈不规则的长方形。这种城邑形制与以被视为正统的“营国制度”（如《考工记》记载）营建出来的就有所不同，然而这样一来，城市规划就冲出了宗法礼制全面统辖的樊笼，其功能也随之拓展了，适用性更强了。

四、城市规模与分区

古时的中国地广人稀。衡量当时国家是否兴盛、都市是否繁华，都是以人口多寡为基准。古代城市人口现今很难确切地统计出。太公时齐地人极少，从典籍记载〔2〕及城内分布广而多的手工业作坊都可知。经姜齐桓盛世，经济快速发展，临淄人口急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君从大城内原先的宫城迁出，增建小城为宫城而居。大城则扩建到相当大的规模，以容纳增加的人口。“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半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3〕齐君正因为清楚了临淄城的具体需求，才使临淄建设获得良性发展。而城外的东、北部沃野千里，对开垦土地、农事生产和粮食运送等都极其便利。

以齐临淄小城建设前后比照，就看出城市规模变化的概貌。城市规模的扩张反映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显示出城市性质演变的结果。工、商业发达和人口的大量集中促进城市不断扩展。此时礼制已不再是决定城市规模的唯一依据，城市经济成为决定的因素。春秋末年城市规模上的各种违制现象，已说明城市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了。战国时期的城市形制多不够规整。一是因为不少旧城不得不依从现状，因地制宜、因势扩张，无法有计划地进行改造。从临淄的演进过程中便可体察到这种旧城发展的情况。一是因为新建的城也有的是利用现有地形条件加以修筑，故形制也难求规整。再加上春秋、战国时频繁战争使得筑城必需将军事防御提上日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兵器及攻城技术的进步，军事防御要求对筑城形制的影响也愈加深刻。“这种情况在城防第一线的外廓建筑上反映尤为明显，充分体现了这个

〔1〕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21-22。

〔2〕《史记》、《战国策》、《晏子春秋》、《国语》中均有提及。

〔3〕管子·八观。

时代特色。”〔1〕

临淄故城“主要街道 10 条，纵横交错，把整个城区划分成若干方块，形似后期的里坊。这些方块中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的分属区，在小城内桓公台附近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区，稷下学宫，铸钱作坊，冶铁作坊，制骨、制陶作坊等。重要的学术研究、掌握经济命脉的机构都在小城之内，以便于管理。”〔2〕可见当时城市内部已有明确的分区。（图 7-5）就如《管子》所提到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畴，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3〕“凡仕者近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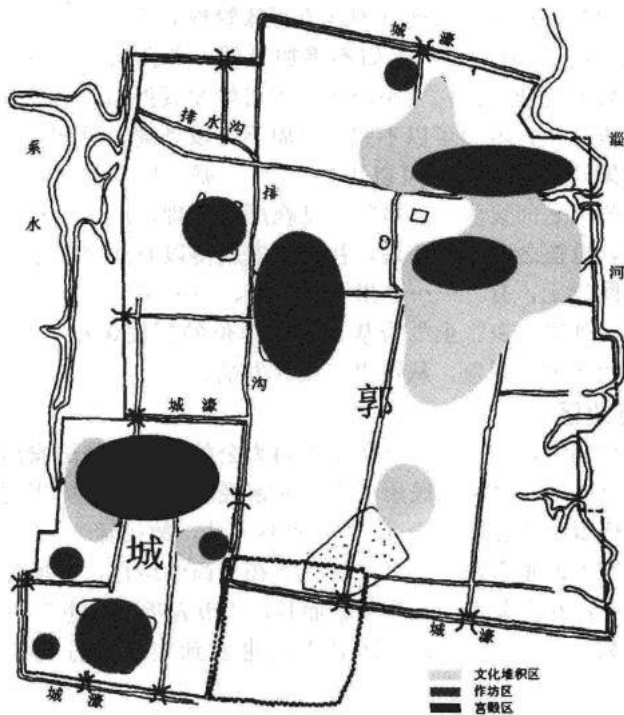


图 7-5 齐故都分区图（自绘）

五、居住区

战国时代临淄中的七万户〔5〕虽有夸张之嫌，但人口众多难以否认。如

〔1〕贺业钺，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16。

〔2〕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淄文史资料，第八辑：250-251。

〔3〕管子，小匡。

〔4〕管子，大匡。

〔5〕史记，苏秦列传。

何妥善安置城中居民，划分居民区。管仲有其独到的方法，先让民众分业而居，“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万事具备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哢，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畴，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这样才可能使“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2〕。接着“制国以为二十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把国中的居民编为二十乡。中心区的国中“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4〕；边缘区的鄙内“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5〕。这就是先根据居民的职业进行总体划分，再以每家每户为最小单位，形成逐级递升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临淄城中约30万的人口，如不善加管理，必会引起大乱。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良好的行政管理，一座城市是不可能发展得如此欣欣向荣的。在城市设施的管理上“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闾不可以毋闾，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6〕。城中居民按士、农、工、商分开而居，在州里之间设隔墙、里门，早晚严格管理，出入定时。这样百姓容易接受教化，抢盗之事易于管理，社会治安就得以有效维持了。城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陶器上，有“……乡里、……乡、……里”等标识所属乡里的印文，印证了这种以“乡、里”为基本管理单位的居民组织。〔7〕一直持续到宋代才慢慢消失的闾里制，从这里可见其发端。

六、商业区

重视商业是齐历代传统，其历史可自太公始。市场是国家财货多寡的标志，没有集市的话，就说明民用缺乏，国家经济不景气。如果要发展商业，那么“徙邑移市，亦为数一”〔8〕。“利不可法，故民流”〔9〕，《管子》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经济主要在于商业运作，市场作为商业行为的载体和空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市者货之准也”〔10〕，“有市，无市则民乏矣”〔11〕，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也要到集市进行交换，没有了市

〔1〕管子·小匡。

〔2〕管子·小匡。

〔3〕管子·小匡。

〔4〕管子·小匡。

〔5〕管子·小匡。

〔6〕管子·八观。

〔7〕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54-255。

〔8〕管子·侈靡。

〔9〕管子·侈靡。

〔10〕管子·乘马。

〔11〕管子·乘马。

场,百姓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达到。“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1〕。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促进了劳动产品的流通,调剂了供求关系,既发展了商业,又刺激了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再生产,从而有利于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再者,“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2〕,通过市场各类商品价格的起伏变化,还可以了解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3〕,指明商人能使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推动消费和解决就业。从经商阶层在国家中的作用也可看出集市在城市中的地位。

临淄城内的交通干道已探明的有纵横向共十条,多与城门相通。纵横交错的街道将大城分割成若干区域。其中小城内有三条,路宽一般为6~8米,最宽者17米;大城内有条,其中东北部于南北、东西方向各有两条宽17~20米的交通干道,可容纳十辆车并排而行,在大城东北部经纬互交构成“井”字形。在这片范围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非常密集,当是临淄的中心市场所在地。出土的战国陶器有“大市”的印文,指的应是该处市场,在其他典籍中也有称为“国市”〔4〕、“城市”〔5〕和“公市”〔6〕的。其中两条主干道之间应为庄和岳所在,孟子所谓“庄岳之间”〔7〕即是指此〔8〕(图7-6)。春秋时已有庄和岳之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陈桓子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杜预注:“庆封时有此木,积于六轨之道。”〔9〕又载:“(庆封)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杜预注:“岳,里名。”可知岳在北门以内,内宫之北。《左传·昭公十年》载:“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可知庄可通东南的鹿门,当为直贯大城南北的大道。到战国时期,庄和岳一带是齐人口最密集、商业最繁华之处,当为“国市”所在。〔10〕

〔1〕管子。侈靡。

〔2〕管子。乘马。

〔3〕管子。侈靡。

〔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市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5〕列子。

〔6〕晏子春秋。

〔7〕孟子。滕文公下。赵岐注:“庄、岳,齐街、里名也。”

〔8〕此看法参考自: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41-244;黄松编。齐鲁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37;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09。

〔9〕曲英杰。《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管子学刊,1996,2:51。对此说法曲英杰先生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庄’当指六出之道,即三条道路相交于一点,由此一点可通向六方,呈*形”。

〔10〕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98,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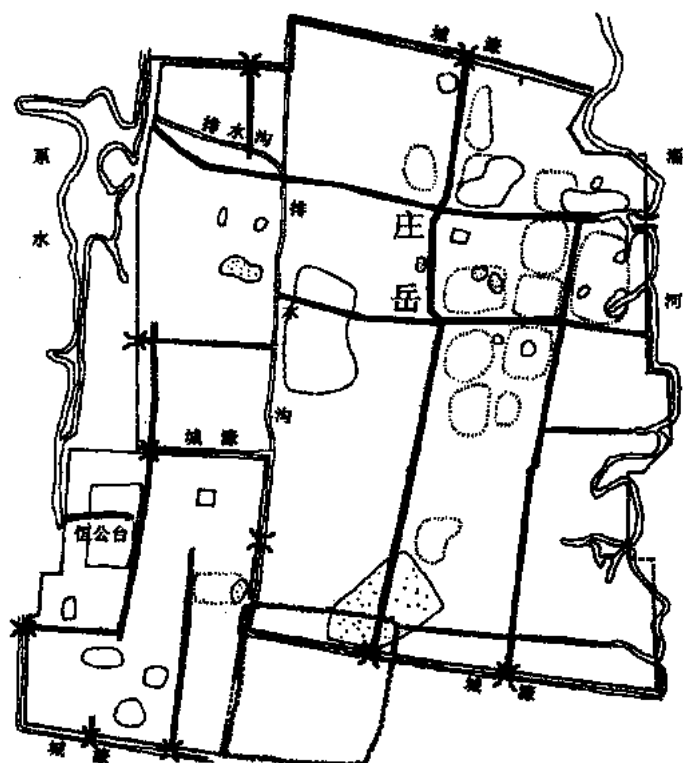


图 7-6 齐故都街道图 (自绘)

《管子》的营城思想博而精。虽说并不是作为营建的范本，然而对临淄城的最后成型，《管子》营城思想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参见表 7-1）。因之，临淄成为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跻身为战国时期规模最大、人口最多、最繁华热闹的都市之一。有战国苏秦为赵说齐合纵之语为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1〕然而，由于传统观点根深蒂固使然，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对《管子》书中营城思想的重视，反而舍近求远寻求别的题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将《考工记》中的营国制度往先秦各诸侯国都城上生搬硬套，导致了某些与考古资料相左的论断。当然，由于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等的影响，《管子》一书及其营城思想一直都没有被视为正统的书籍，对于后世城市建设上无法产生纲领性及书面上的影响，又因为即便是后世的都、城也没有完全照搬某一家、某一类营城思想的，《管子》中的营城思想因此不可能完全在单座城市中体现出来。

〔1〕史记，苏秦列传。

《管子》营城思想与齐都临淄考古资料简要比照

表 7-1

	《管子》营城思想	临淄考古资料
城址	《度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城东、西面分别为淄水和系水；城东南地势高，而较平坦的西面地势低洼
城郭之制	《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分成小城与大郭两部分
水利	从设水官、定职能、征水兵、水工，到确定堤坝形式、走向，到规定筑堤建坝的方式和最佳动工时间，到常年的防护措施，连保管、修理治水工具等，都作了详细周全的筹划；提出要依从水性来治水，有水则筑堤，无水的地方修水库，尽可能做到防蓄并举、防患于未然	不临河的城墙外都挖有宽且深的护城壕沟，与淄、系二水东西贯通；城内也有干渠和支渠与壕沟及二水相遇
城墙、道路形式	《乘马》：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城垣和道路，特别是城垣顺应地势很不规整，随河岸、地形蜿蜒多变；城墙拐角达 24 处之多，其中以大城东城墙和小城西城墙最为曲折；大小城平面均呈不规则的长方形
分区	《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万事具备民也，不可使杂处	集中的宫殿、作坊等遗址

第八章 《管子》与《周礼》城市思想之比较

第一节 概 说

吴庆洲先生提出三种影响中国古都规划的思想体系。一类是《考工记》所记载的营国制度；一类是《管子》里的规划思想；一类属于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1〕}在其《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一书中，对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影响中国古都规划有三种思想体系，除体现礼制的思想体系、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体系外，影响中国古都规划的还有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之所以称为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因为“它在古都规划中坚持‘象天法地’的信条”。该体系以儒道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3〕}“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在儒道哲学的影响下，“人创造了天上的星宿世界，天上的都市宫室苑囿与地上凡间的一一对应，天上帝王将相与人间的也一一对应”。这种行为与思想，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有两种目的与作用。一是君王维护统治的手段。“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5〕}一是贯彻观象制器美学思想的导则。“圣人立象以尽意”，“以制器者，尚其象”，^{〔6〕}用模拟天地万物及人自身的形象等《周易》思想来指导城市规划，即是观象制器，这是一种美学思想。以象天法地意匠营建的都城，“随着中国天文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哲学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宇宙模式，即，“由太阳神话宇宙模式发展为周王城的北辰天宫模式、秦咸阳的天国宇宙模式，汉长安的北辰宇宙模式、唐长安的北辰太极宇宙模式，元代又重现太阳宇宙模式，到明清则为三垣四象宇宙模式”。^{〔7〕}

〔1〕 吴庆洲，象天法地意匠与中国古都规划，《华中建筑》1996，2：31。

〔2〕 周易，乾，文言。

〔3〕 周易，系辞上。

〔4〕 老子。

〔5〕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6〕 周易，系辞上。

〔7〕 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56-379。

在对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有了一定认识之后,接下来本章将对另两种思想体系,即《管子》城市思想与《周礼》城市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以有助于对本书所研究的《管子》城市思想的横向理解。

《管子·乘马》中的“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与《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都是为人所熟知的有关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经典思想,颇具有代表性。本章希望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加深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理解,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实践目的。

“(《管子》与《周礼》)这两部书应该说是齐国的典章制度史,是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建国大纲,《管子》是齐国的百科全书,而《周礼》则是齐国邦国史总论。”^[1]本书基本赞成该提法。由于两书营国思想的普遍性,认为应将“《管子》是齐国的百科全书”改成“《管子》是营国的百科全书”及将“《周礼》是齐国邦国史总论”改成“《周礼》是治国总论”较为恰当。

《管子》书以记录管子的言行、总结继承管子的营国思想为源起和主脉,并汇集有春秋以来的各种思潮。管仲任齐相四十年,大力辅佐齐桓公实行改革,令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于春秋各诸侯中率先称霸,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为此备受后人推崇,有孔子赞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3]!战国初期取代姜齐政权的田齐统治者以承继齐桓霸业为己任,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管子》中有关营国的思想切合田齐变法的需要,为其提供了经验和良策,因而成为其理论基础。同理,其城市思想成为统治者经营城市的理论基础。

《周礼》一书,首次出现于西汉景、武帝年间,由河间献王刘德进献给汉武帝。《周礼》原名《周官》,又名《周官礼》^[4],共有六篇,分别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司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等。至于《周礼》的作者及成书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并且多种说法同时并存,各说各有理,至今尚无定论。本书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所著之说^{[5][6]}。《周礼》记述了一套完整的治国体系,包含着典章制度、官职机构和治国思想等礼制内容。由于“冬官司空”篇在《周礼》为人所知之时就已佚失,时人便用《考工记》替代,因而载有“营国制度”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的。《考工记》是记载中国先秦手工业的技术及工

[1] 王闾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前言。

[2] 史记·管晏列传。

[3] 论语。

[4] 东汉马融、郑玄为其作注称《周官礼》,唐代贾公彦作疏始用《周礼》之名。

[5] 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

[6] 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549-551。

艺等的典籍。“《考工记》非一般泛论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官书’”，而“是齐国政府制订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工作的技术制度。这就是《考工记》一书的基本性质”。〔1〕从内容上看，营城思想即营国制度主要在《考工记》中，营国思想则主要在原《周礼》中。《考工记》与《周礼》其他篇章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与“掌邦事”的“冬官”均有“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2〕的特点。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古人将《考》并入《周》内，从而使得合并后的《周礼》在经营城市上就具备了完整的城市思想。从西汉末年王莽新政时期成为政府机构设立的范本起，《周礼》就不断获得之后某些统治者青睐，并经大批文人学者进行考订和研究，终于摆脱被批驳、冷藏的命运。

以下对《管子》与《周礼》的城市思想进行比较。〔3〕〔4〕

第二节 两者的内容比较

一、具体内容的分类比较

（一）城市选址

《管子》：

“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5〕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6〕

“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7〕

《周礼》：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8〕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9〕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

〔1〕戴吾三编著，考工记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2。

〔2〕周礼，天官。

〔3〕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书中《周礼》原文引用及释义参考。

〔4〕孙诒让注疏，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书中《周礼》释义参考。

〔5〕管子，度地。

〔6〕管子，乘马。

〔7〕管子，八观。

〔8〕周礼，天官。

〔9〕周礼，考工记。

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1〕

（二）规模

《管子》：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2〕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3〕

“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半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遗苞矣。”〔4〕

“别制断之，不满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5〕

《周礼》：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

〔1〕周礼。地官。

〔2〕管子。乘马。

〔3〕管子。揆度。

〔4〕管子。八观。

〔5〕管子。度地。

者四之一。”〔1〕

“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2〕

（三）总体规划

《管子》：

“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3〕

“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阨：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4〕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5〕

《周礼》：

“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6〕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7〕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8〕

（四）功能分区

《管子》：

“凡仕者近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9〕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畴，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10〕

“筑障塞匿，一道路，转出入。审间闭，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间有司，以时开闭。间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11〕

〔1〕周礼·地官。

〔2〕周礼·地官。

〔3〕管子·乘马。

〔4〕管子·度地。

〔5〕管子·立政。

〔6〕周礼·夏官。

〔7〕周礼·考工记。

〔8〕周礼·考工记。

〔9〕管子·大匡。

〔10〕管子·小匡。

〔11〕管子·立政。

《周礼》:

“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1〕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2〕

(五) 市场

《管子》:

“有市,无市则民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3〕

“商工之乡六,……市立三乡。”〔4〕

“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徙邑移市,亦为数一。”〔5〕

《周礼》:

“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价.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黷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6〕

(六) 水利设施

《管子》:

“故圣人之处国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7〕

“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矣,至于鬲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持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8〕

“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9〕

“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

〔1〕周礼.夏官.

〔2〕周礼.考工记.

〔3〕管子.乘马.

〔4〕管子.小匡.

〔5〕管子.侈靡.

〔6〕周礼.地官.

〔7〕管子.度地.

〔8〕管子.度地.

〔9〕管子.度地.

毋败为效。……浊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谓也。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为败。”〔1〕

《周礼》：

“凡天下之地埶，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防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稍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莫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为防，广与崇方。其濶参分去一。大防外濶。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2〕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3〕

“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茭，作田。”〔4〕

（七）行政组织

《管子》：

“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5〕

“（叁国）制国以为二十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叁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6〕

“（五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如保而听，毋有淫佚者。”〔7〕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8〕

《周礼》：

“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鄹，五鄹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9〕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

〔1〕管子·度地。

〔2〕周礼·考工记。

〔3〕周礼·地官。

〔4〕周礼·地官。

〔5〕管子·小匡。

〔6〕管子·小匡。

〔7〕管子·小匡。

〔8〕管子·乘马。

〔9〕周礼·地官。

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调，五州为乡，使之相宾。”〔1〕

(八) 生产组织

《管子》：

“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2〕

《周礼》：

“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3〕

(九) 军事编制

《管子》：

“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4〕

“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5〕

“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6〕

《周礼》：

“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7〕

(十) 土地制度

《管子》：

“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陵陆、丘阜、田畴均，则民不惑。”〔8〕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涵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地均以实数。”〔9〕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一切见水不大潦，五尺见

〔1〕周礼·地官。

〔2〕管子·乘马。

〔3〕周礼·地官。

〔4〕管子·小匡。

〔5〕管子·小匡。

〔6〕管子·乘马。

〔7〕周礼·地官。

〔8〕管子·小匡。

〔9〕管子·乘马。

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1〕

《周礼》：

“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土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2〕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3〕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4〕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羨。”〔5〕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6〕

二、内容比较之小结

参见表 8-1。

《管子》与《周礼》城市思想的比较

表 8-1

主旨			《管子》	《周礼》
			春秋时期管仲全面的经营城市的思想	理想中的周朝官方城市礼制思想
城市思想	城市规划思想	城市选址	营建都城，首先要选取有利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靠山面水、交通便利；营城当在河流湖泊之畔，且离水源距离适中、高低得宜，既解决城市供排水之需、又可防止洪涝之害	作为都城，从邦国到都到邑，其方位与朝向必需求“正”，要位于地之中央；这样的地理位置，天地阴阳调和、四季风调雨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营建都城的好地方
		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的确定与面积大小、城市人口及土地优劣都相关；城市大小与居民多寡是互动的	除了天子所居的国都有一定的模式外，诸侯都城的规模主要是从数量上严格划分并限定其大小及等级的

〔1〕管子·乘马。

〔2〕周礼·地官。

〔3〕周礼·地官。

〔4〕周礼·地官。

〔5〕周礼·地官。

〔6〕周礼·考工记。

续表

		《管子》	《周礼》
城市思想	城市规划思想		
	城市规模	都城有天子之国与诸侯之都的区别;诸侯都分公、侯、伯、子、男几等分布全国,天子之国居于中央,这样方便国君征聚天下之财之物	
	总体规划	先从小方面将城市分为城和郭,再将城郭细分;不拘泥于横平竖直的城墙和道路,而是依顺地势来修筑	重点强调了天子王权的至高无上;各级诸侯城的规模、道路的宽度,按所属等级逐级低于王城
	功能分区	城中居民按士、农、工、商分区居住;各居住区设闾里制进行管理	将王城划分为九个方块;宫城以内外分之
	水利设施	囊、堤、防等;研究水性,利用地形	濬、防、沟、遂、列、浚、沙等;严密的水网
		开挖水库、渠道,筑堤防	
	市场	在国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分散而设;肯定集市的积极作用	按时间及对象分为大市、朝市和夕市几种;占地少,“一夫”而已
	行政组织		
	军事编制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生产组织		
	社会组织	二十一乡及五属之制	六乡及六遂之制
城市管理思想		乡遂制〔1〕	
	土地制度	“公田”、“均田”双轨制〔2〕	井田制

第三节 两者的差别

“自西周领主封建制建立后,筑城被视为受命立国的根本大计。周初大分封的一百四十几个国家,所建立的都是城邦国家,立国与筑城是同一件事,所谓‘国之所在,必筑城居之’即是指这种情形。以城表国,立城即是立国,城坏即是国亡,国的兴灭与城的存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3〕然而历史在进入春秋之际,整个社会开始发生转变,以至于到战国时期完全成为质的转变时,国与城就失去了同义的内涵。《管子》里的国与城即已发生分化,如“叁其国而伍其鄙”、“圣人之处国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及“不如霸国者,国也”等中的国,如“凡立国都”、“城郭不必中规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命之曰金城”及“都十为霸国”等中的都、城。明显地,《管子》已将国与城分开进行使用。《周礼》虽然也有国与城之分,但也仍存在混用之“国”,即时而意指国、时而意指城。如“惟王建国”、“邦国”、“乃建王国焉”、“凡国之大事”及“分国为九

〔1〕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135-147.

〔2〕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14-217.

〔3〕王闿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311.

州”等中的国，与“体国经野”、“以廛里任国中之地”、“国宅无征”、“营国城郭”、“匠人建国”及“匠人营国”等中的国，二者之意不同，前者为国家之意，后者则意为城。这说明《管子》的成书已彻底适应了社会的变革要求，而《周礼》鉴于其注重礼制的初衷，即便处于大变革的社会环境下，仍无法完全脱离旧制的影响而延用了旧提法，此乃其固守的一面。

《管子》营城：(1) 力求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有利于扩充、完善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种功能。(2) 适于有山有水等复杂自然条件下的营城活动。(3) 重视城市的经济职能及经济发展，适合都城及其他大、中、小城市的营建，具有指导思想。(4) 排除以单纯的等级制度为准则，而是由实际中的各种相关因素来框定，或是提出适应性的原则作为实际操作的指导。如城市规模考虑人口、土地等因素，水利措施的实施以熟悉水之性为前提，等等。(5) 从各个方面提出营城的细节，具有实践指导作用。(6) 城中除了统治阶级的宫城、官邸及居所，按身份、职业分区安排其他的国民。(7) 高度重视水害，除成套的水利设施外，主要以“防患于未然”为防洪原则。等等。

《周礼》营城：(1) 以礼制思想为出发点，要求在“礼”的主导下形成营国秩序，形成完整有序的城市网络。(图 8-1、图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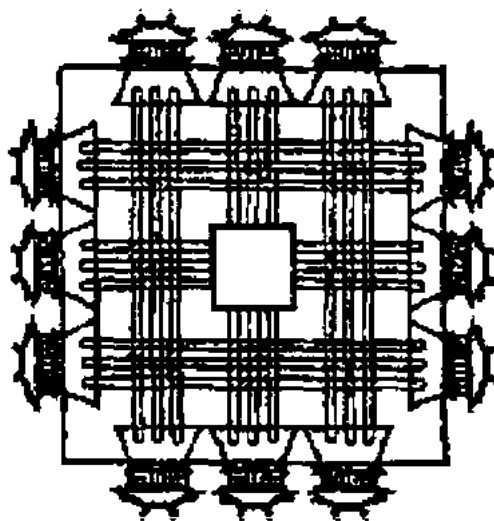


图 8-1 聂崇义所绘王城图

(引自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54)

(2) 较注重的是礼法上的完美布局，事无巨细，均予以等级规定。城之分区：九分其国；内九室居九嫔；外九室朝九卿。王畿之制：以国畿、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逐级向外拓展。道路：经涂、纬涂、环涂、野涂。(图 8-3、图 8-4) 水网：遂、沟、洫、浍、川。水间路网：径、畛、涂、道、路。田地划分：浍、洫、沟、遂、畎。(3) 着重选择平原或平坦的基址——

“地中”进行营城，具有风水

学上的意义，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1〕。(4) 按宗法等级界定城市规模：相对针对国都的营建，邦国处于最高等级，诸侯的都与卿大夫的邑则逐级下调，有擅自扩大或新建者，便属违制。(5) 从王畿的居于“地中”、王城的居于“畿中”，到宫城的居于

〔1〕周礼·地官。

“国中”，都具象地突出了天子之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6)国中的重点在于宫城及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图8-5)(7)市场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周礼》中的抑商思想很系统，它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带有很强的军事化色彩。指挥市场活动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层层密置的官吏，他们对商贾的贸易场所、成交方式、商品价格、质量、种类等等，无一不加严格限制。”〔1〕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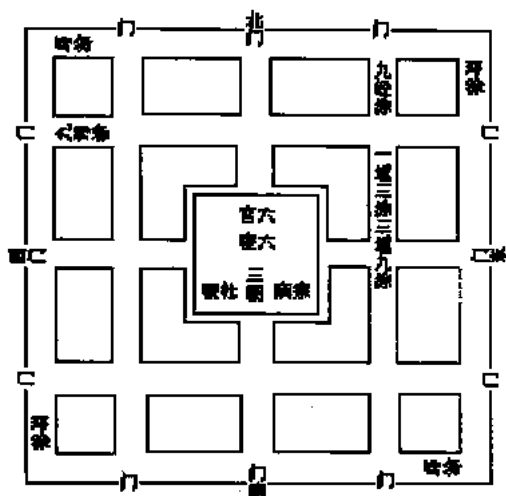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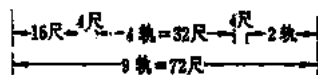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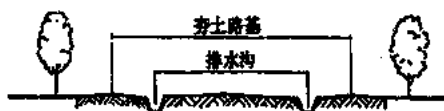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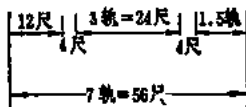


图 8-2 戴震所绘王城国

(引自贺业钺,《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54)



甲、经纬线剖面图



7. 环拉制面用

图 8-3 王城城内各级道路横剖面示意图

(引自贺业钺,《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130)

〔1〕彭林,《周礼》抑商思想刍议,管子学刊,1991,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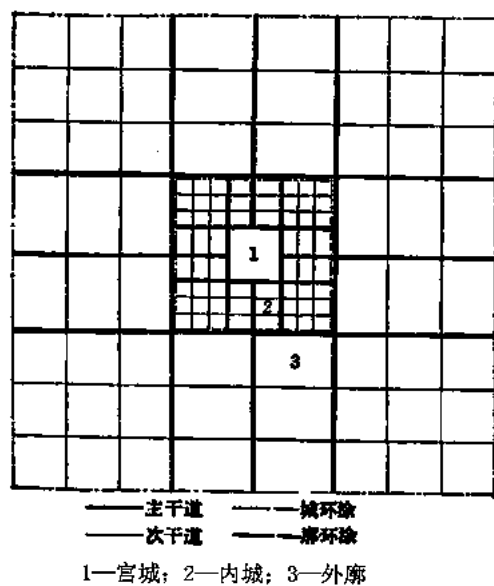


图 8-4 王城城廓干道网规划概貌图

(引自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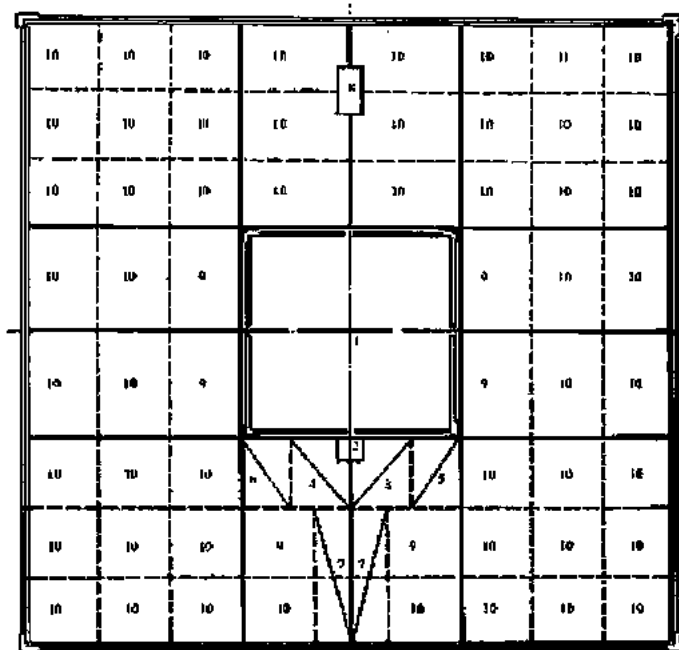


图 8-5 王城基本规划结构示意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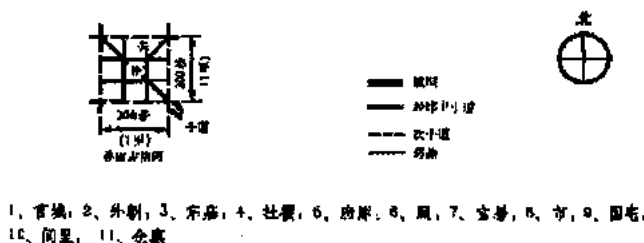


图 8-5 王城基本规划结构示意图(二)

(引自贺业钶,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51)

第四节 两者的共同点

1. 天子之都居于全国中心, 各诸侯国散布其周, 以便教化均布、贡赋均平, 实现了由点到面的延伸, 发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辐射作用。地理上的中心位置使其具备一种外在的合法根据。测地中之法来源于测日中, “中”的概念由相互位置之中到时间概念之中(一日之中、一年之中)再到地理空间之中。一方面有王权神授等观念上的理由, 一方面有政治运作上的原因: 镇守中央, 便于威慑和讨伐四方, 另一方面也便于向属国征税征粮。在商代甲骨文中言四土和四方, 均以大邑商为中心; 周人也重视择中论, 在西周典籍中常用“土中”或“地中”与四外方国对称。立国都于地中, 已经具有了政治学上国家的涵义和文化学上文明的涵义, 是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臻于成熟的一种标志, “执中”、“中和”成为其精神的特征。〔1〕〔2〕

2. 完备的行政、军事编制及生产组织, 有领导、组织化、制度化是其特征, 其相应产物里坊制直到南宋前仍被执行, 体现了对国民管理的严格。从春秋到唐时实行的里坊制度, 把城内居住区划成许多里坊, 每块里坊的四周都用高墙与外界严密地隔离起来, 大门早启晚闭。唐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 长安在当时是出名的国际交流中心, 在这样一个鼎盛时期, 竟连市场这样一种贸易集中地、需要相当开放的场所, 四周都用墙垣围绕, 却也似乎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特征。在这样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 人们无法也不会去理会太多外面的世界, 可以专心致志地营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3. 实行政、军、经合一的制度, 民平时可耕其田, 战时则从戎, 生产与国防两不误。

4. 社会组织为国、鄙或野二分的乡遂制度。国中: 《管子》设二十乡, 以家一轨一里一连一乡逐级递升; 《周礼》设六乡, 以比一闾一族一党一乡。《管子》分鄙为五属, 以家一邑一卒一级一县一属递升; 《周礼》分

〔1〕贺业钶,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55-56.

〔2〕喻希来, 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大时代(一), 战略与管理, 2000, 5.

野为六遂，以邻一里一鄹一鄙一县一遂递升。国中之民编入社会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鄙或野之民则仅处于行政编制之中。〔1〕〔2〕

5.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3〕，完善的水利设施，加上周密的管理制度，可保障城市用水及预防水患。

6. 土地制度采用均地政策，如“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4〕，和“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5〕，都说明了正（均）地对国政的重要性。

7. 地宜论，“相高下，视肥磽，观地宜”〔6〕，“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7〕。

第五节 两者的成因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两本载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典籍，即《管子》与《周礼》。两书完成于相近的年代、处于同等的环境及背景下，却有着各具特点的内容、思想及形成方式，既有如出一辙的、又有迥然不同的，其原因何在？应当在于当时的大、小环境，在于当时的所谓“乱世”。正如“乱世出英雄”一般，在战国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时代才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

一、《管子》城市思想的形成

自周平王东迁洛阳，结束了西周的历史，也意味着周天子的权力不再唯我独尊。春秋以降，写满了诸侯们一欲称霸的意图，在和谈、盟誓和战争不断的表象下，进行着各国不甘示弱的竞争和改革。贺业钺先生在其《中国城市规划史论丛》一书中，在详细分析春秋战国时五座名城——郑韩新郑、燕下都、齐临淄、赵邯郸和楚郢都的城市规划之后提出，这些城市的规划与西周时期的城市规划有较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构成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特征的基础，并总结出这些城市规划的八点共同特征。其中的前六点为：城市形制不规整；城市规模较大；政治活动中心的城与经济活动中心的郭，开始在使用功能上明确分工；城市分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扩大了经济性分区与居住区；经济性分区与政治性分区的比重产生了颠倒，变为经济性分区陡增，而政治性分区相对降低；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如城址的选

〔1〕 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135-147。

〔2〕 应永琛，《国语·齐语》中的国、鄙组织考辨，管子学刊，1992，1：51-56。

〔3〕 管子，水地。

〔4〕 管子，乘马。

〔5〕 周礼，地官。

〔6〕 管子，立政。

〔7〕 周礼，地官。

择、天然或人工水道的利用、高台的营建等，以加大城市防御能力。^{〔1〕}正是这几点，重因变、重经济，因而在思革求变的大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从实践的角度反映了《管子》城市思想的特点及形成。

形成《管子》营国思想的内外因：

1. 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争霸战争；
2. 各诸侯国为求霸主地位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3. 齐国人创新、务实的特点；
4. 开明的田齐君主不拘一格在国内全方位改革；
5. 发展经济全面提上齐国国政日程。

《管子》篇幅大，其城市思想并不是专门列出章节来阐述，而是散布在各篇章之中的。其因地制宜的特征，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对战国及之前营城活动的总结，这点从考古发现可以体现；在提法上却属创新，因为它从思想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礼制束缚，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其“四民分业而居”的新型社会构成及组织，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市居民聚族而居的原始习惯被打破了，新的地缘关系开始替代旧的血缘关系。^{〔2〕}

社会经济形态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发展。该规律在实践过程中主要促进了城市功能分区的形成及较为自由的街巷的出现，《管子》城市思想这一社会规律最有力的发掘者及提倡者。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初步分区，逐渐发展到较为完善的城市功能分区，或者从早期严格划分、定时开关市场与居住区，到后来居住区中通宵营业的商业街，均是该规律最根本的体现。

二、《周礼》城市思想的形成

“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3〕}，“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4〕}。《周礼》中部分具有宗法礼制特色的城市思想，显然与当时战国时期轰轰烈烈的全面社会改革热潮有悖，著者究竟是基于何种出发点？

中华民族栖养生息于东亚大陆，地处温带—暖温带，疆域广大，资源丰富。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北边是较难逾越的蒙古草原—戈壁；西北是干燥的盆地和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冰封雪没、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对古人来说难以征服的“大壑”、“巨海”——太平洋。地理条件作为文化心理的直接载体对人们心理及文化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新石器时代文化最重要特点也许是制度的发展。一种制度可以下定义为：群体信念为了满足群体的某种需要而以比较固定的形式组织

〔1〕 贺业钲. 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122-123.

〔2〕 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32. 城市居民的聚居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的转换.

〔3〕 周礼. 夏官.

〔4〕 周礼. 春官.

在一起的群体行动的结合物。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特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人是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1〕。较为封闭的地形足够把个体的人聚集成一定的规模,令他们互相依赖牵制而组成家庭、宗族以至国家,并建立相应的完整的宗法制度,将家与国和谐地联系起来。

“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占据支配地位时,城市便成为统治权力的中心、社会物质精华的聚敛中心、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龙山时代的城址,其社会功能已不同于原始聚落的寨墙或原始公益建筑,而应是处于城市初现期的、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中国早期城市突出地具有宫城的性质,是王权的所在,而很少或不带有‘市’的性质。”〔2〕“中国早期城市一出现就带有政治性的,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特点,与欧洲的不一样。因为中国早期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在中国早期城市遗址中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宫室宗庙是城市的主要标志”〔3〕。在夏商西周三代的城市发展中宗法礼制思想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商与西周的都城已将宫殿与宗庙作为城市的主体。

中国古代传统的单体建筑的布局、筑城材料、施工技术及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建筑群体布局等因素,对方形城郭、方格路网和城市大轴线的形成起着主导性的影响。又由于我国气候因素的影响,建筑讲求坐北朝南,因而连带形成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道路系统。

《周礼》被托言为周朝的礼法制度,但与实际的周朝礼制却不一致,而且其官制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官制也不完全相符,加上其描述上的详尽与细致,故多被认为是理想化的国家制度体系。再加上战国时期的列国虽然早已各自为政,但仍处在宗周王制之下,争霸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势必会利用或在面子上维护正统的周王之制。从以上可以推断其城市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战国时期城市建设高潮中的“城无定制”,而提出的营城范本。

第六节 两者对后世都、城建设的影响

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一书中,作者依据《管子》与《周礼·考工记》中各自城市思想的特点,将中国古代都城的类型相应分为自然型和方正型〔4〕,不无道理。顺应地形的自然型都与城有明南京、南宋临安、山城及

〔1〕〔美〕伯恩斯、拉尔夫合编. 世界文明史. 第1卷. 赵丰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22.

〔2〕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5. 原文参考自: 邵望平.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 考古, 1989, 12; 白云翔、顾智界整理.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 考古, 1992, 6.

〔3〕白云翔、顾智界整理.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 考古, 1989, 12.

〔4〕叶晓军. 中国都城发展史.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13-17.

江南水乡的小城等等。但也不能说这类城市的建设全是受《管子》的影响，而只能认为《管子》是归纳总结这类——非规整型城市模式的代表。而且所谓自然型不仅仅指的是空间构成上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指在经营城市的整个过程当中持以自然的原则，不去施加过多的不必要的人为束缚及限制，如放宽城市居民的生活自由和商业自由等。至于方正型的有北魏洛阳、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元大都和明清北京等等，其营建却大致上都受到《周礼》城市思想的规范。从实例可以比较出，以南方的中小城居多的自然型城市，地形变化较复杂，经济均较发达，因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自发进行扩展，有的成为其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方正型的城市则以都城居多，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军事的意味较深，而且多在北方平原或地势平坦的地区。对地方政治中心来说，“除受地形条件限制者外，在平原地区建设的都城，乃至府、州、县城的外形大多比较方正。道路成东西向和南北向十字相交成丁字相交，主要街道直通城门。根据城的规模大小，每边城墙上以各开三个城门或一个城门者居多”〔1〕。当然，由于处于平原上的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所占的比重较少，所以在数量上自然型的城市要比方正型的要多出许多，在全国的分布面也更广。

而在《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一书中，又另有一种论述，但其大意同上。“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模式受到自然地理条件、政治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因而表现出规范型、次规范型、非规范型三大类。规范型城市主要出现在我国的北方平原地区，规范型系列传统城市是中国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中最典型的一类——城郭方正，街衢井然，轴线清晰，礼制建筑居中等等，以唐长安、明清北京等为代表。次规范型城市是中国传统规范型建设模式在不断适应不同地理环境、文化风俗、历史条件和城市某些特定功能的要求中，有所变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形成背景总体上的一致性，其空间结构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异，但基本模式中追求方正的传统却一起贯彻其中，如斜方正型（榆林）、外曲内方型（海州）、方正错落型（太原、合肥）、叠合型（南京、广州）等。非规范型城市是中国传统城市建设模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这一系列的的城市，可根据其主导影响因素和空间结构特征的不同，主要分为工商经济主导影响型（樊城）、山水条件主导影响型（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主导影响型（拉萨）等。”〔2〕所谓规范型城市即上段所谓方正型城市，多为在北方平原地区的都城；非规范型城市即自然型城市，多为地形复杂地区的城市，或是作为某一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而次规范型城市则是结合了前两种城市特色的城市，多为都城下一级的州城、郡城、路城或府城，其形成即如引文中所述，应该是追求正统型的城市在实践中受各种因素制约时采取的一种折中行为，或是规范型的城市

〔1〕张驭寰、郭湖生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17。

〔2〕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在注重发展商业后的成果。次规范型城市鉴于其是在实践中对其他两种城市类型主要特点的融合，而这种复合性展示了其空间与职能上的实用性，故此类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于数量上是占绝对优势的，有所区别的只是哪一种城市思想在其中显示有更多的印迹。以下以明南京城及明清成都城，具体分析其中城市思想的复合性。

一、明南京^{〔1〕〔2〕〔3〕}

南京始于东吴的石头城，后为东吴都，名建业；西晋改建业为邺，末年为避晋帝讳，又改为建康；其后相继为东晋、南朝宋、齐、梁、陈都；隋文帝称帝后将原建康城拆毁，仅在石头城置蒋州；唐则在旧蒋州城东南建一小城升州；五代时先是为吴国所据，后为南唐都，名江宁府；北宋时设江宁府治；南宋时为行都，改称建康；元为集庆路，元末为朱元璋所据，更名为应天府；明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间建都于此，南京之名始有。（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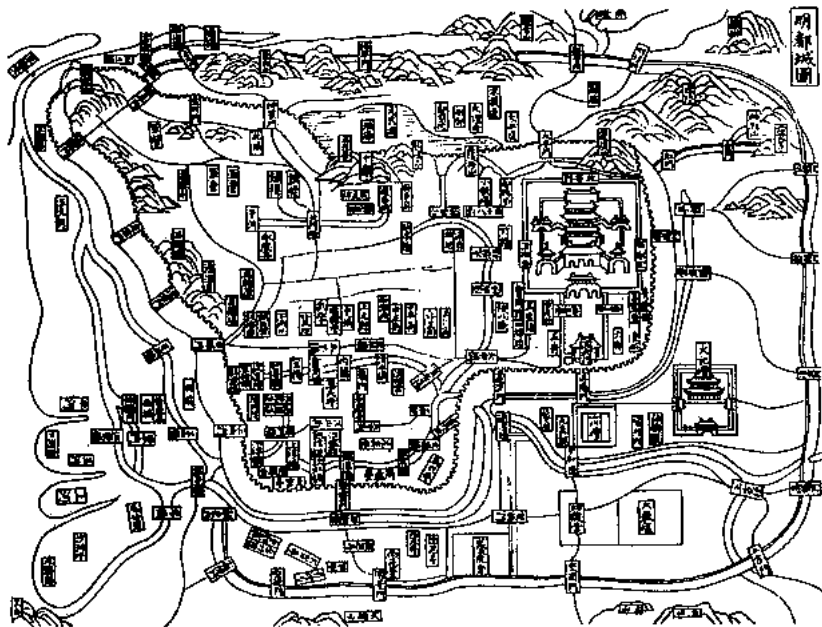


图8-6 明南京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103）

东吴的石头城建于原楚金陵邑的旧址上，为江防要塞；建业城建于石头

〔1〕 庄林德、张京祥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52-55、128-134.

〔2〕 贺业钜. 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630-637.

〔3〕 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94-97.

城东。建康城则在建业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明南京城是在六朝都城建康城的城址和南唐都城江宁府城的基础营建起来的。(图 8-7)五代吴国新建南京城在原建康城南,南唐以此城为都。宫城位于城中,秦淮河在城南,南垣外侧有护城河。明初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新建,修筑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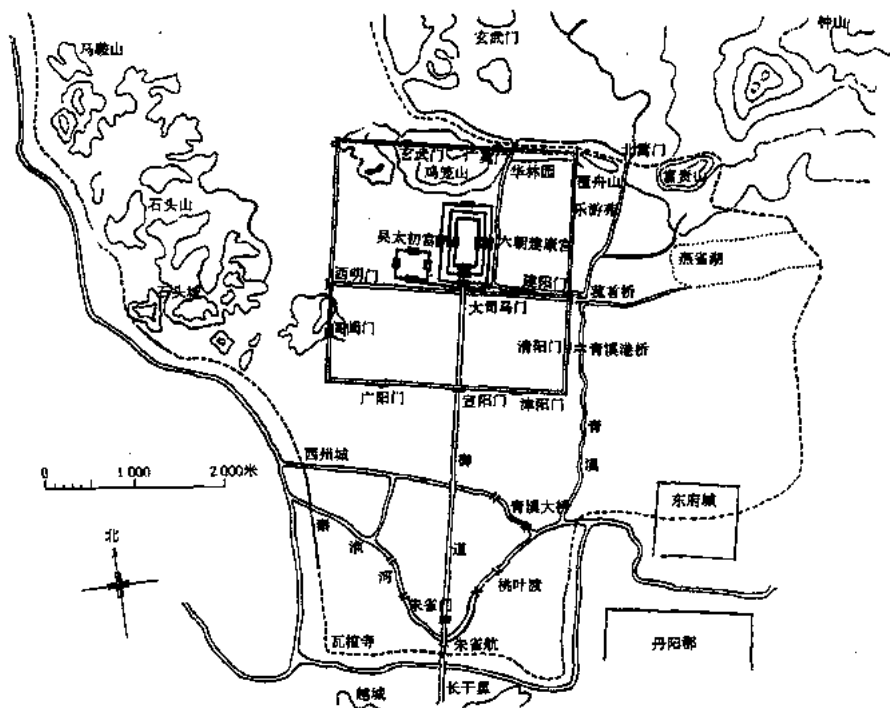


图 8-7 南京六朝都城平面示意图

(引自庄林蓀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54)

南京地处江湖山丘之中，地形复杂，东为钟山，西为五台山，南临秦淮河，北依覆舟山、鸡笼山及玄武湖，西北有长江，整个城市形态不规则。（图 8-8）南京城由大城、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四重城组成。大城即应天府城，依山傍水，将之前所有的城或城址都囊括在内，并依周围环境形成南北狭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皇城在大城东南部，北倚富贵山，南临秦淮河，乃填平大半个燕雀湖而成，所以地势平坦。皇城内为宫城，按“前朝后寝”之制布局，前朝为奉天、华盖与谨身三大殿，后寝包括乾清殿、省躬殿、坤宁宫、奉先殿、柔仪殿、春和殿等宫殿及御花园。主要宫殿与南北向的宫门都建于南北中轴线上，以北面的富贵山作为基准点向南延伸，至皇城南部左为太

〔1〕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09: 104.

庙、右为社稷坛，是为“左祖右社”；至皇城南部外为南北向的御道，两侧布置有五府等官署。（图8-9）郭城之建为控制环城制高点，以有利于防守。其范围最大，西北到达长江边，东囊钟山，南过聚宝山（雨花台），在此大区域下，宫城与皇城的中心地位得到了突出。宫城、皇城四周各有一圈护城河。南京城水系四通八达，具有供水、交通运输、军事防御及防洪等多种功能。〔1〕（图8-10）城内东南部为政治活动区；中南部为手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尤其是秦淮河两岸商业繁荣、市肆兴盛；东北部为军事区，有军营、教场和军库等；中部高岗上建有钟、鼓楼；北部鸡笼山上有观象台，其南侧为文化区，分布着学校和寺庙；西南部建有朝天宫，为大臣练习朝贺礼仪之处；城西秦淮河一带形成市场；城外西北部秦入江口建有大型造船厂；聚宝山（雨花台）西面设有琉璃窑厂。（图8-11）城内道路多不规则，还有弧形街和斜街等。（图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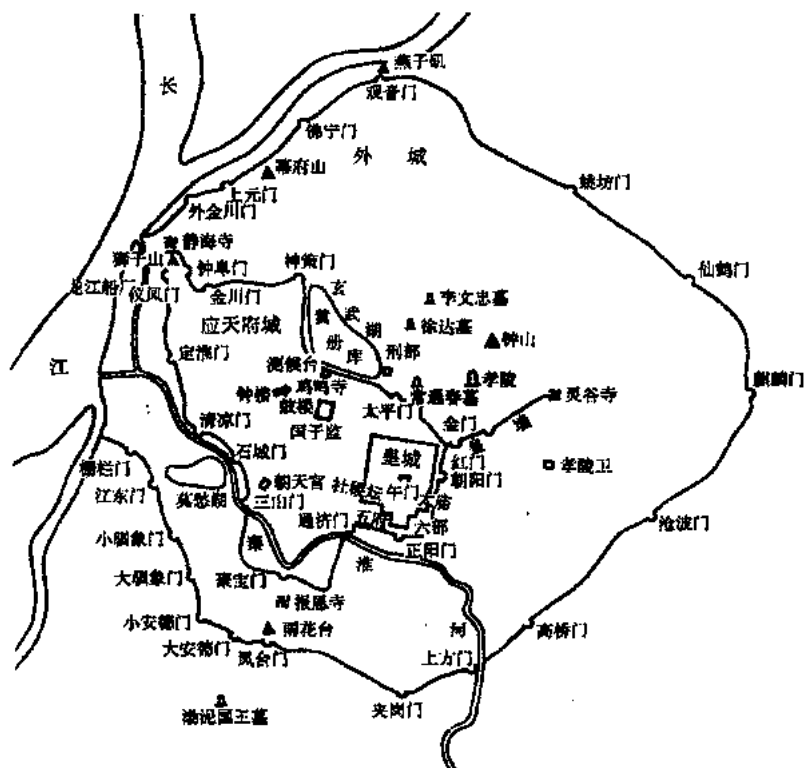


图 8-8 明代南京城简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132）

〔1〕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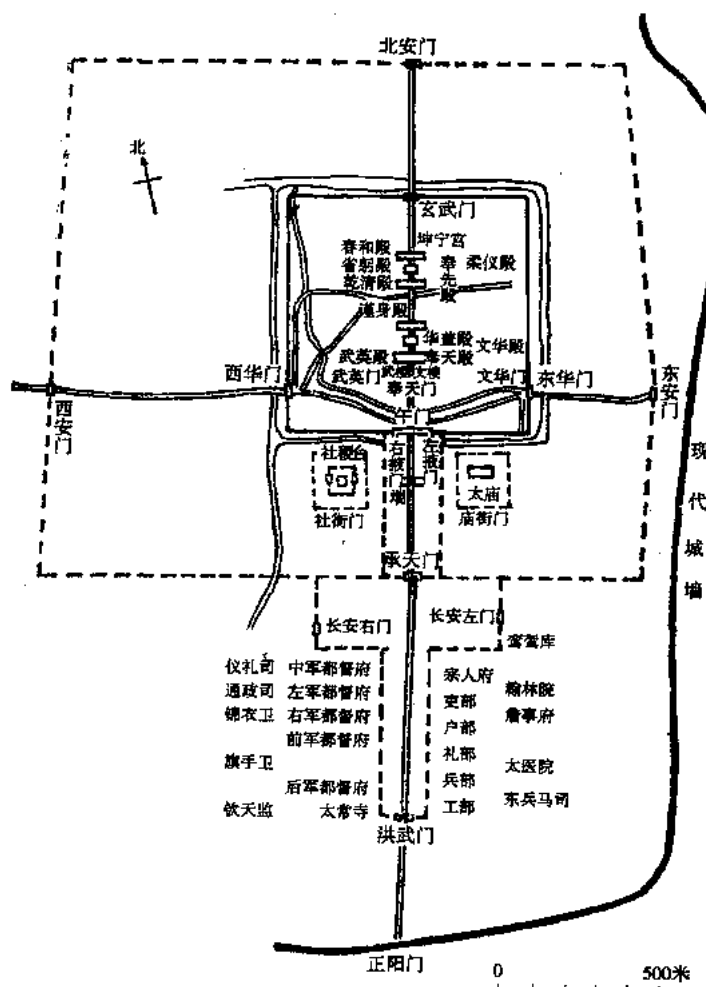


图 8-9 明代南京皇城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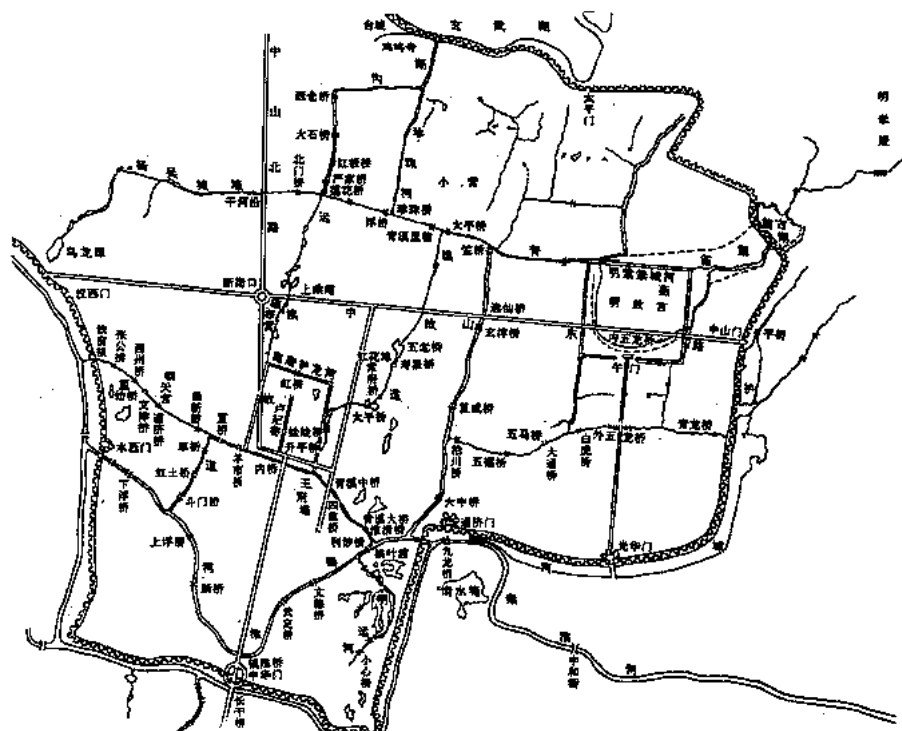


图 8-10 金陵古水道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07)

南京城中有很典型的《管子》城市思想和《周礼》城市思想。《管子》城市思想主要表现在选址、城市形态及充足的经济发展条件上。江、河、湖及诸山的包围，构成易守难攻之势；因地制宜修筑城墙，形成极不规整的城市形态；在扩建、新建的过程中尊重原城中的大致面貌，分区明确，顺应自然发展扶持商业、手工业。而为了确定作为都城最高一级的地位，在宫城的营建上严格遵循营国制度，体现等级观念，结构严谨，整体性强，则强烈地反映了《周礼》城市思想。（图 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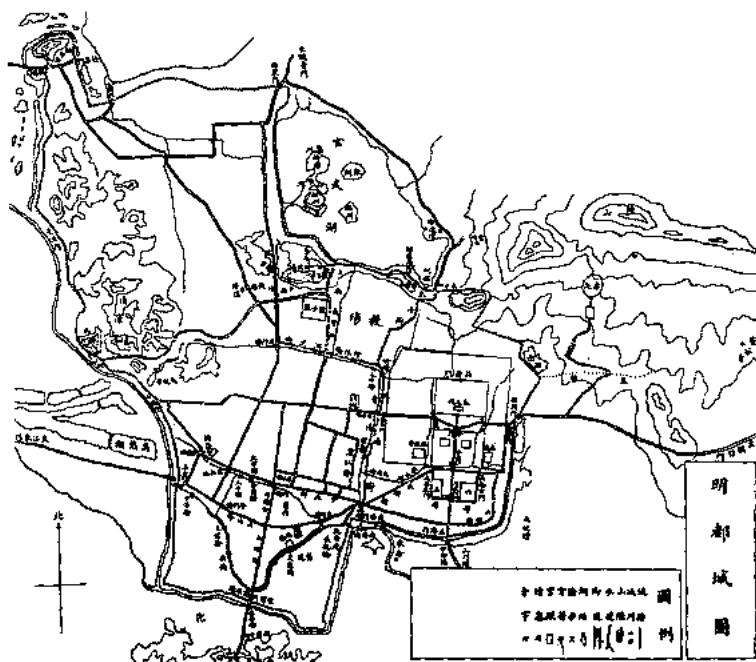


图 8-11 明都城图

(引自贺业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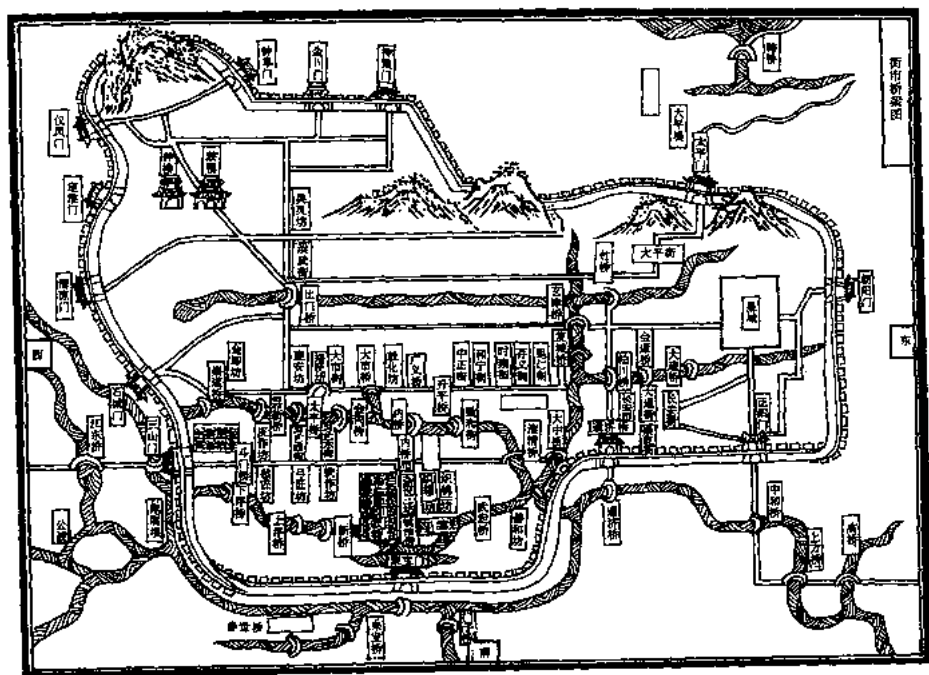


图 8-12 明南京街市图

(引自贺业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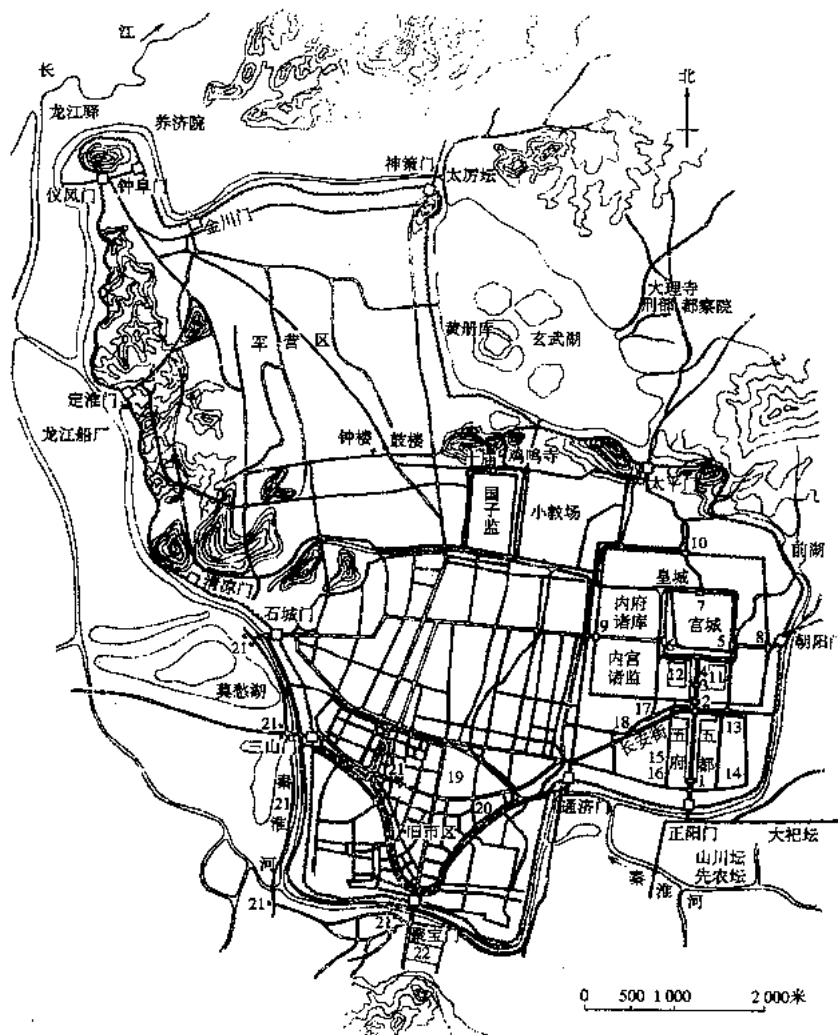


图 8-13 明南京城图(复原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130)

二、明清成都^{〔1〕}

成都城位于川西盆地中心丘陵地带中的一块冲积平原上(图 8-14、图 8-15),在平原中央,地势较高,既远离岷江干流,免去洪水之涝,又有用水之便、航运之利。其选址是用水之利而避水之害的佳例。^{〔2〕}秦时置成都县,属蜀郡;后汉末设益州;三国为蜀汉都;隋改益州为蜀郡;唐为

〔1〕有关成都城的资料参考自: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41-144;董鉴鸿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105-106。

〔2〕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06。

成都府；五代在此先后建立前、后蜀国；元朝设成都路；明清皆为成都府。（图 8-16）自秦时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变得肥沃、富庶，成都的经济地位得以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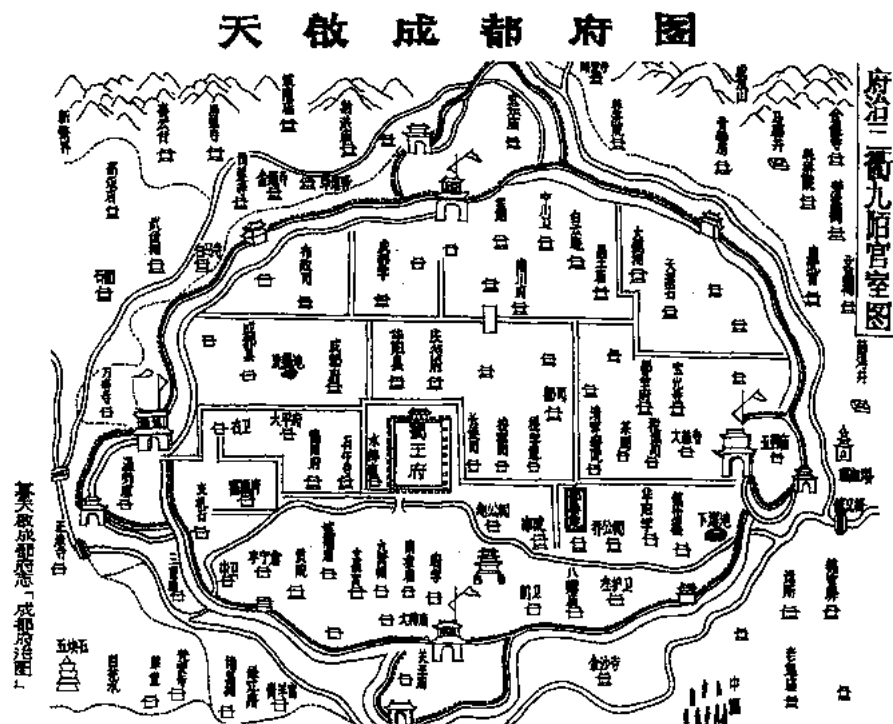


图 8-14 明代天启年间成都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205）

成都城址虽然经多次增筑重修，历代城池形态有一定变化，但位置却大致不变。城外东南均临江，为此该城顺水而筑，三面为江水所包，朝向为东北—西南向的，整个城市呈现出不规整状态。城中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水流也由西北流向东南，有利于城内的排水。而城中明初所建的蜀王宫城则是正南北向的长方形，在平面上与整个城市格局相异。清康熙间分西南部为满城，亦称少城，专为旗军及家属驻地。街道系统有三种迥异的布局，大城中的为东北—西南向的网格状，宫城中的为正南北向的，西部少城的则为鱼脊式的。（图 8-17）

成都城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在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影响下，数十条大小河流从西北向东南流向成都平原，加上因势利导开渠筑堰，形成了河渠环抱成都城的局面。城中大小水渠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既有洗涤之便，又可排污，净化城市环境。城中水渠皆通往城外河中。（图 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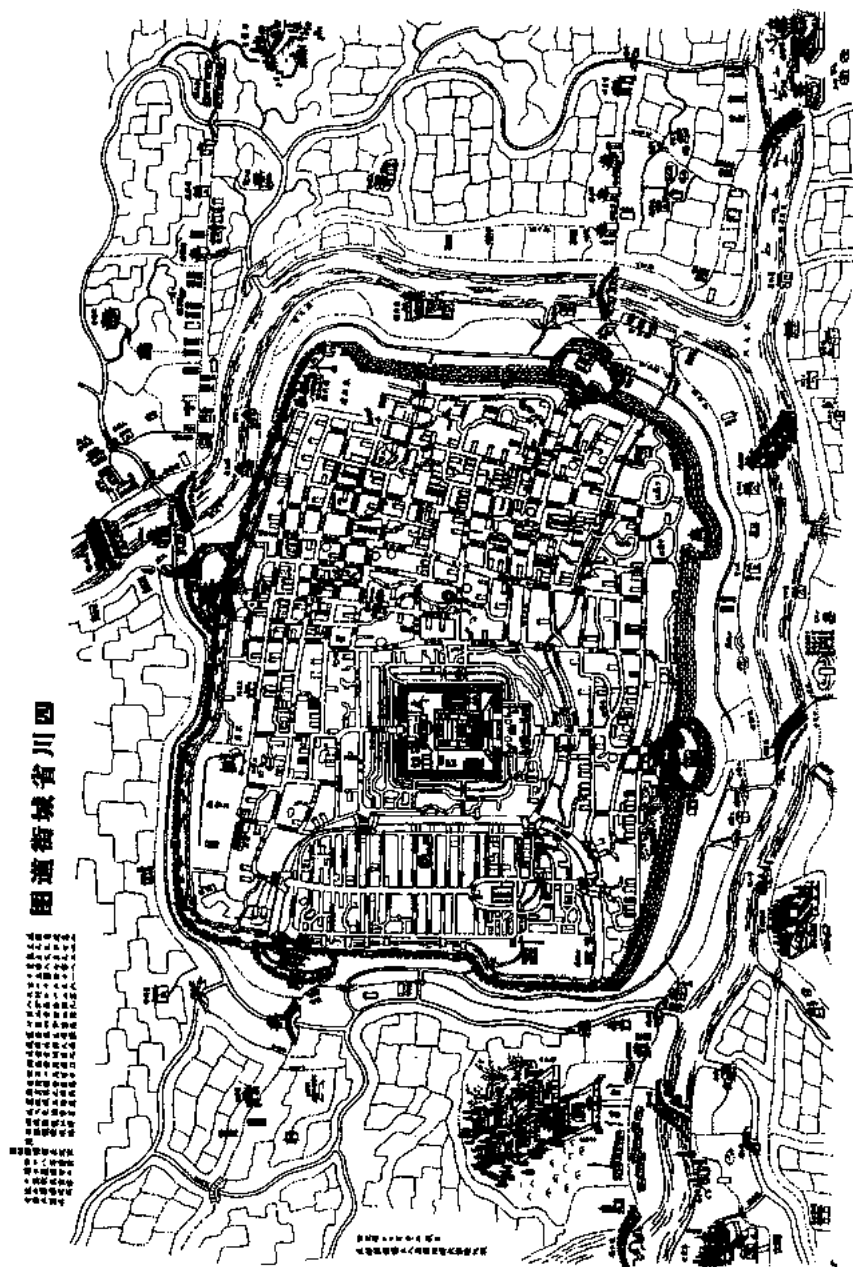


图 8-15 清光绪二十年成都城池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御研究: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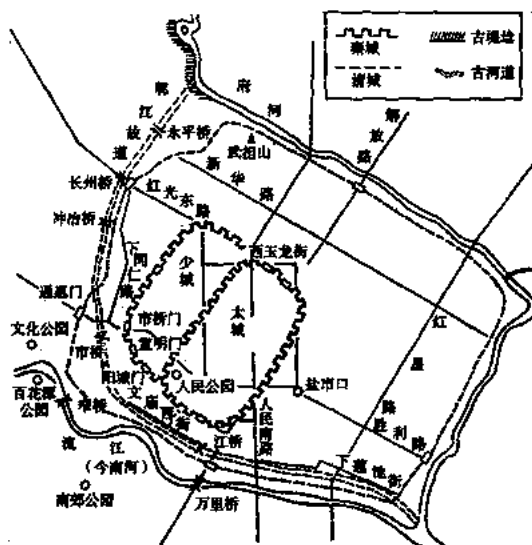


图 8-16 成都秦城、清城位置示意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142）

城内东南部为商业繁华区域。该区靠近水陆交通线：水路则由锦江经岷江至宜宾转长江；陆路则由此通内江。故商贸的来往、店铺的设置均集中于此。城内各街巷里有行市，集中着同行业的街市。城外则在东南边的东门外两江交汇处，形成发达的商市。各城门外沿对外道路的两侧，也都形成市肆。

外城与皇城的方向交错成为成都城的一大特色，同时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即基于对礼制的注重而在皇城中采用了《周礼》城市思想；而其在选址上的用水之利而避水之害及外城顺应地势河道来决定其城市的范围与形态，也都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管子》城市思想。

这两个城市都注重顺应地势、经济发达，可以说其城市思想较为突出地体现了《管子》城市思想。而其于不规则的外城中建有规整的符合礼制规范的宫城、子城，又较完整地体现了《周礼》城市思想。两种城市思想在其中并重，因此二者是较典型的复合型城市。

三、比较

方正的都城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影响力大，不易对其结构形态做大的变动，因而对前朝、前时代的都城因袭较多，仍保存了许多《周礼》城市思想的痕迹。如以宫城的中轴线为全城的主轴线；前朝后寝；正南北、东西向的道路；每边城墙开有的城门接近三道等等。这些基本上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随着封建皇权的逐渐集中，都城中的宫殿建筑和礼制建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宫城以宫殿建筑为主，宗庙、社稷等则渐次退出了宫城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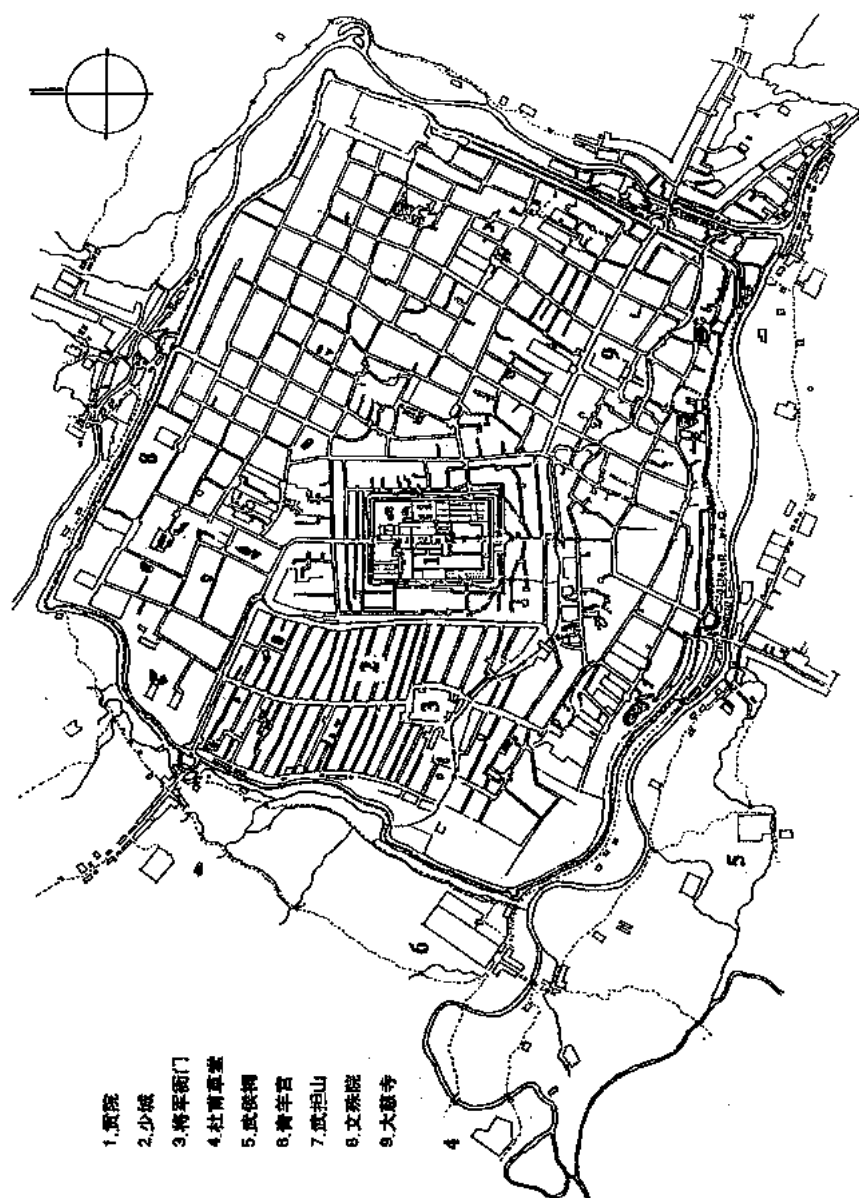


图 8-17 清光绪三十年成都城市测绘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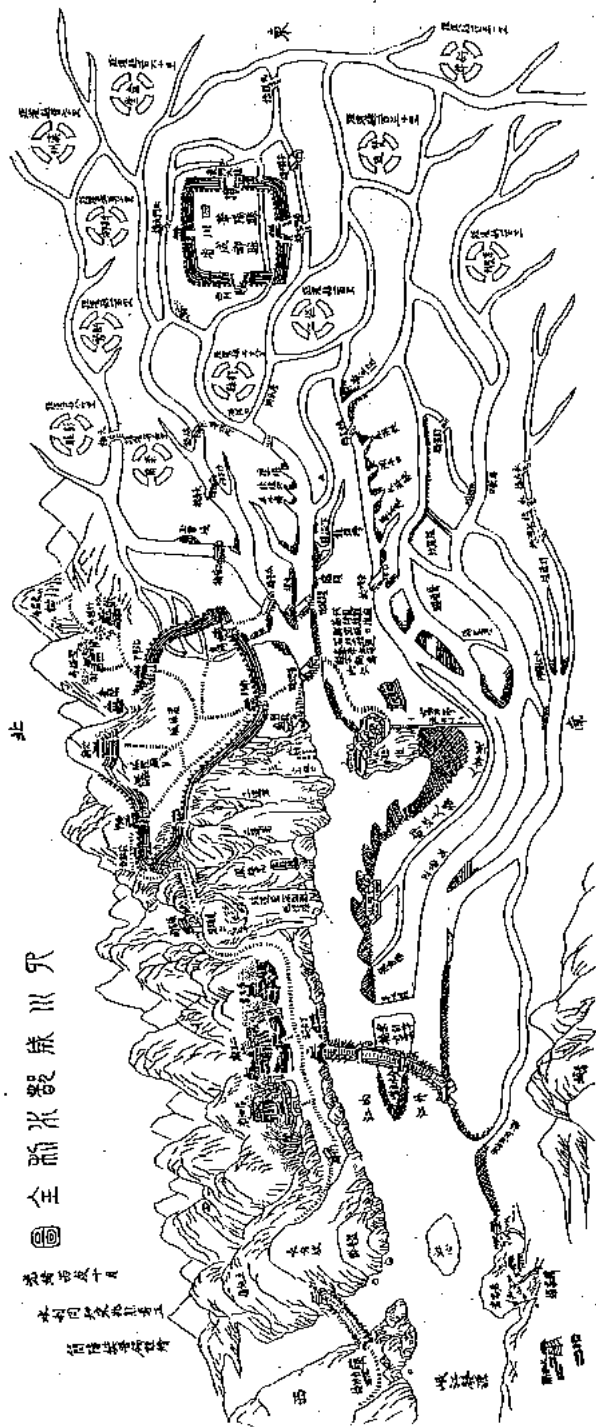


图 8-18 四川成都水利全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86)

有的甚至被安排到了城外。^{〔1〕〔2〕}其中最为体现的是“左祖右社”格局的变化。这说明统治者不会毫无保留地接受所谓的“传统”，他们总是以自己的现实利益为出发点，来选择适合自身的思想。因而以礼制思想为主的《周礼》城市思想，就必然仅伴随着每个朝代的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存在、增删。

《管子》与《周礼》有关城市思想的叙述中，均有较大的篇幅是关于水利建设的。对各种水源的种类和特点的熟悉，使得它们可以自如地利用水性建设渠道工程，有效地化解水害、利用水利，为后世城市的水利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尤其是《管子》中的水利思想，从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维护等方面综合考虑、统筹安排，突出“防患于未然”的主旨，更是提高了之后的城市营建者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从另一方面来说，从这里也可以考察出古人对于治水的心得和体会。

在为保障统治者统治权的前提下，两种城市思想都致力于加强对国民的管理，从政治、经济、行政及生活等方面限制民众的自由，把他们牢牢地掌控在统治阶层的手下。这样，既违反了城市作为居民集合体的基本特性，也不符合城市自身发展的规律。可想而知，这样的城市是缺乏真正的活力和生气的。由闾里制衍生的里坊制的最终消失，非常形象而现实地反映了其非科学性的一面。

市场是城市经济发展及水平的重要体现。从《管子》对市场形成及运作持较为宽松的态度来看，北宋后期出现的开放式商业街市，在这里可初见其思想端倪。从封闭而集中的里坊和集市，发展到开放而分散的坊巷和街市，就是对《周礼》偏重礼制的营国思想的自然淘汰。

两者都以自身颇具规模的规划体系，为后世都、城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有关城市规划不可多得的概念和方法。虽说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两书的城市思想或多或少都体现在后世的城市建设当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指导作用。但在营城上，似乎《管子》的城市思想适用性更强，几乎适合所有城市的建设，无论大小及地形。其系统的预防水涝旱灾的水利措施，在现今社会仍有它可资借鉴的地方。并且其注重城市经济职能的独特性，更有助于城市发展的欣欣向荣。而《周礼》的城市思想偏重于礼制都城的建设，其宗法等级划分的国、都、邑，也与封建君主集权下的郡县制不相适应，自然适用面就小了。至于两者完善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只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能全盘套用。

综上所述：代表统治阶层的意志、具有官方意味的《周礼》城市思想，在中国古代城市思想自汉代以后的发展阶段中是有着较高地位的，而那些蕴含着《管子》类城市思想的城市，则一以贯之地表现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所

〔1〕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0-32。宫殿及礼制建筑在城市中的地位变迁。

〔2〕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34。宫殿及礼制建筑在城市中的地位变迁。

谓各种城市的分类也都只是相对的，一个城市里可能蕴含几种城市思想，其中哪种思想占主要地位或起更大作用，便以此种思想作为代表来归纳该城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抽象的和具体的功能，抽象方面指的是其作为国家乃至地区权力中心的政治、军事功能，具体的则是提供给城市居住者（包括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生活、使用的经济、文化功能。本书所讨论的《周礼》和《管子》的城市思想就分别在以上两种功能中具有代表性。因而如果在实际的城市规划工作中将这两种城市思想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确立城市的中心地位、发挥其辐射作用、深化其不同于农村的独特内涵，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第九章 《管子》城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综 述

由于历朝历代以来,《管子》一书及其城市思想并不被视为正统的书籍,又由于其内容的具体性,因此对于后世城市的建设无法产生纲领性及书面上的影响。而有影响的最大程度在于其空间上因与应、职能上重视经济发展的务实总方针。故后世那些在建城时注重利用环境、顺应地形、发展过程中鼓励商业活动的城市,即无论是秉承因与应的实用性原则,还是实施发展经济、注重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策略的城市,都可将其城市思想归于《管子》类。

一、实用性原则

《管子》主张因、应以求实,因与应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力求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有利于扩充、完善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种功能;有山有水等复杂自然条件下的营城活动;排除以单纯的等级制度为准则,而是由实际中的各种相关因素来框定,或是提出适应性的原则作为实际操作的指导;高度重视水害,除成套的水利设施外,将水利与城防结合在一起;等等。这些因应措施,反映的是《管子》城市思想中的实用性原则。因此,在营、建过程中采用了以上一种或几种因与应的措施的城市,即属于本书所讨论的实施实用性原则的城市的范畴。

二、可持续性发展策略

要使城市的进程不断稳定持续下去,就得重视城市的经济职能及经济发展。其实如果是生长在某些小城市,我们都可以从家乡的一些具体变化来确证城市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县→小市→大市;农业城→商业城。小时候的县城里尚有许多农田,由属于农业户的农民在耕种;大多数居民靠自己种菜就可供应各自家庭的需要,过着半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有国营的商店在经营着商业活动,居民在购物上受购买能力及配给的限制。当农田渐渐在城区消失了,个别家庭的小菜地也只能见缝插针地在一些小角落里存在时,县城也在行政上升级为市了;个体经营的小店铺及小商贩渐渐出现。发展到现在,城里有了许多大型超市,商品供应充足、应有尽有,在消费上已几乎与大城市同步,居民的生活变得方便而舒适;城市面貌也随之有了巨大的改变。通过这种站在居民的角度来看待的变化,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而改变首先来自于国家政策,政策的有效转变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因此国家采取的政策其开明之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符合了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在此前提下,

城市的发展自然欣欣向荣。与此同时,发展带来的繁荣必然对城市的大、小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当日的大片农田被成堆成群的钢筋混凝土所代替,可以在里面嬉戏、游泳的城市河流也很快地被污染,空气污浊,尘嚣日上……于是保持生态平衡也就被提上了日程。在政府、公众的关注与努力下,植树种草、疏浚河流、营造景观、旧城保护等活动大范围、大幅度展开。当鸟鸣声渐渐回到我们的生活后,说明我们的努力开始有了成效,城市的发展开始步入了可持续的轨道。因而,本书将那些含有《管子》类城市思想的城市中,重视发展经济以富民强国、合理利用资源以保护生态的部分统称为可持续性发展策略。

以下本章从中国历代都与城中挑选几个典型的、较有代表性的《管子》类城市,从其各自的特点和某个最具特色的时期着手,考察《管子》城市思想在其中的体现。

第二节 南宋临安

杭州城自秦汉时已设县治,为钱塘江上的重要渡口,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的繁盛与之伴随。隋代开始修筑城池,自大运河挖通之后商业更为发达。唐时城址无变化,钱塘江已可通海船,又将附近一带的沿海贸易集中于此。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在子城外扩建内城和罗城,称西府城。北宋以吴越罗城为城,为杭州州治所在,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港之一,人口大幅度增长。南宋定都于此改名为临安,于吴越城的基础上进行增修,将城南凤凰山东吴越府州所在的子城改为宫城,并扩建城东南。(图 9-1)

杭州位于浙江西北部杭嘉湖平原南端及钱塘江口北岸。杭嘉湖平原为湖沼与河流冲积原,土壤肥沃,水网密布,海拔在 20 米以下。杭州城在此平原上,其选址就已颇有优势。

南宋临江城(图 9-2),地形复杂,东临钱塘江、西就明圣湖(西湖),北近宝石山,南依凤凰山,城南还有吴山(今城隍山)。该城配合地形,平面形状极不规则,南北长、东西窄,状若腰鼓,俗称“腰鼓城”;道路系统也不规整,南北干道与南北向的主要河道平行,东西干道则连接东西的城门。城门十三,水门五。城内外河湖纵横,城内有市河、清湖河、菜市河等河流、有茅山、盐桥二运河,城外主要有里沙河、龙山河、菜市河、五里塘河、沙河、上、下塘河、子塘河、蔡官人塘河、宦塘河、泛洋湖等河湖;由于临安所处地势南高北低,故内外水系走向均为由南向北。北门外的大运河,可直通苏州一带。(图 9-3)当时城市所需主要经大运河供应。较大型的仓库也都靠近北门,而一般的货仓则多在府衙周围。宫城的位置偏于城南一角,为地形所限外形也不规则。其北门前有一条直通城北的御街。

城内外都有集中的市,还有同行业商铺集中形成的街市,即名为团为行为市者。“北关”一带水运发达,商业也最繁荣。自和宁门至观桥御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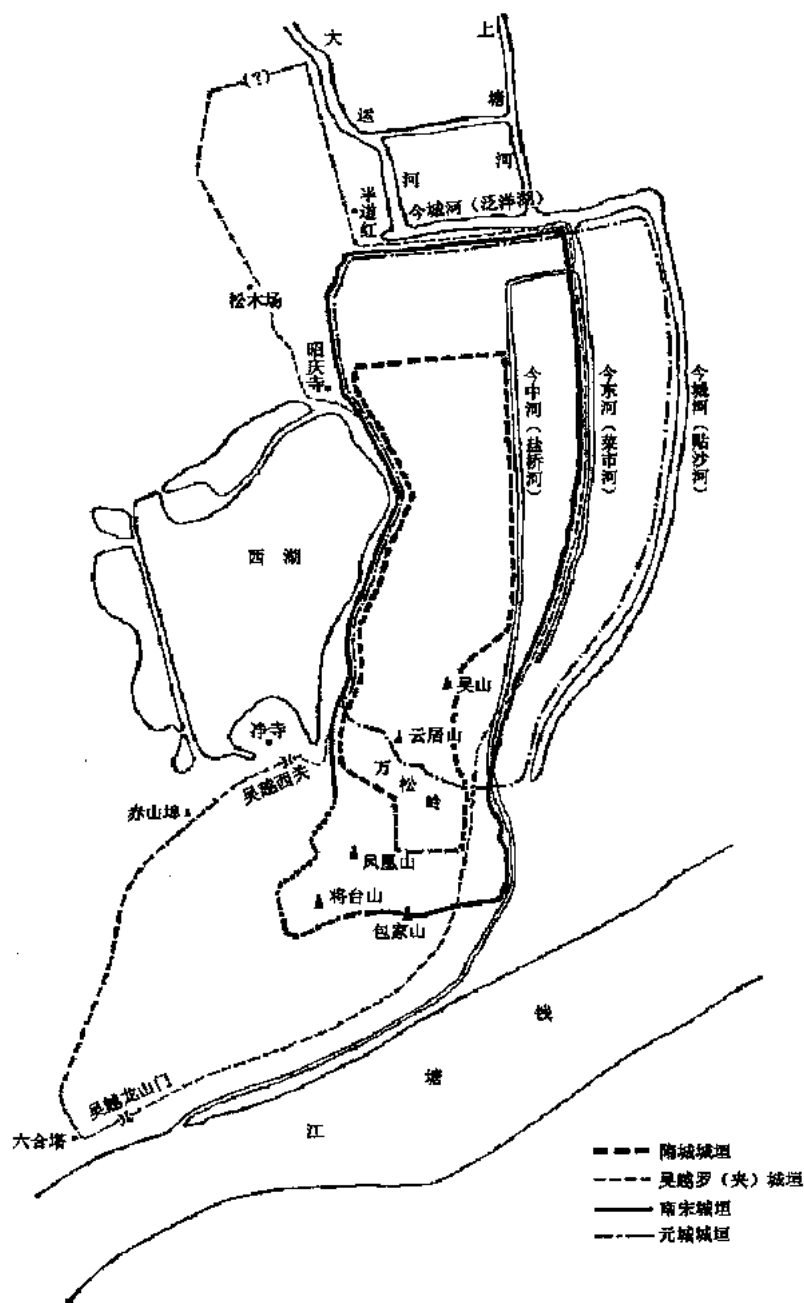


图 9-1 杭州城址变迁沿革示意图
(引自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221)

肆店铺集中。“都城天街，旧自清和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西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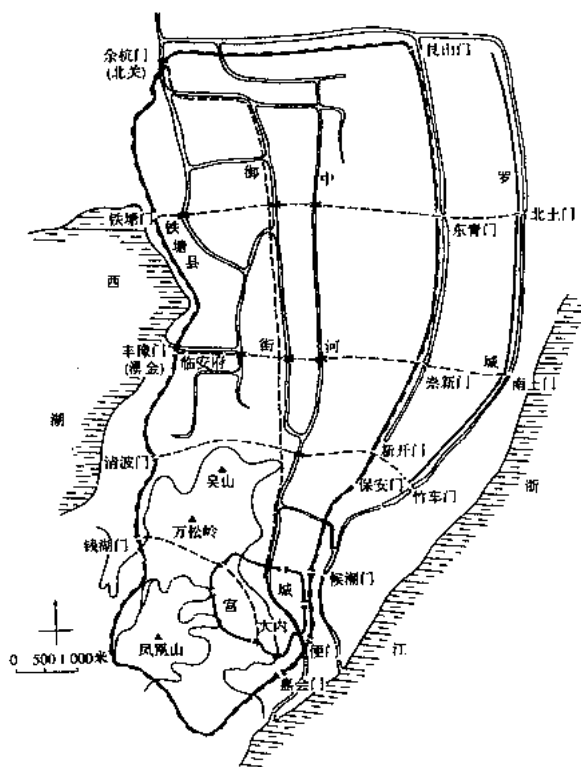


图 9-2 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96)

铺,……自融和坊北至南市坊,谓之珠子市头,如遇买卖动以万数。间有府第富室质库十数处,皆不下万贯收质。……又如大小铺席,皆是广大货物,如平津桥沿河布铺、扇铺、温州漆器铺、青白磁碗铺之类”〔1〕。城内还有许多供行商住宿及储存货物的塌坊(客栈),分布在水陆集散地和闹市区。“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造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邸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2〕另外在码头和集市附近还有称为“廊”或“堆垛场”的简易堆货栈。城内有许多瓦子分布在各处,部分在城门外,集中有茶楼、酒店、妓院等,还有金银盐钞交易铺、质库、铺席等。“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若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

〔1〕都城纪胜。

〔2〕都城纪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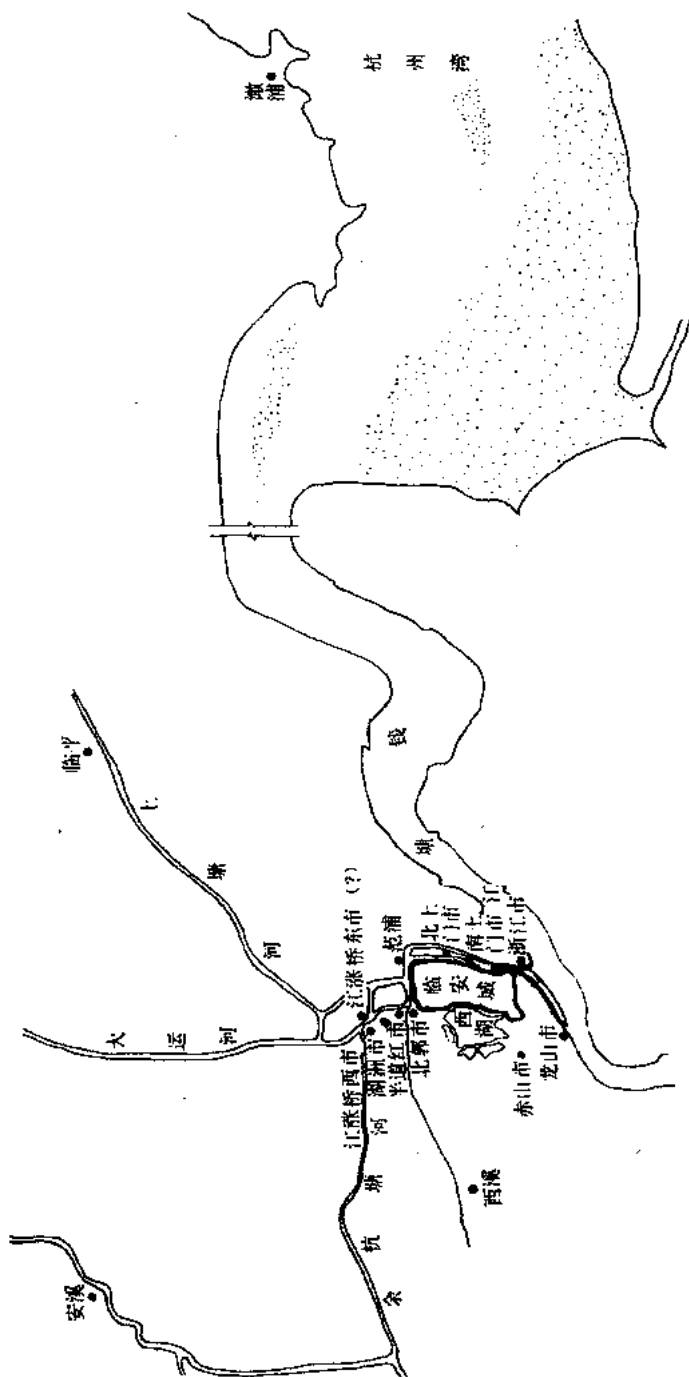


图 9-3 南宋临安城市总体布局概貌图
(引自贺业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09)

下饭鱼肉鲑膳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食，施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1〕。总的来说，临安城内沿御街两侧形成南、中、北三大商业区，且虽然官营与私营兼有，却是以私营为主流。中区为旧商业区，规模最大，行、市齐全；南区邻皇城，以高档消费为主；当时的瓦子多在北区，且贡院也在该区，因此这里的商业以书业和饮食业居多。整个城市供应充足、消费性行业兴盛，许多商业街通宵营业，即便是御街上商业气息也照样浓厚。“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2〕。（图9-4）

“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居民，弥望菜圃。西门引水注城中，以水散给坊市。严州、富州、富阳之柴，聚于江干，由南山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3〕在城内分区上，东门因临钱塘江，为防钱塘潮不设居民区，又因城东密集的河道供水便利而划为菜圃。在城市用水上，则引西湖之水入城，以便坊市用水之需求，并利用湖水灌溉田畴。北门外有运河，将沿河各地的米及海鲜水产等运来此处。在五代吴越城兴修水利后已形成了此格局，临安城既然是在其基础上营建起来的，也就承袭了这种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格局。其水利建设包括：修筑海塘防钱塘江潮；设“撩浅军”专门负责除葑浚湖；引湖水入城丰富城内诸河水源，以解决因水道缺水而造成的泥沙淤积航道；设水闸以防城中诸河漫漫淤塞；大力整治钱塘江航道以保证海运畅通；治理运河，加宽加深河道，以利航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农田水利；等等。

作为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临安城，为适应北宋末期即已新兴的经济发展形势，借鉴于北宋开封城的探索与尝试，以其商业发达的坊巷制打破陈旧的呆板的里坊制，形成新型的灵活的商业布局与居住方式，呈现出崭新的城市面貌。其延袭前代南北靠山、东西依水的选址、及因地制宜形成腰鼓形的营建，采用适用性原则尊重传统而“因旧就简”〔4〕、因势利导，初期仅修缮城垣及疏浚西湖和内河、运河；作为首个全面解除宵禁、商贸自由的都城，在稳定后为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致力于扩大工商业区、增设行业街市和坊巷间商业网点，也表明其采取了可持续性发展策略。这两方面并重，因此是较全面地体现《管子》城市思想的城市。〔5〕

〔1〕 梦梁录。

〔2〕 梦梁录。

〔3〕 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12。原注：〔清〕朱彭，南宋古迹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7。

〔4〕 宋会要。

〔5〕 有关临安城的资料参考自：贺业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南宋临安城市规划研究——兼论后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制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18-285；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01-214；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95-98；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6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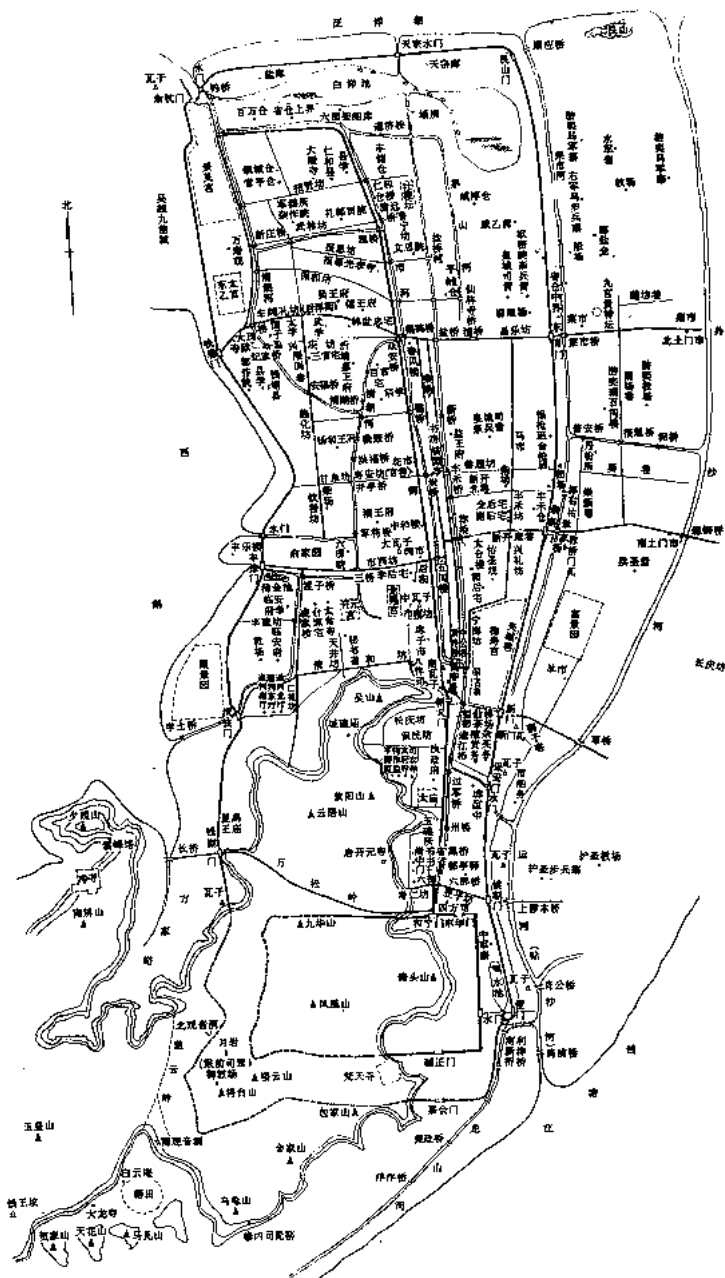


图 9-4 南宋临安城市规划概貌图

(引自贺业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16—617 夹页)

第三节 宋元泉州

泉州位于福建晋江下游北岸，东临海，西接南安县，南邻晋江县，北接仙游县。周为七闽地；秦属闽中郡；西汉属会稽郡；东汉属建安郡；晋属晋安郡；南北朝分属晋平郡、南安郡；隋始置泉州；唐迁于今址建城，为州治所在，唐末发展为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宋时地位提高，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在此设提举市舶司，专管进贡与外贸等；元仍保持这种状况，至元末战乱始开始衰落。

泉州城始于唐代时筑的子城，南唐时于子城北建衙城，子城外建罗城，因环城植有刺桐树，又名刺桐城，子城与罗城均有护城河；宋元后向城外扩展，扩建了城墙，并筑有翼城等。（图 9-5）由于多次扩建，受沿江地形的限制，泉州城由最早方正的子城发展为很不规则的城市。城西至城南至城东南主要是沿晋江形成，城西至城西北则主要顺着原城门外的出城干道发展。城内道路系统为不甚规则的方格网系统，以原子城内的十字街及其延长线形成，西北—东南向的道路则是沿河道走向而形成。（图 9-6）城外有城壕，城内有被称为“八卦沟”的沟渠系统，由城东南引水入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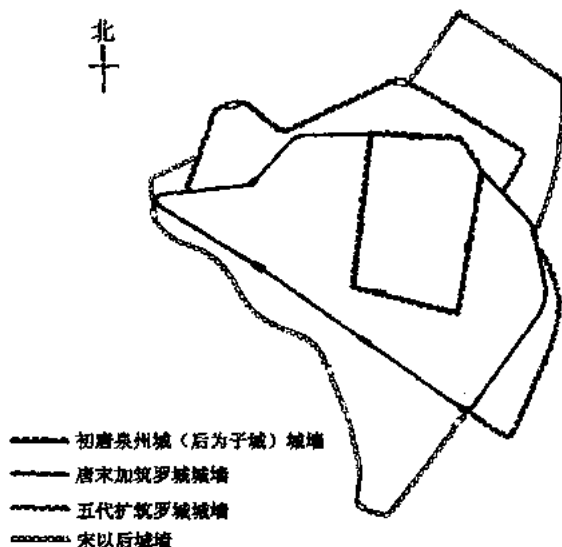


图 9-5 泉州历代城垣变迁图

（引自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535）

自唐代国势强盛，开始吸引西域及欧洲的商人来华经商，于是海上外贸通商发展起来。泉州港自古就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且位于已成为外贸重

〔1〕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72-5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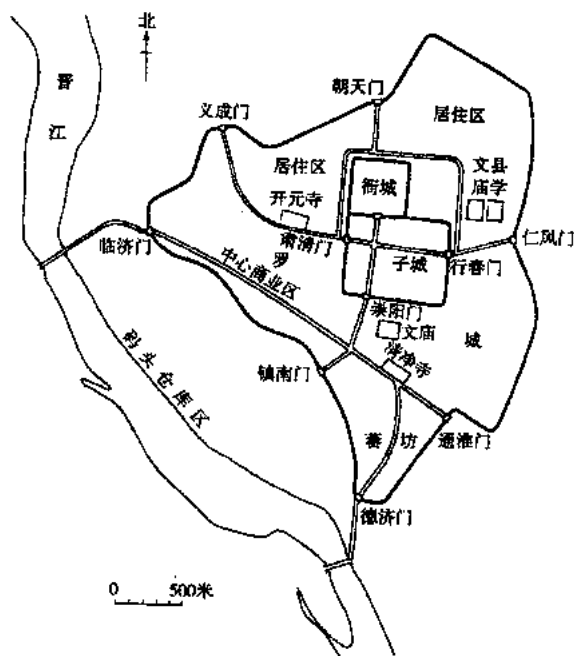


图 9-6 宋元时期泉州城市轮廓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102)

要港口的广州与扬州之间，位置适中。（图 9-7）加上泉州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已有很发达的造船业，宋时又更进一步发展，可造大型船只。又有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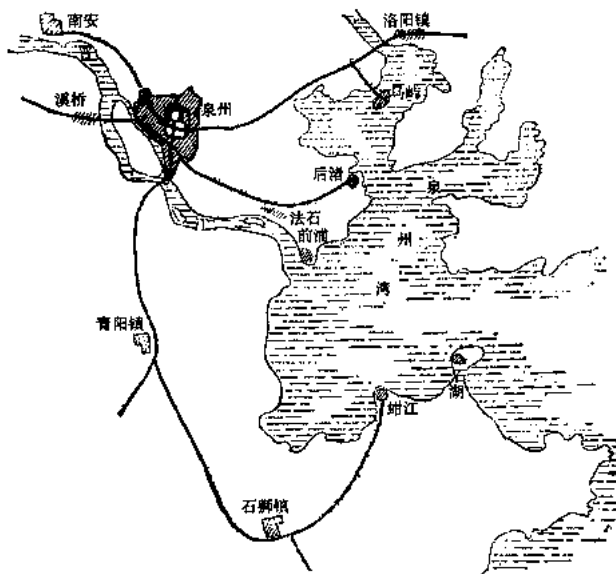


图 9-7 泉州城附近港口分布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 101)

丰富、工农业生产发达的晋江流域与之紧密相联。因而诸因素推动泉州成为宋代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宋元时,泉州城东南通淮门外的晋江东、北岸一带,均为码头及外商集居地。而泉州附近的港口码头也与之有便利的陆上交通。此时期,城内市肆众多,主要的商业区集中于城东南一带,有不少作为商舍及货仓的云栈,邻近为码头与仓库区。

从图 9-5 可看出,泉州城自建城以后的约五百年间就已有了多次大幅度的扩展,其城市发展的兴旺,都有赖于其为保住重要港口城市的地位而采取的可持续性发展策略。“城市水系乃城之血脉”,对城内沟渠河道加以妥善的维护与管理,保持水道畅通、环境良好,以成人文,^[1]即是很好地实施了可持续性发展策略的一方面。而且在受到周围地形限制的情况下,见缝插针地进行拓展,无论是类似葫芦状还是鲤状,以其最后毫无规则可言的成形,揭示其对适用性原则的充分运用。^[2]

第四节 隋江都与唐扬州

扬州成为唐代最大的商业中心,与其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是离不开的。首先是位于当时经济已发达的长江下游;其次在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成为南北商货的集散地、转换地和漕运枢纽;再者,与长江出海口相邻,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商船的转运点和国际贸易港口;又,作为区域政治中心,扬州设有盐铁转运使,江、淮一带的盐在此集散。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其经济成为城市的主导职能,促成了其经济上的绝对影响力和辐射力,从而奠定了其较高的经济地位。(图 9-8)

扬州于汉代称广陵,为盐铁等的中心,城市规模有所扩大,旧城址在今扬州城北的蜀岗上;隋时在蜀岗上因旧城建江都宫,并在宫南建外郭,称江都;唐时改名为扬州。(图 9-9)

隋江都城的宫城因受地形及旧城的限制,为不规整的多边形,前有河流斜穿而过。外郭城倒是为横长方形,城内南北干道四条,东西干道六条,街道、坊巷的布置均较规整。(图 9-10)唐代扬州城以宫城为官署所在的子城,向南拓展外郭,呈纵长方形。外郭城内南北干道四条,东西干道十一条,也较规则。然而在此规整的郭城中的运河却自东北斜向西南穿城而过,使得两岸各坊的形状随之变化。唐代新开的运河沿东城墙外侧流过。城南及东南沿大运河一带,商业最为繁盛。(图 9-11)

[1] 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74.

[2] 有关泉州城的资料参考自:贺业钜,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534-538;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75-80;庄林德、张京祥编著,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0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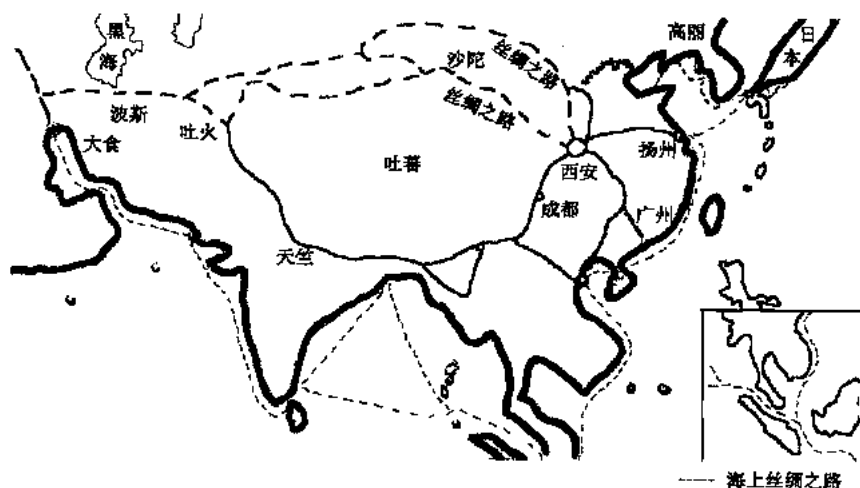


图 9-8 扬州海外交通图

（引自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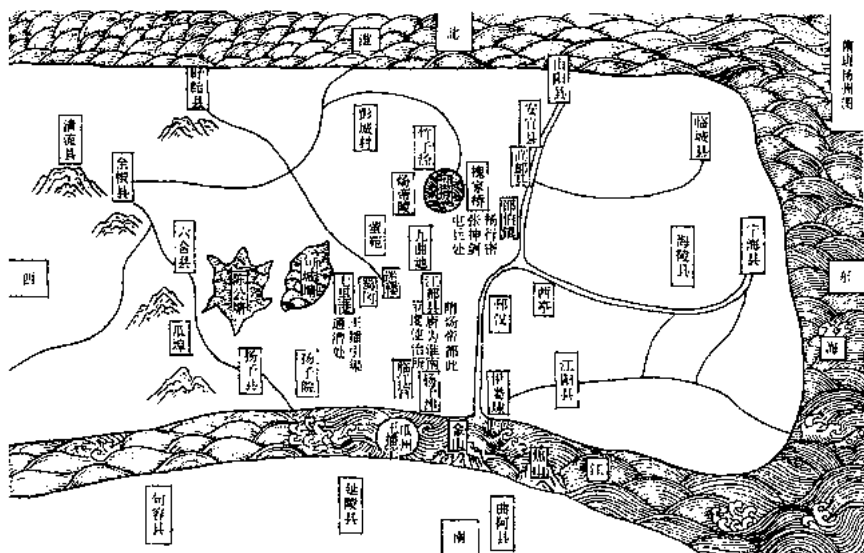


图 9-9 隋唐扬州城

（引自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528）

长江北岸由于泥沙淤积渐渐南移，遗留下的冲积带日益加大，对其进行的开发利用也日益增加。因此处于冲积平陆上的江都城外郭的营建，是在建于蜀岗上的宫城营建之后才进行的，故而显得规整。因南临长江，宫城所处地势较高则有利于防洪，城防也同时被考虑在内。这种首先出于礼制考虑将宫城置于高地上的选址，与隋代营建的目的有关，是先有宫城才有郭城。而平面形制上的不规整，又说明即便是因关注礼制而处于较高地势上，也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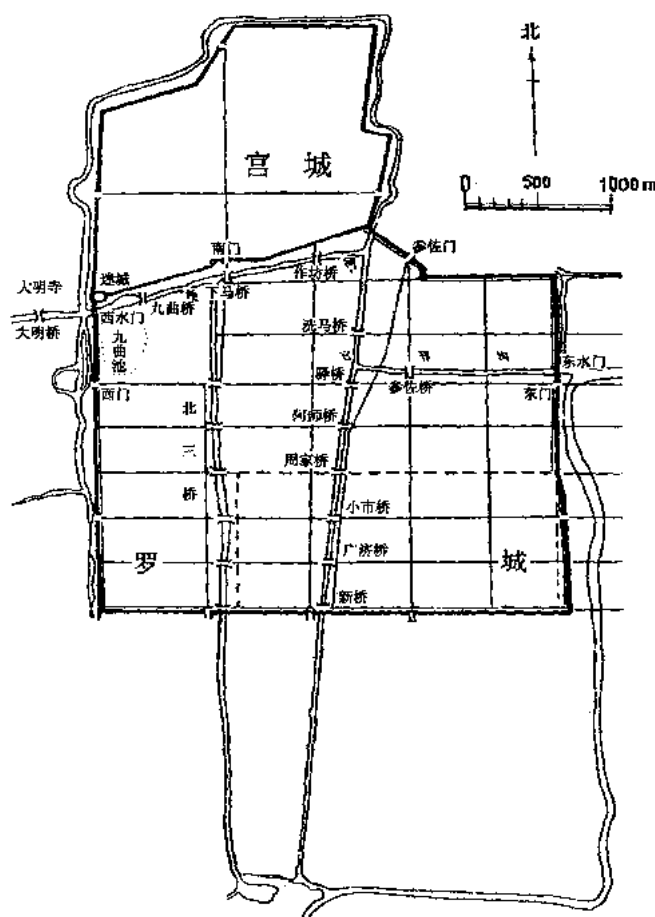


图 9-10 隋江都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引自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下册, 5)

顺应自然与实用, 不去强行制造出规整的平面, 而只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建造了较规整的郭城。唐代以隋宫城为子城, 扬州大都督、淮南节度使及州县等的官署都布置其中, 还有相关的官府府库、官员府邸及校场军营等, 因此子城仍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区域; 向南扩建的郭城则相应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区域, 有居住区、市、手工业作坊等主要分区。突出的经济地位和商业优势, 使得扬州在唐代中期就已呈现出新型城市商业的雏形。其商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两条干道上, 形成街市, 一条为与郭城内运河边与之平行的南北向斜街, 一条临近子城, 自西门起, 沿着东西向的邗沟平行而走, 并向东延伸出一段。(图 9-12) 随着运河伸展的范围加大, 扬州成为手工业中心, 造船业兴起, 对外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渐渐拓宽, 成为可控江淮的重要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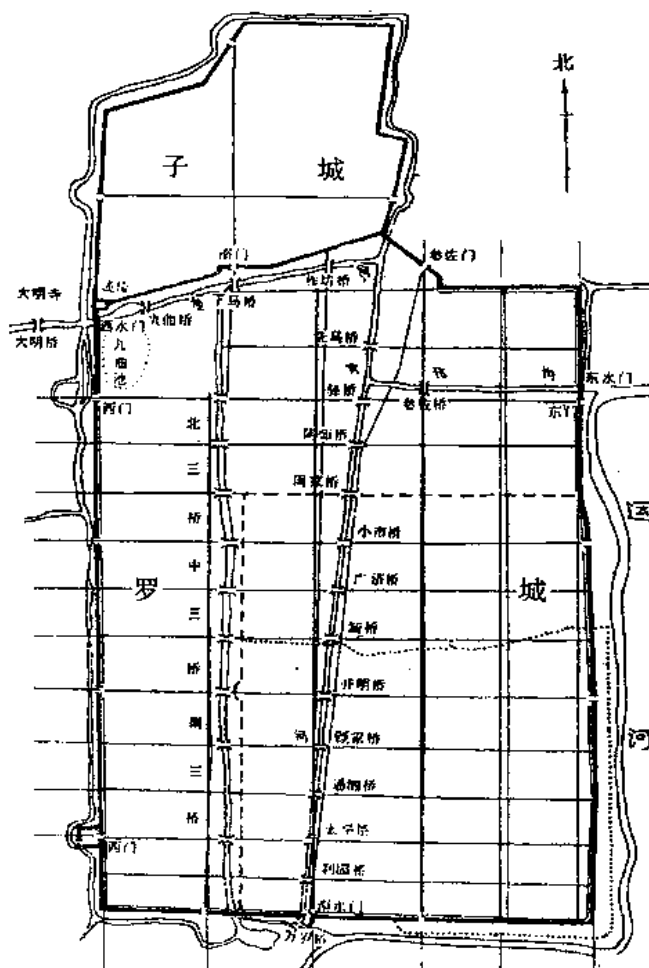


图 9-11 唐扬州城平面分析图

(引自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下册: 5)

扬州本处水乡, 且南有长江, 其本身的地理特点是隋代选择在此开挖大运河的根据。隋、唐先后挖掘的城内、外运河, 连通长江、淮河等水系, 奠定了扬州城与之共进退的命运。(图 9-13) 当运河航运畅通时, 扬州城则兴盛, 当运河淤塞后, 扬州城也随之平淡下来, 且由于原有的丰厚经济基础, 其城市也不致没落, 当然天灾战祸所造成的除外。因此扬州城以其先天的选址和后天的运河之利, 发展成大型工商业城市, 是正确的选择, 也是必然的方向。〔1〕

〔1〕有关扬州城的资料参考自: 贺业钺, 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524-533; 董鉴泓主编, 中国城市建设史,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47-48; 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上册,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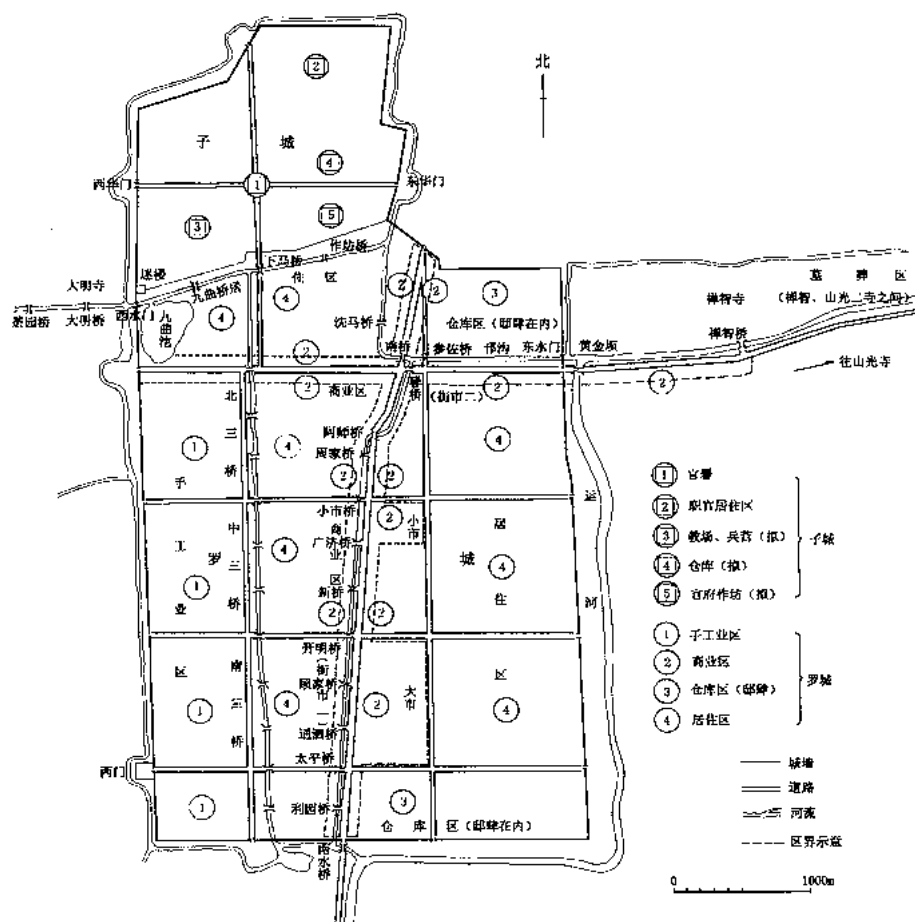


图 9-12 唐代扬州城市总体规划结构示意图

(摹自贺业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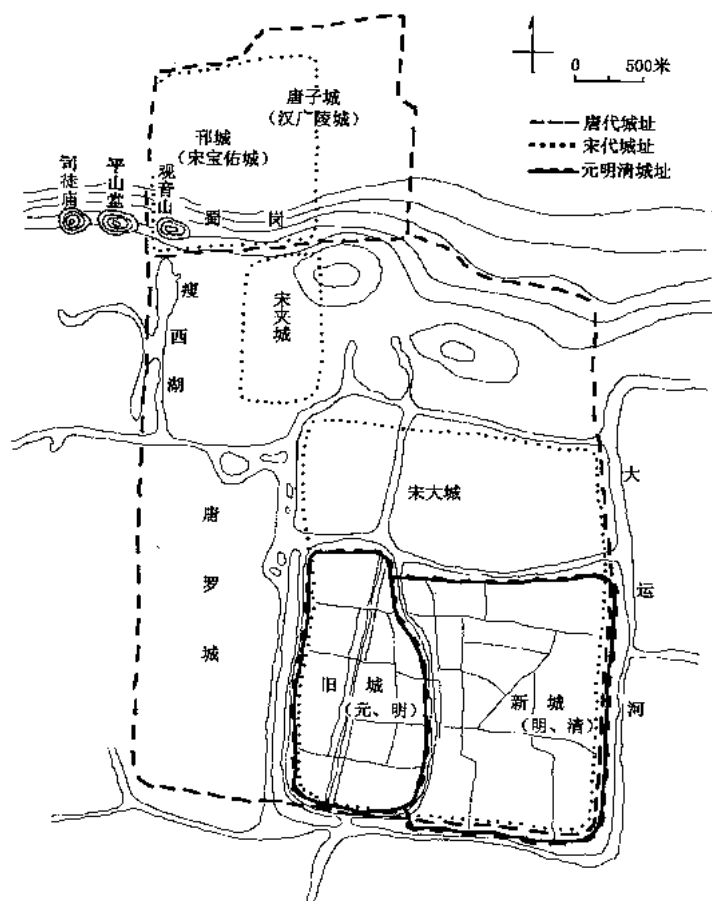


图 9-13 扬州历代城市变迁图

（摹自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49）

第五节 明清赣州

汉高祖时设赣县；西晋置南康郡，治赣县；东晋时筑城于章贡二水间，为郡治、县治所在；隋改郡为虔州，仍治于此；唐宋因之；南宋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治于此；元初城毁，后修复，此后各代均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缮、发展。（图 9-14）

赣州城东临贡水，西临章水，处于二水交汇入赣江的三角冲积扇地带，因而东、西两面的城墙沿江流方向砌筑，近二水交汇处的北城墙则只有短短的一小段。整个城的平面顺应地势形成近似的三角形，总体上很不规整，此为唐末即规划建设而成的所谓“龟形城”。龟头筑南门，龟尾在章、贡二水合流处，临水的东、西二门为龟足，因其形，减少了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由于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在军事防卫上得天独厚，加上历代对城池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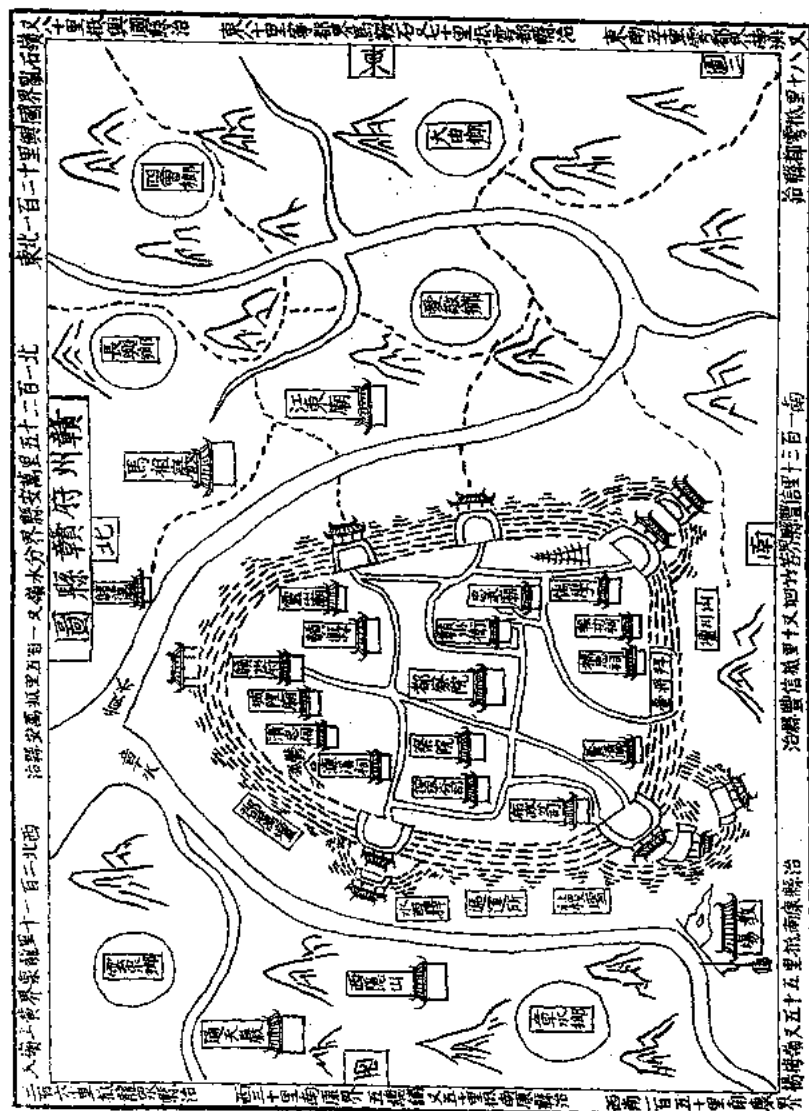


图 9-14 明代贛州府縣圖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45)

设,如改土城为砖、石城、创冶铁固基之举、不断加高加固城墙等,可谓固若金汤,有“铁轭”之称。^{〔1〕}

州治所在的子城偏于城市地势较高的西北部,商业区及居民区多在城东南,并出现了各种专业性行业的街市,城西有部分为居住区,城南为城防区。码头与仓库均分布在章、贡二水沿岸,以城东为主。城内道路多不规则,有顺应城墙走向的,有沿地势伸展的,有连接城门的,等等。(图 9-15)城中有较完善的排水系统,始设于宋代,名为福寿沟,其中寿沟引城北水入章水,福沟引城东南之水入贡水,经历代修整完善,使得该水利设施不仅一直被沿用下来,还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今仍是旧城区的主要排水干道。福寿沟还将城市原有的水塘都串通在一起,形成城内的完整水系,雨季时可调蓄水量、避免洪灾^{〔2〕}。(图 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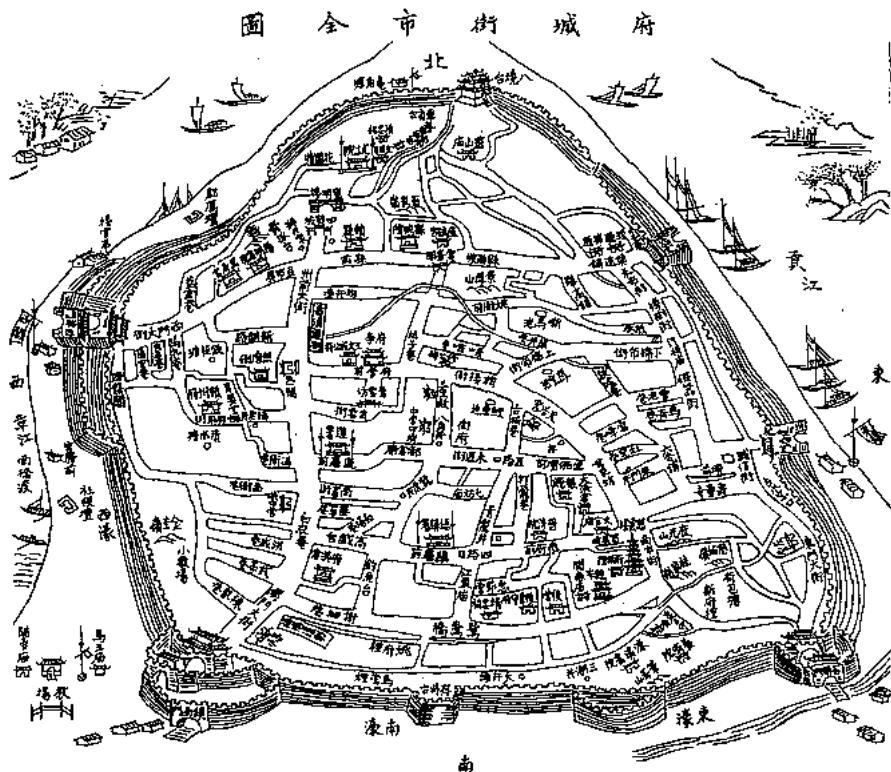


图 9-15 清代赣州府城街市全图

(引自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547)

〔1〕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50.

〔2〕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51.

圖 溝 壽 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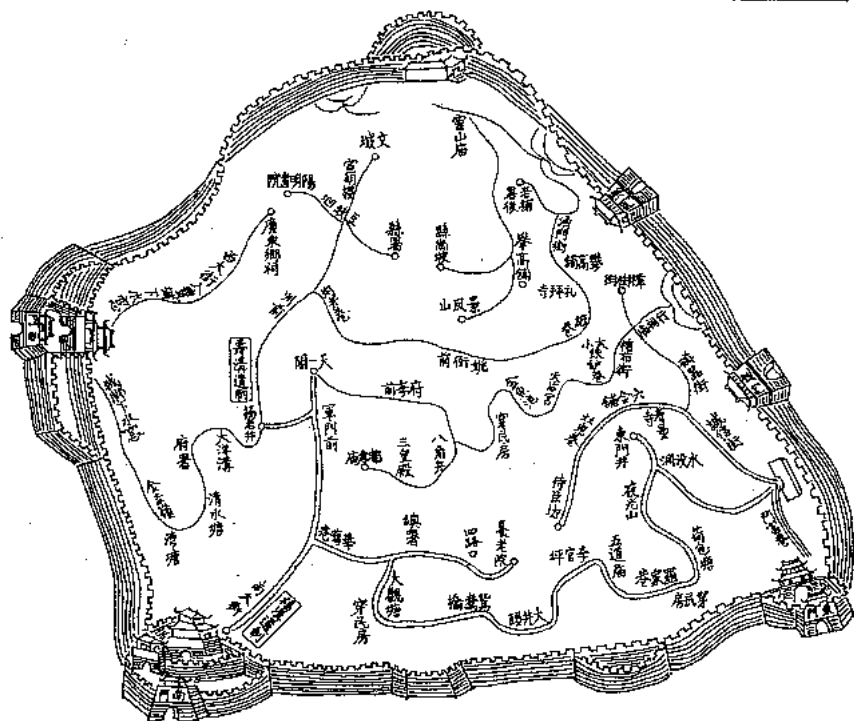


图 9-16 赣州城福寿沟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46)

该城在东晋时特意选址于章贡二水间, 其意在近水之便与城防之利, 从图 9-14 来看, 其周围环境由众多水系周濶环绕, 当也是为地势所限。于是在营建上选择了依水而筑, 化不利为有益, 并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摸索、总结适合自身的水利系统, 其城市思想体现了对适用性原则的重视。^{〔1〕}

通过以上几个城市实例的分析, 分别提炼出其中体现的《管子》城市思想, 及体现的方式, 是采用适用性原则还是可持续性发展策略, 抑或是二者皆有。从这样几个实例可以总结出, 只要是其城市思想在营建中以适用性原则及可持续性发展策略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的城市, 都可归结为《管子》类, 所不同的只是在体现《管子》类城市思想的程度与形式上有所差别, 或直接、或间接, 或系统、或零散, 或全面、或有侧重, 并具有时效性, 即同一城市处于不同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 同为《管子》城市思想中不同层面的内容, 其对城市的影响不同,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 即为遵循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 其结果则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1〕 贺业钺, 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517-522。有关赣州城的资料。

第十章 从地方志中看《管子》城市思想

中小城市与各朝都城的营建，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在于作为城市它们均是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中心。不同点是都城兼具着各种职能，而中小城市则可能只具有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职能；都城的建设以政治用途为着重点，中小城市的建设却可能更多地指向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拓展或军事防御的需要。地方志是研究其城市发展概况及历程最原始、最直接和最有价值的一手资料。本章选取一些府城及县城作为例子进行研究，以其各自地方志资料为蓝本，以表格列举城池的经营概况，通过引用、解读，将其进行总结，考察其中《管子》类城市思想的作用和反映等具体状况。从而在这些具有中小城市的共性也并不意味着自身个性的城市中，检验《管子》城市思想的先验性、实用性、适用性及普遍性。^{〔1〕}

第一节 汀州古城

汀州古城（今福建省长汀县城）位于福建西部，地处闽赣两省的边陲要冲，自唐至清，曾是州、郡、路、府的所在地，是闽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2〕}

一、建置沿革

参见表 10-1。

汀州之建置沿革

表 10-1

朝代	年 代	建置、所属	领 县
—	禹贡	属扬州城	—
周	职方	属七闽地	—
春秋	—	属闽越地	—

〔1〕本书在引用地方志原文时：无句读的按文意及笔者的理解加以标点，其中标点的使用参照《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模糊不清或空缺不明的字留缺“□”，漏字据上下文可知者补之，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简体无的除外），错别字或讳字则更正之，以《新华字典》（1979 年修订重排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依据。

〔2〕以下有关汀州古城的资料及数据参考、引自：长汀文史资料，各辑；〔清·乾隆〕汀州府志；〔清·光绪〕长汀县志；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6；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地方志丛刊，临汀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续表

朝代	年 代	建置、所属	领 县
秦	—	属闽中郡	—
西汉	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	属闽越国	—
东汉	—	属会稽南部都尉	—
孙吴	—	属建安郡	—
西晋	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	属晋安郡	郡领县八,其一曰新罗,即今汀州及龙岩地
南朝宋	泰始四年(公元 468)	改晋安为晋平	废新罗等三县,寻复故陈隶闽州
隋	—	改闽州为丰州,寻改为泉州,皆隶	—
唐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始置汀州	领县三,长汀、黄连、龙岩
	天宝元年(公元 742)	改临汀郡	改黄连为宁化,领县三
	乾元元年(公元 758)	复为汀州	—
	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	析龙岩属漳州,以建州之沙县来属。领县三,长汀、宁化、沙县
	乾宁间	隶威武军	—
后晋	开运二年(公元 945 年)	地入南唐	割沙县入剑州
北宋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隶威武军	—
	雍熙二年(公元 985)	隶福建路	—
	淳化五年(公元 994)	—	析长汀置上杭、武平。领县四
	元符二年(公元 1099)	—	析长汀、宁化置清流。领县五
	—	—	—
南宋	绍兴三年(公元 1133)	—	升长汀之莲城堡为县。领县六
元	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升为汀州路,隶福建行中书省,以后或隶江西行中书省	改莲城为连城
	至正十六年(公元 1356)	复隶福建	—
明	洪武元年(公元 1368)	改为汀州府,属福建布政使	—
	成化六年(公元 1470)	—	升清流之明溪镇为归化县,析将乐、沙县、宁化地益之。领县七
	成化十四年(公元 1478)	—	析上杭置永定。领县八
清	—	汀州府	附郭为长汀,外七县为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

二、山川形胜

汀州府地形地貌显示为东北部高，西南部低。(图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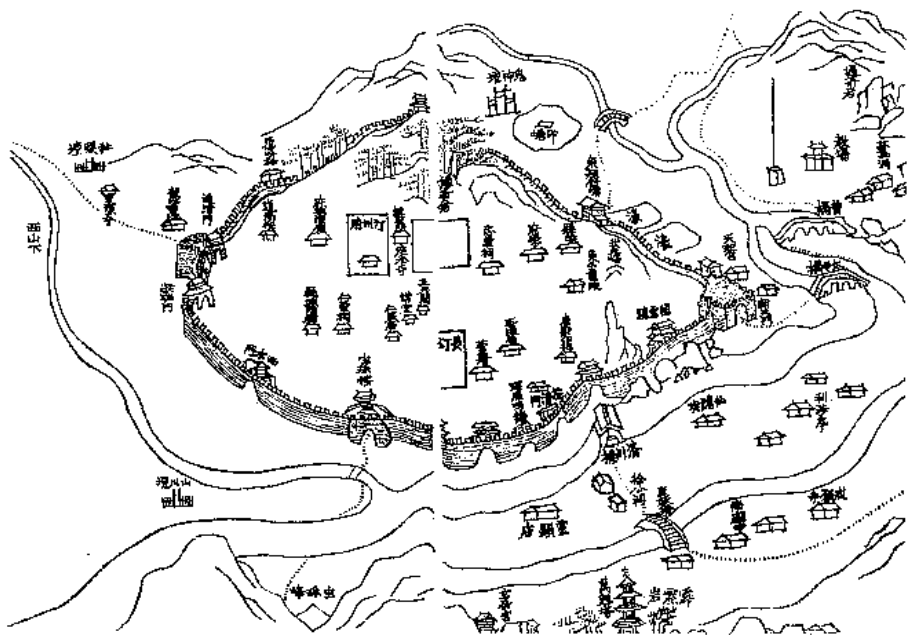


图 10-1 清汀州府图

(摹自〔乾隆〕汀州府志)

“汀独在万山中，水四弛而下，幽岩纤溪”〔1〕。

“水际平沙曰汀。闽越遐阴僻在一隅，凭山负海。今汀闽越西南，其地与赣、潮、梅接，崇山复岭，民生尚武。岛居者安鱼盐之利，山居者任耕织之劳。……南通交广，西达江右，实闽之奥壤也。……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山曰灵蛇、曰鸡笼、曰襄荷，水曰九龙、曰寅湖、曰鄞江。西邻赣吉，南接潮、梅，实江西、二广往来之冲。”〔2〕

在长汀县城周的山脉有卧龙山、东山、南山、拜相山、圆珠山等。离城稍远者至更远的有马鞍山、展旗山、莲花山、笔山、玉女山、赖溪障山、翠峰山、鸡笼山、靖峰障山、灵蛇山、七宝山、鹯峰、西峰、二老峰、佛祖峰等。

在县城周围的河、溪有鄞江（正溪）、东溪、梓步溪、小湘溪、西溪、南溪、北溪等。

三、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宋时该城的水系，东有汀江，西南有护城河，构成三面环水的交通和防卫水系，同时也是居民用水的主要水源。城内还有大井九处，多分布在子城

〔1〕〔清·乾隆〕汀州府志，卷之三，山川。

〔2〕〔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三十二。

内及其附近,说明这一带是人口聚居地。随着农副产品的增加及汀江水利交通的利用,汀州城的商业也发展起来。当时在水东街设县市、在城西秋成门外的兴仁坊设杉岭市。连济川桥(即水东桥)上,也是“列肆两旁”,日夕营业,一片繁荣景象。

汀江,别称鄞江。《汀州府志卷三·山川》云:“鄞江,在府东南,一名正溪,……按天下水皆东惟汀独南,南丁位也,郡名汀州取此。”《永乐大典》亦云:“旧国经云,水际平沙曰汀,又云,南丁位也,以水合丁于文为汀。”因南方属丁,故古名丁水,后名汀江。宋初汀江尚未通航,闽赣边境之货运全靠陆路,由广东运至闽西、赣南,运输线长而跋涉艰难。后组织人力、物力开辟汀江至韩江的航道。从此两江流域互通贸易不再是难事,成为方便之举,大大解决了民生问题。此乃有水之利。

汀州城“三面傍水”之势,如果在“下毋近水”方面把握不好,难免洪涝之灾。长汀历史上自然灾害最多最甚者,即首推水灾。据水文资料,春夏期受台风影响,水位流量季节变化较大,年最高水位和最大流量一般是出现在4~6月,最低水位和最低流量都出现在10月至次年3月。由于长汀山多而高,每年4~9月份雨季,当暴雨连降势必引发洪涝山崩,令民众损失惨重。按水灾出现年代分析,汀江每11~13年便有一次大、中洪水、每80~120年就有特大洪水发生,往往是年刚涝过,翌年或隔年又紧接着遭受一次。据文史资料显示,宋代水灾有记载的为5例,以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及十六年(公元1189年)受灾为最。元代水灾记载仅1例,但灾情严重。明代所载则有9次以上,其中有7次损失甚重。清代载有14例,其中8次大灾。此皆太过近水之弊。

长汀县下属的河田市,旧名柳村。早期之时此地林木成荫,土地肥沃,河道畅通,舟楫往来。然而长久以来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表面植被受损,造成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河床升高,故而时时水涨堤决,洪水泛滥,形成“田”与“河”相连的情形。河田之名即由此来。^{〔1〕}

长汀所处为山区,林木资源丰富,对林木进行保护有十分的必要。其民取用于斯,多意识到可持续保护山林的重要性,有“禁山石碑”为证。该碑立于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4月20日,正文曰:“立禁山、林、松、杉、竹木、春、冬两笋、薯、姜、芋、菜、果木、杂物等事。……庶几山中竹木得以森蔚,田中杂物得以收成,俾一乡之中风淳俗正矣。立禁是实。……禁盗伐松、杉、竹木、春、冬两笋、薯、姜、芋、菜、果木,一切公罚猪肉伍拾斤……。”长汀之民自发封山育林之实况,从中可见一斑,然官府此项所治之不得力、不尽心处亦可察见。(图10-2)

四、汀州城之经营

初建时的汀川城为土筑,其规模和形制已无遗址可考。当时汀州城的布局,以横贯东西的街道把城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地势较高,集中设置了州

〔1〕鲁逊. 长汀地名浅话. 长汀文史资料. 第五辑: 118.



图 10-2 清汀州府里至总图

(摹自[光绪]长汀县志)

署、开无寺等主要建筑。南城外的平旷地带是一般居民居住区，实际上该区在以后的发展中渐渐成为州城的一部分，到明代扩城时即完全与原城融为一体。这种南低北高的规划布局，适应了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的需要。在以后的扩建、改建中，州署的位置始终不变。汀州城初建时防御设施较简单，无子城、敌楼及护城河等。到大中初，刺史刘歧才增筑州署所在的子城，并创建罗城敌楼一百七十九间。

宋代的汀州，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的需要，进行了扩建和修筑。“宋治平三年守刘均拓而广之。周五里二百五十四步，高一丈八尺。浚三濠，深一丈五尺，西引南口溪水流东以绕之。辟门六，东曰济川，西曰秋成，南曰颁条、曰鄞江，东南曰通远，东北曰兴贤。”^{〔1〕}这是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其项目有：增筑扩建城墙；新开护城河，自西门外引南溪水入城，经西瑞门（小西门）、广储门（三元阁）、镇南门，流至丽春门（水东桥）汇入东溪，濠池宽度不一；开辟六门；修建子城。城市范围为东临汀江，西至西门，南至广储门，北至卧龙山顶。而后又曾几次增修。“绍兴间赣卒叛，守黄武增修。隆兴元年，守吴南老又增修敌楼五百一十五间。”^{〔2〕}与新开的三条护城河，共同形成防卫系统。宋时城市布局基本沿袭前代，分南北二段，州署及六个厅署设在北段，开元寺、定光寺、城隍庙、州学等主要建筑

〔1〕[清·乾隆]汀州府志，卷之五，城池。

〔2〕[清·乾隆]汀州府志，卷之五，城池。

也多集中在这里,还有三个厅署及预备仓、行用库等设在南段。城内有七条干道,把全城划分若干个区,分属于三个坊管理。此时城内人口十分稠密,居民区只好向城外发展。《永乐大典》载“临汀志”曰:“周麦才五里,市集居民多在关外,故城内坊才三,而城外余二十。”见于记载的坊名有二十四,其福善、登贤、崇福三坊在州城内,其余二十一坊都分布在县治周围方圆五里左右的地区。如此大范围的民居分布,一是由于摆脱了唐代那种封闭管理的里坊制度,一是由于城市繁荣发展而自然生成。

明清两代,汀州改为府,管辖八个县。汀江至潮汕航道,成为汀州府经济发展的命脉。明清时的汀州城,既是赣南、闽西商品货物的集散地,又是粤赣边界的军事重镇。此时的汀州城大为拓展,原来的南、北二段式变为南、北、中三段式,城区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城池所圈定的范围。因此,城市的总体规划也趋向于复杂化和多样化。(图 10-3)道路系统随城池的扩大有了增加和改变,有十七条大街和十六条小巷。城中的水系仍有汀江、西溪三面环抱,城内原来的城壕,扩城后变成水圳穿城流过,城区的水井增加到三十余处。明清时汀州城的市民比前更为稠密,居民区有二十坊,城外有左、右两厢。城区内临街设店,经营京果、布匹、油盐酱醋及农副产品等货物。汀江两岸除原来的水东街市外,又开辟了河边市、五通庙前市、店头街市等商业区。并设有惠吉门码头,供汀江航运货物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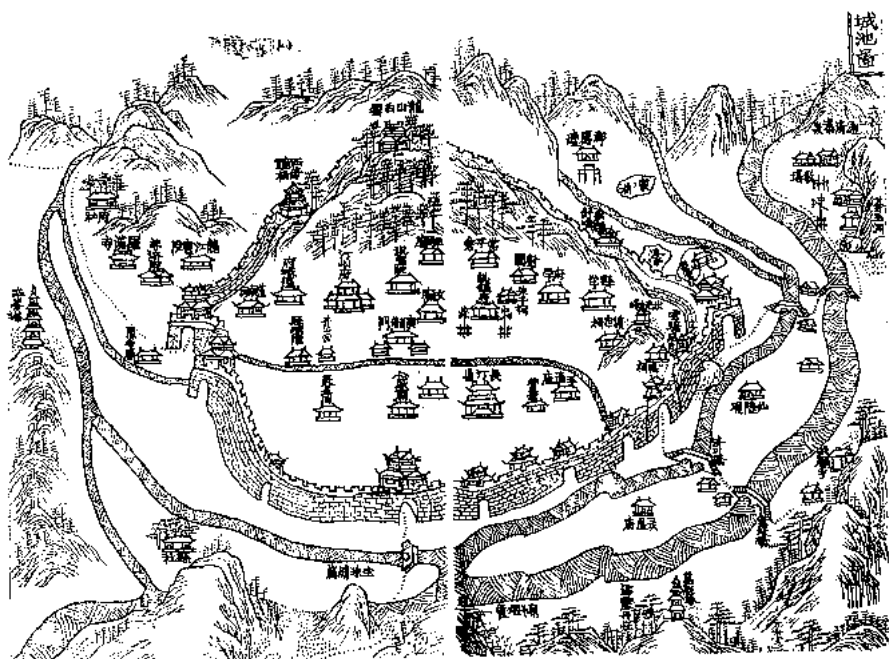


图 10-3 清汀州城池图
(摹自【光绪】长汀县志)

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火炮技术下的防守要求,明清时汀州城多次进行扩建和加固。“明洪武四年卫指挥同知王珪塞颁条门,改济川为丽春、秋成为通津、通远为镇南、鄞江为广储、兴贤为朝天,周城包以砖石,城北卧龙山巅创总铺一、窝铺八十一、女墙一千一百九十五、箭眼八百一十四。弘治己未卫指挥张韬建广储门楼,庚申丽春门楼。初知府吴文度以郡城内大半皆山,县治民居环列城外,议自通津门西去数百丈,逶迤而南,东迄济川一带,立城围之,以秩满“口”。嘉靖间知府杨世芳始因前议筑土为县城,列七门:曰会川,后改挹清;曰五通,后改环雁;曰惠吉,今改正笏;曰富有;曰常丰,后改宝珠;曰西瑞;曰通金,今塞。周六百一十九丈九尺,堞二千一百八十有奇。隆庆间知县陈金陶砖包砌,然垣甚卑薄,郡城镇南、广储二门横赘在县城。崇祯四年增修县城,自挹清门至通津门俱加崇阔,撤镇南、广储二门,盖合郡、县为一矣。八年增修东、西、北三面。十年筑宝珠门月城,增扩惠吉门。国朝康熙三十六年知府王廷抡重浚旧濠。”〔1〕

五、汀州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参见表 10-2。

汀州之城市思想		表 10-2
类 别	城市思想	特 点
山川形胜	水际平沙曰汀;在万山中,水四弛而下;被山带溪	因地制宜,靠山依水,注重经济发展
城市之经营	规模形制	
	城防	
	分区	
	行政组织	
	水系	
	生态保护	
	田制	地宜论

由于不清楚原城址的概况,唐初迁城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然究其大致原由,不外乎风水不佳,也即所在环境是不适合生产与生活的。“年谷不登”指的就是五谷不丰,当是要么土地贫瘠,要么水源不足等所致。“民多疾疫”就是说在各种生活条件如通风、日照及水质等不良的情况下,由于汀

〔1〕〔清·乾隆〕汀州府志。卷之五。城池。

州城处于山区，完全可能引起例如瘴气的祸害。民生受到困扰，自然“鼓角声堙郁不畅”了。《管子》曰：“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务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列的是几个容易使国家贫穷的问题，国贫则民困，放之于国以下的地方州县，同样会使其产生负面效应。因而无山泽以防火、沟渠不通致水灾、种植五谷没有因地制宜、六畜不养、瓜果菜蔬不齐、追求繁文缛饰，同样也可能有碍于一个城市的正常发展。（图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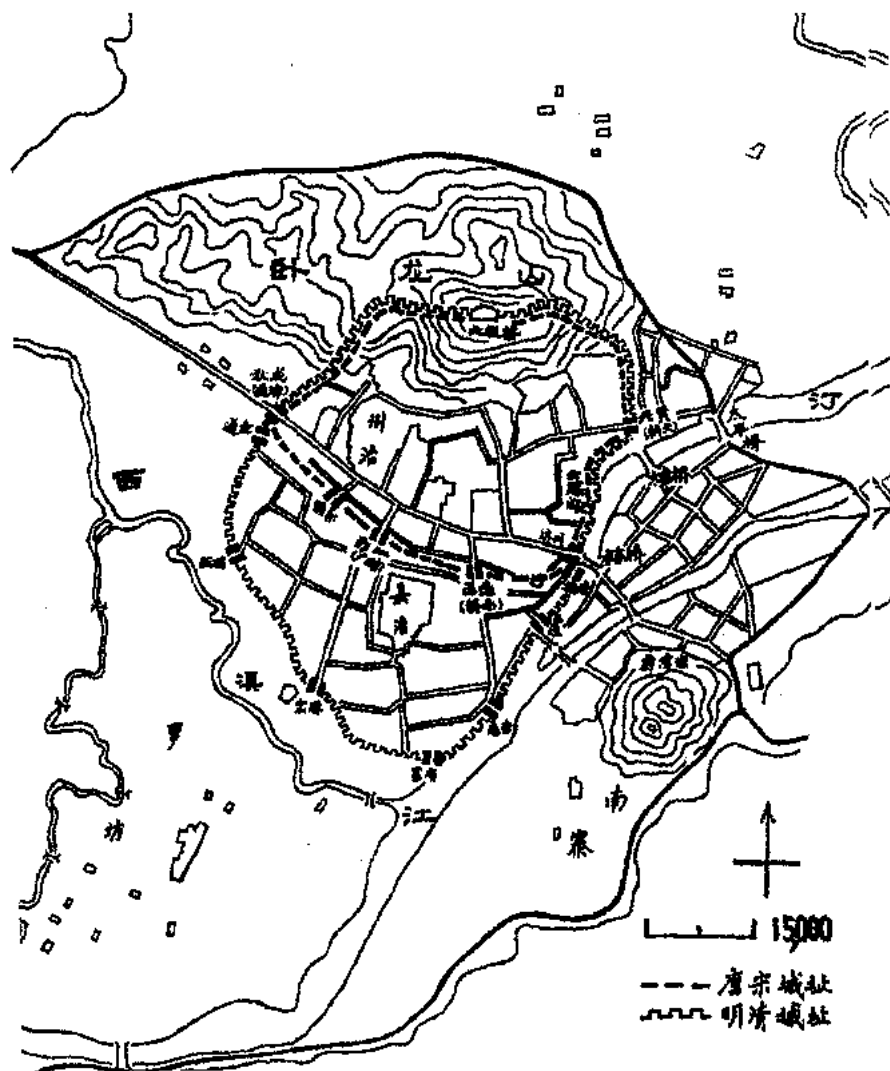


图 10-4 汀州历代城址变迁图

（引自汤家庆，古代汀州城的变迁，长汀文史资料，第 10 辑：49）

“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1〕，唐刺史陈剑之迁城改筑含有此中因素。而且从《汀州府志》中汀州城的平面图来看，对“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2〕这几句富有实践意义的筑城要诀也有所遵循。

第二节 广州府城及县城

广州之为古都，乃因曾有“三朝十帝”建都广州。秦末汉初，秦将赵佗在番禺建“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共传5主，历时93年。五代十国时期，清海军节度使刘龔称帝广州，为“南汉国”，历四帝共55年。明末清初，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桹的八世孙朱聿在广州称帝，史称“南明”，在位仅40天。都城的建设大力推动了广州城区的发展，使得广州从秦汉时期开始，就不断有北方人口大规模南移，汉越杂处，加强城市建设，加上海外贸易，广州实际上已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以及有名的港口城市。〔3〕（图10-5、图10-6）

“（广州府城）城市本身，包括城墙内外的各部分，范围并不很大，尽管人口众多，但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管辖着广大的地区和拥有对外贸易。”〔4〕广州由秦汉起至明清两千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到唐朝时，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其航程从广州起，经南海、印度洋，直驶巴士拉港，到达东非赤道以南海岸，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到唐宋时期，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唐时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市舶使，宋以后为市舶司；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曾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5〕

一、建置沿革

参见表10-3。

二、府城形胜

“广地负山阻水，滨际海隅。”“地总百越，山连五岭。夷夏奥区，仙灵窟宅。”〔6〕“包山带海。连山隔阴，巨海敌其阳；五岭恃其北，大海环其东；

〔1〕管子·乘马。

〔2〕管子·乘马。

〔3〕以下有关广州府城及县城的资料均参考自：〔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4〕〔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50。

〔5〕曾昭璇等，论中国古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地理论丛，2003，2：66-77。

〔6〕〔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九，舆地略一，形胜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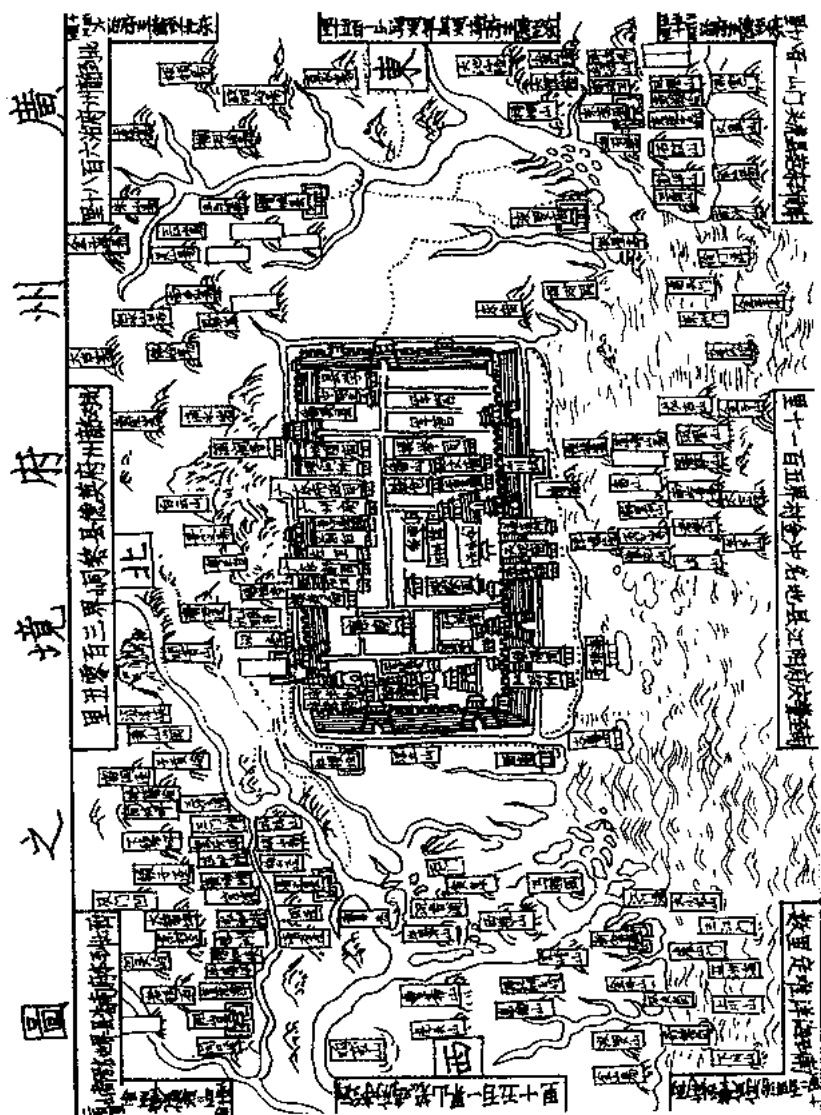


图 10-5 《永乐大典》“广州府境之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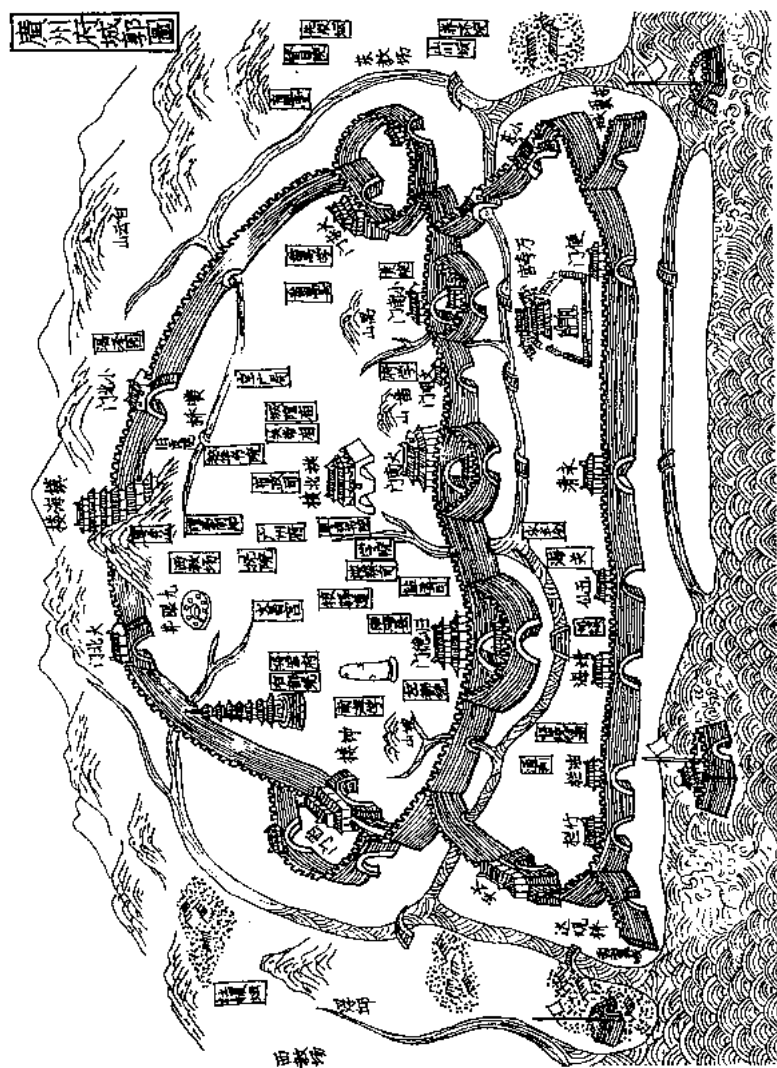


图 10-6 清广州府城廓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0)

广州府沿革表(1)(2)(3)

表 10-3

朝代	所属郡、路或府	置、废年代	领 县	备 注
春秋战国	百越地	—	—	尚无行政建置
秦	南海郡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不详	所领不可具考
西汉	南海郡	汉初为南越国;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复置郡	番禺、博罗、中宿、四会、龙川、揭阳	—
东汉	交州南海郡	建安八年(公元 203 年)升交州刺史为交州牧;十五年(公元 210 年)治番禺县;十八年(公元 213 年)复古九州,废交州以郡属荆州;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交州州治由广信东迁于番禺	番禺、博罗、中宿、四会、增城、龙川、揭阳	后汉末移交州治于此
吴 西晋	广州南海郡	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立广州,实行交广分治;寻废;至永安七年(公元 264 年),交广再次分治,治番禺,此后成为定制	番禺、四会、增城、博罗、平夷、龙川	—
东晋	广州南海郡	成帝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分南海郡立东官郡;恭帝元熙二年(公元 420 年)分南海郡立新会郡	番禺、增城、怀化、西平、龙川、高要	—
宋	广州刺史南海太守	明帝分交、广二州地置越州,治临漳	番禺男相、熙安子相、增城令、怀化令、绥宁男相、博罗、西平、龙川	—
齐	广州南海郡	—	番禺、熙安、增城、怀化、绥宁、博罗、龙川、西平、新丰、罗阳、高要、安远、河源	—
梁	广州南海郡	并置都督府	番禺、博罗、新丰、龙川、安远、河源	—
陈	广州南海郡	并置都督府	番禺、博罗、新丰、龙川、安远、河源	—
隋	南海郡	置总管府;开皇初废郡,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改番州;大业初复曰南海郡	南海、增城、宝安、清远、政宾、新会、义宁、化蒙、怀集、浈江、曲江、始兴、翁源、乐昌四会	—

(1) [清·光绪五年] 广州府志, 卷六, 沿革表一, 广州府沿革表, 广州府沿革考。

(2) [南宋] 王象之, 舆地纪胜, 卷第八十九, 广州, 州沿革。

(3) 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4-50。

续表

朝代	所属郡、路或府	置、废年代	领 县	备 注
唐	广州南海郡	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置广州总管府,设岭南五府经略使;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改为岭南道广州大都督府;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改为岭南道中都督府;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州为郡,复南海郡;至德元年(公元 756 年)升岭南五府经略使为岭南五府节度使;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广州;咸通三年(公元 862 年)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广州隶东道;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赐号清海军节度	南海、番禺、增城、东莞、清远、新会、义宁、四会、化蒙、怀集、浈江、潯水、浈阳	自此岭南分东西两部分
南汉	兴王府	高祖乾亨元年(公元 917 年)改广州为兴王府	咸宁、常康、番禺、增城、东莞、清远、新会、义宁、四会、化蒙、怀集、潯水、浈江	南海分为咸宁、常康二县
宋	广州南海郡清海军节度	北宋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为广南东路治;大观元年(公元 1107 年)升帅府;南宋绍兴元年(公元 1278 年)升翔龙府	南海、番禺、增城、清远、东莞、新会、怀集、信安	南渡后增香山一县
元	广东道广州路	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改广东道兼置海北广东道,治广州路;三十年(公元 1293 年)升为广州上路	南海、番禺、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	—
明	广东行中书省广州府	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改广东行中书省广州府;四年(公元 1371 年)置广东都卫;八年(公元 1375 年)改为广东都指挥使司;弘治九年(公元 1496 年)为广东承宣布政使司治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新会、新宁、从化、清远、阳山、连山	—
清	广东行省广肇罗道广州府	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设广东行省,省下广肇罗道,道下广州府;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广州府隶于南韶连道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清远、新安、花县	—

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1〕(图 10-7)

“广州背靠山地丘陵,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根据山地丘陵距离广州的远近及其海拔高度,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五岭山地,由东到西环拱于广州北面,海拔高度 1400 米左右。二为中山低地,错杂分布在广州东

〔1〕 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7.

北部地区的盆地、谷地和平原间,海拔在400米以下,由白云山及其余脉越秀山以及瘦狗岭组成。三为岗、台地,主要分布在广州北郊的从化、增城及市区的白云、天河、黄埔等区,相对高度在80米以下,坡度小于15度,为缓坡低平地地形。〔1〕



图 10-7 最早广州府舆图

(引自广州历史地图精粹)

“(广州)城市周围近郊的景色是丰富多姿的,但并没有什么雄伟壮丽之处。城北和东北的郊外,多为丘陵和山地。其余几个方向,视野都很开阔。河流和运河很多,河里盛产鱼类,河面上有种类繁多的船艇,不断来往于邻近的城镇和乡村。城市南边,极目所及,相当一部分为江水所淹,可能占整个平面的三分之一。平地上到处是稻田和园圃,这里或那里偶尔有一些小山包或小树丛突起,使本来完整无缺的平面更显得错落有致。”〔2〕(图 10-8)

三、各城之经营

(一) 府城之经营(图 10-9)

“府城,南海与番禺分境而治。旧有三城。(后汉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陟以越城久圯,乃扩番山之北为番禺城,二十二年迁州治于此。唐天祐末靖海节度使刘隐以南城尚隘,凿平禺山以益之。宋庆历四年经略使魏瓘加筑子城,周环五里。熙宁初,经略使吕简重修东城,转运使王靖成之,共袤四

〔1〕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8.

〔2〕〔瑞典〕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注.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49-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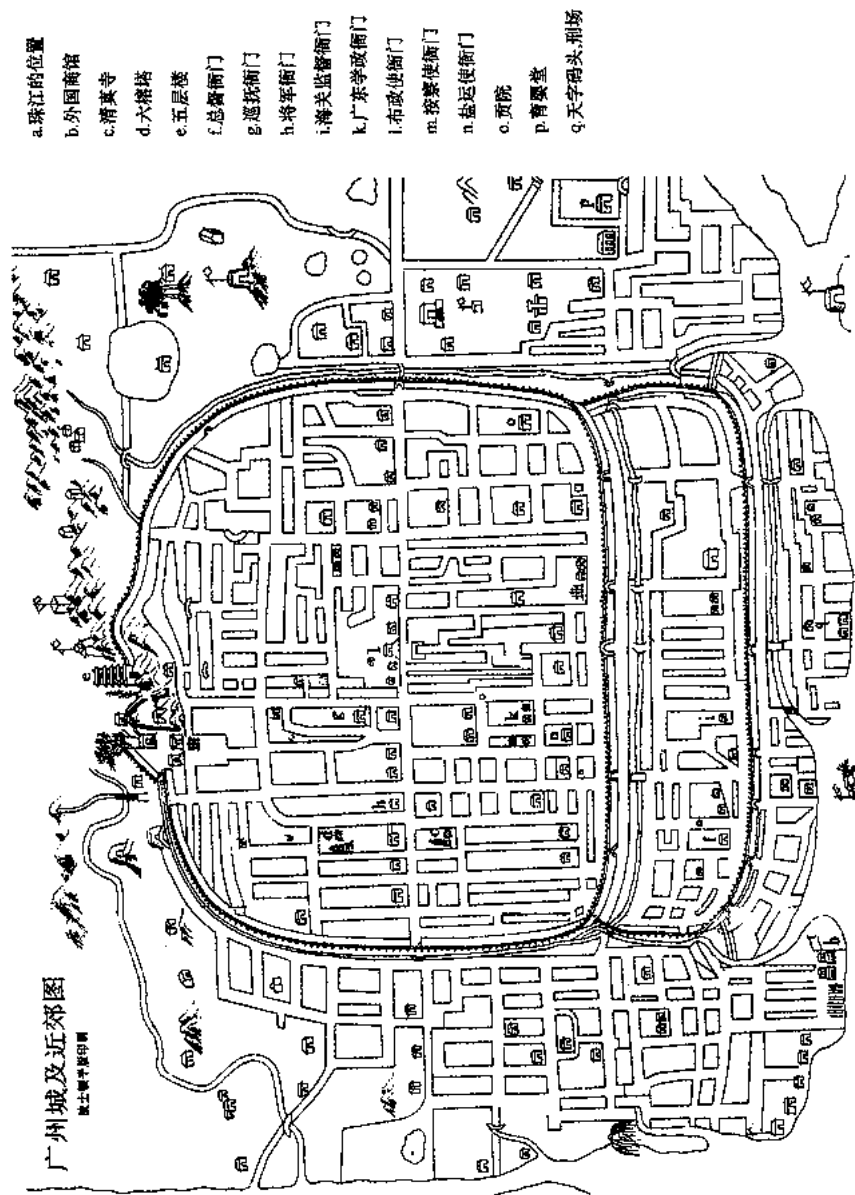


图 10-8 清末广州城及近郊图
(引自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里。熙宁四年经略使程师孟筑西城，其周十有三里。绍兴二十二年，经略使方滋修三城，三城之名始此。）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粤王台山包入十之九。今称内城谓之旧城，又谓之老城。周二十一里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七，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南、稍东曰定海、西曰归德。城楼敌楼七，警铺九十七。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惟北一面枕粤秀山，乃于正北门外筑瓮城以蔽之。于东北城下置小水关，防以石柱，以疏城渠之水。复于山左建五层楼，名曰镇海。成化二年，总督左副都御史韩雍筑南城归德二门月城，各延三十八丈。弘治十六年三司以东西月城渐颓，请于巡抚都御史潘蕃，命广州府知府袁熾指挥韩雄协同修之，增高七尺。（正德宝录：城垣周围二千七百一十丈，高三丈有五，镇海楼一，角楼四，城楼九座，窝铺七十七间，雉堞二千二百七十有九，为门七，曰正南、曰定海、曰正东、曰大北、曰小北、曰正西、曰归德，门内之左右为兵马司者一十有四，其西北至东皆距濠堙，长二千五百五十六丈，濠之西、东则各疏水关一处。按此因修之后与初制微异。）嘉靖十三年增筑定海门月城。万历二十七年于正南门迤东辟门一曰文明，国朝顺治七年闭，康熙八年复开，十三年因滇逆吴三桂变警复开，二十五年巡抚李士桢以郡学当门文明宜启，复开，道光三年总督阮元巡抚陈中孚拨司库闲款兴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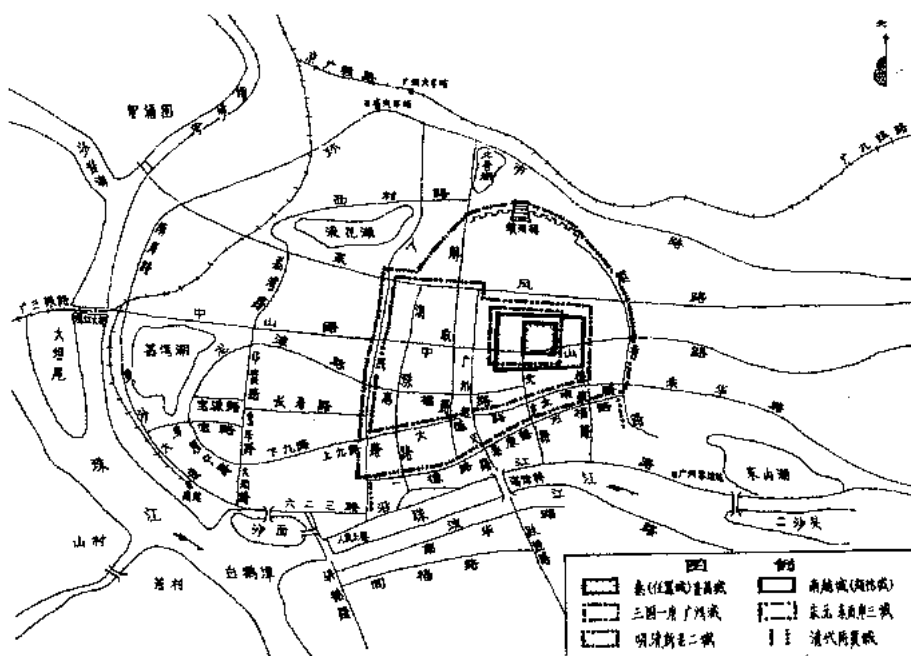


图 10-9 广州古代城址变迁示意图

(引自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外城今谓之新城，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总督都御史吴桂芳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八，其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永清，东南曰小南，今名永兴，西南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栏。（何彦总督吴公筑省外城序略：广贼东南滨海，黄木之湾、扶胥之口，接于海门，通及岛夷。海孽一作，巨舰扬帆直指会城，且城以外民廛稠聚、海舶鳞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群贼每窥伺垂涎。逐年如黄许诸贼屯据海口，去会城尚远，而群情汹汹，内外戒严，外城不可不筑，斯其明验也。先是倭奴自闽入寇潮境，圣天子厪南顾之忧，乃简命自潮吴公总督二广公至，移镇惠阳以次擒灭。未几柘林叛卒勾结白石贼党劫掠河下，虽不敢逼近内城，而拥众连粤肆焉。无忌公乃回镇省下设策调兵，逾月而叛卒贼党首恶悉擒。公出镇海楼周览城郭，叹曰濒海一带无垣壁可恃，思患预防城守为重，外城不可不筑。遂檄藩臬诸司疏闻报可，乃以事事复浚，永安桥诸濠水环抱以入于江。）国朝顺治四年冬总督佟养甲筑东西二翼城。各长二十余丈直至河旁，高二丈，厚一丈五尺。各为门一，其东南曰正东，其西南曰安澜。康熙九年垛墙炮台、马路共颓三百余丈，平南王尚可喜修复。是年水，五仙门复倾一十余丈，知县陈万言、高去修修葺。十一年归德门城颓三十余丈，知县桂冲云、王之麟修复。二十五年巡抚李士桢倡捐修葺。乾隆八年、十二年、十六年、十七年、嘉庆五年、十二年俱题准部覆动项修葺。咸丰六年洋人寇五仙门，城塌，同治二年总督劳崇光劝捐，并内城各城楼同时修葺。”〔1〕

“六脉渠在老城内。古渠有六。自草行头至大市，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一也。自净慧寺街至观音巷擢甲里新店街合同场番塔街，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二也。自光孝街至诗书街，通仁王寺前大古渠水出南濠，三也。自大钩市至盐仓街及小市至盐步门通大古渠，四也。自按察司至清风桥水出桥下，五也。自子城城内出府学前泮池，六也。六脉通而内城无水患。此古渠之说也。明东莞谭清海建议谓：西一脉水绕坡山由南濠尾穿西关而出；东一脉水绕军局万里桥合贡院前水（明贡院在粤秀山东麓）由天关而出；小南一脉水绕荷塘背由文溪桥至府学前渠而出；正北一脉水绕兰湖由贤关里穿城脚而出；正南一脉水绕清风桥龙藏寺仙湖街而出；小北一脉水自白云来由小北门合万里桥水循天关而出。此明六渠之说也。”〔2〕（图 10-10、图 10-11）

（二）各县城之经营（图 10-12）

参见表 10-4。

〔1〕〔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六十四，建置略一，城池。加着重号的文字为本书作者根据上下文之意所加。

〔2〕〔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六十四，建置略一，城池。



图 10-10 清“重浚广东省城六脉渠碑”局部

(引自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102)

四、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19 世纪近中叶，有美国新教来华传教士、《中国丛报》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裨治文，对当时广州城的包括地理形势、历史、城市、政府和军队等在内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和介绍。其内容构成了《早期澳门史》一书的补篇——《广州城概述》的主要部分。姑且不论其主观评论的正确性，其中对城市中各方面的客观描述就应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与价值，那是一种与国人的著述完全不同的笔法与表达，对现在的人去了解当时的城市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并可辅以印证、对比《广州府志》中的记述。

“聚集到这里的不少游客和货物，是经由濠渠，或者叫做‘濠涌’，运进城里来的。濠渠有好几条，其中最大的一条流经整个东城墙，还有一条在城的西边。这两条濠渠之间，另有一条与它们相接。这条濠渠在新城的城墙北边不远，沿着城墙的走向；^{〔1〕}所以船只可以从西边驶进来，横穿整座城市，从东边出去；反过来也一样。东郊和西郊还有其他濠渠；南郊也有一条。有许许多多更小的溪流注入到这些较大的水道，中国人把这些水流称为

〔1〕 此处原书校注：这三条濠渠即东濠、西濠和玉带濠。

‘城市的脉络’。还有几个水库，但都不大。居民用水很大部分是取自珠江和各条濠渠。水井很常见，雨水也被利用。泡茶等等所用的纯净清洁的水则大量取自几处泉眼。这些泉眼在城北一带，城墙内外都有。濠渠上架着几座桥，有些是石头造的。”〔1〕水利之设，若维护得当，虽历经百年仍可供河运、生活之用。据以上描述日常的使用，即可知其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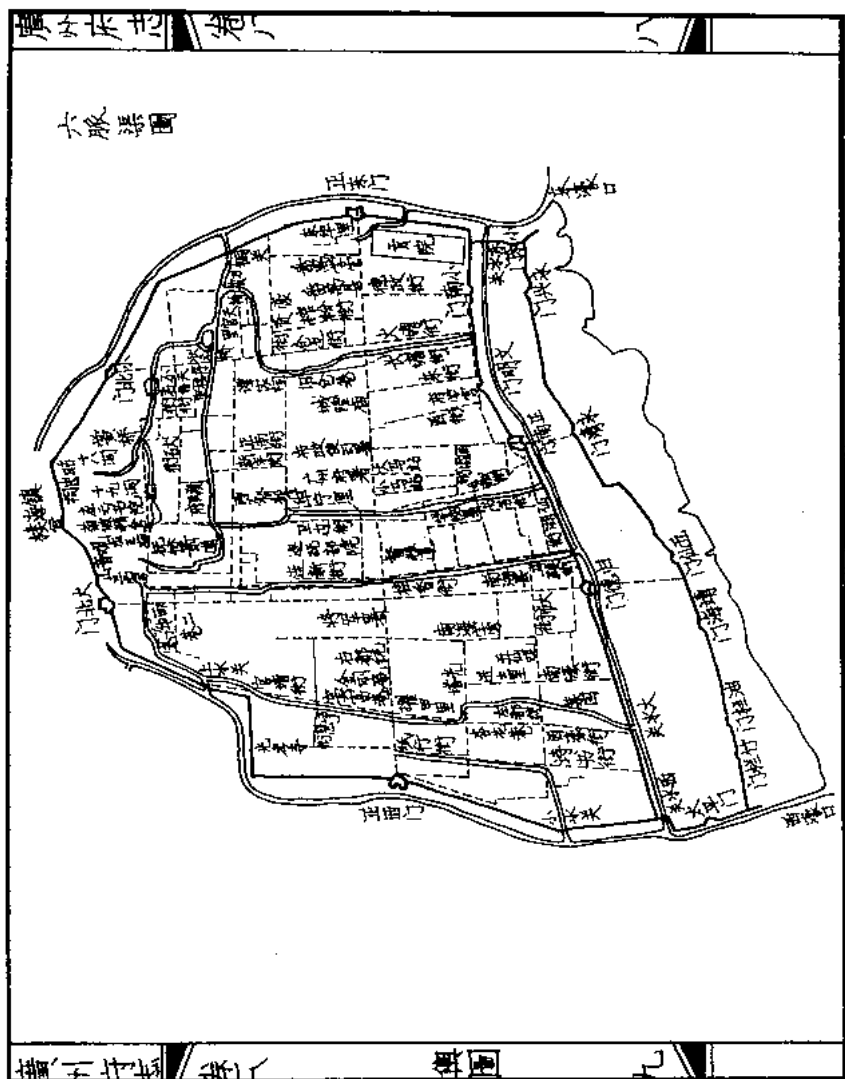


图 10-11 光绪广州府志六脉渠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3)

〔1〕〔瑞典〕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注,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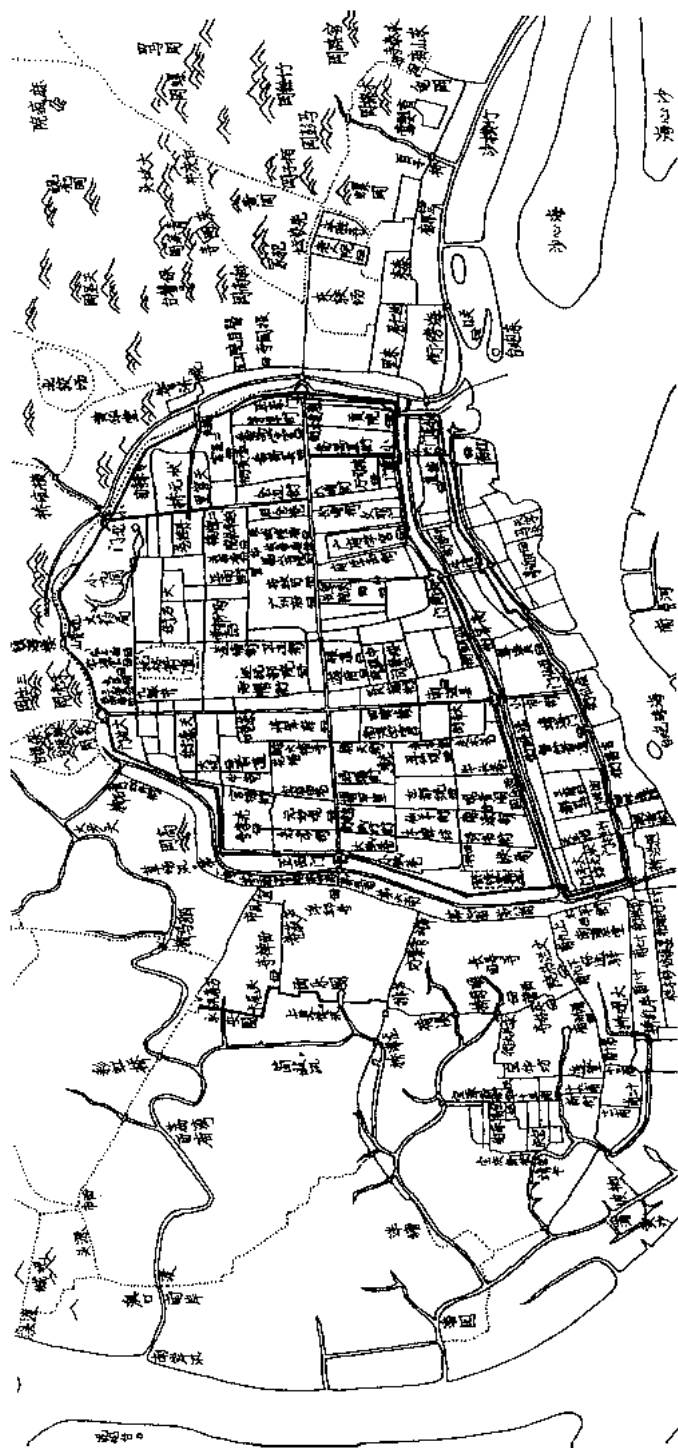


图 10-12 广州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务研究, 393)

广州府各县城的营建^{〔1〕}

表 10-4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鉴
南海	—	—	分治府城西境
番禺	—	—	分治府城东境
顺德	明	景泰三年(公元 1452 年)	竖栅为城
		景泰五年(公元 1454 年)	始垣之,作头门、二门、厅堂、两廊,造儒学、文庙、城隍庙、山川、社稷、邑历各坛
		天顺八年(公元 1464 年)	筑土城,因规模草创、体具未周,故新增置丽谯楼、戒石亭学舍,甃城垣、标题文饰
		成化元年(公元 1465 年)	易以砖石,周六百五十五丈,高一丈五尺,雉堞二千四百五十,城楼四,敌楼四,警楼三十,门四
		隆庆五年(公元 1571 年)	作石城,视旧高七尺
	清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 1714 年)	捐修东、南、北三面城楼及窝铺
		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	捐修雉堞、窝铺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 1848 年)	重葺三面城楼;濠池引碧监海自南绕东至城北达于海,周千七百二十丈,广三丈,深一丈;城西跨金榜山无濠;北设水关濠城,内河绕至凤山书院前止,长八十一丈,广一丈五尺
东莞	明	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	在旧砖城基础上筑新城,甃石为之,高二丈五尺,周二千二百九十九丈,旱门四,水门一,水关二,敌楼四,警铺四十,雉堞二千三十一
		天顺间	增筑谯楼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 年)	增筑月城
		崇祯三年(公元 1630 年)	大水毁城百余丈,重修
		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	增修城楼,易北水关木梁以石
	清	雍正三年(公元 1725 年)	城圯,重修,工未竣;雍正六年继成之;乾隆三年、八年俱题准部覆动项修葺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	飓风毁四门城楼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 1790 年)	修西门城楼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	修东南北三门城楼;浚到涌及西北二濠
		嘉庆六年(公元 1801 年)	飓风,倒塌东西南三城楼并左右炮台、周围城墙百余处
		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	小修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 1816 年)	修复东南北四城楼并各处城垣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 1818 年)	修复东北角城垣一段
		同治三年(公元 1864 年)	五月初连日大雨,东江涨,北城倒塌二十余丈,修复
		同治十二年(公元 1873 年)	重修水关二,一在城东,一在城北

〔1〕[清·光绪五年] 广州府志。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新安	明	洪武间	设东莞守御所于此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394 年)	始开筑城池,周五百七十八丈五尺,高二丈,门四,城楼、敌楼各四,警铺二十五,雉堞一千二百,水关二,一在东南隅,一在西南隅
		隆庆六年(公元 1572 年)	建县,其城池因之
		万历年(公元 1573 年)	谓北门当县治之背,地脉不宜疏泄,塞之,止通东西南三门
		万历五年(公元 1577 年)	增建三门,子城城楼三,敌楼四,甃以砖石,增置窝铺
		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	增高城垣五尺,浚广旧濠,阔二丈,深一丈五尺,长五百九十二丈
	清	康熙十年(公元 1671 年)	飓风,倾塌城楼、雉堞、窝铺,捐修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	重修
		嘉庆十六年(公元 1811 年)	飓风,复塌东楼城墙,修葺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 1817 年)	捐修
从化	明	弘治间	自番禺横潭迁于流溪都,无濠池
		弘治三年(公元 1490 年)	析治今县治横潭
		弘治七年(公元 1494 年)	改治马场
		弘治十一年(公元 1498 年)	甃以砖石;门四,警铺十六,雉堞九百二十
		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	重修
		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	改雉堞为平顶
		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	复旧堞
	清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1689 年)	重修
龙门	明	弘治九年(公元 1496 年)	始筑,寻圯
		弘治十六年(公元 1503 年)	缮治;周四百九十二丈,高一丈二尺,警铺十,城楼四,门四
		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	重修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	增高三尺,添警铺四
		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	增高二尺
	清	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	捐资重修
		康熙五年(公元 1666 年)	捐修东西北三门城楼,七星楼一,炮台七,警铺四,雉堞七十余,马道五十余丈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	重修,更城门名
新宁	明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 1848 年)	详报捐修城,南枕大溪,西北有小河,东西无水
		弘治十一年(公元 1498 年)	析新会置新宁县
		弘治十二年(公元 1499 年)	始以木为櫓
		正德间	改甃砖城,周五百三十丈,高一丈一尺,雉堞一千一百十二,外植竹为子城,东西南为三门,门各有楼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新宁	明	隆庆六年(公元 1572 年)	增高城四尺,增垛口九百六十有二,后并为四百八十,窝铺二十,东南角楼一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	飓风坏城堞,修
	清	顺治九年(公元 1652 年)	大雨,西城倾,修复
		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	修建东西南三门城楼;康熙十一年、四十五年重修,雍正二年、八年又修,十年大修;共计一百四十八丈七尺;乾隆五年题准部覆动项修葺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	筑城南门濠;周五百五十丈,广一丈;道光二十一年修
增城	东汉	建安六年(公元 201 年)	始建县城
	元	至正间	以县旧无城池始筑土城以备寇
	明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	开筑城池;城周围凡六百八十丈,高一丈三尺,东至于大河,西至溪水,南至新街,北至于县社,建四门及楼,警铺十有六;然垒薄堞卑,岁久渐坏
		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	筑砌
		成化五年(公元 1469 年)	因城垣卑薄弗称、难守,撤旧城,重用砖石甃砌;历十有八月而讫工;广长皆加于昔,广一丈三尺,周八百余丈;城楼、警铺之数如旧,城门楼四,敌楼四,警铺四十八,门四,雉堞一千六百;里城亦甃以石
		成化十八年(公元 1482 年)	以北门称要害,以城枕北山,地势受敌故,筑月城以护之;月城之外有板桥,岁久朽圯,因易以石;月城计长一十八丈五尺,高一丈九尺,桥阔一丈九尺,长三丈二尺,高半之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 年)	增甃加高
		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	筑马道以护城堞
		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	易雉堞为平顶一千二百一十;因东南临江仅一城,门无以蔽敌,遂于东西南三门,创月城建楼四门,逾三月而讫工;开浚北城外濠
		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	创立炮台
		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	易雉堞为尖顶,以便防守,又创窝铺六
	清	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十年(公元 1671 年)	各重修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	奉旨通行修城,乃并修四城窝铺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	复修
		雍正四年(公元 1726 年)	修西城垣;其东西径一里,南北径一时在,周三里有奇;其池自西北隅过西门桥,以至西城之角,东折南门桥,以至南城之角,属于江,于是濠水自北折而西而南,江水自北折而东而西,会流于增江口;乾隆十二年题准部覆动项修葺,十一年题准部覆续圯处所动项修葺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增城	清	嘉庆十四年(公元 1809 年)	修复西门月城
		咸丰七年(公元 1857 年)	捐修复四城楼,并修城垣、雉堞,废南门月城及东南城上炮台二座;池周围同城,广一丈二尺
香山	宋	初年	开设寨以土垣,号曰铁城
	明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	置守御千户所,广之,更为砖城;周六百三十六丈,高一丈七尺,雉堞三千六百四十,城门楼四,敌楼四,警铺十二,门四,各以其方名之
		弘治间	改辟正门直对县治
		弘治十三年(公元 1500 年)	增城四尺,增窝铺十一
	清	康熙十七年(公元 1678 年)	从众请改复南门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 1716 年)	改开正东门以接莲峰秀气
		乾隆十年(公元 1745 年)	捐浚南河
		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	捐修各城楼;西门以日者不利未修,西门原丙外异向
		嘉庆十五年(公元 1810 年)	捐疏东南、西南水关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 1816 年)	浚城壕及颍涌
		道光七年(公元 1827 年)	复通治水关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 1847 年)	从邑绅改开正门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 1848 年)	捐修城垣
		同治二年(公元年)	捐资疏通由濠达河
		同治三年(公元 1864 年)	复开旧西门;其池东南长五百四十七丈,北有长塘八十九丈,西枕武山
新会	元	—	始筑垣备寇之乱,邑破为墟;古无城
	明	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	置千户及城池,是年设都指挥立镇守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391 年)	始筑土城
		洪武三十年(公元 1397 年)	始甃以砖;西北跨西山,东跨马山;周五十里,凡一千六百六十八丈,高一丈九尺;门四,各有楼櫓,高一丈;东西角楼二,窝铺十三;外环以池,长一千六百八十丈,西南北为水门三;是为旧城
		天顺六年(公元 1462 年)	西寇焚掠郭外,筑土为子城;周一千六百八十八丈,高一丈二尺;外浚重濠,周二千一百二十五丈,深一丈五尺,阔二丈二尺;濠外又筑竹基,周二千五百八十七丈;基外为重堦,三千一百六十八丈,谓之辅城;明年寇至,卒莫敢犯;岁久倾圮
		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	修复子城,一如陶鲁之旧
		万历年元(公元 1573 年)	捐筑,上者至四十丈,下者五尺,又以寺田之价计亩之征及城中架梁助工;东接马山,西跨象山,延袤九百六十丈,高一丈八尺;大门三,便门四;敌楼八,炮台八,寨口一千四百四十五;水门三,小水门二。是为新城。新、旧两城周围计十里零一百五十七丈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案
新会	明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	因旧城北一带旷野脾脍低薄,乃东自马山西至旧城益以砖石,增高三丈,周围三百丈
		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	城塌,修
	清	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	内外城增高三丈
		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	增建炮台五,敌楼五
		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	疏浚内外河道;乾隆十六年咨准部覆动项修葺
		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	修葺
		咸丰四年(公元 1854 年)	是年之役,炮台毁,北门楼复遭飓风,坍塌;修濠池,周围同城
三水	明	嘉靖五年(公元 1526 年)	分南海、高要等地建三水县
		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	创建城垣,甃以砖石;高一丈五尺,周六百七十五丈;门四,而西门虽没不行;城楼四,敌楼十二;东西各有水关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 1608 年)	增高城堞三尺
		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	加土筑高城堞;闭熙阜门,开学前文明门
	清	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	又开复熙阜门与文明门并行
		康熙十年(公元 1671 年)	修熙阜、文明各楼;门五,窝铺十二;城北倚冈,三面皆临破田,南则肆江也;乾隆三年准部覆动项修葺。嘉庆四年准部覆动项修葺
清远	元	至正间	始筑土城
	明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	改筑砖城;周一千四百五十丈,高一丈九尺,门五,楼如之,敌楼五,水关二,警铺七十,雉堞四千四百,钓桥五
		天顺七年(公元 1463 年)	广西瑶贼陷城;拱石为门,甃砖瓦为城垣,西南隅地形之阴也,筑子城以便防守,东北隅往来之冲也,建楼于上以为观美;始事于成化庚寅冬十月,毕工于壬辰秋七月;而寇肆獯,率民兵分伍守之,越明年寇遁
		成化二年(公元 1466 年)	议城中自通津门水关起至正西门东北一带包土城,四百三十七丈,限之以便巡守;周围九百零八丈,高一丈八尺五寸;春夏苦雨水涨,土崩城必倾圮,环覆以屋
		成化六年(公元 1470 年)	甃砖包砌;建城楼四、角楼二、钟楼一、串楼、垛口各七百四十五,城下旁筑栏马墙
		成化甲午(公元 1474 年)	关城排栅朽,易以甃甃,延袤四百余丈
		嘉靖五年(公元 1526 年)	复修
	清	康熙十年(公元 1671 年)	捐修,历绅上呈称南门瓮城小楼不利风水请拆,改两边炮台各一,前立照墙,外为薰风亭,遂成一邑大观,并修大楼四千四方,西门瓮城小楼一,东南角钟楼一,西北角鼓楼一;其池东西濠各一千四百六十丈八尺,阔二丈,深一丈,南近大河无濠,城西三里为濠塔,以镇水口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鉴
花县	清	—	旧名平岭,为番禺慕德里巡司地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	设兵驻防,请立县治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	再请,始创筑城垣,周四百四十丈,高一丈四尺,厚一丈二尺,雉堞六百三十,窝铺十二,门四,东西北三面皆山,南无濠堑,城角内外各开马路,广一丈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 1787 年)	修
		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	重修,城脚用石砌,增厚二尺,高二尺,加八雉堞,添炮堞四,兵房四

“城墙部分用石、部分用砖砌成。石头主要是粗糙的沙岩,用来砌筑城墙的墙基、墙体的下部及城门的拱洞;砖是小块的砖,质地松软。在好几处地方,特别是沿东城一带,城墙被风雨侵蚀得很厉害;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勇武善战的现代敌人面前,这城墙的防御作用是不大的。墙体几乎是垂直地笔立,各处不一,从 25 至 35 或 40 英尺。厚度为 20 至 25 英尺。北边的城墙最高,最坚固;显然因为敌人最可能从这个方向发动攻击。整个城墙的顶部建雉堞,每隔几英尺的间距开着箭孔。中国人把雉堞叫做‘城人’。雉堞后边是宽阔的通路。城有两‘翼’,即两道短的城墙,一在城的东南角,一在西南角,由主城墙延伸而出。这两道城墙是用来封住城墙与城濠之间的狭窄地带的。两道短墙上各开着与城门一样的大门。”〔1〕

广州城的城门本身并无特别之处,只是以下的描述中对城门的各个说明颇有说明力,说明了各城门的位置、地位、功用、大小高矮及相互关系等概况,具有参考价值。“城门共有 16 座。其中四座是开在分隔新旧两城之间的城墙上,所以通往城外的城门只有 12 座。以下从北面开始,然后向西、向南、向东依次列出这些城门的名称:1、正北门:——这是北面的主要城门。门前有一个半圆形的空间,由和城墙一样的墙围绕。北门是政府官员或递送公文的信使从北京经陆路抵达时的入口。官员们也有不少时候会乘船来广州,那样的话,他们就从南边的一个城门进城。2、正西门:——这是从西边能入旧城的唯一城门。对于一座中国城市来说,这座城门很宽很高——可能有 15 英尺宽,12 英尺高! 3、太平门:——这是从西边进入新城的唯一城门。它与正西门相似,但没有那么大。4、竹栏门:——这是一座小城门。是转过城墙西南角后遇到的第一座城门。也是离外国商馆最近的一座城门。5、油栏门:——离竹栏门不远。和竹栏门一样,是为大量的商品运输而设计的。6、靖海门:——这座城门无论是位置还是名称,似乎都说明它应该是这座城的水门。7、五仙门:——意思是‘五个仙人的城门’。除了名称之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8、永清门:——这‘永远清静之门’四周并没有什么能

〔1〕〔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58.

说明这个名字的东西。却有很多东西能令人想到其反面。此外,它还是通往那血腥的场地——皇家刑场——的城门。9、小南门:——这座城门是南边的第六座,也是最后一座城门。10、永安门:——这座‘永远安宁之门’从东边通入新城;在各方面都与西面的太平门相对称。11、正东门:——这里从东边进入旧城的唯一城门。它与西面的正西门相对称,位置刚好与正西门相反。12、小北门:——这座门是向城内运送水和食品,以及建筑材料,供应北城之需的方便入口。13、归德门:——从西边数起,这是隔在新旧城之间城墙上的第一座城门。14、大南门:——这是第二座城门。15、文明门:——这是第三座。16、定海门:——这是第四座,亦即最后一座城门。”〔1〕

对于广州府城及所领各县城的城市思想参见表 10-5。

广州府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表 10-5

分 类		城市思想与特点
城址		府城:背山临水,“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北有五岭之固,近倚白云、越秀二山,南滨大海;西有石门之险,东有瘦狗岭之屏蔽,易守难攻”〔2〕;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其岗、台地所在即应为“二级阶地”〔3〕。各县城:有倚山依水的、有仅依山的、有仅临水的、离水近的防水成为要事
行政组织		城:坊、厢一甲;乡:乡一都一堡一约一村、图、图村;城乡之别,但是在城乡结合的附城已成为二者的过渡区域
城池营建		府城城墙与水关可御洪潮〔4〕;城池扩建、改建多由于政治面貌或军事防卫方面的需要,偶有因风水原因的;诸县城的兴建是起于军事要求
经济策略		墟市众多;对内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是主要发展方向
人口		从清初人口稀少发展到中期,人口呈数倍以致数十倍增加之势;城内容纳不下的居民则扩展到城周围,使得城墙内外的区别减少许多
防御设施	炮台	府城之东西南北四面俱设有数量不等的炮台;其余如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新宁、香山、新会各县俱设有炮台。《广州府志》记载各县城有众多的炮台,而《早期澳门史》则有相反的叙述,即在清朝末期炮台数量少而无用;或是在贼寇日少的情况下渐渐疏于防范,加上注意力转向经济的发展,水线已多为运输之用,故而炮台、城墙甚至军队都有退化的趋势;或是由于清末国力衰竭,遭洋人横加干涉拆毁之故
	海防	海环广东南界,倚为险固,攻守之计切于海;濒海的县城有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宁、香山、新会、新安;守御之方,防微为上,保甲之制——乡立一老自相管,摄十家为甲、百家为乡,出入互相觉知行检、互相纠察寇盗、互相守望;另有为军事防御而建的寨城、营城及所城
	江防	府各县患北江涨者清远、三水,患西江涨者南海、三水、顺德、新会,而南、顺二县为尤甚,故其囤基独多,东莞则东江为患,而其害较南、顺小矣;围、堤、基等防水设施

〔1〕〔瑞典〕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 章文欽校注.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258-260.

〔2〕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2.

〔3〕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8.

〔4〕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92.

续表

分 类	城市思想与特点
水利	府城:城周多浚濠作为防护,依山处则无;城内有六脉渠及多条濠涌;六脉渠与城濠共同组成城市排水系统,历代均重视疏浚渠濠,城西关因地势低洼且近珠江,沟渠常淤塞,为此专门成立清濠公所定期疏浚〔1〕。诸濠至清末其交通运输功用已大过其防护功能,当然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使然,但必须要有以下的基础支持才行:一是该城处在较高的“二级阶地”上,较少水患;二是诸渠与濠的完善,使得有效地疏通了水流。各县城:江防者防之于江,临江各县容易有水害;水利设施有水闸、陂、塘、围、涌、溪、坑、源、洲、港、墩、渚等

第三节 潮州府城及县城

一、历史沿革与建置〔2〕〔3〕

从考古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潮州一带已有原始人类活动。通过对当地贝丘遗址的勘察可知,当时生活于大海之滨的人类已主要从事渔猎等生产活动,原始农业也较发达,多个氏族在此定居并开始形成原始聚落。

夏:禹贡扬州之南裔。

商:属南越地。

周:属海阳;周末属百粤。

秦:为南海郡之揭阳县。

汉: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征南越,揭阳令史定归附,仍置揭阳县,属南海郡,统于交趾部刺史;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属交州;十八年(公元42年)属荆州。

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以南海郡属广州,后主时析置庐陵南部都尉,揭阳属焉,隶扬州。

两晋: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以庐陵郡置南康郡,揭阳为属县,隶属扬州;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置东官郡,析揭阳置海阳等四县以属;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又析东官置义安郡,增置义招县,共领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等五县,属广州。

南北朝:为南朝所有。宋延晋制,仍为义安郡,领五县;齐增程乡一县;梁普通四年以义安郡置东扬州,接着改为瀛州,后又析海宁县置龙溪县以属南安郡;陈永定中废瀛州,仍置义安郡。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义安郡,置潮州,潮州之名始于此;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改为义安郡,废绥安县,复置程乡县,改义招为万川,领海阳、程乡、潮阳、海宁、万川五县,后又废海宁县。

〔1〕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94-395.

〔2〕[清·乾隆]周硕勳纂修. 潮州府志. 潮州沿革表.

〔3〕[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 州沿革.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义安郡为潮州，废万川县并入海阳县，领县三；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属福建县略使；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改属岭南道；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潮阳郡，复隶福建；九年（公元750年）还隶岭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潮州；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属岭南东道。

五代：为南汉所有。以程乡置敬州，潮州止领二县。

宋：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改敬州为梅州，领程乡一县，潮州仍领二县；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属广南东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废梅州；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复置梅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析海阳置揭阳县。

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置潮州路；十九年（公元1282年）置梅州路，属广东道宣慰司，隶江西中书行省，领县延宋制；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降梅州为散州；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以梅州属潮州；至元中（约公元1337~1338年）复为梅州路。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潮州路为潮州府，改梅州路为程乡县，属岭东道，领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四县；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置饶平县；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置惠来县；五年（公元1526年）置大埔县；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置澄海县；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置平远县；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置普宁县；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置镇平县。潮州府共领十一县。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析程乡、平远、镇平三县属嘉应州，存八县；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增置丰顺县，共领九县。（图10-13）

二、府城山川形势

城北为金山，高四十丈，占地周长为四里，“形如覆釜，多巨石”，前有小湖。距城北一里多有西湖山，旧名银山，高约五十多丈，占地周长有十里，山下为西湖。^{〔1〕}城东有韩山，旧名双旌，因顶上有三座峰，形似笔架，又名笔架山。韩愈任潮州刺史时常到此浏览，故名韩山。山下为韩江。山后为东湖，为四山所环绕。（图10-14）

城西有三利溪。宋朝时引韩江水通北濠、过云梯冈以灌溉海阳、潮阳及揭阳等地之田，利及三县，故名。^{〔2〕}

三、各城之经营

（一）府城之经营

“潮州府旧有子城，后依金山山北而南绕以濠，东临大江。外郭以土为之。宋绍兴十四年知军州事李广文乃循濠流旧址甃砌焉。绍定端平间知军州事王元应、许应龙、叶观相继甃筑完之，为门十一。元大德间总管大中怡里修东城滨溪一带，谓之堤城。明洪武三年庚戌指挥俞良辅辟其西南砌以石，

〔1〕〔清·乾隆〕周硕勳纂修。潮州府志。卷十六。

〔2〕〔清·乾隆〕周硕勳纂修。潮州府志。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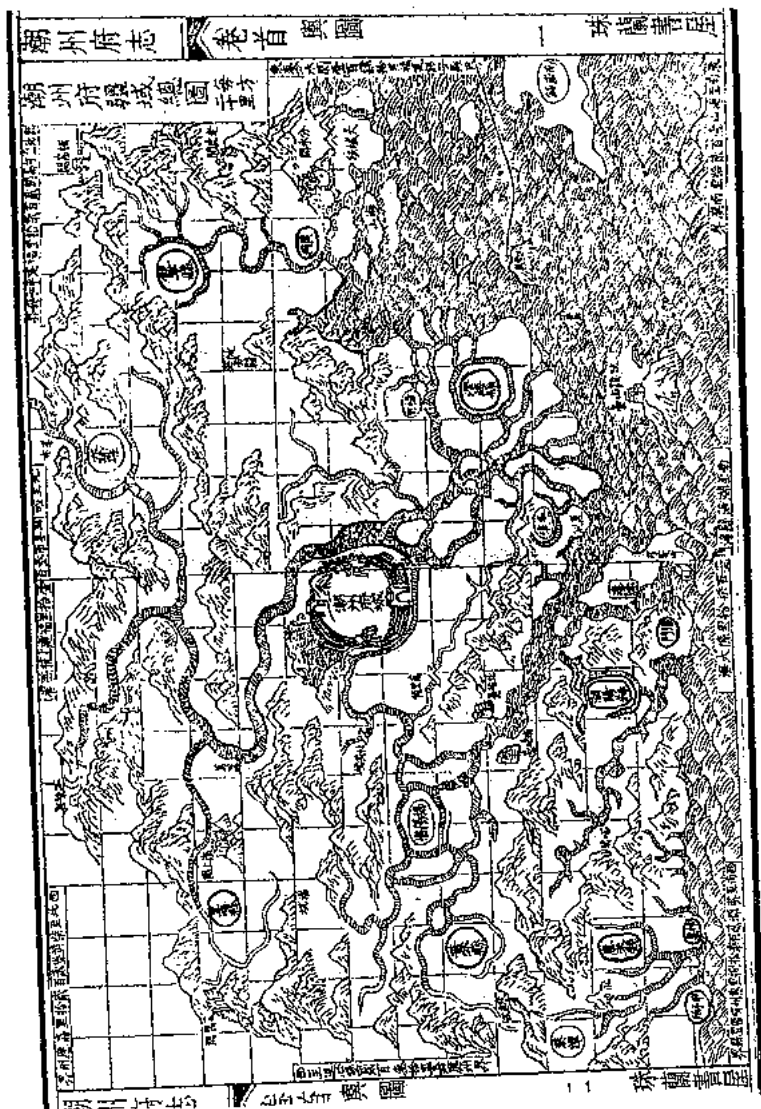


图 10-13 清潮州府疆域总图
(引自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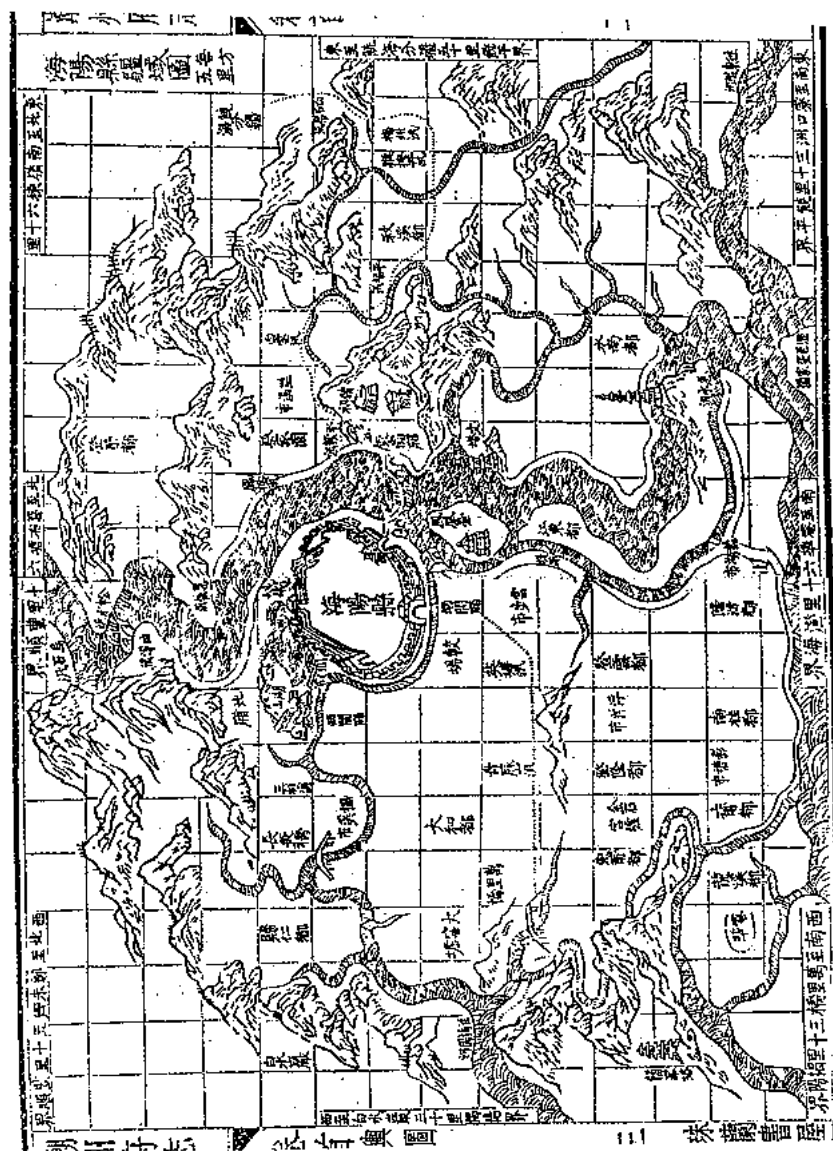


图 10-14 清潮州府城疆域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49)

改门为七，谓之凤城。城高二丈五尺，基阔二丈二尺，城面一丈五尺，周围一千七百六十三丈。东距溪曰广济门、曰上水门，左有涵洞一，引韩江水入府学泮池，经太平桥绕海阳县治过潮头桥，透西湖，出三利溪，后为民居填塞。南曰竹木门、曰下水门，南门前有涵沟通韩江过城西出三利溪，灌溉附近田畴。西曰安定门，左有水关引韩江水入下水门，经开元寺绕小金山，会大街、新街、西街诸沟之水而出西关。其门原广五六尺，深亦如之，日久尾闾不泄，暴雨江涨不便于民。北曰北门，门各有楼，内有兵马司。东西南北四门今增为义仓，外罗以月城。城有敌楼四十有四，窝铺六十有七，雉堞二千九百三十二。弘治八年乙卯大水决城一百六十余丈，城内行舟，官廨民房坍塌无算，同知车份筑之。嘉靖十三年甲午知府汤暉重建南门城楼。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兵备道王一乾修外城马路。国朝雍正九年辛亥知府胡恂、知县张士琚请帑大修。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揭阳分界内，西关外炮楼，圯二十余丈，揭阳知县王璽捐修。初宋庆元三年形家谓濠西不利，惑其说者凿堤为二关，取石斲之，决河东流入于溪，地势东仰西流如故。五年溪涨堤溃，知军州事沈杞率民塞之，濠复故流。日久民渐侵占填塞过半。开熙元年知军州事赵思奶疏口。水复通三利溪，有水关石桥二所。”〔1〕

“州之子城，依金山为固，前俯而后仰。由南而北，统以壕。东则溪也。方创置之始，土工不坚，未期悉圯。宋皇佑间，侬智高自邕攻广韶，岭外全壁以待。至和改元之九月，郑侯伸始至，不二月兴畚鍤，自农务外八阅月而就。绍兴初，黎寇掩至城下，攻具百出，屹然不为之动，凡避寇于内者赖以免。其外郭故以土为之，久且夷。绍兴九年间，徐侯渥欲接溪流带湖山，去天庆观数百步为之基，筑具毕备，力固可为。继因议论不协，于是辍其役。逾十有四年，李侯广文乃移以自近，址循壕流故基为之。四厢居民，各筑其地，才及丈余，斲石且半，会督役者故出入其基，讼者纷然。李侯怒而罢。故址今悉为民居，遇有少警，遂皇皇然无寄足之所，虽有子城，无地可容，因州之阙典已。子城外带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东以江水隔民居才二里。直州而前为街三、堤一，巷陌贯通，所阙者外郭耳。

州子城门三：东，西，南。东门今废。子城四围凡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广一丈，基倍之。壕面阔七丈五寸，自城下转西而南，绕郭之外，延袤一千二百余丈。三阳门，郭之南门，结楼其上，旧曰揭阳门，存古也，常公祐始创。林公嶠增崇旧基而新之，更其扁，盖取三邑皆以阳名。

外城旧基，周围一千一百七十丈。石城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丈；为民居所侵，无复遗址者，四百一十丈。今所侵不止。是淳熙间，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外城，总计一千五百三十丈，与旧城丈数异，今两存之。右按外城自李公广文辍役后，故基日就侵削，郡有筑城之请屡矣，殆成文具。淳熙间，沈寇迫境，城市之民避于子城，什不容

〔1〕〔清·乾隆〕周硕勳纂修，潮州府志，卷之六。

三、二。

壕流自子城外西渐入于湖，湖末流又入于壕。庆元间，有感于阴阳者，谓壕流而西，不利于郡。凿堤为二闸，间取诸郭门之石以甃之，决壕流东入于溪。地势东仰，西流如故。后溪洪暴涨，反导水溃堤。沈公杞率居民负土石以塞之，仅免水患，壕复故流。然民居久侵官壕，填塞过半。开禧改元，赵公师会正壕之界，稍加疏辟，壕流仅通。然筑外郭、浚故壕，当复有为长远虑者。

州之外城，右有旧基，岁久颓圯，外无捍蔽，居民每以为虑。绍定间，属有梅杨、陈寇之患。王侯元应从邦人请，乃分委州县曹掾及富民有材干者，董以判官俞林因旧基筑之，外甃以石。时志于速成，客土未实，亡何坏者过半。许侯应龙复筑之，乃稍坚致。自三阳之南，西北环抱接于金山之背，计九百五十一丈，由北距女墙高一丈五尺。西、北辟五门经通往来：正西曰贡英，西北曰潮平，正北曰凤啸，对岳祠曰和福；与南三阳而六。由是居民恃以无恐。端平初，叶侯观复檄厢官巡视，即雨所坏处为之修补。然城之内面，未及累甃，当有继而成之者。

州治之东，溪界于左循、梅。舟筏顺流而东，直至子城下，扞御之备，视三方尤为要害。此方空阙，南、西、北虽有城，与无城同。端平初，叶侯观下车未几，首虑及此，慨然有兴筑之意。然工役浩繁，所费不貲，捐公帑之外，乃喻诸座户，俾佐其费，人乐输之。遂东自新城门，沿溪傍岸，筑砌以石，至于三阳门之南，首尾与旧城联属，计五百五十丈，高二丈，雉堞与焉。仍结四门以通水陆往来之道。于是城郭固密，民居其间，始有安枕之乐矣。是役也，判官赵汝竭，县丞赵必魁实监督之。然始创亟于图成，多因居民水阁旧北，未免凹斜屈曲。端平丁酉，刘侯用行重新整砌，雉悬壁立，不复如前日之萦迂矣。

州之外城及沿溪一带城壁，岁久粉堞摧剥，雉门敝倾。淳祐丙午，陈侯圭僦工葺理，环雉堞四千余而一新之。城楼之颓圯者，若登瀛，若三阳，若贡英，若和福，若潮平，若凤啸，一一更创。以致城北隅之新路，三阳门东西之二东衢，旧虽有门而楼橹阙然，今皆鼎建。扁其东曰开泰，西曰通利，北曰崇恩。周环相望，规模视昔尤胜。城之帝草木屏翳，至是分隶营寨，兵卒悉铲锄之，保障为之屹然。是役也，靡金钱二千四百余贯。”〔1〕

“洪武元年，指挥俞良辅统兵来潮。越四年，因旧基而再兴，内外皆砌以石，高厚坚致。各门外筑瓮城，皆屋其上。为门七，东门、上水门、竹木门、下水门、南门、西门、北门。”〔2〕（图 10-15、图 10-16）

（二）各县城之经营

参见表 10-6。

〔1〕陈香白辑校。潮州三阳志辑稿。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之四。

〔2〕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图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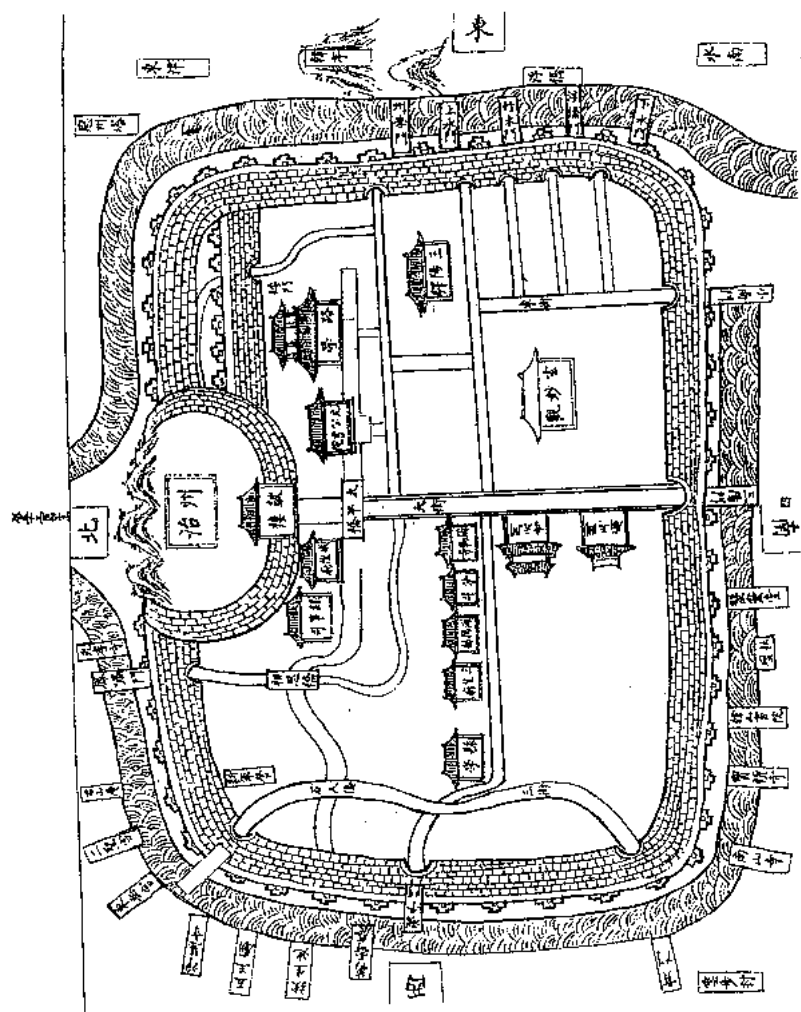


图 10-15 永乐大典潮州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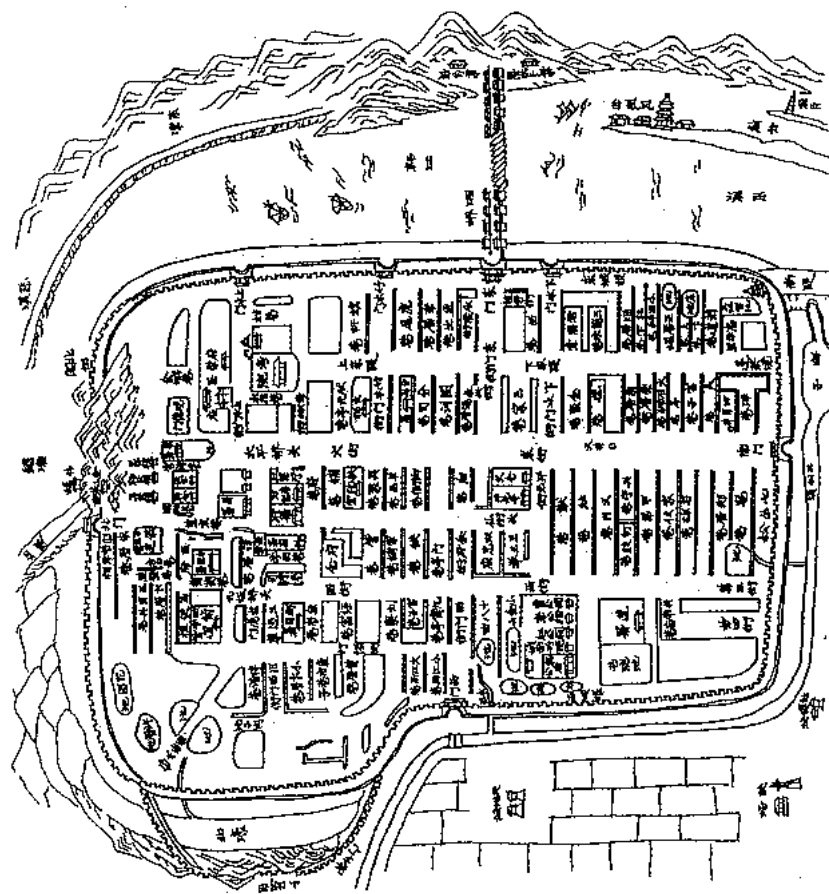


图 10-16 光绪海阳志潮州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院研究: 449)

潮州府各县城的营建〔1〕

表 10-6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潮阳	唐	初年	置县治于临岵山
		元和十四年(公元 819 年)	迁于今治;左右皆山,前后皆水
	宋	—	因之
	元	至正十七年(公元 1357 年)	始筑土城,岁久日圯
	明	正统间	修
		天顺四年(公元 1460 年)	海寇乱;六年垒石增高;周围九百七十四丈,自址至壕高二丈五尺,门各有楼
		成化二十年(公元 1484 年)	增修城楼,有五门
		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	砌以石,重修五楼,各设更鼓,改五门名
		弘治五年(公元 1492 年)	浚濠;沿岸砌石百丈有奇,深一丈、广五丈,民赖舟楫之利
		弘治十七年(公元 1504 年)	再浚濠
		正德十一年(公元 1516 年)	开小南门
		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	又浚濠,深广仍旧;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重浚之
		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	飓风城坏,修之
		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	飓风,南北二楼俱倾,修之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 1558 年)	倭寇乱,修复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 年)	相继增修銃台一十有三;倭寇解严,凿西畔城濠,垒石为岸;相传彼时濠水尽赤,堪舆家谓龙脉在西濠之不便,乃复填塞,而以西门外石桥移之东山郭祠前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	建望楼十四
		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	又浚东北濠
		隆庆三年(公元 1569 年)	海寇逼城,击走之,重修城楼并望楼,增置北门外瓮城
		隆庆四年(公元 1570 年)	飓风、霪雨,东南城并马道圯四十余丈,修砌完固
		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	五、七两月霪雨,南门、西门、水门、马路、敌台、窝铺俱圯,修之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	四月连夜雨,城坏四十余丈,坏马路三十余丈、城垛五十余丈,城濠岸圯四十丈,重修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 1604 年)	九月,东门、南门、小南门塌八十余丈,西门、北门塌四十余丈,修之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 年)	五月霪雨,城塌三十余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 年)	复坏,修之

〔1〕[清·乾隆]周硕勳纂修.潮州府志.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潮阳	明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	四月至五月雨,西、北二门坍,修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 1618 年)	八月飓风,门楼、敌台、城垛俱坍,修
		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	六月飓风,坏城楼、敌台、城墙五十余丈,修
		天启七年(公元 1627 年)	海寇告警,加修完固
		崇祯五年(公元 1632 年)	夏大风雨,城坏五十余丈,修
		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	增高旧城三尺,加厚马路三尺、濠深三尺
	清	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	夏五月霖雨,城坏二百三十二丈,时寇氛未靖,民惊风鹤;七月又水,城垣、马路、敌台及东门城楼俱倾,修之,旬而竣;东门、南门、太平门、泰安门无瓮城,乃于四门桥外各筑墙、竖栅以资捍御
		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	寇警,筑城上炮台五
		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	六月飓风城坏,捐修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	文武捐资协修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	又于驿后巷尾北城上新建更楼,重修,告竣计六门、城楼七座、敌台一十四座、炮台六座、窝铺二间、西北瓮城二围、腰城二围、东南桥墙二围、东、西南北重门四处、更楼四座、垛堞四百二十有六;城周围一千二百六十二丈、高二丈五尺,城濠深一丈、广三丈,自东而南通前后溪计长一千四百六十五丈,深而广之,岁久湮塞
揭阳	宋	—	置县未有城
	元	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	御海寇始砌内石城二百丈,外筑土城八百余丈
		至正十六年(公元 1356 年)	拓土城而广之;濠濠长一千六百丈、阔一丈、深八尺,外濠一千六百余丈、阔二丈、深一丈
	明	初年	城扑濠湮
		天顺四年(公元 1460 年)	海寇乱,拓内城之东北一百丈通三百丈,高一丈五尺,阔一丈四尺,砌以石,外城之西北七百余丈通一千六百丈,高一丈二尺,阔一丈六尺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 1487 年)	七月流贼白昼劫城,九月修筑
		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	僦工甃石为址;高五尺,上累以甃,高七尺,堞高三尺,共一丈五尺,修广皆如其旧,费银六千三百两有奇;未几甃坏
		弘治十一年(公元 1498 年)	易甃以石,女墙、楼櫓为之一新;又费银五千九百两奇,役丁夫十数万,民颇劳怨
		正德三年(公元 1508 年)	大修之;内外马路各增二丈水脚签桩,桩缝复垒以石和灰土筑之,灰土上面复纵横其石,城称巩固
		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	又重修内外腰城百余丈,马路六百丈,城楼、窝铺俱重修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	沿海寇警,筑四门月城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揭 阳	明	万历十八年(公元 1590 年)	重修,增高五尺
		天启元年(公元 1621 年)	于东、北两门上下建学宫,重辟门曰进贤
		崇祯二年(公元 1629 年)	因海寇屡警,锐意修葺;周围设垛眼二千六百二十八,烟墩九座,分七坊各设窝铺,安弁兵守御,另筑銃柜十一座于城下各要害处
		崇祯五年(公元 1632 年)	新筑銃城二座,南坐观音阁边,北坐马牙罗家田界,毁于寇;环城内外有深濠
	清	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	九军贼乱,塞进贤门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 1700 年)	重辟之
		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	以东关外、西关外、钓鳌桥两旁灰窑有妨外濠,令悉去之,并培县龙入首之脉通邑,士民德之,请勒石永禁云
		乾隆间	环城内外溪渚交流,舟楫纵横,仿佛三吴风景;东南多属水乡,西南莫非山谷;周围一千六百丈,高二丈三尺,厚一丈六尺;门五,水门四,俗呼为睿
饶 平	明	成化十四年(公元 1478 年)	在元歌都下饶堡建;东、西、北三面皆山,惟南一面临海,皆筑以砖,高一丈八尺,面广一丈,基倍之,周围七百二十一丈;北临溪,东、西、南三面凿池,广一丈二尺,延袤七百五十二丈有奇;东、西、南、北辟四门构城楼
		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	秋大水,城决四十丈,补直之
		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	四城楼俱圯,次年重建,雉堞环拱如式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 1558 年)	于西北城上建镇北楼;濠濠广二丈、深丈余,引据水入西门外濠
		崇祯三年(公元 1630 年)	夏颶风、洪水,城圯二百四十丈
	清	顺治年间	增修;高一丈,马路广三尺;改镇北楼为尊君楼,更置銃楼、敌楼一十有七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	复修,改尊君楼为望耕楼
惠 来	明	嘉靖二十二年(公元 1543 年)	拓南城四十四丈,合旧城共七百四十四丈;西北则峰临碧落,东南则浪拍长空;周围原七百丈,高一丈七尺;旧有四门楼堞俱备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 1544 年)	颶风城圯,重修;各建兵马司西门二间;旧建北门为形家所忌,后因寇堵塞;后重开北门于城隍巷,民称便;水门原在辰方,于县治不利,日久壅塞,另辟一门,卜在巽位,至是规模略备;而东畔尚隘,宜作子城;有四门;城濠深丈许,阔二丈七尺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 1556 年)	以惠来城河源窄,浚之,然东西俱从山下发源,多为沙淤,小舟从龙江入神泉至河头而止;仿清闸河法浚深五尺、阔一丈,每一里许为一陂,水大则泄水,水小则停,可通潮汐,便舟楫,亦通县之大利也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迹
澄海	明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 年)	议建;城周围九百二十五丈四尺;城址广一丈八尺;高一丈一尺、腰城、雉堞各三尺,共高一丈七尺;经始于嘉靖甲寅(公元 1554 年)、告成于隆庆辛未(公元 1571 年);北港水、南港水成绕郭之汤池,大莱苑、小菜苑作重洋之藩卫
		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	增高三尺五寸,共高二丈五寸;垛堞一千二百八十有三,为门五,为楼四,楼前为过道,城北设水关,窝铺二十有六
		万历戊子(公元 1588 年)	同知建议凿之使舟楫得通城下,由东门古溪起南行数百步,折而西行,经南门复西行数百步,折而南行通南桥溪;然沙岸易崩,不逮半载仍塞
		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	知县劝民浚之,两岸砌以灰石,今亦渐壅滞
	清	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	毁于寇
		顺治十三年(公元 1656 年)	修复
		康熙甲辰丙午间 (公元 1664~1668 年)	滨海寇警,历三次迁,斥至七年展复,城隍民离,几不成其为县
		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	因旧基而重建之
大埔	明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	浚城濠,东北地如天堑,西南亦地势洼下
		嘉靖五年(公元 1526 年)	历三年告成;山众而田畴转寡,地僻而要隘偏多;天下诸县治多面南,独埔邑朝宗北向;据茶山之麓,周围五百一十九丈四尺,高一丈七尺,下广一丈二尺,上广九尺,垛堞九百九十有六,内外甃以砖石
		厥后	楼橹、墙垣率多倾圯,嘉靖二十三年(公元 1544 年)重修,增建窝铺以备守望,门三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 1556 年)	重修三门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	以城南跨山墙垣低隘,复于茶山东西一隅增高五尺,山巘左右各建营房四间,中间建茶山亭一所,拨铺兵八名外列营戍守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	盗贼啸聚,自山麓东西迤邐以北俱增高三尺子墙,崎峻处作石级以便登降;其北及东、西复浚濠,深三尺,阔一丈,延袤一百一十丈;又筑瓮城于北门,广三丈,深二丈;建楼四座,分置四方,可凭高望远;規制略备
		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	复增建敌楼四座,高二丈三尺,广一丈一尺、深九尺,修窝铺十二间,又置四门守御铁炮兵器
	清	康熙十四年(公元 1675 年)	刘进忠倡乱,盗贼蜂起,增筑炮台于城之东、西两隅
		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	西炮台及北门瓮城、雉堞倾圯重修

续表

县城	朝代	年 代	事 鉴
普宁	明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	设县十一年始经理县城于厚屿,规模略定
		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	始改筑今城,但地洼卑湿,形家称为浮水葫芦,水潦则泛滥成巨浸;洪山枕于后,铁山峙于前;其间深沟巨涧脉络钩连,险阻良多;高二丈零五寸,周围七百丈,雉堞七百四十,门四,门各有楼,四门相距各有敌楼,门左有窝铺,城脚马路八尺,水关西、北各一,绕城浚濠为濠,东、南、西广一丈八尺、深五尺,东北至西北广三丈、深七尺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607 年)	以今地之不可城者甚,悉相度安仁至新坛埔得平衍高阜官地,请改筑以慰民望,议格不行,相沿至今
		崇祯间	城垣增高三尺
	清	顺治十二年(公元 1655 年)	海寇陷城蹂践如平地
		顺治十三年(公元 1656 年)	寇退,修复
		康熙十三年(公元 1674 年)	刘进忠叛,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孝驻师普宁,复大役民夫浚濠修城
		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	因年久倾圮发帑一千六百两有奇,修复颓城八十九丈三尺、高一丈二尺、厚五尺,下马路三百一十九丈、高七尺、厚五尺,土马路四百六十八丈、高二尺、厚三尺,雉堞三百六十二个、高三尺、厚二尺、长二尺,城基四处,共长五十四丈、高四尺、阔四尺,城门、城楼建盖,銃柜四间,炮台四间,窝铺七间
丰顺	清	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	原海阳县丰政都,明通判府旧城;初建,县议将旧城展拓、加高,新开东门,建复城楼,门四;僻在崇山,岩谷险阻
		乾隆九年(公元 1744 年)	草草告竣;周围才二百零九丈四尺,高一丈五尺,厚一丈三尺;向开西、南、北三门
		—	其东门久塞,山墙、马路、雉堞、櫓楼亦已圯坏,惟基址完固

四、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潮州城是以其城市防御特别是防洪方面的成功为特色的。具体参见表 10-7。

潮州府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表 10-7

分 类	城市思想及特点
城址	府城:东韩山,南桑浦山,西湖山,西北梅阳山,韩江在东;“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各县城:为南方城市,多雨、多飓风,城塌、堤毁之事常有;近山者须防贼寇,近海者防海盜,近江河者防水;依需要而采定各处经营城市的合适之道
街道城墙	“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实际体现
市场	从城市的名称上即可看出,许多墟、市的设立都选择在人流集中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庵、官、塔、教场、书院等;或是在水边,如塘、溪、濠、湖、浦、埕、潭、陂、汀、洋、埕、坝、屿等,此类的墟市数量较多;或是在繁华的交通线或点上,如城门外、城关、冈等;或是在人烟稠密的乡村里;民通食货资日用莫如趁墟,人气旺一货品聚集一流通快,符合商品经济的自发规律

续表

分 类	城市思想及特点
行政组织	粮为里长,民为税长,图为夫长;城中:图、粮里、民里;附城:厢一图、粮里、民里一村;城坊里之外:乡一都一图、粮里、民里一堡一村
生态环境	常年于上游开垦无度,致山童而土疏,洪流挟沙过辄淤垫,河身日高、堤身日卑,至增筑加培于无可施;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使用和保护,带来水患、生态失衡等严重恶果,成为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一大隐忧
水利建设	卫城池、溉田畴、通舟楫。设施:堤为防护、围截之用,堤城御敌兼御洪潮〔1〕;濠、溪、陂、渠、涵、塘、沟、湖、井等为疏通、利导之用;水门、水闸、涵洞、砌起节点控制之用。措施:两岸高分露明与入地部分,下钉梅花桩,免坍塌之患;涵洞分内外,涵口左右凿石安板,方便启闭,左右为两墩,涵口两旁为八字墙,筑砌以护;在急流等险要处建石砌以杀水势,又为堤工之保障;创用厝灰筑堤防渗;城门左右各竖石柱,凿槽安板,大水则下板以堵塞;于城墙或堤坝中自堤基起筑一道龙骨以隔水;广济桥,开合式桥梁,是与洪潮抗争的范例,位列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2〕

第四节 归德府城

一、建置沿革〔3〕

归德本属兖、豫二州之域。

秦置碭郡。

汉隶豫州,属梁国。

东汉改陈留郡。

魏、晋始有睢阳,属梁国。

后魏改梁郡,辖于南兖州。

刘宋则改为南梁郡,辖于南豫州。

北齐初置梁州睢阳郡。

隋为梁郡,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宋州,是称宋州之始。

唐以宋州属河南道,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睢阳郡,属宋州。

五代梁置宣武军节度使。

后唐改为归德军,此归德之名所始。

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建南京为应天府,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夏五月南宋高宗即位于南京,其时金更名归德府,此归德府名所始,领县六。

元初旧领宋城、宁陵、下邑、虞城、谷熟、杨山六县与亳之酇县一起归入,置京东行省,未几罢,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以虞城、杨山二县割

〔1〕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450-452.

〔2〕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454-456.

〔3〕[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方輿沿革表.

属济宁府，又并谷熟入睢阳、鄆县入永州，降永州为永城县，与宁陵、下邑隶本府，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以宿、亳、徐、邳并隶。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州，隶开封府。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复为府，隶河南布政使司，领一州八县，除原领宁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五县，又增睢州、考城、柘城三县。置商丘为附郭，系高辛子阏伯封地。

清廷为归德府。

二、形势

归德府总体地势平坦，通达四方，南控江淮，北临黄河，东为彭城，西邻开封府，互为联通，为大河南北之要道，所谓“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是“未有不以之为腰膂之地”。〔1〕（图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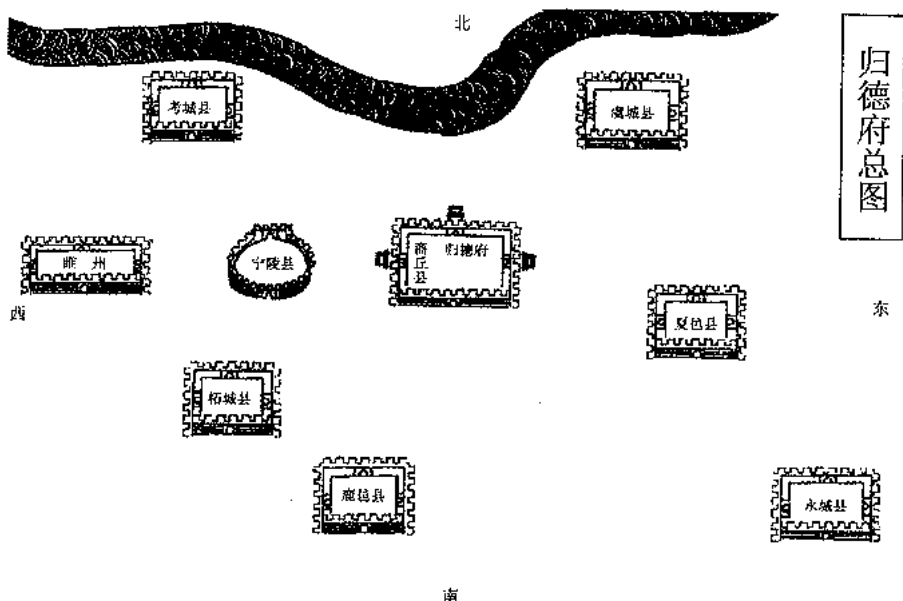


图10-17 清归德府总图

（引自〔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

三、经营

府治所在，供需繁多，车马如梭，与外界的联系密切。多次受到洪水的袭击。

该城春秋时为宋国之都城。汉梁孝王都于此。唐建中时，为宣武军城。城有三。宋为南京城，城周十五里四十步。内为宫城。京城中有隔城。东有关城，东面外城也。金之将亡时，以汴京危急谋出幸。或言归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既而金主出顿归德，复走蔡州。旧城周于明初减少四分之一。弘

〔1〕〔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形势。

治间圯于水。正德间知州杨泰修堤围和护城河。嘉靖间知府王有为重修。又建西、北门楼各一，东南门楼二俱加修葺。又建角楼四，敌楼一十三，警铺三十二。嘉靖间巡抚章焕檄知府陈学夔，包以砖。而知府陈洪范、罗复继修之。明末寇变拆毁者十之三。清知府张若愚重修城门四，水门二，一在南门东，知州王范建；一在南门西，指挥梅旻建。康熙间知县周宗义重修，复建门楼、护城河与护城堤。^{〔1〕}

建于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的归德府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门相对在中轴线上。……（城墙）外包青砖，内填黄土，为沙淤混合土，分层夯实，每层厚30~50厘米。内外自上而下各有收分。城周有3600个垛口。四门……样式相同，均为拱券式建筑。……四门外原有4个瓮城，瓮城各有一扭头门，即北门向西，西门向南，南门向东，东门向南，……砖城四角各有一宽阔的角台，凸出城墙之外。其中东北城角最大，……西南城角最小，……（马面）凸出墙外6.7米。马面多为方形，惟西门向南第一个马面呈半圆形。……护城河距城3.5米，水面窄处25米，宽处500米，环城一周，只有四门通过四个拱桥，经过四关方可出城。……距砖城550米为护城堤，周长9公里，环绕城一周，为黄土筑成。堤高5米，基宽20米，顶宽7米。该堤是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三月为防兵患而筑。归德府城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汤伐葛伯、泓水之战、楚攻宋城、睢阳之战等重大事件。”^{〔2〕}修筑的护城河、护城堤、门楼、角楼、敌楼、警铺等防御设施，也都说明了对军事防卫的重视。（图10-18）

现今遗留的古城，即建于明正德六年。“古城外圆内方，形似一枚巨大的古铜钱币；地面呈龟背形，地势向南稍倾，总面积1.13km²；街道规划格局有如棋盘状，共93条街道，至为严整；城内的水井、厕所多为梅花形，布局合理；南城门东西两侧建有两个水门；城内建筑多为走马门楼和五门相照的四合院建筑群。城墙、城湖、城廓三位一体，保存完好。城廓由砖城、护城河、护城堤三部分组成。全城周长9000m，其中内层砖城周长4347.5m，城墙高为6.67m，顶宽6.33m，基阔10m，外包1m宽的大砖墙，内为夯土。城上有角楼4座，炮台13座，警铺32处，垛口3600个，城墙虽经战争和风雨水患，但保存基本完好。城门为拱券式，东门曰‘宾阳’，南门曰‘拱阳’，西门曰‘垓泽’，北门曰‘拱辰’。……内城外是宽阔的护城湖，环绕全城，湖水碧波荡漾，水面达8000多亩。……内城外500m许，是巨龙般的护城大堤，即外城廓，建于明嘉庆十九年（公元

〔1〕[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城池。

〔2〕李卫华，归德府城墙，中原文物，1999，2：117。原文中提及护城堤乃为防兵患而筑，却并未言及原由及提出佐证，提到的几次“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似乎与该城之后的建设没有直接关联。然该城确是遭受了多次战祸，从方志的记载中可了解到。

1540年),用土筑成,用以防水患兵灾,现在大堤已改建成环城公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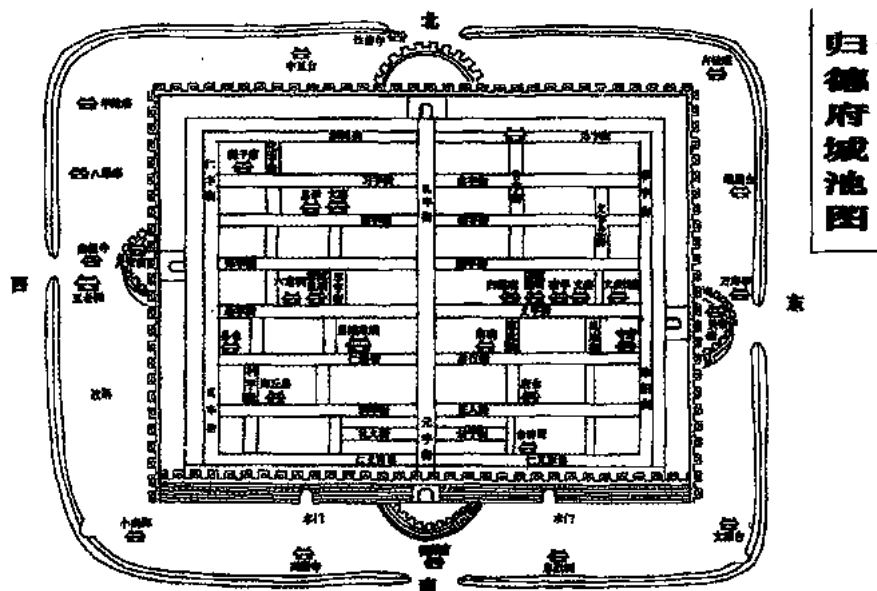


图 10-18 清归德府城池图
(引自〔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

四、解读

(一) 防洪

“归德一府为诸水下游,所属九州县常遭水患。”〔2〕归德府地处中原平衍之地,周围又有诸水环绕,研究该府的城市思想应着重放在防治水灾上。

“是郡一州八邑,山川无扼塞之险,城池鲜金汤之固,而适处乎中原四战之域,其形势实与徐汴相表里。论者或以地多平衍无足系重,不知固国不以山溪地固,以人重也。……是地常取重于天下,亦可谓知其要矣。”〔3〕这段话的本质延自《周礼》中的礼制营国思想,作为官方组织编纂的方志中有这样的思想不足为奇。细揣之,话虽如此,然不顾山川地形而建之城,将会或因水害而后患无穷,或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以经营之。

“归德地最卑下,无高山大阜以为固蔽,滨河诸县往往受黄河大害。而合属水势,由西北而达东南者,有干河二十道,要皆条贯于各州邑之中。而稚水蒙流,以干河为归宿者,支河小沟可次第而修举。试分其支、别其派,因其自然而复其故道。利在一乡者,即役一乡之民兴之;利在一县者,即役一县之民兴之;利在一县而波及旁县者,则旁县之民亦相助而兴之。夫然后

〔1〕陈道山,商丘古城:“阴阳五行八卦”城,中外建筑,2008,12:58-59.

〔2〕〔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水利略二.

〔3〕〔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形势.

水治而田亦克治矣，故曰水利也。”〔1〕论及实际情况，“地多平衍”的劣势即显现出来。如果加上地又卑下，那么“无高山大阜以为固蔽”就更容易造成周围水流内涌而无法倾泻。况归德府邻近有以黄河为主的诸多河流，那么所受其害不言而喻。方志中归德府所领各县城多有为水患所迫而移城的现象，即可说明这种罔顾地理环境的选址的失策。从其自身的角度进行比较或与其他方志中记载的城市相比较，都能够发现其在军事防卫方面的经营远没有防水方面的更为重要。此志中大篇幅关于防水、治水、理水的叙述，以及不吝全文上载的各“请开归德水利疏”、“奏归德水利善后事宜”及“归德治水碑记”等，也说明了对治水防灾的全面重视，并且从实践上反证了“高无近旱”、“下无近水”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高毋近旱”与“下无近水”这种理想的营城形势，在幅员广阔、地势多样的中国无法尽得。既不得之，则设法因应之，这也是《管子》城市思想的一大特色。以防治水灾为主要任务的归德府各城在这方面，有下心得：

1. 筑堤之法。

“夫治水莫善于《禹贡》二法，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宜别而疏之，以杀其势，‘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水之性骤则溢，宜旁而蓄之，以节其溢，‘蒙波既潴’是也。……凡地势高下之宜，源流分合之势，古今通塞之由，大小缓急之序，兴作考验之方，延袤深浅之度，岂可不随时经营利害。”〔2〕

“堰筑虽固，然一有蚁穴，则泛滥害稼，惟相其势而时防之可也。”〔3〕

“（虞城）邑司寇杨东明撰《筑堤捍水记》有云，外则采柳索绹卷埽以防冲刷，内则树桩加土坚筑以防溃裂。”〔4〕

“为了城池的长久存在，不得不考虑黄河定期不定期的漫、溢、决口和改道的造访。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千多年间，黄河下游发生的漫、溢、决口和改道约有1500余次，其中在16世纪，平均四、五年就要发生一次。事实上，商丘古城的设计与建造者也是这样做的，仅城郭的选址与建造就反复论证并不懈地实践了30多年，直到公元1540年在城墙外约500米的圆周上筑起新的城郭（即现存的城郭，已改建成环城公路）。”〔5〕

明万历年间形成一套黄河防洪的堤防制度：“其治堤之法，有缕堤以束其流，有遥堤以宽其势，有滚水坝以泄其怒”〔6〕。即在商丘以上采取遥堤、减水坝和太行堤系列措施，共同分散洪流、削减洪峰、减少洪水溃堤的可能，从而制约较大的洪水，减轻灾害的程度。该堤防制度针对黄河的水文

〔1〕〔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水利略一。

〔2〕〔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水利略一。

〔3〕〔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商丘水道（堤坝附）。

〔4〕〔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虞城诸水。

〔5〕陈道山，商丘古城：“世界遗产标志”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94。

〔6〕明史，河渠志。

特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直到咸丰河水改道前,这些措施都在被广泛地应用。〔1〕

(图 10-19)

2. 治河之法。

“宋、元以前之治河,虽塞筑为劳,止以去河之害,而不资其利,故去害即所以到利。宋、元以后之治河,其法愈密,其费愈繁,不惟去河之害,而并资其利,故全利乃可以去害。……夫防河之法,不外治堤、治埽、塞河而已。顾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异;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及龙头、马尾之分;塞河一也,有缺口、豁口、龙口之殊。……道在治河者,相水势以行,便宜国与民,不且交受其利也哉。”〔2〕

3. 人力与物力的重要性。

“丁夫埽柳,分派沿河(黄河)州县,每亩出银,雇河夫以应役。河夫既系游手,且需索无厌,视修河为利藪。往往堤将成而盗决之,故民困益甚,而河卒不治。”〔3〕沿水的州县均要出人、出资,以“每亩出银”的原则提供所需费用,而雇用的人力往往因管理不善,造成工程溃而不成,民反受其害。

“昔年开之(沟)而民受其惠,厥后淤之而民受其困。今日浚沟之举,合之昔年开浚之役,惠忆之意有同揆也。”〔4〕

“水治而田亦治,故水利重焉。”〔5〕

水利之重,在于其不但可防治水害,同时也灌溉田畴促进农业生产,在以农为主的中国,其利于民也。

(二) 仿生象物:神龟八卦模式〔6〕

“龟长寿,有很强的生命力。”“龟形象征着天地宇宙,从而有趋吉避凶、保佑平安的作用。”“由于龟有外壳可以抵御攻击,故龟形又为设防的



图 10-19 归德府段黄河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27)

〔1〕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27.

〔2〕[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河防.

〔3〕[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河防.

〔4〕[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虞城诸水.

〔5〕[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水利略一.

〔6〕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365.

城和建筑所模仿，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1〕

“八卦象征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种自然现象和多种社会现象。……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营造建筑、村落、城市以八卦为模式，是追求天地和谐合一的理想居住环境的体现。”〔2〕

“鸟瞰商丘古城，外圆内方，犹如一枚巨大的古铜钱，镶嵌在黄河故道与济水之间。外为土筑的城廓，呈圆形，象征天；内为砖砌的城墙呈方形象征地。八卦中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圆为阳，方为阴，外阳而内阴，阴阳结合便是天地相生，如此商丘古城便成了阴阳天地大宇宙的象征，商丘古城也便有了与日月同在的道理。古城坐落在向南微倾的龟背上，这也是设计者的一大匠心。众所周知，龟是长寿的动物，自古以来被视为吉祥物。古城的设计者不将城池建在平坦的地方，而将城池建在龟背上，就是利用龟状似的地势，以祈求城池永固万年，吉祥千秋，且城南为一大湖，龟头伸入湖中，龟得水更可长寿。”“古城内城为方城，四周城墙均为砖砌，置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四座城门外分别构筑有半圆形瓮城。四座瓮城置有四个扭头门，东城门南扭，南城门东扭，西城门北扭，北城门西扭，形成南东、北西瓮城分别两门相间，城门‘四门八开’的八卦构图格局。寓意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此可见，商丘古城的城门是按八卦原理设计的，南、东瓮城两门相向，合成阳；北、西瓮城两门相向，合成阴，是为太极所在的阴、阳两极。阴阳运动所产生的四象，两阳（太阳、少阳）和两阴（太阴、少阴），即被称之为拱阳、宾阳、拱辰、垓泽的四座城门；四象运动所产生的八卦，即四座城门连同四座瓮城扭头门在内的八开之门。古城设计者对城内街道相交的隅首的设计更颇具匠心。根据五行相克相生的理念，东为木，西为金，金克木伤气。为防金木相克，古城东、西两门被有意识的错开，不在同一直线上，东门偏南，西门偏北，错开一条街，出现了与中轴线分别相交的两个隅首，如此便可逢凶化吉。假如以西门大街为西北或西南隅，东门大街为东南或东北隅，而四隅街道便是以单数与双数组成的阴阳二卦。西北隅阳卦，东北隅阴卦，东南隅阴卦，西南隅阳卦，且东北、西南隅与西北、东南隅皆双双阴阳结合；同时，东北、东南隅和西北、西南隅共同组成双阴双阳卦，与城门、瓮城门‘四门八开’的双阴双阳相照应。”〔3〕（图 10-20）

尽览所引各地之志，其城为何时、何地、何人新建，又为何因重建、重修或增补等等，其筑城、修城之史一一详述。《管子》城市思想也浮现于字里行间。城之始与用在于护民、卫民；城之损与毁不外乎灾害与兵燹；守城、护城是经营城市的首要之务。摄城事之官也都始终以维护该城的完好为

〔1〕 吴庆洲. 防患象物的营造意匠与客家建筑. 南方建筑, 2008, 2: 45-46.

〔2〕 吴庆洲. 防患象物的营造意匠与客家建筑. 南方建筑, 2008, 3: 45.

〔3〕 陈道山. 商丘古城：“阴阳五行八卦”城. 中外建筑, 2008, 12: 60.

己任，尽心为城民营造一个有利于居住、生活的环境。而无论是政府倡导还是民间自发的守城、护城行为，都一道成为构筑重实用、重可持续性发展等《管子》城市思想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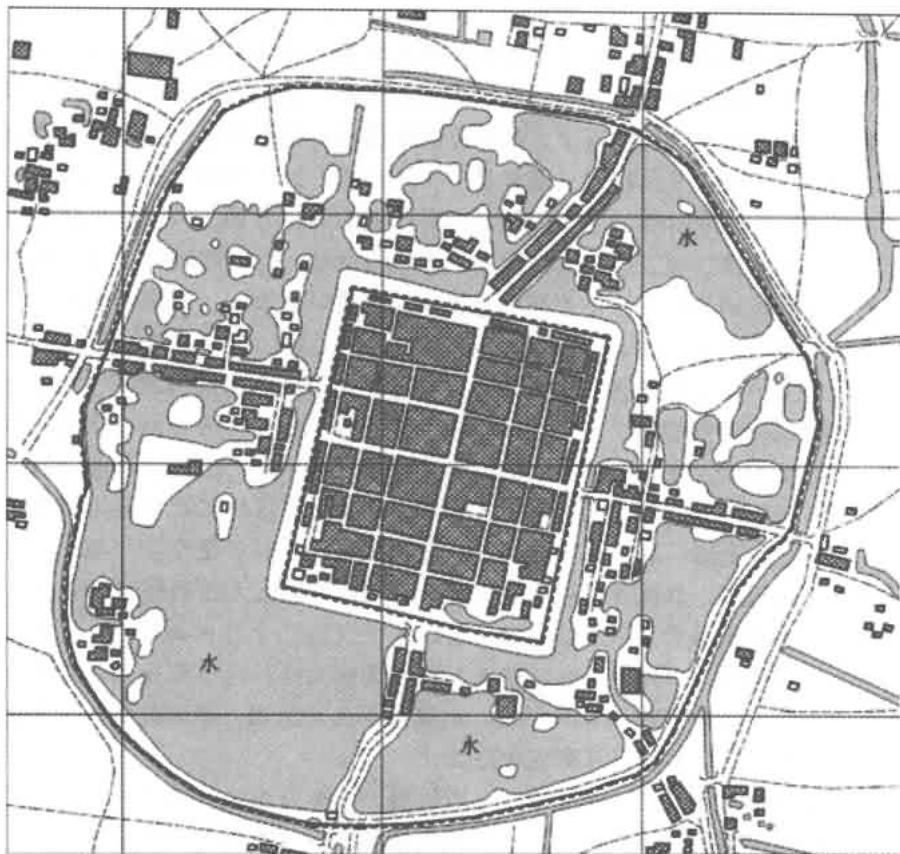


图 10-20 商丘古城平面图

(引自 <http://bbsimg.dahe.cn>)

第十一章 《管子》中的城事防御思想

筑城的材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由土石转换成了砖石，这在明后得以大量的实现，从各方志中可窥其概况。砖石筑就的城墙自然其坚固性及防卫功用就比之土石城墙有了大大的进步，是一大飞跃，也是各守城官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尽可能地用砖石进行增修、扩建的主要原因。当然，材料的变化相对只能算是一个不动因，好比城市的初建一般，在其本身而言，建成时就已达成了使命；而守城的其他方面——城事防御则属于动因，比如建好城之后的维修和守护等经营活动，须时时进行，并根据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这些措施该如何决定和实施，涉及守城策略、守城器械、及守城设施的完备程度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武，一是文；可能就是调节和制约中国政府各种措施的主要力量。”^{〔1〕}也可能是影响城市经营的两个主要力量。城市的经营上也分为两方面：守城的概念，在这里不仅仅是战略意义上的城市军事防卫——武，还包含了确保城市生活正常进行的管理行为与各种维护活动——文，可以将二者合之为城事防御。“故有人无城，谓之守平虚。”^{〔2〕}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3〕}同样，城区大而居民少的，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军诫秘术·巧攻善守》：“凡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众多，粮储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浅而守具不足，水高城下而可溉灌，诸如此例，皆弃而徙之。故曰：三里之城，万家之守足矣。”

《轻重甲》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意为，城防不固招来敌人进攻，没有粮食储备招来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能不加以考虑呢？其中的城防即是武的一面，粮食储备则作为文方面的代表，在东周时期诸侯国林立纷争的环境下，这两方面的详细策划显得尤为重要。

“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

〔1〕〔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76。

〔2〕管子，揆度。

〔3〕管子，八观。

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1〕说明立国需依天、地、人三险，修法度、增高深、扼要害、为城郭、沟池、关隘、亭障等，无险修险固之备，有险也补其不足、疏其不通，而城防同理。

城市之经营在于建城与守城两方面；当城市建成之后，即以守城为要；而守城又包括日常维护与军事防御。以下将引用文献中相关的实践经验与理论作为辅助资料，总结、研究方志中的城市经营，从城市日常管理与维护及军事防卫两方面进行论述，来论证《管子》城市思想的城事防御论，即是由建城与守城这两方面经营活动所构成的务实论。

第一节 日常管理与维护

《度地》曰：“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则臣之义也。”君凭借城以治天下，臣管理城以尽忠职守，民则以城为其根本，对城的管理建设是君、臣、民等所有人的职责和义务。

《形势解》曰：“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马是作为在外骑乘奔跑的，因此就算不用时对马的喂养也不能懈怠其事。以养马为立城养民之喻，即使无敌寇来范太平之时，也应兢兢业业治城守土，不违其事。

《管子》中守城的负责制：“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2〕作为地方官，有责任将维护、修缮城墙、濠渠及城门水闸等城池防御设施作为守城头等大事。

《管子》中守城实略之一：“若岁凶旱水沴，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3〕如果遇到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榭，雇用穷人在做工为生。故而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政策。

〔1〕〔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卷087。

〔2〕管子：问。

〔3〕管子：乘马数。

《管子》中守城实略之二：“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1〕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常耽误其农业生产。故欲成就其事就应该因时行事。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和物价变动，发布法令以平准，控制经济上开放收拢的主动权，而并不去向百姓求索。

对城池的全面经营除了政府地方官及地方乡绅的积极倡导、建议外，需要劳力和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事实上往往由于资金无法到位，而使得经营要求不能如期、如愿实施。因此招集劳力、筹募资金是地方官等必须首先解决的大问题。在张志尧所著《拯溺凭谁湮息壤：潮州堤防史话三题》一文中，就根据地方志乘及档案资料地招集劳力、筹募资金的方法进行了归纳。虽然其针对的是堤防设施方面的，但放之整座城池的经营活动同样适用。方法如下：一、劳力招集方面，有劳役方式、分属负担方式等。二、资金筹集方面，有上级拨款、国库拨款、关税利息、防御经费、地方拨款（含罚没、公产、慈善拨款等）及捐助（含官捐、民捐等）方式。〔2〕无后顾之忧的城市经营才有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从方志记载来看，城池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又首以水利设施及城墙的管理与维护为要。吴庆洲先生在《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中总结八条古代城市防洪的方略：防、导、蓄、高、坚、护、管、迁，大多是与城池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密切相关的。其中：坚字方略，“采取各种工程措施以保护城基”经受洪水侵袭；护字方略，对“城市防洪的基础设施如城墙、堤防、门闸以及壕池、河道、沟渠等”，进行“经常的维修、维护”；管字方略，“管理好城市防洪体系及各子系统”，管理好城市水系等排洪排涝基础设施；迁字方略，包括让江河改道远离城市、迁城及迁人和物三种。〔3〕

一、水利设施的管理与维护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4〕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5〕。在中国古代城市灾害中，水灾所带来的损害是最大、最频繁的，轻则屋倒墙塌，重则城毁人亡。故“除五害，以水为始”〔6〕。《度地》篇中有载得十分详细的治水具体措施：“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

〔1〕管子·乘马数。

〔2〕张志尧。拯溺凭谁湮息壤：潮州堤防史话三题。潮州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96：128-134。

〔3〕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76-483。

〔4〕管子·度地。

〔5〕管子·度地。

〔6〕管子·度地。

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甬、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伞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储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阅具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次更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效。此谓备之常时，祸何从来？……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为败。”设专职水官管理，未雨绸缪，一年四季有备无患。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成灾，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首要的是围河筑堤，遏制河水外溢，并用堤坝拦挡，以驯服河水。除黄河外，在齐国还有大清河、徒骇河、马颊河、沐河、沂河、汶河、胶莱河、大沽河等内河水患。这些河不少是发源于山区，夏季常有山洪暴发，源短流急，常有水患发生。因此要沿河筑堤，工程规格、质量，要求很高，在修筑堤坝的同时又修了路，一举两得。“关于修筑堤防的技术，首先注意季节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如果在冬天施工，则冻土严重影响堤土的夯实，待到春夏冻土溶化，肯定会造成堤坝的陷落和崩塌，夏天土壤水分过高，亦会影响夯土质量。”〔1〕修堤更要护堤。冬天要委派水官巡视检查堤防，需要修治的地段，就要具文向都水官报告，以便统筹安排，来春修整。进入雨季，为了确保大堤安全，要派人分段看护，抓紧修补，人力不够时就给徒隶补充。堤坝还要经常加高加固。在大堤两旁种植荆棘、灌木、杂草和栽种树木，以加固堤防。自周代始，已有于沟渠旁植树以固堤岸的制度，故《管子》根据先人经验提出了详细的巩固方案。〔2〕河堤两侧种植荆条、灌木，栽植大杈，使其盘根错节，既加固了堤防，提高了抗洪能力，又美化了环境，同时还可大量增加经济效益，扩大林木来源。治水也不单是堤坝的修筑，还要兴修农田水利，疏浚河道挖沟修渠使水路通畅，兴修水库，蓄水抗旱，既减轻了山洪暴发的冲击力，又灌溉了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旱能浇水，涝能排水，雨水过多时也无害于五谷，治水的基本要求就算达到了。

临淄经济的破坏与衰退就是水运的衰竭引起的，即由于黄河的泛滥造成黄河下游和济水中游环境的恶化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恶化。临淄在兴盛时期与中原地区有关频繁的交通运输，并以此支撑其经济发展，而它的主要运输线为济水，由济水沟通黄河、淮河及长江流域。因而济水航运的通畅与否与临

〔1〕于嘉芳。“磨折以叁伍”新解——兼论齐国农田灌溉和水利工程。管子学刊，2000，2：86。

〔2〕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30。

淄城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自文帝时起,黄河经常泛滥,尤为严重的是武帝元光三年,河决瓠子,泛滥达十六年之久,使济水河道受到黄河泥沙的淤填。再者,由于黄河的含沙量日渐增大,茌泽经过长期的泥沙淤积,其蓄水拦沙的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济水的含沙量增大,河床日渐淤浅,通航能力下降。王莽时大旱,济水枯竭。^{〔1〕}其实,王莽时黄河长期泛滥使济水已不能通航。东汉时,主要治理汴河,济水也就再也无人过问了。从汉武帝到王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其间没有战争的影响,临淄的城市经济也因交通的破坏而逐渐停滞、衰退,人口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虽然临淄的衰落较为缓慢,但在其外部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如一旦受到战争或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就很难再恢复,因而,在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乱之后,衰落下去的临淄一蹶不振。

中国古代城市的护城河工程属于城市水利工程体系。所谓“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2〕},即说明了护城河对城池的防卫作用。整个体系包括:引水工程,护城河的源头一般为上游的河、湖或泉等,这就需要专门的引水系统来实现;排水工程,用以将护城河水导入邻近的江河等;溢洪工程,于暴雨来临或河水泛滥时适时、快速将水排走;蓄水工程,将水收集起来,到枯水、干旱时节即可供水。而且以上各个部分并不是各自在起作用,而是构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在运行着。^{〔3〕}还有的古城会在城墙之外加筑一道护城堤,堤外再绕以沟渠,这样城池就相当于有了双重的防护屏,既保障安全又防御洪水。如河南省淮阳县,古称陈州,建在高地上,城外有湖堤围绕,这里的湖堤即为护城堤。在该城历史上曾多次遭黄河水袭击,皆因有湖堤将洪水挡在其外,且黄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也因此在此沉积下来,久而久之形成堤外高而堤内低洼的地势,如明代治水专家刘天和所言“自堤下视城中如井然”。明清时期有许多城市都筑有这种堤,并形成这种现象。^{〔4〕}

在我国古代,大规模地采用引水灌田技术始于春秋末期,这与当时铁质工具的逐步普及相关,如楚国修建的芍陂,吴国开凿的邗沟,到战国时期更出现了魏惠王时期的引黄河灌溉,西门豹引漳水溉邺。《淮南子》:“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皇览》:“楚大夫子思造芍陂。”《水利通考》:“楚孙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利。”《一统志》:“孙叔敖为楚相,截汝汶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该水库约建于公元前614~前591年的春秋中期,上引淝河之水蓄于白芍亭为湖,可调节

〔1〕 续汉书·郡国志。

〔2〕 孙诒让注疏。周礼正义。

〔3〕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中国水利史稿,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224。

〔4〕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中国水利史稿,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225。

性地灌溉农田达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目前尚存陂堤约 24 公里,仍可灌溉农田达十五万亩以上。《绝越书》:“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渚以东至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指的是楚国另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无锡河,为春申君所开。《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公元前 370~前 337 年)时,引黄河水于甫田,又凿大沟于北郭以导甫水。秦昭王时期,李冰父子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凿离碓,避沫水之害,建成都江堰,引水溉田以万亿亩记。^[1]这些引水工程,一是直接从江河中引渠,一是修堤坝,安水藏,截水蓄水,广开水源,抬高出水口的水位,然后再开渠引水。显然后一种引水方法技术含量高,实用性强。

以西湖、钱塘江及运河等水系为主要环境因素的杭州城,其水系的整治与完善对城市的发展即起了很大的作用。“杭州城建设了以西湖、城濠及城内河渠为主干的城市水系,具有多种功用,包括供水、防火、军事防御、灌溉、园林绿化等功用。”“这一城市水系靠历代的建设和管理。”^[2]自唐代经李泌与白居易整治水系之后,杭州的城市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西湖游览志》记之曰:“代宗时,李泌刺史杭州,悯市民苦江水之卤恶也,开六井,凿阴窦,引湖水以灌之,民赖其利。长庆初,白居易重修六井,甃函、筑以蓄泄湖水,溉沿河之田。”^[3]筑暗管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井内,极大地方便了城中居民日常汲饮洗涤。其后多次进行修缮增补,保障了该城的正常运作。^[4]五代钱镠时,“湖葑菱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入运河”,治理西湖与修筑钱塘江堤坝,因而创造良好条件使得杭州城“财力殷阜”、“兴作自由”。^[5]宋苏轼任杭州守郡期间,因“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6],更吸收前人治理西湖的经验,如“积葑草为堤,横跨南北两山”^[7]、“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见今公私舟船通利”^[8],为杭州城建设完整水系提供了西湖这一前提条件。南宋绍兴年间又多次修挖运河。明代则增凿了许多“甘井”,并在城内开河引湖水。基于此,整个城市的水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

[1] 刘叙杰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一卷. 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291.

[2]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438.

[3] 白居易《钱塘湖石记》云:“(钱塘湖)北有石函,南有筑,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田十五顷。”

[4]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 中国水利史稿.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9: 223.

[5]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 卷一.

[6] 苏轼. 钱塘六井记.

[7] 宋史. 河渠志.

[8] [清·乾隆] 杭州府志. 卷四十.

善,且形成一个完整系统,“有上、中、下三河,转辗递注,皆受西湖水”〔1〕。至清朝“康、雍、乾、嘉中皆大浚之”〔2〕。明清间“南方城市的水系是直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3〕,欲保持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就势必要维护好水系。乾隆《杭州府志》卷三十八载:“梁开平四年八月,吴越王钱镠始筑捍海塘。”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重修捍海石堤,“用钱氏旧法,实石于竹笼,倚叠为岸固以椿木,环亘可七里,斩材役工,凡数万,踰年乃成”;“九年知杭州马亮修江岸成”;“天圣四年侍御史方谨请修钱塘江岸斗门二所”;“景祐三年四月知杭州俞献卿筑堤数十里”,“工部侍郎张夏作石堤一十二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庆历四年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筑堤二千二百丈”。〔4〕至明清时期,更是重视钱塘堤的修筑工程,“历年添建工程更为坚实”。如此连续不断地修筑钱塘江堤坝,既保护了杭州城,又保护了民田,“于省城足资永远巩固”。〔5〕〔6〕可以说,“杭州是从筑塘防海开始诞生、发展,成为一座中外闻名的大都会的。”〔7〕(图11-1)

寿阳,古名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有着战略意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由南经肥水、施水和巢湖可通长江;从北经淮水、颍水、沙水可入黄河;沿淮东下转泗水、汴水也可入黄河。由于其地势低洼又处于淮、肥、淝三水的包围之中,随时可能受到其中一水泛滥时的冲击,因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适合自身的护城河防洪体系。南北朝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北魏南侵攻打寿阳城。守将垣崇祖在城西北筑堰壅肥水淹城四周以阻魏兵,又在堰北筑小城,在小城四周挖壕堑通水并派兵驻守。魏军无法直接攻城转而攻小城,于是南齐军趁其不备决上游一水坝口,将魏军卷入汹涌之水。寿阳城从而得保。此后30多年的梁天监年间,寿阳城为北魏所据。梁武帝为夺取该城,下令筑拦淮大坝浮山堰壅高淮水淹城。堰成淮河两岸数百里内一片汪洋,然而寿阳城虽在洪水的浸泡下有所损坏,但仍无损其防洪、防御能力,使得梁军始终无法攻下该城。说明该城的护城河体系其防御及防洪能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8〕

〔1〕[清·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十。

〔2〕[清·光绪十八年]浙江省城图,说明。

〔3〕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08。

〔4〕[清·乾隆]杭州府志,卷三十八。

〔5〕[清·乾隆]杭州府志,卷三十九。

〔6〕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05-116。

〔7〕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30。

〔8〕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中国水利史稿,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228-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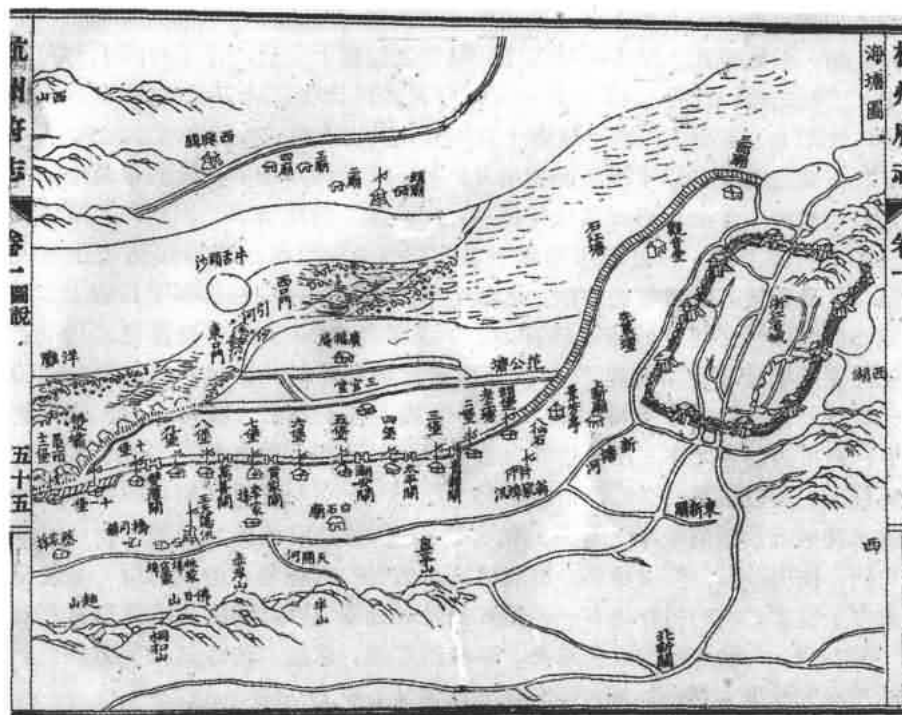


图 11-1 海塘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37)

二、城墙的维护

“夯土筑城起墙，在原始社会城市及聚落遗址中已有实例，……这种夯筑技术起源甚早，它的进一步完善，恐在大禹治水之际。虽然当时理水以疏导为主，然而堤坝的建造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对于夯土的密实性与防渗性格外重要。……在石料匮乏和陶砖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夯土无疑是最重要的建筑手段之一。”〔1〕

“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约公元前 3300～前 2800 年）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版筑夯土城址，其中挖槽筑基和版筑技术标志着城垣建筑技术已开始趋向成熟和完善。”〔2〕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杜祐通典·守拒法》中提出城墙高宽的比例并举例加以说明：“垒高土厚，城坚沟深，粮实众多，地形险阻，所谓无守而无不守也。……凡筑城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料功。上

〔1〕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76。

〔2〕萧红颖，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南京：东南大学，2003：86。原文参考自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7。

阔下加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积数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筑土二尺，计工约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计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计工二万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计工七万五百人。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并计之大功之内。”

城墙之初建是以军事防御为出发点的，随着城市使用功能的日益增加，人们在实践中学会运用城墙以作他用，如防水、防洪等等。因而，“城墙既是军事防御工程，又是城市防洪设施”〔1〕。〔2〕用现成的城墙防止洪水攻城，是最直接、最省事的方法，这就必然将城墙的坚固性提到了日程上，而城墙的坚固性必然从城墙基础开始。“我国自6000年前古城出现之日起，就注意了城墙基础的处理。”基础处理要针对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有总结历代筑城经验的筑城（基础）法：“……基固。开土及丈，或得盘石，或得垆矿，皆可为胜重之本。浮泥松沙，必垦令尽。试观掘井者然，层沙层泥，下辄黄土。基较所载，必广厚倍之。乃久而不圯。”〔3〕有重筑城垣，在旧城为洪水冲毁之后汲取前车之鉴总结的办法：“以城之旧址浮而斯濫，今当发深一切，抉去砂石，实以精壤，重加镇筑，然后广其宿基，增诸石版，必使坚永俾于铁壁。”〔4〕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基础处理方法，如桥式木排承重基础（图11-2）、桩基础、冶铁基础、深基础等等。总之，注意基础的坚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城墙经受住洪水的考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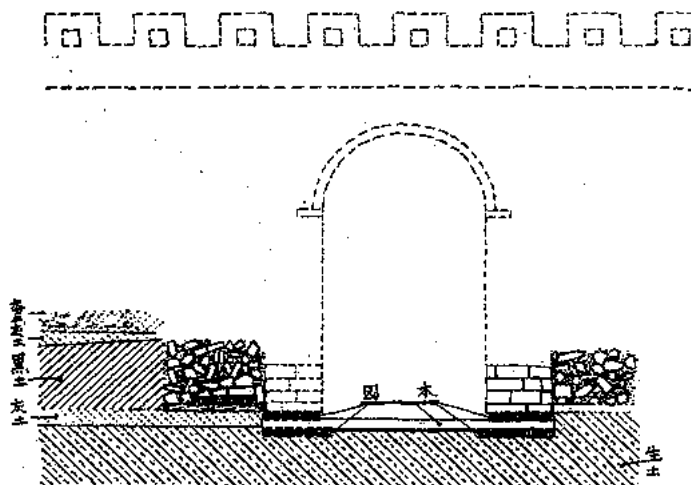


图11-2 苏州齐门古水门纵剖面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519）

〔1〕 吴庆洲. 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1.

〔2〕 刘叙杰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一卷. 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90.

〔3〕 魏源. 圣武记·城守篇.

〔4〕 杨麓. 歙州重筑新城记.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城池.

〔5〕 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17-520.

城墙要达到耐用的要求,堪以承受防洪的重任,就必须得到长期不间断的修护。对城墙的维护,《管子》里提到,“树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1〕,即在城墙上种植荆棘,利用其交错纠结的特性,加固城墙,提高城墙的韧性,并且每年都要适时对城墙进行增修、补修,做到防患于未然,才能“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之葆守也”〔2〕。秦以前的制砖技术尚属稚嫩;汉时有所提高,制造出可作不同用途的砖,从四川广汉东汉雒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可知,当时的城墙已使用了砖作为夯筑主体的外包材料。尽管这之后陆续有一些城市使用砖砌,且宋代的制砖技术趋于成熟,但直到明代以前也并没有普及开来,土筑仍属于主要的城墙构筑方式。如郑州商城的城墙全用夯土版筑而成,城墙的横断面呈梯形,其中中部的主城墙层层平筑,内壁近于垂直,梯形的两腰为护城坡则倾斜夯筑,以支撑主城墙。此时步步加高墙身的筑法尚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如元大都也为土城,因年年用芦苇覆盖墙头以防雨水而被称为“黄蓑城”,土中即用竖向的永定柱和横向的柃木来加固城墙。从防御上考虑,当还处于冷兵器阶段时,土筑城墙尚能起到较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城市,其城墙所用泥土较之南方的更为优良,那么城墙本身的坚固性也更强。而当明初火器大量制造和使用后,土城的防御性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往往是致命性的。“由于火药的普遍使用,火攻武器威力渐大,迫使作为防守用的城墙非得变得坚硬起来不可。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的重要段落,在明代进行了包砌。其工程之大、用砖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他如南京、北平、西安等重要城市和很多州县都用砖砌起坚固的城墙。”于是,正如各地方志所载,在从官方拨款、民间捐赠等各个途径解决了费用问题之后,总是会或将土城换成砖城、或在土城外贴砖、或修补扩建等等。〔3〕

在城墙的土筑时代,其本身的防水及排水问题不容忽视。据考古发现,郑州商城主城墙内、外两侧的护城坡顶,其面上铺有一层料姜石碎块,可防止雨水的冲刷(图11-3);战国赵邯郸王城及“大北城”西墙北段的城墙身上均有排水槽道(图11-4),及在王城西城南墙上铺设有筒、板瓦,应才是防止雨水冲刷、渗透的措施;另据《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即载有“蓑城”法,在雨季用草覆盖城墙以防水,这应是维护城墙的方法之一,如以上提到的元大都城用的就是此方。〔4〕西安城墙上也有合理的排水系统。清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大规模修城,在增修城墙排水系统时,先是统一顶部的倾斜度,而后在城墙内侧每隔40~60米通高修一道排水槽。共167道

〔1〕管子·度地。

〔2〕管子·度地。

〔3〕本段观点及资料引自、参考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433-434;杭侃,中国古代城墙的用砖问题,文物世界,1998,1:81-84;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37-38、221。

〔4〕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11-12。

槽，槽身为砖石结构，口宽 0.65 米，深 0.76 米，壁厚 0.6 米，顶部为石制吐水嘴，下部与沟渠相通。雨水经城墙顶部 $10^{\circ} \sim 15^{\circ}$ 的斜面即可流入排水槽，由排水槽直接导入城墙脚的沟渠，从而防止雨水长期对墙体的浸泡、渗透，有效地保护了城墙。〔1〕另一点，城墙要尽可能防渗。可采用夯土墙体、牛践土筑城、糯米汁石灰浆砌筑城墙及筑心墙等防渗措施。〔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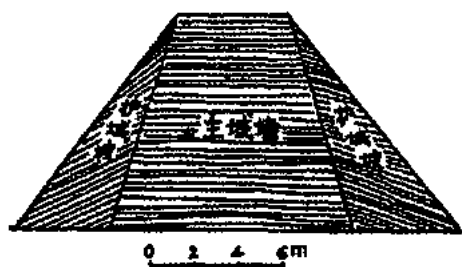


图 11-3 郑州商城夯土墙横断面示意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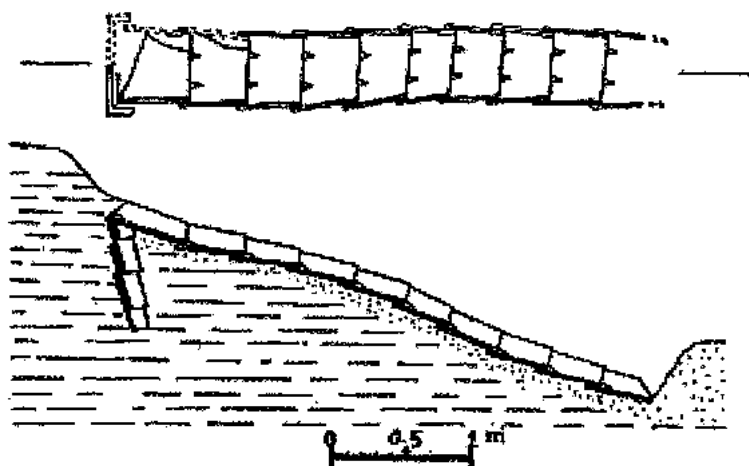


图 11-4 赵都邯郸西城东南墙排水槽道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2)

当然，在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城市空间其范围及类型都要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下城墙就必然成为阻碍城市拓展的“紧箍圈”。城市需要扩大与城墙界定的有限范围之间产生了矛盾，当该矛盾到了

〔1〕王卉. 西安城墙的排水系统. 丝绸之路, 2001, 1: 63.

〔2〕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524-525.

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就如有的方志中提到了迁城址，此解决方法通常是在原城受到较大的损坏之后进行，或是增建附城、关厢等来缓和。

“寿县古城位于八公山之阳，淮、淝之滨”〔1〕，历史上水患较多。“据清光绪《寿州志》记载，南宋绍熙年间恢复故城，嘉定年间重修……。初建城墙，原为军事防卫而用，后来因黄河水不断南泛，淮河水患增多，城墙遂兼有防洪功能。由于城池地面低洼，高程只有18~23米，每遇淮、淝水涨，四周一片汪洋……。建城以来共有六次破城，‘军民房舍倾圮无算’，‘民遭没者三千有奇’。频繁的水患，严酷的现实，使地方官员逐渐认识到防汛抗洪是寿州政事的先务之急，形成了‘御水保城，重在于防’的观点，采取许多维修加固措施。明清两代大规模维修即达27次，主要办法是：（1）对水毁出现的问题及时补修。今日环绕而视，累累斑痕，可发现30多种不同时代、不同规格的城砖。（2）对城外加以护坡。明万历年间，知州郑琬‘乘民之暇，畚土于郊’，精工夯筑，使得土岸‘崇隆壮实’，既厚且坚明嘉靖年间，御史杨瞻，筹款‘万余金’，把地势低洼的3000多丈土岸外围砌成古堤，使城垣平添了一道坚固的防线。（3）对城门加以改造，原来四门均有瓮城，瓮城的内外门均在一条中轴线上，后来除地势较高的南门以外，对东、西、北三处瓮城的内外门向、位置，进行变通：东门外门位置北移，偏离中轴线4米，北门外门向西，西门外门向北，内外门道在平面上呈90°直角。这样交角处理，不仅有利于军事防御，还可减轻凶猛洪水的冲击力。”〔2〕

“上海自元初立县后262年间未筑城墙，主要是‘邑人多以海营生，素习武艺，并不惧海寇来犯’〔3〕，认为无筑城必要。……久不筑城的另一原因是库藏空虚，无从筹措经费，因此虽有人提议筑城，但屡议而屡寝。”〔4〕“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至六月间，上海县城连遭五次焚掠，‘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署，邑里为墟’〔5〕，上海民众始决定筑城御倭。当时任光禄寺少卿的顾从礼即上奏朝廷：‘今编户六百余里，最难防御……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要求朝廷‘转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衰苦’，主张迅速‘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松江知府方廉也表示：‘斯城之筑是以民委之盗也’〔6〕，遂下令征集捐赋，勘定基址，趁倭寇暂退之际赶筑城墙，吏民竞相资助，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7〕”〔8〕“上

〔1〕姜瑞璜. 防汛话城墙. 治淮, 1998 (10): 50.

〔2〕姜瑞璜. 防汛话城墙. 治淮, 1998, 10: 50.

〔3〕原注：〔明·弘治〕上海县志.

〔4〕俞宝英.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8.

〔5〕原注：〔清〕谷应泰. 明倭寇始末.

〔6〕原注：〔明·万历〕上海县志.

〔7〕原注：〔清·乾隆〕上海县志.

〔8〕俞宝英.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9.

海城墙是为应付紧急军事而修建的,由于时间紧迫,工程主要用版筑,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破土兴建,十二月即完工。城墙围长9里,高2.4丈,设有宝带门(小北门)、朝宗门(大东门)、朝阳门(小南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西门)、晏海门(北门)等六座城门;还建有四座水门,沿城墙有护城河,河上可以行船,城墙上还有万军台、制胜台、振武台三座敌楼以及二十余个箭台,在东北城要害处,增筑高台层楼三座,楼分三层,置陈珩旧额其上。……城建之后,明政府专设海道于上海,董邦政为首任金事,有‘三千战兵备倭’,防御力量较前大有增强。……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城墙在万历、康熙、乾隆、道光年间多次修复加固。”〔1〕

第二节 军事防御

《管子·兵法》曰:“无守也,故能守胜。……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用兵中至善者乃不战、以守取胜,因而要重视城之固守。“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即守城时不要寄希望于敌之不至,而要依靠自身的充分准备,创造敌无可攻破的条件,严阵以待。中国古代城市自都城至各级地方城市,历来都重视其防卫体系。至于该如何守城防御,在中国古代城市的长久发展进程中古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中国历代都城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在实践中不断经历着变化,以自身的强固和完善来抵制日益先进的攻城手段:城墙由二重发展到四重;濠池总的趋势是变得更宽更深;城墙建得越来越高;城墙由夯土墙向砖石墙演进;城门外的瓮城由一重向二重乃至三重演进;在热兵器出现后,城门洞变为砖石券门洞,瓮城前楼演变为箭楼;用糯米汁石灰浆砌筑;在城池之外设防,在京师之外设防线。〔3〕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将法书·攻守》曰:“善守者,当之则有所不能攻,高峻其墉,深峭其池,辅以寨栅,重以沟障,固以大车,险以蒺藜,远设斥候,严慎鼓旗。寇来先闻,预为之备,寇至坚守,不妄争利,伺其怠隙,乘其不意,败乱其众,使攻者不能为勇,无所用智,气沮力惫,迁延引去,此善守者致然也。”

《永乐大典》卷八千二百七十五之叙兵、卷八千三百三十九之兵守对中国古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均有翔实的收录。以下将引用其中有关的内容作为佐证,前人之述备矣!

〔1〕俞宝英.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 30.

〔2〕孙子. 九变篇.

〔3〕吴庆洲. 明南京城池的军事防御体系研究. 建筑师, 2005, 2.

一、守之君、守之将、守之士、守之具

“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1〕“形势器械具，四者（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备，治矣。”〔2〕若是“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3〕，“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4〕

《管子·问》曰：“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饷廩何如？……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辔家车者几何乘？……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饶、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夹锁之衣、钩弦之造、戈戟之繁，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帅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乡帅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蔽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之官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筑城郭，修墙闾，绝通道，阨门阙，深沟防，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管子·参患》又曰：“兵不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徒人，与残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正所谓“慎谋乃保国”〔5〕，官吏、军士、兵器、车马、粮草、城郭等等均为守城之必备，其平时的准备与维护不可疏缺，否则有等同于无，甚至弊大于利，“此所谓素有备而预具者也”〔6〕。以上《问》之大半篇幅所询问的正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况，显示出对保国守城的关注，及深谙养之千日方可解一时之燃眉的道理。

（一）君在大方针政策方面循守之道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续后汉书·兵守》曰：

〔1〕管子·参患。

〔2〕管子·七法。

〔3〕管子·七法。

〔4〕管子·七法。

〔5〕管子·问。

〔6〕管子·度地。

“兵之为守尚矣，凡建侯树，屏列之采卫，皆以守卫中国。分乡置遂，赋之师旅，皆以守卫京师。设防会禁，统之方伯，皆以守卫列国。边徼则有戎役，宫闾则有环列，皆所以为守也。故兵为天下之大闲，谨其所守，相为维捍，则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责于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闲。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则守在四夷至于出居于郑，失其所守则不足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为京师，是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无以为闲也。诸侯，守国者也，有道则守在四邻，至于郛溃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则不足为公，浚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为都邑，是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无以为闲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弃。强暴侵夺，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结其民去而复国避之可也。……若夫战攻于外，则必有居守于内，以为本根。进有所恃，退有所归，股肱心腹相为表里。”

（二）将对于守之事必须面面俱到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续后汉书·兵守》曰：“城守拒攻，将之事也。守心为上，守气次之。守兵为上，守城次之。心为气城，兵为城城，心固则气固，兵固则城固。静密专安，内外如一，无隙无瑕，以主待客，虽画地守之可也。况于城乎！又必兵械备具，薪粮足馥。进有郭围，退有停障。远有救援，迤有间候。畜力多暇，明慎罚赏，申饬教戒，禁绝讹妄。血视肉薄，示之必死。……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渊若海而不可测，寂若无人而不可见，应若无端而不可穷，故攻为易，守为难。活地易，死地难。将将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三）守城之士包括守军与城中居民

平日里守军需按守城之法勤加训练，真正到了危难之时，则应是全民皆兵。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玉帐玄枢·守城》曰：“守城之法，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称杂攻之要，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皆有将，其将长武文相兼，量材授任而统领之。敌在城外，城中有火，须防有奸人内应，但令通便近主掌，管老少妇女救之。及遣大将亲作左右监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辄离职掌，乱走街巷犯者斩。”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军诚秘术·巧攻善守》又曰：“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五十步、百步皆立其长，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领之。其城内先量兵多少，简募骁勇分为十队，或二三十队，大将副将各领队绕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内老少及丁女，除营食之外，应为役者，城上四队，城下树其一队，使识文字者点检掌其备守之物，各以为八部。”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杜祐通典·守拒法》亦曰：“城内老小男女，除营食之外，皆令应役。城上分为八队，使识文者，点检常须备拟物为八部。”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太白阴经·攻守》曰：“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力费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

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

“宋代各城置有专管修补城垣的厢军，称作‘牢城’或‘壮城’。”〔1〕

（四）守城的器具需齐备以在需要时发挥应有的作用（图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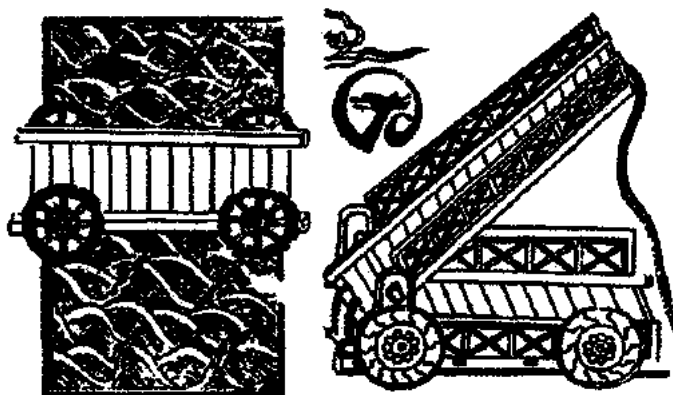


图 11-5 《武经总要》中的撞桥和折叠桥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玉帐玄枢·守城》曰：“守城之法。灰砂、铁、铜、镬、盆、瓮、礮石、水筒、长刀、长斧、长锥、长镰、连枷棒、棍棒、长短枪、瓦砾、礮石之类，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贮积之处，预以泥厚涂之，火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盖者，用泥厚涂之，以防火炮。楼上楼槽吊钟板，皆皮裹用毡覆水湿之，以防火炮、火箭也。敌攻城于地道，来自于城上，凿穿一井截之。积薪井中，如火薰之。谓之天井。城内四傍穿井深二丈，新瓮皮幔于井内，枕听切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积石备礮石，随大小用。积木桶榴木长五尺，径一尺，至小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长茅枪刺之，则敌不敢近门。篳篱战格于女墙上，跳椽去墙二尺，内着横插。掾端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一丈五尺，安于掾端，以遮矢石。贼以火车将油镬煎炼推及城门，纵火而去，切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须众水俱沃，方可灭之。”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杜祐通典·守拒法》：“……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凡敌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并树墙屋并填除之，并有填不尽者，投药毒之。木石砖瓦茭刍，百物皆收之。入不尽者，并焚除之。其什物五谷，粮鱼盐，布帛医药，功巧戎具，锻冶秸稿，茅荻芦苇，灰沙铁炭，松桦蒿艾，脂麻皮毡，荆棘篳篱，釜镬盆瓮，石雷木铍斧，锥凿刀锯，长斧长刀，长锥长镰，长梯短梯，大钩连锁，连枷连棒，自棒、芦竹为禾享，之顺反。插以松桦，城上城下，咸先蓄积。缘人间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缉。抛石大小随事。”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十四章 建筑设计与建筑施工，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09。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行军须知·守城》曰：“兵法曰：守城者，则深沟高垒，坚壁利刃，藏声灭迹，常令防城。占具敌棚，楼橹完壮，以备应急使用。边城并宜足备陈此名件，预知施設更在临时，取其利便。一用火筒火炮，长枪糯米手炮，伤上城人。一多设备城毡帘笆篱牌沙，隔遮其矢石。一多置救火水桶，要堤防积薪烧城门楼橹用。一当城门路安置转关、机桥木、马子陷、马坑、铁蒺藜。一多设照城灯笼，防夜后有贼人凿城于黑暗处。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乱军。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烧填壕柴草。一用火炮打距堙土山鹅车洞子。一城寨若在乎川，或侧有高原，泉水成流。及有江河须防决壅灌城之患。今河东古太原城，宋决汾水而灌刘维元是也。一城上以彩旗诈为旄，使敌人仰望城上，即顺风吹扬糠粃、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猛火油灌之，劲弓硬弩射之，以粪炮污之，砖石打之，即退。一城上多备泥浆桶麻搭，防敌人放猛火油火箭火炮。一用火钩烧红垂城下，贼人见之用手樊悬，以损其手。一烧城多置瓮听，恐有人马凿城为孔，昔恩州用此破之。一用旋风炮打填壕人、及围队人马。一垂火箭烧炙穴中，掘城壕人及掘天井填杀掘城人。一绕城多设突门，暗出勇骑人马，攻其不意之处。一城中空阔地多堆积砖石，可抛掷城下敌人。一收城中粪秽，用水调稀，顺风浇污攻城敌人。一贼若于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楼，观我城中虚实者，如城中军马数少，即以居民牛马尽与披挂衣甲，于街市摆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壮者在前，老弱者在后，俱要相接。次用妇女披挂擗立，不可与少壮男子相杂，恐生奸邪，可代正军防守门户，往来巡城应急使用。一可于城外聚集民户大军，及拆屋口大小竹木作木栅，周围密下枯签七里，栅外开深沟，起直吊桥。遇夜下锁蒺藜地，栅板差人伏路，城里重门击柝鸣鼓，知更提铃巡警，以防奸宄城门。当路安置转关机桥、木马子、陷阱坑，昼夜官军守把四门，盘诘奸细。一城内无事日，多穿井准备缓急，要水用度。及檐、桶、井绳之类亦备。一城内多用泥草及湿毡搭盖，积聚柴薪，令人宿护，防贼火烧。右已上防城之法，虽是广设备御，昼夜不停，巧施谋策，详在主将。度其虚实，临机应变，可以保全。”

“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1〕

二、城之守

“守城之道，重在城也”〔2〕，除了前一小节所讨论的守城各个因素外，还有城市本身的防御设施，当然它也是守城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城门，在城市受到攻击时即成为城防的薄弱点，必须不断加强、改进其构造。如在门上钉木线加涂泥或包铁叶以防火，在门上留孔洞作为射箭之处等。

瓮城，汉代已有此做法，并沿用至清代。

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谈到：“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

〔1〕管子·七法。

〔2〕永乐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

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需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据考古资料，史前城址时期已有类似马面的构筑物出现。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杜祐通典·守拒法》曰：“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城门先造连拒马枪，壮锐以锁连之。城内面别穿井四所，置水车大瓮二十口，灶十所。却敌上建墩楼，以板跳出为槽，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城壕面阔二丈，底阔一丈，以面阔加底，积数太半之，得数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壕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计功五人一步，五尺计功二十五人，五十步，计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计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计功七万五百人。以此为率，则百里可知。弩台高下与城等，去城百步，每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台内通暗道，安屋膝梯，人上便卷收。

……城内对敌营，自瓮城内为暗门……。城门先自凿扇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则敌不得近门栈，以泥厚涂之，备火柴草之类，贮积泥厚涂之，防火箭飞火。转关桥，一梁端着横检，拔去其检，桥转关，人马不得过，度皆倾水中。布巾曼复布为之，以弱竿悬挂于女墙八尺，折抛石之势，则矢石不复及墙。……

上八队之间，安转关小抛二，机关大抛一，云梯撞抛等其间先后城边，用木出跳为重女墙，高于土女墙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随事缓急而开闭之。敌若以大石击墙楼，石下之处出跳，空中悬生皮毡毯等袋，以乘其石。

……凡敌攻城，多背王相起土为台，我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台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又于城上以木为棚，容兵一队，作长柄铁钩，陌刀锥斧随要便以为之备。……

城若卑地下，敌人壅水灌城，速筑墙壅诸门及陷穴处，更于城内促团周匝，视水高中而阔筑墙，墙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后于墙内，取土而薄筑之。精兵备城，不得杂役。如有泄水之处，即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引泄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简募解舟楫者，载以弓弩楸钁，每船载三十人，自暗门衔枚而出，潜往斫营，决彼堤堰，敌觉即急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

敌有骁勇冲门进来，门内多穿坑阱，又于重墙内卒出其不意，敌必傍走，自入阱中。

……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为之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关，内重短为门合道，外柱木重长四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尺。又立门合道，内柱上布板木为栈立栏竿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守一如城垒法。

烽台。于高上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迥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

马铺。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弈计会，有事惊急，烟尘入警，即奔驰报探。

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捡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之《守城隶·靖康朝野金言后序》曰：“筑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头墙，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两女头中挂搭篦篱，惟可以遮隔弓弩箭，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篦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里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头上坠下害贼之物。

……于城里脚下取为深阔里壕，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开门，使人人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上新城脚下缭绕行三二里，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贼善填壕。止不过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里壕，贼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上新城上人直下临城，何物不可施用？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上有敌楼而虏人用大炮摧击，城外有壕而虏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而虏人用天桥鹅车、对楼、幔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虏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样，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观望。

及设施枪路，墙里近下以细小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人备风雨，屋在墙里，比墙低下，则炮在外虽大而数多，施設千万，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桥，桥中作钓桥，时暂隔贼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实桥，兵出入俱利。

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餘步置，不独贼矢石不入，其旧作门楼处。行人一步向里便是贼落陷阱，何谓陷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贼人，应敌之具，皆可设施。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餘，两头遮遏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坝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鹊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鹊台上立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观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头墙，墙里鹊台上载埋排杈木，以备贼填平壕堑，攻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贼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贼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齐用，使贼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按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贼人以何术可解。若此，则既有羊马墙，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于大城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又羊马墙脚去大城脚止于二丈，不令大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大近者虑其大窄，难以回转长枪。……

守城机要。

一城门旧制，门外筑瓮城，瓮城上皆是敌楼，费用极多。以御寻常盗贼则可，以遮隔箭镞。若御虏人大炮则不可用。须是除去瓮城，止于城门前，离城五丈以来横筑护门墙，使外不得见城门启闭，不敢轻视。万一敌人奔冲，则城上以炮石向下临之，更于城门里两边各离城二丈筑墙，长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门所在，不可窥测。纵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阱，故城门不可依旧制也。

一护门墙，只于城门前十步内横筑高厚墙一堵，亦设鹞台。鹞台高二尺，墙在鹞台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两头遮过门三二丈，所以遮隔冲突，门之启闭外不得知，纵使突入墙内，城上炮石雨下两边，羊马墙内可以夹击。

一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实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

一城门旧制，皆有门楼别无机械，不可御敌。须是两层，上层施劲弓弩，可以射远，下层施刀枪。又为暗板，有急则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门者，门为三重，却后一门如常制皆旧加厚。次外一重门，以径四五寸坚实圆木凿眼贯串以代板，不必用铁弃钉裹。又外一重，以木为棚，施于护门墙之两边，比之一楼一门，大段济事。

一城门外壕上，旧制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起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殊不知正碍城内出兵，若放下钓桥，然后出兵，则城外必须先见，得以为备。若兵已出，复拽起桥板，则缓急难于退却。苟为敌所逼逐，往往溺于壕中，此钓桥有害无益明矣。止可于门前施机械，便敌必不能入。拆去钓桥，只用实桥城内军马进退皆便。外人皆惧城内出兵，昼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赚板旧制用铁弃钉裹，置于城门之前。城上用辘轳车放亦是防遏冲突，其碍城内出兵，则与钓桥无异。既于城门里外安置机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为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角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更改，攻城者终是得利，且以城之东南角言之。若直自东南角攻则无足畏，炮石力小，则为敌楼战棚所隔。炮石力大，既必过入城里。若攻城人于城东立炮，则城上东西数十步人必不能立。又于城南添立一炮，则城上南北数十步人不能立，便可进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旧制也。须是将城角少缩向里，若攻东城，即须近北立炮。若攻南城，则须近西立炮。城上皆可用炮倒击其后，若正东南角立炮，则城上无敌楼战棚，不可下手。将城角缩向里，为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头墙旧制。于城外边约地六尺一个，高者不过五尺，作山字样，两女头间留女口一个，女头上立狗脚木一条，挂搭皮竹篾篱牌一片，遮隔矢石。若御大炮，全不济事。又女头低小，城外箭镞可中守御人头面，须是于

城上先筑鹊台，高二尺，阔五尺。鹊台上再筑墙，高六尺，厚二尺，自鹊台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个，眼阔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径及尺。相离三尺。又置一个，两眼之间，向上一尺。又置一个，状如品字，向上作平头墙，贼若登城，只于方眼中施枪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头墙，即是常用篋篱牌挂搭，不必临时旋施設也。更于鹊台上靠墙每相去四十，立排叉木一条，高出女墙五尺。横用细木夹勒两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过品字眼，亦不能到平头墙上。更至墙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过排叉木，必须用手攀缘，则刀斧斫之，枪刀刺之，无不颠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脚。其上皆有楼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毕备，须用毡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炮。一为所击，无不倒者。楼子既倒，守御人便不得安。或谓须预备楼子，随即架立，是未尝经历攻守者之言也。楼子既倒，贼必以石弓弩并力临城，虽损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中留品字空眼，以备观望，又可通过枪刀，靠城身两边开两小门，下看城外，可施御捍之具。墙里造瓦厦屋，与守御人避风雨。遇有攻击便拆去瓦厦屋，靠墙立高大排叉木，用分鹿绳横编。若造巴相似，任其攻击，必不能为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则积雨摧塌，修筑费力。城面不可太阔，太阔则炮石落在城上，缓急击中守御人。城面通鹊台，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边大郡城壁，高亦不过五丈，阔不过二丈而已。

一羊马墙旧制。州郡或无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过六尺，厚不过三尺，去城远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盖羊马城之名，本防寇贼逼逐人民入城，权暂安泊羊马而已，故皆不以为意。然捍御寇攘，为利甚博。当于大城之外，城壕之里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筑鹊台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阔四尺。台上筑墙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个，以备观望。遇有缓急，即出兵在羊马墙里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马。不可去城太远，太远则大城上抛砖不能过。太近则不可运转长枪。大凡攻城须填平壕，方可到羊马墙下。使其攻破羊马墙，亦难为入，入亦不能驻足。攻者止能于所填壕上一路直进，守者可于羊马墙内两下夹击。又大城上砖石如雨下击，则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敌。城内又有小炮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计百出皆有以备之也。

一羊马墙内，须均量地步远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门。分布安排人兵，易于点检兼防奸细入城。

一城郭旧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虽遇大敌，攻计百出，亦可退却。或不经历攻守者，忽遇大敌围城，不无畏怯，须是先为提备。当于外壕里修筑高厚羊马墙，与大城两城相副，即是一壕两城。更于大城里，开掘深阔里壕，上又筑月城，即是两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无可攻之理。大抵城与壕水，一重难攻如一重，至若里城里

壕，则必不可犯。计羊马墙与里城里壕之费，亦不甚多，若为永久之计，实不可缺。

一修筑里城，抵于里壕垠上增筑高二丈以上，上设护险墙，下临里壕，须阔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则有里壕阻隔。更使能过里壕，则里城亦不可上。若此则不特可御外敌，亦可潜消内患。里城里壕，费用不多，不可不设。庶免临急旋开筑也。

一修城旧制，多于城外脚下，或临壕栽丫叉木，名为鹿角，大为无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内，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风用火，可以烧毁。不若除去为便也。

一今来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军城池若作京都会府，须于城内向里，量度远近。再如外修筑一重，其外安置营寨，向里更筑一重作官府。若此岂独坚固而已哉！内外之患无不革尽。

一攻城用云梯，是欲蚁附登城。今女头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马墙重重限隔，则云梯虽多，无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镞，欲以搬运土木砖石，填垒壕堑。待其填平，方进攻具。或欲逼城剜掘。今既有羊马墙为之限隔，则洞子亦自难用。

一对楼则与城上楼子高下相对，鹅车稍高，向前瞰城头，向下附城脚。天桥与对楼无异，止是于楼上用长板作脚道，或折叠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马墙既有人守，自可两边横施器刃。又城上别用撞竿，与其他应急机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桥鹅车、对楼、火车、火箭，皆欲使人惊畏。有以备之，则不能为害。

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数条者，高与城等，直逼城头。今羊马墙中既有人拒敌，又大城上抛掷砖石，自然难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于城内靠城脚急开里壕，垠上更筑月城，两边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于棚上。又于欲来路上多设签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过里壕。纵过里壕，决不能过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无一二。今所备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则以数策应之。

一攻城用大炮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旧制楼橹，无有不被摧毁者。今不用楼子，则大炮已无所施。兼城身与女头皆厚实，城外炮来，力大则自城头上过，但令守御人靠墙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则为墙所隔，更于城里亦用大炮与之相对施放，兼用远炮，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领。盖攻城必以驱虏协从者在先，首领及同恶者在后。城内放炮在城上人照料，偏正远近自可取的。万一贼炮不攻马面，只攻女头，急于女头墙里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绳实编如巴相似，向里用斜柱撑抢。炮石虽多，亦难击坏。炮既不能害人，天桥对楼鹅车慢道之类，又皆有以备之，则人心安固，城无可破之理。”

三、守城实例

以下截取《永乐大典》中所载宋朝德安府城以严密、完备之军事防御措施守城池、却敌寇的实例，来进一步铺陈守城的各项具体措施，并说明守城

措施的重要性。〔1〕

北宋靖康元年至二年（公元1126～1127年）之交，贼寇王在、党忠等侵犯德安府，为守城官兵齐心齐力所击退。

“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围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后。

一踏逐过往寄居官进士勇敢者，借补官资差摄职事。

一选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诸门上城御敌，及分认地头，机察奸细，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级黄谨等行军期司，专一行遣防城守御修城文字，及各带器甲随规巡城。

一选差安陆县吏杨王介等提辖防城，军民弓手日夜巡逻，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拨军民弓手分作四队，及选差弓手节级长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队。内马立、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许进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刘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准备出战。

一差拨有心力胆勇保正队头黄寿等，部领保甲人兵一十六队，计八百余人准备出战。

一招集到茶客杨政等，自召募人准备出战，并僧雷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杀贼。

一城上极有尖狭，有不及一尺阔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无乳头，寻于城上里边用锹直削向下三尺以代乳头，下城镗道添造竹木棚栈，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御。

一城壁卑矮，遂于城外添立竹栅，间安篋篱，外可以遮隔弓箭，内可以施用兵伏，于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层。

一城有极卑薄处，遂于城内脚下离城三尺，别立木栅一重，约高一丈五尺。门空五寸，立木一根，于城稍低薄处，无不周遍。系于土城之内，又立木城一重。于木城之外，每两步立一人，与城上人更互上下守御。

一城门薄怯损弊，寻于门外别立小门一重，各以毡皮钉裹。上开门顶空歇以备坠石，及下施兵伏，又于门内两边栽立枋木，作鹿顶，约高一丈五尺，长五十步，其中路阔六尺。至尽处用木拒马四五重闭定，每五寸立木一根，两边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长枪。

一城上以千字文为号，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为一甲，十甲为一队，互相统辖，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户置籍结甲，上城守御。

一选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头二人，管押统领，昼夜准备应援。如东壁有报惊急，即提兵东应。西则西应。自攻围二十余日，每有惊急，无有不至者。

一于贼退之后，其未远止在四外侧，近围绕之中。寅夜偷工开壕筑城，仍命工人计城厚薄而中分，之先并力以筑其表。高及寻丈，度不可以骤登，

〔1〕永乐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守，守城策。

则又并力以筑其里适相当，然后增筑以成之。内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备警，起五邑之夫，万人竭作，不淹时而毕。

一城壁长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六尺，底阔三丈七尺五寸。及于城壁外开筑城壕，绕城壕堑计长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阔三丈，底阔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鉴于以上的防御措施，又有了之后的几次胜利：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9月，贼寇张世、李孝义等又犯德安府城，连续4日攻之不下，只得退走；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3月，杨进等群贼来犯德安府城，连攻16日而计穷力尽，只得接受招安；同年，贼寇孔彦舟三次进犯该城，无计而退；建炎三年寇董平、四年寇赵胜及寇曹成、李雄、绍兴元年寇桑仲下、邢尚孙、二年寇李横分别侵犯攻城，均不得其门而入，遂败去。

无论是都城抑或是州郡府县之城，其实用性被摆在了第一位，接着才是有国家经济实力保障的都城趋向于去寻求礼制上的完美。如果说实用成为了城市建造的初衷，那么不用说也是城市使用的实质所在。至于城墙是否依然完整与坚固、防御设施是否长保齐备及水利系统是否总是畅通有效等等，更是最直接影响城市各项职能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因而所谓城市思想，并不是仅仅用于营建城市，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建成后的使用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保护、维持及发展的方法、措施和策略。这点也恰好是以重实用为务的《管子》城市思想中的主旨。从《管子》城市思想的因地、时、事、人而应、以经济为主导及重人本三个特点（详见本书第四章）来看，与守城的目的与方法相契合。因而建城与守城的关系，正如构成《管子》城市思想中的营城思想与营国思想之关系：营建城市的营城思想，其“营”之意在建造；城市防与护的营国思想，其“营”之意则重在经营；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城市存续的基础和根源，后者是城市发展的手段和保障。由此，最终全面论证了《管子》城市思想的因应务实。

结 语

一、《管子》城市思想的形成

《管子》中有营国思想及营城思想。营国思想指的是全面的经营国家的方略，包含有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工商、牧民、哲学、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税收、盐铁、礼俗等等。营城思想则指的是营建城市的一系列方法与原则。在国家的经营上，营国思想是主要的，居于统治地位，对于营城思想有指导意义。在城市的经营上二者则是居于同等地位的，并且互为补充；将二者结合起来便构成《管子》的城市思想。

开放而富有活力的齐文化、管仲佐姜齐桓公称霸的伟业、田齐君王为政治目的创立稷下学宫等，分别是《管子》一书产生的渊源、背景和主因，是《管子》城市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纵横向条件。《管子》既对管仲的营国思想一脉相承，又博采众家之长。其城市思想的内在综合性与齐文化的特色相契合，外在适应性又与时代背景丝丝相扣，是齐文化的深层体现和高度浓缩。

《管子》一书产于齐地，受齐文化的浸润而生。齐国的地理概况、所处的文化区间及文化渊源，深刻影响着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了齐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即便是有着相近文化背景的鲁文化）的特质——那就是多元、开放与务实。这些特质以其无形中的引导作用影响着该区域内的文化产物，于是产生了颇具同样特点的《管子》一书。对于该书的形成过程来说，多元是手段，开放是观念，务实是本质；其具有延展性的大跨度的成书时间，决定其处于齐文化长期浸淫下的切实性；而其著书者的群体性，使其大量接纳外来文化，并与本土文化充分结合，筑就了多元的特色。对于该书本身而言，其内容是多元的，思想是开放的，出发点则是为了务实。齐文化的特质影响了《管子》的特点，二者是相通的。

二、《管子》城市思想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

《管子》城市思想具有因应务实的独特性。营城思想与营国思想是《管子》城市思想中的主要内容，两者共同体现了这样的独特性。营城思想是指具体的规划城市的方法，即城市规划思想。而营国思想则全方位地阐述城市从建立到发展所需的各种制度和策略，亦即城市管理思想，是营城思想的辅助和补充。

随着周王朝的统治日趋衰落，进入了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变革年代，《管子》所阐述的城市思想，明确转向重视经济与国民，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心的主要是城市作为经济活动场所的层面。从而，城市的功用从重礼制转而为重实用，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是大环境下的产物。《管子》集众人、耗长时以融汇之，并承前启后——总结三代时期城市建设、博采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发展的成果与经验。后代此类的城市的营建由此可归之于《管子》的营城类别。

《管子》的城市管理思想全面而系统，在治理城民、巩固城防、加强军备及发展经济诸方面都能够行使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其大致包括礼法并重的政治管理思想；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农业政策与土地制度）；以轻重之术为主的经济实施方略；“通商工，便鱼盐”的发展工商业政策；“相地而衰政”的赋税制度与“作内政而寓军令”的军事制度；等等。对务实的大力提倡，对经济的大力发展，及对国民的大力维护，构筑成《管子》城市思想的基石。政治、经济、农业、国民、军队等方面的策略，息息相关、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作为城市管理思想在对“城”的规划、建设和防护中缺一不可。

《管子》中最突出的营城思想是关于城市地域、分布、构造、功能等城市选址、地形、规模、分区、人口、生态及水利等的。本书以实用为总导框架，以“因天材，就地利”、定民说等思想为脉络，从城市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及水文学等方面进行归类，辅以地宜论和包含水性、水类及水质的水文概念，详细论述了《管子》中有关的城市规划思想。《管子》的营城思想（即城市规划思想）得以大致成型。（1）城市地理学思想。《管子》中的“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论述，说明最好的基址处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上，“大山”与“广川”之间是适合城市发展的地形。《管子》认为“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无论是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还是内部的局部扩展，都体现了不规则城墙与道路的灵活性与优越性。《管子》提出“壤列”的多核心同心圆模式地域分级管理制度：城市体系就好好比人体的头颈、手臂、腿脚等一般，是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管子》从几个实际方面确定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礼制等级；城乡比例；城区大小与居民多寡的关系；城区大小与土地多寡的关系。（2）城市社会学思想。《管子》中的行政组织是一个层层相因、上下相关的有机网络。《管子》人口思想的基本点是增加人口。提出按职业划分居民为士、农、工、商的分民思想，使他们各有所处，各尽其责，各安其业。（3）城市生态学思想。《管子》描述了植物与生态因子的关系和植物群落特征；划分土类类别，说明不同土壤中适宜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管子》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同时，主张保护自然资源，使有限的自然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反对滥用自然资源。（4）城市水文学思想。《管子》对“水”的认识和论述主要集中在水的意义和作用上。对水利

工程的组织、准备、分工和实施等有着全面的考察、细致的观测、科学的分类、精确的表述,并将水害防治与水利建设的有机结合,实施常年防洪之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管子》营城思想的实践性,可从东周以前先民的营建活动中得到验证。从史前聚落到史前城址到夏商西周三代城址,都强调对水源的需求、充分利用周围环境因地制宜的实际经验等等。这其中经历了浅—广—深的必然发展阶段,经过不断总结与归纳最终在《管子》一书中升华为系统的思想理论。

三、《管子》城市思想的实证及理论上的横向比较

临淄是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管子》的城市思想虽说并不是其营建的范本,然而对其最后成型,《管子》城市思想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由于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等的影响,《管子》中的城市思想不可能完全在单座城市中体现出来,即便是后世的都、城也没有完全照搬某一家、某一类城市思想的。因而,本书仅借临淄城作为引子,来打开深入研究《管子》城市思想的渠道。

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抽象的和具体的功能,本书所讨论的《周礼》和《管子》的城市思想就分别在以上两种功能中具有代表性。比较二者具有互补的意义。如果在实际的城市规划工作中将这两种城市思想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确立城市的中心地位、发挥其辐射作用、深化其不同于农村的独特内涵,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值得探讨。

四、《管子》城市思想务实的实践运用体系

《管子》城市思想在城市营建的实践中,可从总体上分为适用性原则及可持续性发展策略两种。并以此二者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对南宋临安、宋元泉州、隋江都及唐扬州及明清赣州等实例进行分析,总结出:在后世城市的营建思想中,只要是以适用性原则及可持续性发展策略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的,均归为《管子》类城市思想。经详细考察一些府城及县城的方志资料,了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经营活动,以此研究《管子》城市思想在其中的反映与作用。最后通过论述城市经营活动日常维护与军事防御的普遍性,形成《管子》城市思想的城事防御论,即城市经营务实论。

五、任务与展望

现代城市总体规划中,能源、交通及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对于保障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城市的合理运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将《管子》营城思想延续过来,仍具有战略意义。而《管子》的城市管理思想在政治、

经济、军事方面的全面性，也值得借鉴。《管子》城市思想的实用性不仅在于其内容，而且在于其因应而务实的特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为时代所限的不足之处，在此不详述。

在完善而系统地研究《管子》城市思想之后，该如何更全面地将其运用在现代城市规划与管理当中，是接下来所要面临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但也是所期待的……

图 录

图 3-1 西周时期齐国位置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17-18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节选增绘)

图 3-2 春秋时期齐国位置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26-27 “春秋时期齐鲁”图节选增绘)

图 3-3 战国时期齐国位置示意图

(根据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39-40 “战国时期齐鲁宋”图节选增绘)

图 3-4 齐地水系示意图

(引自叶晓军, 中国都城历史图录, 第一集: 132)

图 5-1 有关磨折

(引自戴吾三, 考工记图说: 144、145、149)

图 6-1 内蒙古白音长汗(南区)环壕聚落示意图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30)

图 6-2 西安半坡聚落(前期)环壕结构复原示意图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30)

图 6-3 陕西临潼姜寨一期环壕聚落示意图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30)

图 6-4 赤峰西山根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36)

图 6-5 登封王城岗遗址第二期遗迹分布图

(引自钱耀鹏, 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中原文物, 2001, 1: 35)

图 6-6 河南鄆城郝家台遗址位置图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1)

图 6-7 淮阳平粮台城址平面图

(引自钱耀鹏, 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中原文物, 2001, 1: 36)

图 6-8 章丘城子崖城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16)

图 6-9 阳谷景阳岗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18)

图 6-10 五莲丹土城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0)

图 6-11 凉城老虎山城址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0)
图 6-12 包头威俊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2)
图 6-13 天门石家河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4)
图 6-14 荆门马家垸城址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5)
图 6-15 荆州阴湘城城址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5)
图 6-16 石首走马岭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6)
图 6-17 沔县城头山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6)
图 6-18 新津宝墩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27)
图 6-19 都江堰芒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7)
图 6-20 郫县古城遗址平面图
-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7)
图 6-21 崇州双河遗址平面图
-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77)
图 6-22 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4)
图 6-23 偃师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5)
图 6-24 郑州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6)
图 6-25 安阳殷墟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58)
图 6-26 周原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1)
图 6-27 丰镐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3)
图 6-28 洛邑遗址平面示意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4)
图 6-29 焦作府城城址平面图
-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5)
图 6-30 山西垣曲商城城址平面图
- (引自萧红颜. 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 148)

图 6-31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7)

图 6-32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68)

图 6-33 房山琉璃河遗址平面示意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70)

图 6-34 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74)

图 6-35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引自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75)

图 7-1 淄济运河
(摹自王育民.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上: 248)

图 7-2 齐故都地势示意图 (自绘)

图 7-3 齐故都临淄城遗址
(改绘自群力. 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 图 1)

图 7-4 齐故都水系图 (自绘)

图 7-5 齐故都分区图 (自绘)

图 7-6 齐故都街道图 (自绘)

图 8-1 聂崇义所绘王城图
(引自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54)

图 8-2 戴震所绘王城图
(引自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54)

图 8-3 王城城内各级道路横剖面示意图
(引自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130)

图 8-4 王城城廓干道网规划概貌图
(引自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132)

图 8-5 王城基本规划结构示意图
(引自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51)

图 8-6 明南京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03)

图 8-7 南京六朝都城平面示意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54)

图 8-8 明代南京城简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132)

图 8-9 明代南京皇城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131)

图 8-10 金陵古水道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07)

图 8-11 明都城图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36)

图 8-12 明南京街市图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33)

图 8-13 明南京城图(复原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130)

图 8-14 明代天启年间成都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05)

图 8-15 清光绪二十年成都城池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05)

图 8-16 成都秦城、清城位置示意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142)

图 8-17 清光绪三十年成都城市测绘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06)

图 8-18 四川成都水利全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86)

图 9-1 杭州城址变迁沿革示意图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 221)

图 9-2 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96)

图 9-3 南宋临安城市总体布局概貌图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09)

图 9-4 南宋临安城市规划概貌图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616—617 夹页)

图 9-5 泉州历代城垣变迁图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535)

图 9-6 宋元时期泉州城市轮廓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102)

图 9-7 泉州城附近港口分布图

(引自庄林德等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 101)

图 9-8 扬州海外交通图

(引自董鉴泓主编. 中国城市建设史: 48)

图 9-9 隋唐扬州城

(引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528)

图 9-10 隋江都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引自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下册: 5)

图 9-11 唐扬州城平面分析图

(引自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下册: 5)

图 9-12 唐代扬州城市总体规划结构示意图

(摹自贺业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529)

图 9-13 扬州历代城市变迁图

(摹自董鉴泓主编. 中国城市建设史: 49)

图 9-14 明代赣州府赣县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45)

图 9-15 清代赣州府城街市全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547)

图 9-16 赣州城福寿沟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246)

图 10-1 清汀州府图

(引自〔乾隆〕汀州府志)

图 10-2 清汀州府里至总图

(引自〔光绪〕长汀县志)

图 10-3 清汀州城池图

(引自〔光绪〕长汀县志)

图 10-4 汀州历代城址变迁图

(引自汤家庆. 古代汀州城的变迁. 长汀文史资料. 第 10 辑: 49)

图 10-5 《永乐大典》“广州府境之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0)

图 10-6 清广州府城廓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0)

图 10-7 最早广州府舆图

(引自广州历史地图精粹)

图 10-8 清末广州城及近郊图

(引自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图 10-9 广州古代城址变迁示意图

(引自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图 10-10 清“重浚广东省城六脉渠碑”局部

(引自广州历史文化图册: 102)

图 10-11 光绪广州府志六脉渠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3)

图 10-12 广州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93)

图 10-13 清潮州府疆域总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48)

图 10-14 清潮州府城疆域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49)

图 10-15 永乐大典潮州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48)

图 10-16 光绪海阳志潮州府城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49)

图 10-17 清归德府总图

(引自 [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图 10-18 清归德府城池图

(引自 [清·乾隆十九年] 归德府志)

图 10-19 归德府段黄河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327)

图 10-20 商丘古城平面图

(引自 <http://bbsimg.dahe.cn>)

图 11-1 海塘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437)

图 11-2 苏州齐门古水门纵剖面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519)

图 11-3 郑州商城夯土墙横断面示意图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0)

图 11-4 赵都邯郸王城西城南端排水槽道

(引自吴庆洲. 中国古城防洪研究: 12)

图 11-5 《武经总要》中的壕桥和折叠桥

表 录

- 表 5-1 《管子》中的城市地域选定因素
- 表 5-2 我国城市所在的不同地形类型
- 表 5-3 《管子》中的城市功能分区
- 表 5-4 《管子》中的行政组织
- 表 6-1 聚落遗址列表
- 表 6-2 史前城址列表
- 表 6-3 夏商西周时期城址列表
- 表 7-1 《管子》营城思想与齐都临淄考古资料简要比照
- 表 8-1 《管子》与《周礼》城市思想的比较
- 表 10-1 汀州之建置沿革
- 表 10-2 汀州之城市思想
- 表 10-3 广州府沿革表
- 表 10-4 广州府各县城的营建
- 表 10-5 广州府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 表 10-6 潮州府各县城的营建
- 表 10-7 潮州府各城之城市思想总结

参考文献

一、古代文献

- [1] 赵守正译注. 白话管子. 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 [2] 颜昌晓. 管子校释.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 [3] 李文娟、李远燕译注. 管子.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1.
- [4] 孙波注释. 管子: 注释本.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5] 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 管子直解.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吴文涛、张善良编. 管子(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 [7] 戴吾三编著. 考工记图说.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 [8] 孙诒让注疏. 周礼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9] 林尹注译. 周礼今注今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 [10] 陈成国点评. 周礼·礼仪·礼记. 长沙: 岳麓书社, 1989.
- [11] 永乐大典.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2] 赵尔巽等. 清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3] [明] 董说. 七国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4] [清] 姚彦渠. 春秋会要.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55.
- [15] [春秋] 孙武; 周亨祥译注. 孙子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16] [北魏] 酈道元; [清] 汪士铎图; 陈桥驿校释. 水经注图.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 [17]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 [18] [南宋] 王象之. 輿地纪胜.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1.
- [19] 顾炎武. 历代宅京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0]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1] [民国九年] 临淄县志.
- [22] [清·乾隆] 汀州府志(长汀档案馆藏书).
- [23] [清·光绪] 长汀县志(长汀档案馆藏书).
- [24] [宋] 胡太初修、赵与沐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福建地方志丛刊: 临汀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 [25] [清·乾隆] 周硕勳纂修. 潮州府志. 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潮州市档案馆编印.
- [26] [清] 周硕勳纂修. 乾隆潮州府志.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据光绪十九年(1893)重刻乾隆四十年本.

- [27] 陈香白辑校.潮州三阳志辑稿.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 [28] [清]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光绪五年]刊本影印.
- [29] 栾星审定;杨子建、莫振麟等校点.归德府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30] [清·乾隆十九年]陈锡轺修;河南省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峻峰校注.归德府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31] [清·乾隆]郑澐修、邵晋涵纂.杭州府志.
- [3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3] [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高履泰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 [3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市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二、现代文献

- [1] 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 [2] 吴庆洲.中国古城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3] 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 [4] 董鉴泓主编.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 [5] 贺业钜.中国古代规划史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 [6]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 [7] 叶晓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 [8]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 [10]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11]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
- [12] 李锋.商代前期都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 [13]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 [14] 萧红颜.东周以前城市史研究(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南京:东南大学,2003.
- [15]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16]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17]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18]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19] 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 [20] 李洁萍. 中国古代都城概况.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 [21] 李洁萍. 中国历代都城.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 [22] 刘德岑. 古都篇.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 [23] 中国古都学会编. 中国古都研究. 第二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 [24] 中国古都学会编. 中国古都研究. 第三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25] 中国古都学会编. 中国古都研究. 第五、六合辑.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3.
- [26] 中国古都学会编. 中国古都研究.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27] 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 十二.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28] [德] 阿尔弗雷德·申茨. 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 梅青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29] 李孝聪. 历史城市地理.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
- [30] 任重、陈仪. 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1] 程存洁. 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2] 肖建乐. 唐代城市经济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3] 吴刚. 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4] 李孝悌编. 中国的城市生活.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35] 阎崇年. 中国都市生活史.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7.
- [36] 史卫民. 都市中的游牧民: 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6.
- [37] 葛永海. 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38]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倪文产、宋俊岭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 [39] 庄林德、张京祥编著.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40] 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 中国城市发展史.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 [41] 董鉴泓主编. 中国城市建设史.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 [42] 张承安. 城市发展史. 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 [43] 戴钧良. 中国城市发展史.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44] 马正林编著.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45] 许学强、朱剑如. 现代城市地理学.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 [46] 许学强编著. 城市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 [47] [日] 山鹿诚次. 城市地理学. 朱德泽译.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
- [48] 张钟汝等编著. 城市社会学.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1.
- [49] 康少邦、张宁等编译. 城市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 [50] 于志熙. 城市生态学.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2.
- [51] 沈清基编著. 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8.

- [52] 朱元胜、金光炎. 城市水文学. 北京: 中国科技出版社, 1991.
- [53] 周乃晟、贺宝根. 城市水文学概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54] 郑连第. 《中国水利史》小丛书古代城市水利.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5.
- [55] 傅崇兰. 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56] 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57] 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 历史·现状·展望.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58] 杨继瑞. 中国城市用地制度创新.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 [59] 汪美球、刘荣芳、蔡渝平编著. 城市学.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8.
- [60] 叶舜赞主编. 城市化与城市体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 [61] 吴春明、林果. 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 [62] 郭德维. 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63] 何忠礼主编.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9.
- [64] 刘建国. 古城三部曲: 镇江城市考古.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
- [65] 沈亚虹. 潮州古城研究: 论潮州古城的形成发展及其布局的科学性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1984.
- [66] 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 [67] [瑞典] 龙思泰. 早期澳门史. 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注.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 [68] 临淄文物志编辑组编. 临淄文物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 [69]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临淄区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70] 临淄文史资料选辑. 各辑.
- [71] 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临淄巡古》编辑组. 临淄巡古.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 [72] 李文生、张鸿祥主编. 走进长汀.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0.
- [73] 长汀文史资料. 各辑.
- [74] 潮州文史资料. 各辑.
- [75] 广州文史资料. 各辑.
- [76] 商丘文史资料. 各辑.
- [77]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78]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 中国建筑史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 [79] 刘敦桢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 [80] [日] 伊东忠太. 中国建筑史. 陈清泉译补.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81] 刘叙杰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一卷. 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82] 龙庆忠. 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0.

- [83]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84]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 [85] [英] 帕瑞克, 纽金斯. 世界建筑艺术史 (第二版). 顾孟潮、张百平译.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吴庆洲. 中国军事建筑艺术.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 [86] 杨鸿勋. 宫殿考古通论.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1.
- [87]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编. 建筑历史与理论. 第 3、4 辑 (1982~1983 年度).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 [88] 杨鸿勋、刘托主编;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编. 建筑历史与理论 第 5 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 [89]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 [90] 李国豪主编、喻维国、汪应恒副主编. 建苑拾英: 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0.
- [91] 李国豪主编、喻维国、汪应恒副主编. 建苑拾英: 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 第二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 [92] 刘致平、王其明增补. 中国居住建筑简史: 城市、住宅、园林 (附四川住宅建筑)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 [93] 贺业钜. 建筑历史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 [94]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95] 孙宇文. 中国建筑与哲学.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 [96] 王振复. 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97]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0.
- [98] 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99] 杜金鹏、焦天龙. 文明起源史话. 中华文明史话.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 [100] 王震中.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101] 杨宽. 古史新探.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02] 鲁仲文. 中华文明史. 第二卷. 先秦.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 [103]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 二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 [104] 李学勤主编.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105] 李学勤.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106] 李衡眉. 先秦史论集. 济南: 齐鲁书社, 1999.
- [107] 许倬云. 西周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08] 顾德融、朱顺龙. 春秋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2001.

- [109] 杨宽. 战国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110] [日] 五井直弘. 中国古代史论稿. 姜镇庆、李德龙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11] 季啸风编.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中国历史研究. 第2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 [112] 季啸风编.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中国历史研究. 第4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 [113] 吕振羽.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 [114] 谢维扬. 周代家庭形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15] 张秣楠. 商周政体研究.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116] 晁福林.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117] 谢华. 论西周封建.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 [118] 石井宏明. 东周王朝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119] 晁福林. 霸权迭兴: 春秋霸主论. 中华文库.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 [120] 缪文远. 战国制度通考. 成都: 巴蜀书社, 1998.
- [121] 缪文远. 战国史系年辑证. 成都: 巴蜀书社, 1997.
- [122] 何怀宏.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123]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24] 俞伟超. 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 论先秦两汉的“单-? -弹”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25]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26] 费孝通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 [127]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128] 李炳海. 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129] 靳怀堦. 中华文化与水. (上、下).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05.
- [130] 王闳森、唐致卿主编. 齐国史.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 [131] 项观奇. 悠久的古代历史. 可爱的山东.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 [132] 逢振镐编. 东夷古国史论. 成都: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1989.
- [133] 李新泰. 齐文化大观.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 [134] 王志民主编. 齐文化概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135] 宣兆琦、李金海主编. 齐文化通论(上、下).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 [136] 《管子学刊》编辑部编. 齐文化纵论.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3.
- [137] 齐文化研究社编. 齐文化研究十年论文选编. 1999.

- [138] 黄松编. 齐鲁文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 [139] 孟祥才、胡新生. 齐鲁思想文化史: 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140] 谢治秀主编. 齐鲁文博: 山东省首届文物科学报告月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141] 张龙海主编. 齐俗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142] 张龙海. 临淄拾贝. 2001.
- [143] 白奚. 稷下学研究: 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44] 胡家聪. 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45] 王迅.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146] 徐树梓主编. 姜太公新论.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
- [147] 张连伟. 《管子》哲学思想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 [148] 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赵宗正、王德敏编. 《管子》研究. 第一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 [149] 《管子学刊》编辑部编. 管子与齐文化.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 [150] 王德敏、刘斌等. 管子十日谈.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 [151] 王海峰、林勇斌. 《管子》一日一语.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52] 管子学刊. 各辑.
- [153] 高正. 诸子百家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54] 干春松、孟彦弘编.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下).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155]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新译本). 杨东莼、马雍、马巨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 [156] 李开元.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57] 王树民. 中国史学史纲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58] 金景芳. 论井田制度.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159] 万国鼎编著. 中国田制史. 南京: 正中书局, 中华民国 26 年再版.
- [160] 陈登元编著. 中国土地制度. 上海: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 23 年三版.
- [161] 徐喜辰. 井田制度研究.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 [162]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 中国水利史稿.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9.
- [163] 彭云鹤. 明清漕运史.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164] 吴申元. 中国人口思想史稿.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165] 罗桂环、舒俭民编著. 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5.

- [166] 袁祖亮. 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 [167] 杨子慧主编.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6.
- [168] 李普国. 《周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 [169] 葛剑雄.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70] 顾颉刚、史念海. 中国疆域沿革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71]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历史地理. 创刊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172]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历史地理. 第五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173] 侯仁之.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 [174] 黄盛璋. 历史地理论集. 人民出版社, 1982.
- [175] 史念海.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一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176] 刘德岑. 中国历史地理丛书.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 [177] 王育民.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上、下).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 [178]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历史地理研究 [1].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179] 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180]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8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0 年修订本) (第三版). 第一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82]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183] 赵纪彬. 略论先秦哲学思想的起源、派别和成就. 出版社, 1963.
- [184] 张云飞. 中国农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
- [185] 覃光广等主编. 文化学辞典.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 [186] 韩建业、杨新改. 五帝时代: 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 [187] 俞伟超.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188] 老弓编著. 发现之旅: 中国考古大揭秘.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1.
- [189]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集刊 (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90]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集刊 (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91]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集刊 (3).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 [192] 安金槐主编. 中国考古.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93] 许虹、范大鹏主编. 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 中国最近 20 年 32 次考古新发现.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 [194] 淄博市博物馆编. 文物考古与齐文化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 [195] 栾丰实. 东夷考古.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 [196] 栾丰实.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197] 张学海. 张学海考古论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198] 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编. 河姆渡文化研究.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199] 叶晓军编. 中国都城历史图录. 第一、二集.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
- [200] 刘镇伟主编. 中国古地图精选.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5.
- [201] 谭其骧主编.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 [202] 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精装本). 第一—八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 [203]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原始社会、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上海: 中华地图学社, 1975.
- [204] 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绘.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205] 顾颉刚、章巽编著; 谭其骧校订. 中国历代地图集. 古代史部分. 上海: 地图出版社, 1955.

后 记

本书很荣幸蒙邀加入吴庆洲教授主编的“城市营建史书系”。吴先生在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各个方向均研究颇深，并有相当的造诣，而在城市营建史方面的修为，于先生所著的《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一书中即有深刻体现。本书来源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承蒙先生之器重，从立意、开题、撰写、修改到完篇，都离不开先生的殷殷指教。无论是专业的学习还是论文的完成，先生无不倾注其相当的关注。这次将要出版，先生更是亲自审阅书稿，不仅从大处，如从与城市营建息息相关的水系等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指引方向，还对文中某些观点的阐述提出更为详尽的解释，甚至在细微处如引文、句逗及错字等都进行了纠正。先生还为我提供了许多相关的书籍进行参考，并无私地将他在《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一书中清晰精美的电子版插图交予我供我引用……诚惶诚恐，感激涕零！感激之余望以区区之浅学全力以赴攻克“《管子》城市思想”此高山大壑之一角。故文中倘有管窥、井蛙之见，敬请诸师友指教、海涵。

感谢先生一直以来的悉心栽培与爱护！先生渊博的专业知识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

感谢《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先生、国家规划司汪德华先生的慷慨赠书，感谢龙岩财校校长胡泮基先生、广州地方志办公室林若广先生在资料收集上的热情协助，还要感谢提供书籍和资料的长汀档案馆与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感谢肖旻、冯江等学友、同事及身边的朋友多年来的鼎力相助！

感谢亲爱的爸爸、妈妈、姐姐、姐夫，还有那个称我为“姨亚”的小伙子（当年的小人儿已长大啦），谢谢你们总是在我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候，及时地出现在我的身边，并不断给予着鼓励与理解。我爱你们！

最感谢亲爱的“爸比”，谢谢这一路走来不懈的相依相伴和默默的全力支持。此次在通宵达旦、紧张的书稿修改过程中，更是彻夜相伴扫描、处理文中的插图，帮助校对。值此之际，我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成果、我的小精灵——咬咬，脱离婴儿期步入幼儿期了，两周岁啦！成长中的宝宝带给我的点点滴滴的快乐足以消去我一切的不安、烦恼与失落！“爸比”稳如磐石供我依偎依靠，宝宝清如泉水教会我许多的为人处世，是你们分担了

我的苦与累，给予了我人生的喜悦！谢谢！谨以此书献给你们——我的至爱！

也感谢我自己，无意之中的把握机会，使得收获了一大片柳荫下的清风与明月。“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是我的人生追求。人说知足常乐，是也！

.....

秋风卷起的总是知它、懂它的叶，一片又一片……
谢谢！

责任编辑：常 燕

封面设计：赵一潜

经销单位：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

网络销售：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博库书城 <http://www.bookuu.com>

图书销售分类：城市规划·城市设计（P10）



ISBN 978-7-112-12667-5



(19974) 定价：42.00 元